

三联生活周刊

® 2016.7.18
2016年第29期
www.lifeweek.com.cn

法理、政治与善恶选择

聂树斌案再审之价值



895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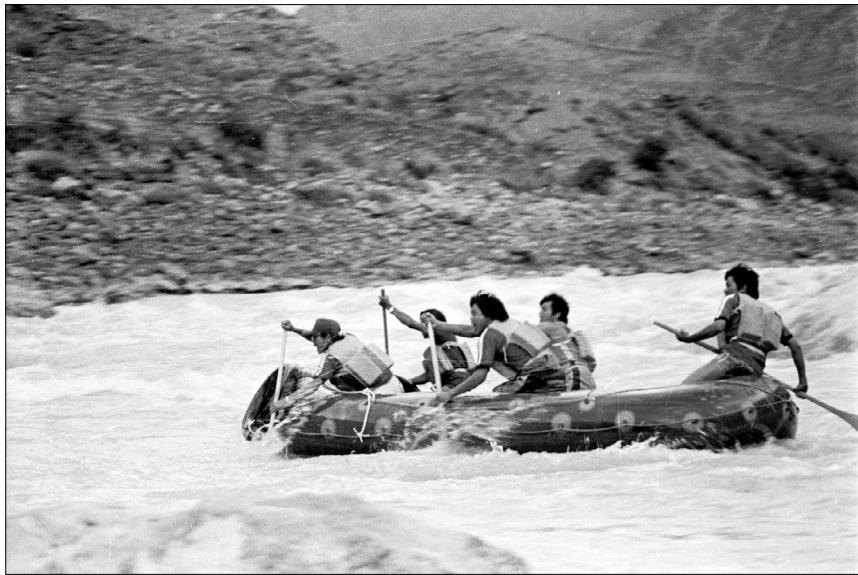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 元



P32 封面故事
法理、政治与善恶选择
聂树斌案再审之价值

- 34 “聂树斌案”的再审之路
- 52 聂案众生相：22年生死两茫茫
- 62 张焕枝，不容易
- 70 错判，还是错放？
- 78 错案率4.1%：“控辩交易”与“洗冤工程”并峙的美国司法



P86 往事：那群 30 年前，在长江激流中搏命的人

社会	书与人：别想从奥兹那儿得到答案	156
往事：那群 30 年前，在长江激流中搏命的人	86	
教育：从公立到国际：转学背后的教育理念	96	
经济	专栏	
市场分析：房产税传闻再起	邢海洋：人民币的 6.80 共识	18
商业：飞行者波音的 100 年	苗千：第五种力？	148
	张斌：那一夜 这一夜	150
	宋晓军：奥巴马要借用萨德扮演“硬汉”	151
	朱伟：李陀：文学的地平线 (4)	164
文化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艺术：画家的藏画：谁是谁的热爱？		
专访：白谦慎访谈：“审美”的疑思		
话题：美国同性恋“骄傲游行”里的政治范儿		
图像：迈泰奥拉：最高机密	环球要刊速览	23
戏剧：奥斯特玛雅：戏剧只是我谋生的手段，	读者来信	24
这很讽刺	天下	28
电影：阿巴斯：伊朗电影巨匠	理财与消费	168
科技：集体记忆：不完美的过去	好消息・坏消息	22
思想：翻转时间之镜		
书评：那些看不见的危险		

(本期封面绘图：张曦)

2016年第29期，总第895期，2016年7月18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玲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楚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uan 刘凌 Liu Ling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阿润 A Run 赵雯珺 Zhao Wenjun 李晓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刘小荻 Liu Xiaodi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孟佳 Meng Jia 赵卓 Zhao Zhuo 夏青 Xia Qing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 : ¥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甘肃省旅游局

3 · 红牛

9 · 腾讯

11 · 腾讯

19 · 中华瑰宝

69 · 头条传媒

116~117 · 野生救援

123 · 周刊征订

143 · 周刊松果广告

147 · 腾讯软文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WWF

封底 · 力度形象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网址：www.vtpower.com.cn



夏日阅读： 世界的另一个入口

“夏日阅读”，对我而言极富画面感。脑中浮现的，不是电子屏，是捧着的书本——带纹的纸张，漂亮的铅字，隐隐的墨香。近40℃的酷暑，树荫下竹椅上，一个小女孩，一本砖头厚的书——没有空调的年代，这是唯一能让上小学的我安静下来、有滋有味欢度而非熬过暑假的良方。书中的世界，更多异于个人体验，打开这扇窗，世界的多样性渐渐丰满。无师自通的繁体阅读，花哨复杂的长句式，严谨的逻辑关系递进，读得多了，就见到了长进，成了语文老师眼中的优秀生，数学老师口中天资聪颖的好学生，那套翻烂了的《十万个为什么》知道进步何来。虽然从事研究工作，每年读书无数，但年少时那只为愉悦的读书最让我怀念。

武汉 孟晓雨

圩也围不住

老家安徽桐城近日的水灾牵动人心。央广网桐城7月6日消息，受持续降雨影响，桐城境内灾情严重。目前桐城市境内姜团圩、包兴联圩等4个万亩圩口全部漫破，数万亩农田被淹。武警等救援力量正在逐户搜查撤离被困群众，确保一个不漏。这意味着，前一阶段加固圩堤的工作已告一段落，现在转入灾后救人的安置环节了。

岳父现在跟我住在远离故乡的城里，他年轻时曾经在这些万亩圩口奋战过。那时候冬天兴修水利，他曾经连续几个月吃住都在圩堤上。他对这些大圩是有记忆有感情的，听到这些万亩圩口全部漫破的消息，岳父怅然若失，叹息了很久。圩破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自然会有重大损失，这一点是肯定的。前一阶段，干部群众为保圩而做出的奋斗牺牲，是非常感人的。但万亩圩口全部漫破，需要反思的东西也很多。岳父静静地眼望窗外，似乎回到了当年修圩的现场。

“圩多了也不好，你看那条条圩埂，将河道挤得缩成了一条线，洪水来了，不破才怪呢。”岳父说。说实话，当老家大圩全破了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在农村长大，对于那道道圩埂相当熟悉，它像一条条坚固的绳索将河道捆得紧紧的，然而河水有它的泛滥区域，现在人为地或者说过分地限制了它，物极必反，它当然要还人类以颜色了。不由得，我想起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在南亚等一些国家，野生象经常出来糟蹋人类的庄稼，有时还伤人。有专家就指出，这是人类侵占了野生象的领地，它们生存的空间被一再压缩，没办法，它们才出来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而与人类抗争。其实，洪水来犯不也是这个道理么？！

说到这里，就涉及一个宏大的主题，那就是人对自然的敬畏问题。不

可否认，当年筑圩拦水围湖造田，对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洪水袭来时，我们为保圩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及至圩破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水退后，我们又开始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就这样周而复始没有休止。也就是说，在自然面前，人类以前采取的方法是主动进攻，一心想征服自然战胜灾害。其实，有些自然灾害或者说这些灾难的扩大化，正是我们人类对自然的冒犯引起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否可以退一点？将自然的还给自然，人与自然各安其位，这样也许才能最大限度地相安无事。就以圩口为例，对于那些范围太大又实在有违泄洪天然需求的大圩，可否将圩内人口迁出，将圩还原成永久性的沼泽地和湿地？沼泽地和湿地并非毫无价值的荒地死地，其作用与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当然，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规划调整，需要有关部门审慎思考。

江苏常州 周二中

不要低估了贫困

老早就听人说“其实贫困县不穷，日子过得比很多地方还舒服”。我开始是不信的。前几年，有报道说一个县打出了“热烈庆祝我县获得国家级贫困县称号”的大幅标语，我似乎有点信了，觉得贫困县未必真穷吧。等我来到国家级贫困县挂职后，最想说：“千万不要低估贫困！”在此，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闻。

去年这里的财政自给率不到15%。这可以非常直观地说明这里的经济状况。或许再与其他地方比较一下更能看出差距。我工作的地方是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就与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比较吧。这两个县都是山区，都是全国产茶大县，前者盛产安化黑茶，后者盛产铁

观音，并且从县名来说只有一字之差，从面积来说，安溪县只有安化县的约60%，但财政收入却是安化县的3倍！安化县有些乡镇有200平方公里，但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一二十万元，比不上一些小康之家一年的收入，也比不上“北、上、广、深”很多市民一年的工资。全县的贫困人口占了总人口的10%。

再从交通来看。安化县距益阳市区132公里，由于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高铁，县城到市区开车单程要两个半小时。有时去市里开会，会长50分钟，我在路上来回的时间要5个小时；有时会议特别重要，要求早上7:50入场，而清晨山雾很大，行车危险，就要提前一晚去市区。去年，贵州省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但安化县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据悉6月底二广高速安化县到邵阳市这段将通车，但是县城到益阳市区的高速公路还正在修建中。由于安化县是山区大县，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有60多座，有的乡镇离县城有120多公里，修路如果要取直，不可避免的桥梁隧道会很多，造价就会很高，为了节约资金，一般都是盘山路，狭窄弯多，下暴雨经常有山体滑坡，所以即使开车，时速也就30多公里。有的地方没有桥，还要过轮渡，晚上从安全角度考虑一般渡船也不开，群众到县城特别不方便。很多山上的住户要走差不多两小时的泥巴路才能看到水泥路，

也有一些老百姓从来没到过县城。

其实这里物产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大片的原始次生林，出产木材、药材，水果、水产也丰盛，黑茶、绿茶、红茶都有；生态也保护得特别好，旅游资源非常密集，有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石漠化公园等。交通不便导致来这里的游客还不多，山货外运也不便捷。这里的群众都很勤劳，一点点平地都开垦出来种菜，但是由于交通原因收入不高，一些老百姓一年到头看不到几次百元大钞。

谈论这些状况，并不是嫌弃这里，也不是觉得自己在这里工作多艰苦，我在县城里工作生活还是非常便利的。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真的误以为贫困县其实不贫困，也希望各地客商能来这里发现商机，通过投资兴业帮助这里脱贫致富。

湖南安化 甘正气

乡村的变与不变

前不久，因同学阿伟的母亲吴阿姨因病去世，我和儿时的一干玩伴便回到村里为吴阿姨送殡。虽然国家一直提倡火葬，但在很多农村，土葬仍然盛行，我的家乡也不例外。

阿伟家距离村头墓地比较远，大约有四五里路程。按照家乡规矩，中午10点左右就要出发，把吴阿姨的棺木抬到墓地下葬。和我印象中儿时村里送殡场景不同，

现在棺木已经不是靠人去抬，只见一辆经过改装的拖拉机吊起棺木后一溜烟地驶向墓地，很快伴随着吴阿姨的入土为安，送葬活动便宣告结束。

返程路上，看着运载棺木的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而去，我不禁想起了儿时乡村的送殡场景。那时候，老人的棺木都是靠村里晚辈们手抬肩扛从家里运到墓地的，因棺木沉重，路途也不近，棺木往往需要八九个人合力抬着，一路上如有体力不支者，还得根据需要换人。虽说抬棺是一项累人的体力活，但无论是老人的近亲，还是同村的晚辈，在这种场合下，没人会吝惜体力的。都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老人辛劳一生，最后一程由村里或邻村后辈抬着他走完，是他应得的回报，此时的乡村就像一个大家庭。可如今，乡村老人去世，村里晚辈抬棺的几乎再也寻觅不到，以至于在今日乡村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职业：有人专门把拖拉机进行改装，做起了运载棺木的生意。虽说存在即合理，而有些变化总让人难以接受，毕竟儿时的乡村在经济上虽不如今日，拖拉机这种机械也不如今日普遍，但骡马等牲畜每家倒是都会喂养一两头，可也没见过谁家冒出了送葬时用骡马车托运棺木的念头呀？

阿伟听了我的吐槽，摇

摇头对我说，在今天乡村，用拖拉机运载棺木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在不要说在城市，即便在乡村，找人干点活，一天的工钱至少也要100到150元，中午还要管一顿饭。抬棺是一个累人的活，虽说用不了一天，但给少了也没人干，八九个人的工钱算下来，还不如雇辆拖拉机划算。阿伟的话出乎我的意料，现在农民打工，工钱比过去增加不少是好事，可即便在外工钱再高，村里有事，情字为大，还能处处讲钱？阿伟却说，现在是全民言商，你怎么还能要求村民独善其身？过去村里很少见到闲人，不管挣钱不挣钱，都有干不完的庄稼活，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没人会计较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勤劳对于村民来说，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过现在情况早已发生变化，村民们普遍在外面开了眼界，凡事也都开始讲究成本收益了，碰到给钱少的活，很多人都宁愿在家打牌聊天也不愿意去干，更不用说像过去那样帮忙抬棺了。

虽说生活中总有变化，但我还是忍不住对阿伟说，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阿伟却反问我，农民辛苦劳作，一季麦子种下了，一亩地的收入多年来始终也不过几百元，这种不变难道就对吗？

郑州 关晓海





以色列 | 士兵训练

7月6日，以色列军队“卡拉卡尔战斗营”士兵正在进行实战演练。卡拉卡尔战斗营是第一支男女混合军营，成立于2004年，其战斗成员主要为女性。该战斗营基地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与埃及、约旦接壤。在这里没有人会因为性别受到优待，硬女侠随处可见。



法国 | 2016 秋冬巴黎高定时装周

(右图) 7月4日, 2016秋冬巴黎高定时装周上演 Tony Ward 品牌秀。Tony Ward 早年求学于巴黎, 曾与顶级设计师共事。1995年返回黎巴嫩创立了自己的高级定制品牌, 并活跃于罗马高级定制时装周。



葡萄牙 | 2016 红牛悬崖跳水世界系列赛

(左页上图) 7月7日, 葡萄牙亚速尔群岛, 2016 红牛悬崖跳水世界系列赛葡萄牙站, 选手训练中上演花式跳水。悬崖跳水是十分惊险刺激的运动, 红牛悬崖跳水比赛向来以惊险著称。当选手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水面时, 不仅要展现完美的动作姿态, 更需要把握好入水的时间, 否则极有可能受伤。

墨西哥 | 水下婚纱摄影

(左页下图) 据7月6日报道, 一名极具天赋的摄影师为一对新婚夫妇拍摄了一组“消灭婚纱”系列水下摄影。自2009年开始, 摄影师皮埃尔·维奥利 (Pierre Violle) 就一直为新婚夫妇拍摄水下婚纱照。维奥利原是一名法国摄影师, 数年前来到墨西哥, 在那里他被美丽的水下世界深深吸引, 并由此爱上了潜水。在熟练掌握潜水技术后, 他便将这种爱好与职业相结合, 开展了水下婚纱照摄影服务。





中国 | 台风

(左图) 今年第1号台风“尼伯特”于7月8日5时50分以超强台风级在台湾台东太麻里乡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截至8日17时止，台湾农林渔牧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约新台币6.638亿元（约合人民币1.37亿元），以台东县损失最为严重。

英国 | 展示航空史

(下图) 7月6日，艺术家杰拉尔丁·皮尔格林 (Geraldine Pilgrim) 在英国大湖区温德米尔的布罗克霍尔游客中心策划全新节目，这个节目展示了大湖区丰富的航空史。图为一名参加表演的志愿者装扮成20世纪前10年(所谓爱德华时期)的人物形象。



人民币的 6.80 共识

文 / 邢海洋

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3%，比“8.11”汇改当季还要多，同时创下史上最差纪录。季末英国退欧公投更把全球货币粗暴地划归两类：避险和风险货币，人民币“不幸”被划入后者。不过人民币走贬的深层次理由却不在此，有一种观点是，英国脱欧为中国提供了以比正常情况更快的速度贬值自己货币的机会。相当于稳定汇率，央行亟须的是为中国制造提升竞争力，并用尽可能快的贬值速度抑制资金外流。那么，人民币真的如众多机构所预言的，会跌到 6.80 么？

人行曾多次公开澄清“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最近一次，6 月 30 日路透社援引知情人消息称，中国央行愿意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 2016 年跌至 6.8 以支撑经济，当天央行就予以驳斥，称少数媒体误导舆论，助长投机力量做空人民币，人民币因此勉强守住 6.70 防线。路透的调查显示，此前的两周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空头头寸增加了一倍多，升至 5 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早在英国脱欧公投前，鉴于中国经济的疲弱走势，投机者开始下注央行将容忍人民币走低；公投后，尽管英镑拖累了风险货币，人民币走势仍明显弱于韩元、新台币等其他一些区域性货币。相比于周边市场，人民币的缓跌似乎又到了一个节骨眼上，那就是央行的不干预。

按照官方表述，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并不复杂。“参考收盘价”原则是“8.11”汇改的一个核心

改革，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原则是人民币加入 IMF 特别提款权后，2015 年 12 月 11 日开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保持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追随海外市场震荡，本轮人民币贬值的一大特点是央行多次大幅度调低人民币中间价。这当然是按事前制定好的规矩行事，此前当央行试图影响人民币走势时，通常的做法是收盘时刻大笔抛售美元，5 月之后，市场人士几乎看不到央行入市的迹象。而 6 月份，外汇储备意外增加 134 亿美元，为今年以来的最大月度增加额，更佐证了不干预的推测。

“不干预”是汇率自由化的必由之路，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 IMF 的郑重承诺。但有心人发现“8.11”和“12.11”两个汇率之“锚”，似乎并未因先后关系而立新废旧，而是两项并存，给予央行灵活的政策引导空间。如 2016 年 2 月初到 4 月底，美元回调，这段时间人民币以美元为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稳定，结果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调。可到了 5 月份，美元转强，此时，人民币则转以一篮子货币为锚，对美元持续贬值。当然，中间价只是一种指导价，不具有强制性，而最终的汇率由市场决定，央行所做的也可以解释为是追随市场的行为。

早在“12.11”货币篮子形成时，摩根士丹利、法兴银行和野村证券等众多海外机构几乎众口一词，解读为央行将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并一致预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2016 年贬至 6.80。高盛最为保守，也预计至 6.60。尽管贸易有盈余，但海内资本投资机会越来越少，资金稳定外流，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国。与之相应，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只能在资本与货物的双向流动中形成。人民币回到 6.80，一个更接近其公允价值的地方，似乎是当下市场各方力量的共识。尤其是 6.80 意味着今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4.5%，与去年贬值幅度相当，恐怕这也是央行的一个底线，否则，过多的跌势或引发恐慌，招致资本不计成本地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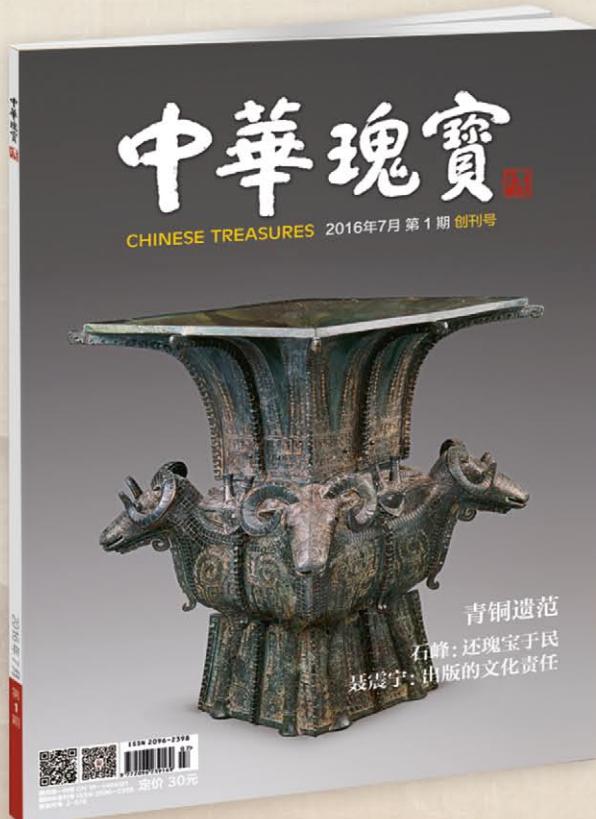
人民币对美元走势



热烈庆祝 《中华瑰宝》杂志创刊！



弘扬民族精神 传承中华文化 发掘文化精髓



主管单位：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内统一刊号 CN 10-1404/G1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2398
邮发代号 2-976 定价：30元/册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杰王府甲12号 传真：010-82599518 邮箱：zhgbyy2016@163.com





栏目插图 | 范薇

美元再崛起？

7月6日英镑续跌，兑美元跌破1.28，较英国公投退欧前的高位1.50跌去约17%。不仅是英镑和欧元，相较于一系列新型市场货币，美元都显示出强劲的升值动力。瑞士宝盛集团认为，相较作为避险资产的日元，美元的市场需求尚未得到完全的展现。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表示，全球央行的政策方针不一致将进一步推动美元的升高。三大世界性央行中，日本、欧洲央行仍将延续宽松策略，英国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实行宽松策略的可能性很高。美国经济稳健，美元一枝独秀的情况很难改变。

意大利银行业

根据欧盟新规，在纳税人救助之前，应该先由银行的股东和债权人进行救助，于是股东纷纷逃离。7月5日，意大利第三大银行西雅那股价、债券暴跌，危机深重的意大利银行业引发全面焦虑。意大利银行业规模在欧元区排名第四，但其持有的不良资产规模约为3600亿欧元，约占欧元区银行业不良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不良资产率已经高达17%。

海外医疗资产

5月，科瑞集团以12亿美元收购英国血浆产品生产商Bio Products Laboratory Ltd.，这是中国企业在制药领域最大的一笔国际收购。同月，复星医药拟参与竞购印度制药企业Gland Pharma Ltd.约96%的股权。在中国，5000家药企无一上榜全球药企50强，激烈竞争还使得价格不断下行。海外并购以提升技术水平的意愿促生了今年并购的“井喷”：今年收购额已过39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总量，相比2012年的总额提升10倍。





GDP 中的“新经济” //

7亿中国人使用智能手机，从顺风车到沙发客，共享正在改变经济结构。而当统计局对递减的GDP数字一筹莫展时，共享将是下一个GDP统计的新亮点。2005年，国家统计局开始统计服务行业，使GDP一下子增加了3000亿美元。实际上，如绿色能源、机器人以及移动通信等“新经济”已被计入GDP，但分享和数字经济等部门被完全忽略了。研究机构莫尼塔有一个“新经济指数”，它发现，在中国统计不足部门的活动占经济活动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脱欧后遗症

7月5日，英国第三大资产管理公司M&G Investments宣布，其旗下的房地产基金暂停投资者赎回。这是英国公投退欧之后，英国第三家房地产基金宣布暂停交易。脱欧恐慌在投资者中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6日，又有三家公司被迫冻结旗下地产基金。房地产基金面临的普遍困境是，卖房子需要时间，而保证金却正在缩水。投资者预期英镑贬值，于是撤离英国，因为随时可撤出资金，向散户开放的基金更容易受到冲击。英国商业地产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打开。

白银时代

7月4日，亚洲时段白银狂涨8%至两年新高，创下5年来最大日涨幅。最近上海期交所白银期货交易量大增，但未平仓合约却在下降，丹麦盛宝银行认为这正是日内投机者入市的清晰迹象。因为成本更低，白银通常比黄金更能吸引投机客。自去年12月跌至5年半低点以来，现货白银价格已经反弹逾50%。又因为人民币汇率走低，中国买家在期货市场大胆押注，继钢铁、煤炭等黑金后又制造了一波白银热潮。



洪灾与 CPI //

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洪水浸泡养猪场的画面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处于历史高点的猪肉价格。可资类比的是，1998年和2010年均是涝年，当年夏粮、蔬菜收获均出现明显下滑，禽畜类死亡率上升和疫情的蔓延，都造成了供给端下降。可具体到整体物价，1998年GDP和CPI双滑落，而2010年GDP和CPI双上涨。可见经济下行周期，通缩环境很难被短暂的自然灾害改变。尤其是，相比1998年，CPI食品类权重已经大幅下调，今年洪灾更难改变经济疲弱带来的物价缓行。



全球变“怒”

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多暴力的时代。这是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为首的研究小组日前在《行为与脑科学》上发出的警告。研究者指出，综合以往数据建立的模型显示，生活在四季分明、气温较低的地区会令人更期待未来、更重视自控，而生活在像赤道附近这样常年高温、四季不明显的地区，则会令人们倾向于以及时行乐、只顾眼前的态度对待生活，从而更易成为冲动犯罪的施行者和受害人。此外，由于在炎热地区人们更倾向于户外活动，也会增加冲突发生的概率。

好消息

好脂肪，可延年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小组对 12.6 万名美国人的膳食与健康状况进行了长达 32 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只要将日常饮食中摄入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总热量的 5%，换成更健康的食源性多不饱和脂肪酸或单不饱和脂肪酸，就可以将死亡风险分别降低 27% 或 13%。

宗教的安慰

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上的论文追踪分析了 8.9708 万美国护士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况后指出，经常参与宗教活动的被调查对象自杀率显著低于没有此种习惯的对照组。每周至少参加一次礼拜仪式的信奉天主教的护士自杀率仅为对照组的 1/20。



坏消息

垃圾熊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小组使用无线定位技术跟踪了 16 只生活在土耳其东北地区的棕熊后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体正在变成名副其实的“垃圾熊”：靠在城市附近的生活堆翻捡食物为生，从而放弃了以往的长途迁徙和觅食习惯。这不仅不利于熊群健康，也会给城郊居民带来威胁。



古老的耐药菌

耐药菌的存在可能比我们认为的久远得多，甚至早于抗生素的发明。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分析了三具印加帝国千年干尸的肠道菌 DNA 后发现，众多基因显示出对青霉素、万古霉素和四环素的耐药性。拥有相同基因的现代耐药菌会导致一系列顽固难治的感染。



一个好消息是，在谷歌上搜索“我想卖肾”的人少了。这不是开玩笑。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在谷歌上输入“我想卖……”的时候，“卖肾”都排在自动填充列表的前三名。现在它已经被“家具”所代替。

——《泰晤士报》说，要了解经济的真实状况，不能去看头条数据，而是要看一些更深层次的、非传统的另类指标

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之中。伟大的激情和肉麻的煽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往往倾向于对前者的可能性嗤之以鼻，给真挚的深情贴上自作多情的标签，这就使我们难以进入那种柔美的境界。

——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廊桥遗梦》

“想入非非的现实主义者”告诉我们说，事情过去一直就是这样，而且将来也一直都要这样。其含义就是，用糟糕的历史来解释糟糕的道德观。

——大卫·W·奥尔，《大地在心》

在我看来，有难度的诗歌是最具有民主性的，因为你做的是使你的听众感到荣耀的事，你把他们想成是聪明的人类。今天这么多民粹主义诗歌都在将人当成傻瓜。在这方面，同时发生的是，对传统的遗忘。

——“20世纪最优秀的英国诗人”杰弗里·希尔
6月30日去世，享年84岁

+

数字

200
MB



微软宣布，利用DNA存储技术完成了约200MB数据的保存，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以及99部经典文学作品。此前已有研究人员证明，

数据可以被保存在DNA之中。不过微软表示，此前并没有任何研究者能一次性向DNA写入如此多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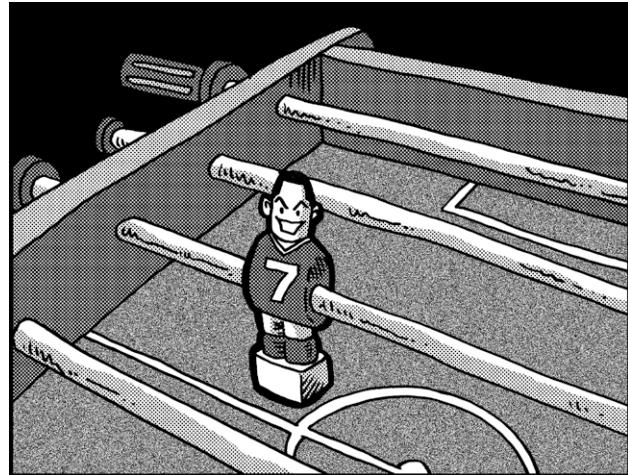
3
倍

澳大利亚柯廷理工大学的物理疗法教授莱昂·斯特雷克称，花太多时间玩iPad及类似的触屏设备可能导致儿童的肌肉和骨骼无法正常发育。玩玩具的孩子活动上肢的次数是他们看电视时的6倍，是他们玩iPad时的3倍。



9
克

《纽约时报》说，西瓜营养丰富，吃西瓜可能会轻微降低血压。尽管西瓜的纤维含量不及其他很多水果和蔬菜，但它不含脂肪，一杯份西瓜中所含的热量仅为45卡路里左右。很多人担心西瓜的含糖量，但同等重量的话，西瓜的含糖量其实比其他一些水果还低。一杯切成丁的西瓜所含的糖分约为9克，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的含糖量为14克到15克。



(插图)



年轻时，我会向众生索要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的：友谊长存，热情不灭。如今，我明白只能要求对方能力范围之内的：做伴就好，不用说话。而他们的情感、友谊和操守，在我眼中仍完全是一种奇迹，是恩惠的完全表现。

——加缪



花园里有只刺猬

文／上官莫
图／谢驭飞



她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安稳日子。不是找到长期饭票的安稳，而是岁月静好的平和。父亲酗酒，从记事起，她就知道镇上只有她家爸妈总打架。父亲排行老四，弟兄姊妹9个大都在农村。父亲是乡党委书记，家里条件稍好些，于是借钱借米、大事小情，叔伯姑姑们轮流往她家来。乡政府的家属房小，她和哥哥本来就睡沙发，一来人，两个小孩子只好去别人家借住。当民办老师的母亲一边照顾她和她哥，一边贴钱贴米招待夫家人。生活艰辛，一对原本美好的小夫妻变成戾气的高压罐，动不动就引爆。两人个性都强，擎天柱遇到霸天虎，打起架来惊天动地。大多数时候是母亲被打得好几天卧床不起。如今哥哥成了父亲的翻版，经年的互相伤害则使年迈的父母在大房子里形同路人。

她大学毕业后到大城市工作，母亲唯一的交代，就是莫找个喝酒的。但她竟然就遇到个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的年轻男人。快30岁那年，才终于意识到受过高等教育的自己，不过是在不同时空重复母亲的一生。她决然离婚，之后两年认识了老秦。

大她20岁的老秦是书画商，却不会写字作画，有个女儿，只小她几岁。她最满意老秦的性情。她平时温顺，可有时分明觉得自己的态度和语气，与母亲对父亲似的毫无二致。每逢此时，老秦都会笑眯眯地转移话题。认识老秦的那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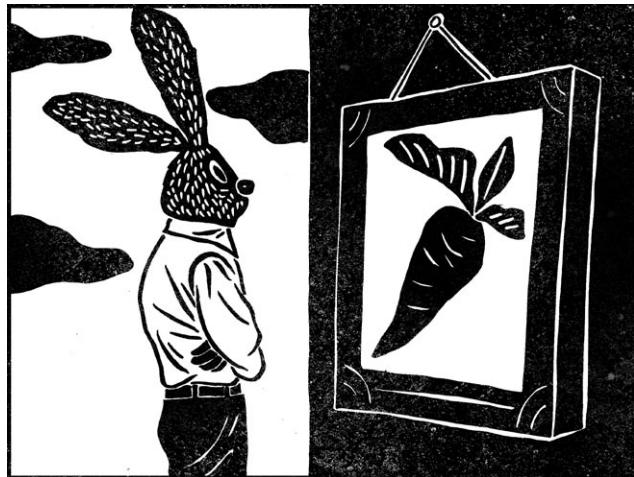
2013年1月11日，后来她因事翻出自己的离婚证，无意看到那上面的日子是两年前的1月11日。而1月11日，是老秦的生日。这个发现最终促使她下定和老秦在一起的决心。

时间稍长，宁静逐渐成了越来越令人透不过气的沉闷。因膝盖和后背受过伤，老秦很少运动，从不下楼散步，去步行10分钟距离外的超市都得开车。她喜欢海，老秦这辈子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游泳。她去爬山，老秦只能在山下等。她观察身边其他夫妻，都是在理想和现实间纠缠不清。她想起父母亲、她的过去、她曾在严寒冬夜躲在楼下树丛里时最大的希冀，确认现在的生活确是她曾最想得到的。

安静的日子里，她开始读书练字，捡起从前写文章的爱好。唯一的消遣是到楼下花园散步。花园人少疏阔，没有快活的大妈跳广场舞，多是沉默的老人牵着沉默的狗。园子错落有致，地势有高有低，树林有疏有密，冬梅春桃秋银杏，四季皆有颜色。某天月夜下在花园里独行，看见一只黄鼠狼在墙根的阴影里步履匆匆，她一时为之所动，想起不久前还见过一只灰色的刺猬。兴之所至，录了篇关于花园的口述文章。不料最末一句“不知道，那只刺猬还会不会再来”话音刚落，耳畔草地上就传来窸窸窣窣声。她扭头，是一只四肢纤细、身子浑圆、蹑手蹑脚的灰色刺猬。□

文艺青年的午餐

文 / 迷糊珠
图 / 谢驭飞



80尾巴上的秦先生，在我们的圈子里是十足的文艺青年。他从事广告创意工作，只穿棉麻材质的衣服，经常晒在朋友圈里的照片，都是他画的油画、写的小诗、做的烘焙、捏的软陶、看的小众话剧等文艺气息爆表的事情。

最近秦先生开始晒午餐，他的午餐由健康的粗粮、蔬菜沙拉、水果、三文鱼、鸡胸肉等组成。据说没有油盐，采用清蒸或凉拌的方式。他说：“不爱重油重盐的洗礼，更喜欢食物最本真的味道。”究竟口味如何不得而知，但色彩却是斑斓无比，搭配得好看极了，就像一幅艺术作品。而且他用的饭盒是木质的，看起来有种低调的质感。

他发的状态从来没有凡尘俗世的烦恼，一切都那么风轻云淡。这样的秦先生让人感觉特别有生活情调。虽然朋友圈里大多是美化过的生活，但我知道他确实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想当年一块上学的时候他就与众不同，最爱的就是画画、看书，朋友们玩乐的俗事他从来都不感兴趣。

果不其然，当我再度见到他时，他就像刚从朋友圈里走出来一样。穿着棉麻的衣服，背着画架，戴着黑框眼镜，边等边翻看着一本书。我拿过他手里的书，是《月亮与六便士》。我拍着他的肩膀欣慰地说：“果然，这就是你啊！”他不明所以，白了我一眼：“当然是我了，不然是谁给你接风？”我诧异秦先生接话这么溜儿，以前他可是个很木讷又害羞的孩子呢！但也瞬间释

然，一别好几年了，大家都要有所进步嘛！

此次来北京本是出差，但也有一些富裕的时间可以游玩。秦先生带我愉快地游玩了“798”艺术区，他对那里的工业遗留如数家珍，在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由来时，还几乎每家不漏地点评了一遍“798”的餐馆。这家的菜很辣，那家的菜分量少，这家服务员态度最好，那家的粤菜最地道……

最终到了一家他最满意的餐馆，我诧异地问他：“798”这么大，难道你每家都吃过？他撇撇嘴，答道：“以前在这附近上班，每天都来吃午饭，几乎把每家都吃遍了。”

且不说“798”里有多少家餐馆，这每家的消费水平参差不齐，绝大部分都不是适合吃工作餐的餐馆呀！据我所知，那一段时间他刚北漂没多久，经济能力绝不允许他如此奢侈。

秦先生看出了我的疑问，他无奈地苦笑：其实我也不想这么浪费，更不爱在外面吃饭，我更愿自己带午餐。但刚加入公司，要跟同事们搞好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和他们一起混吃混喝啊！我本想问他现在的午餐如何，但他已经从对餐馆的看法谈到了对体制的看法，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工作5年后才能在北京买房，那时候北京的房价得有多高。想起买房的事情，我也不禁头疼起来。

到最后我也没有问他现在的午餐到底味道如何。□

骑驴年代

文 风清不扬
图 谢驭飞



驴，在今天是火烧的主料，但在司马迁笔下是匈奴奇畜，在东汉是普通家畜，在唐代是低马一等的劣乘。唐传奇中有个叫郑大的穷帅哥骑驴逛长安，碰到某白衣女子在步行，于是搭讪：“姑娘这么漂亮还亲自走路？”那美女也是有心，随口笑道：“你有驴骑却我不借我，我能怎么办呐？”郑大说：“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两人就此相识，后来同居多年。这事儿告诉我们：泡妞未必需要香车宝马，关键是要脸皮够厚内心要有想法。

脸皮薄就会消减勇气，没想法就会错失机遇。唐朝天宝年间，萧颖士路过某县南郊，遇到某年轻单身女，红衫绿裙骑着驴。那女子对萧哥说：“妹住南边二十里，天色将晚我很怕，结伴同行好不好？”萧哥问：“你贵姓？”女子答：“姓胡。”听说对方姓胡，见多识广的萧颖士立即想到狐狸精，骂道：“死野狐，敢来媚惑我萧颖士？”骂完就跑，直到有店投宿。过了许久，机智男发现骑驴女也进了店，还跟店老板诉苦：“老爸，刚才路上有个疯子骂我狐狸精咧。”夜昏沉女窈窕，可以发生多少浪漫故事呵，而且萧哥还是有身份有条件骑马的人喔！

且放下不解风情的萧颖士，回头再看骑驴的郑大，人家不单懂得搭讪泡妞，还是个懂生活有讲究的人呢。郑大骑驴泡妞时只是个普通的苦青年，刚琢磨同居那会儿，穷得连家具都得找人借。

等真和美女同居了，就立即讲面子讲排场，啥事都追求档次，当然也幸亏他有个吃不垮借不烦的富二代好友。等他带着美女到外地赴任小官时，更是必须向富二代朋友借马赴任。唐朝就是这样，百官骑马不骑驴，因为驴子便宜档次低，骑驴不符合领导干部身份。

人呢总希望对自己好一点，但凡有条件香车宝马，自然不愿简车破驴。唐朝咸通年间的进士也是这么干的，结果高层领导很不爽，硬性规定进士们不许乘马只许骑驴。于是立即有人发牢骚：“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后两句是说，广大瘦子们骑驴还行，像状元郎郑昌图那样的胖子就要发愁喽。

其实骑马也好骑驴也好，都是一种生活。人比人气死人，不如看开点。就像诗僧王梵志说的：“他人骑大马，我自跨驴子；回看担柴汉，心绪好些子。”即使想骑驴，也未必人人有买驴的条件呢，实在没办法还得靠租。唐朝的租驴公司既有国营也有民营，那些专业的租驴户就被称为“赁驴小儿”，听起来不上档次，但钱不少赚。日本和尚圆仁调研过唐文宗时期的海州市场，雇驴一头行二十里，“功钱五十文”。盛唐时期斗米不过八文钱，对照现时米价，出租驴应该跟出租车差不多吧。□

老麻抄手和书

文 / 王旋
图 / 谢驭飞



A先生是个很闷的人，喜欢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R小姐，二是书。前者是他的骄傲，后者供他逃避解压。

“大四”那年，在一个卖抄手的小馆子里，R小姐提出和他分手，他没有回应，只是闷着头把R小姐碗里的老麻抄手一个个塞进嘴里，再把剩余的红油汤汁全灌进肚子，便付钱离开了抄手店，把R小姐留在那里。他说，这就是他给她的回应了。

与R小姐分手后，他把自己埋进了书里，像个死人，如此消耗掉大学的最后几周。直到距离离校截止日期只有三天的时候，他才从书中爬出来，收拾整理自己仅剩的物品——300多册书！那时，邮政在校区设置的投寄点已经撤走了，走物流他不放心，走快递价格又太高，他只得自己想办法把这些书运到离学校5公里之外的邮政局。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让他打给老大，他说老大已经回到云南老家了，老四正在成都参加面试，我骂他：“你现在才想起我们，早干吗去了？”他没出声，挂了电话。被他挂断电话时，我乘坐的火车正行在一座桥上，桥下黄绿相间的田地上浮着薄云，突然我心里一沉，A先生不会想不开吧。我在心里骂一声：“那也是活该！”就这样，我与A先生再见面已经是5年后了。

在重庆喝着夜啤酒时，我问他那批书最后他

怎么运走的。他惊讶地看着我：“谁说我运走了？”他说，那时候他准备叫黑车去邮局，于是把书一批批从宿舍搬下楼，到全部搬完的时候早累得不成样子，满身大汗。这时宿管大爷送上一瓶水，问他是否要卖，不如就卖给他吧，他会负责全搬走。A先生没说话，太阳从正面直射在他脸上，两颊热得快烧起来，片刻之后A先生把手朝大爷一摊，那一堆书全卖了废纸，换得200块钱。我问他：“R小姐现在怎么样了？”老四抢着说：“她今年初结婚了，男的是一个单位的。”A先生没说话，像要说服什么似的点点头。我又笑着问他：“还读书吗？”他说，读，只是不再买书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喝了一口啤酒，笑着说：“反正都留不住啊。”那夜我们全喝翻了，除了A先生，我们在旅馆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回昆明的飞机上了。

A先生的事成了我们朋友圈里的一个笑柄，A先生也会跟着笑一笑。每次看到他发在微信群里的笑脸表情，我总会想起那晚送我们回旅馆的出租车上他说的话：“如今每每想起R小姐，我嘴皮总会发麻，两颊发红，但不会疼了。”

顺便提一句：A先生还一直单着，R小姐前不久刚生了孩子，我们都已经33岁了。□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重回 50 年代

为纪念宝珀贵妇鸟 (Ladybird) 诞生 60 周年, 宝珀推出限量 60 枚周年纪念版腕表。腕表的珍珠贝母表盘采用对比鲜明的雕刻亮纹装饰, 造型有如层层精致的树叶; Cal. 6150 机芯直径仅为 15.7 毫米, 自诞生至今, 依然是世界上最小的自动上链机芯之一。

“镜头感”十足的虹膜碗

“虹膜碗”借用了人眼虹膜结构的设计灵感, 打开闭合之间颇有相机光圈叶片的即视感。设计师马克·埃姆斯 (Mark Ames) 用航空级铝合金设计了这个轻巧精美的小装置, 用于放置零钱、钥匙等随身物品。



冥想蜡烛

这款蜡烛的设计融合了瑜伽“冥想法”的概念, 刻画了一个盘腿静坐的小人正在静心“冥思”的生动形象。与普通蜡烛不同, Candleman 由混合蜡制成, 持久耐用, 可以燃烧长达 7 个小时。

智能卷尺

这款叫 Bagel-labs 的智能卷尺, 用细线代替了易划手指的传统铁皮卷。丈量到的物体长度会根据细线的长短在 LED 屏上精准显示出来。卷尺还可以开启遥感测量, 即发射红外光束, 测量其与照射物体的间距, 适用于难以触及的物体高度。结合移动端 APP, 所有数据信息可以实时保存。



透着竹香的凳子

来自台湾的设计师以竹子为核心材料设计了一款能够闻得到沁脾竹香的板凳系列“清转合”。坚实的竹子具有相当的韧性，而且在炎炎夏日十分清凉舒服。竹子内部自带的节枝也被高效利用在加强凳子强度的小结构中，充分增加承载的稳定性。



场景迁移跑步机

Voyager 是一款能够实现场景智能迁移的跑步机。根据配备的大屏幕和互动系统，屏幕中可以模拟出用户所喜欢的场景来优化用户体验。跑步时还可以与手机进行配对，模拟在《神庙逃亡》《地铁跑酷》这些游戏中奔跑的动感体验。



长翅膀的摩托车

雅马哈新推出的 04 GEN 摩托车，由铝合金镂空车架作车身基础，半透明的车壳板件增添了摩登的气息。车尾类似鸥翼式设计，打开时宛如一个挥着透明翅膀的女孩儿，颇具女性的柔美气质。整个车体的流线型设计，中和了传统摩托车的雄健威风，融合了中性美。



光束单片凳

Kartell 品牌的“光束”单片桌 / 凳是实用的多功能小家具，由透明塑料一体成型制作，塑料薄片的厚度强调了几何形状的纯净特质。



球形音箱

Harman Kardon 品牌的“玛瑙工作室 2 代”无线便携式蓝牙音箱以简约的球形外观及出色的声学结构取胜，背部中央位置是覆盖金属材料的标志性被动单元。



鸟笼边桌

费舍尔·韦斯曼设计的“鸟笼边桌”以钢材料手工制作，8个圆球形桌脚撑起整个结构，钢材料的表面镀了一层闪亮的弥达斯金箔。

珐琅对表

瑞士品牌 DeLaneau 推出“对表”新概念，象征两个人在时间上的特殊联系。Atame Colibri 白金腕表表盘装饰大明火珐琅花鸟微型画，周围镶嵌长方形切割的钻石和缟玛瑙。



蜗形悬臂灯

出自 Roll & Hill 品牌的“蜗形”悬臂灯，造型如同蕨类植物。金属灯臂以一个扭转的弧形托起手工吹制的玻璃球灯罩，获得微妙的平衡。

碧玺耳环

洛杉矶珠宝设计师埃里卡·寇特妮 (Erica Courtney) 擅长设计色彩丰富的华丽珠宝，这款碧玺耳环用钻石镶嵌出卷曲的造型，中间梨形切割的碧玺如薄荷般清凉。



彩虹手包

菲拉格慕品牌与设计师莎拉·巴塔利亚合作的“莎拉”手拿包，灵感取自品牌档案库的彩虹凉鞋，几何形糖果色块在表面拼贴出波浪的效果。





法理、政治与善恶选择

聂树斌案再审之价值

主笔 陈晓 插图 张曦

失去现场，失去被害人，失去“行凶者”，失去了10年的时间，除了两个都各有疑点的“凶手”的认罪口供外，没有一条闭合的证据链可以排除掉所有合理怀疑，锁定其中任何一人就是“真凶”。这是“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

一般刑事错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亡者归来”，一是“真凶再现”。前者几乎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没有任何托词——比如余祥林案，2005年事发，当年就得到纠错。但“真凶再现”就要复杂得多，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新审视案件证据的过程，来证明“再现”的“真凶”是不是真的“真凶”？已经判定执行的旧案，是否是错案，需要再审纠错？

涉及聂树斌案的各方，用了11年时间来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再审纠错，涉及一个利益权衡，即法律的公正性与法律的安定性的冲突及选择。一方面，有错必纠，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才能有效保护法益；但另一方面，裁判的既判力和裁判的权威也是应当重视的价值，因为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也是法治的重要条件。价值选择的区别，形成不同的裁判思路和裁判原则。简单概括，就是‘有错才纠’，还是‘有疑即纠’。”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在《聂树斌案法理研判》一文中提出了案子延宕多年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事关法理、政治以及人心善恶的选择。

龙宗智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大陆法系国家在多年前即已讨论这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再审审查程序不能适用有疑问即纠正的原则。因为犯罪事实通过三审而被认定，事件已经平息，若轻易再审，依据确定判决既判力而产生的法的安定性就会因此而遭到破坏。所以再审只限于那些无罪可能性很高的场合。另一种意见认为，再审程序仍应适用有疑问时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原则。理由是若采用前述观点，如果没有不容争辩的新证据（如真凶现身等），再审之门就不可能被打开，冤者就只能含冤了。日本研究再审程序的

权威学者田宫裕教授说：‘再审也是让事实说话，让有罪心证动摇的举证过程。在这里存疑时有利被告人的原则也应该适用。’两种学说，所持立场不同，前者更注重法的安定性，后者更加关注冤者的救济。”

2016年6月8日，最高法做出了选择，宣布聂树斌案复查结果，并决定提审该案，交由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审理。担任该法庭庭长的胡云腾一直致力于《刑法》研究，精通法理，担任过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做法官之前，他还当过律师，多重身份的历练或许让他的视野会比传统的执法者更为开阔。他多年来提出讨论“废除死刑”的问题，作为执法者，对司法机器的作为界限有更接近人性的思考。学界对他的审判充满了期待，不仅是期望他给出一个再审的结果，而是他能够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判词？这个判词是否可以为将来的同类案件在程序、认识和判定上都做出正确的指引？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张保生告诉本刊记者，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疑案是进不了再审程序的。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规则上的修改和实施，使得聂树斌案虽然因为年深日久和其他种种原因，“真伪难以查明”，却也有了纠错的理论依据。但要跨过传统地方自查自纠的司法闭环，将案子推进到司法机器的再审轨道中，仍然是一个需要用时间和亲历者的痛苦作为成本的漫长过程。中间涉及诸多对刑事错案再审惯常程序的突破：跨省异地审查，复查听证会，最高法提审，交由巡回法庭审理……哪些值得借鉴，并在此后的刑案纠错中得以制度性保留，哪些是执法者在各方压力下违反法理的仓促应对，都会成为法学界此后一再讨论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聂树斌案已经成为一个显示两种法理价值观之争的公共事件——既不仅始于1995年，也不结束于2016年。□

（感谢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的帮助）

“聂树斌案”的再审之路

主笔 / 陈晓 记者 / 付晓英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



(侯少卿 摄 / 新华社供图)

一件分歧很大的“疑案”，如何打破地方“自查自纠”的司法闭环，走入司法机器的再审程序中？聂树斌案用 22 年的艰难行程做了回答。

再审

2016 年 6 月 8 日清晨，李树亭起得很早。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日子。他代理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再审申诉，已经在山东高院复查了一年多。按照正常的再审审查程序，复查一般在 3 个月内结束，需要延长期限的，也不得超过 6 个月。但每次在审查即将到期的半个月前，他们都会接到山东高院的通知，告诉他们因为“案情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案发和审结时间久远”，复查需要延期。从 2014 年 12 月复查开始，至今已经延期了四次。

前天下午，他和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再次接到山东高院的电话，让他们来法院一趟，吃住均由法院安排，行程需对外保密。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律师，李树亭了解司法机器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强大的程序惯性下运转的。以往和山东高院的接触中，每次通知延期复查都会提前半个月。高院这次的电话在第四次复查到期之前，因此这次很可能“不是延期，而是宣布复查结果”。

6 月 7 日，李树亭、张焕枝以及张焕枝弟弟一起赶到济南。当天晚上，负责接待的山东高院法官孟健照例很和气，招待他们一行吃了晚饭，和每个人都周全地寒暄了一番，然后将李树亭拉到房间一角，问：“明天去法院，就你陪她（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去还是她的弟弟也一起去？”“我当时回答，我去就行了。”李树亭向本刊记者回忆，“我想就是去接个文书嘛，律师去就可以了。孟健略微沉吟了一下说，总得去个人安抚一下情绪啊。”听到这话，李树亭说自己“心一沉”。在来济南的路上，他和张焕枝就复查可能的结果和应对已经做了商量。“无非就两种情况，一是同意再审。那我们就先感谢山东高院。这是真心话。自从案子从河北转到山东后，每次去法院，法官都是笑脸相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

(郭延冰 摄 / 新京报供图)

二是驳回申诉，不予再审。我们也得首先感谢，然后当场提出要继续申诉。”

虽然已经做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孟健的话仍然让李树亭不安，整夜难以安睡。“几乎一个小时醒一次。”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到凌晨2点，索性起来写材料。如果明天的结果是不予再审，就当场递交新的申诉。写完去街头一家通宵营业的商店打印，刚把纸放进去，又卡墨了。一切感觉都是不好的兆头。”回想起6月8日前夜，几乎无眠的种种忐忑和敏感，李树亭也有些无奈地苦笑。

李树亭的不安是有来由的。1995年，河北石家庄下聂村村民聂树斌被判强奸杀人，执行死刑。10年后，一名强奸杀人连环犯王书金被捕后，供述自己才是聂树斌所涉案件的真凶。聂树斌家人找到李树亭，自此开始了对聂树斌一案的再审申诉。负责申诉审查的河北省高院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没有给他们明确回

复。2014年，最高法将此案的复查权转交山东高院，启动异地复查，案子才有了转机。山东高院对复查表现得非常慎重，为案子拨了专款，包括律师和家属吃饭睡觉接待的车费都考虑在内。为了核查律师提交的新证据，光河北就去了6趟。2015年5月，山东高院还主动把案卷中聂树斌的全部签名、指纹单方面委托上海司法鉴定中心有关部门检验，然后通报律师检验结果——所有指纹是真的，但聂树斌的签字都是假的。这次复查结果的宣布，既是最大的希望，也可能是最大的失望。

6月8日一早，当地媒体记者和摄像机已经等在了山东高院内。一件刑事案跨省的异地复查，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是没有的，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都吸引着法学界和公众的注意。当地对案子的公共形象也非常重视。自从移交到山东后，官方就委托一家本地媒体全程跟踪报道。复查一年多以来，每次法官和当事人的会面，这家媒体都会进行全程录像。

会议庭里已经聚集了一屋子人。负责复查的合议庭法官、山东高院几位官员，还有三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都已到场。为首的一名女法官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副庭长滕伟，她向张焕枝和李树亭宣读了最高法的再审决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本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报请本院审查。”

“什么叫‘缺少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性证据’？”张焕枝问法官。为儿子的案件申诉这么多年来，她已经了解了不少法律知识，关于儿子所涉案子是否成立，是否具备申诉的条件，申诉该有的程序，她都能跟诸多来访的人讲得头头是道。但再审决定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是她十几年来倾尽全力想到达，却一直未能进入的阶段。当法官一字一句地向她解释完法条，并把再审决定书交给她后，张焕枝捏着文书，呆立片刻，不知是悲是喜。“我赶紧跟他解释，就是说这个案子最高法要提审了。”李树亭向本刊记者回忆，“她突然哭了起来。不是那种号啕大哭，而是两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

这天是2016年6月8日——距离张焕枝走上再审申诉之路11年，距离她的儿子聂树斌被判处强奸杀人并执行死刑21年。

案发

从北京到石家庄的高铁轨道旁，还留出了一大片尚未被城市占领的土地。正值初夏，刚割过麦子的田野，金黄一望无际，散发出油画般干燥热烈的美感。收完春麦后，就该是种玉米的季节。经过一个夏季雨水和阳光的浸润后，金黄的麦茬地会变成油绿，长出一大片密集的、高过人头的玉米秸秆，这就是北方平原蔚为壮观的青纱帐。

1994年初夏，石家庄西郊下聂村的年轻人聂树斌就常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穿行在村庄与村庄相连的青纱帐中。那时工业化已经从城市蔓延到郊区，青纱帐的边缘建起了一些厂房。在聂树斌家附近，就有了液压厂、水泥厂、化工厂。半工半农成为村庄中最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既能依靠土地供给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蔬菜，又能从工业生产中分享到高过种地数倍的收入用作消费。聂树斌家就因为这样，成为当时村庄中的“小康之家”。母亲张焕枝务农，父亲聂学生在化肥厂上班，20岁的聂树斌从技校毕业后，也脱离了土地劳作的束缚，进入了一家工厂当钳工。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家里花4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辆山地车，在当时村子里算是件时髦的“奢侈品”。聂树斌几乎每天骑着它在邻近村庄间闲逛。“有时候也会走出老远，但总是玩玩就回来，从不夜不归宿。”这是母亲张焕枝对儿子村庄生活的最后印象。

1994年9月23日，在警方排查西郊玉米地的一起奸杀案中，聂树斌被列为怀疑对象拘捕；1995年4月20日，一审判处死刑；4月25日，二审维持原判，报省高院死刑复核；4月27日，执行死刑。整个案子从逮捕到结案只有7个月，从一审、二审到死刑复核，再到执行死刑，这几个决定生死的关键程序只历时7天。整个过程中，聂树斌家人没有收到判决书，没有看到死刑通知，甚至连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都还不太清楚。4月28日，父亲聂学生拎着包袱想去看守所给儿子送几件换洗衣服时，被告知儿子昨天已经“走了”。

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聂树斌案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案件，并没多少让人生疑之处。“我国1979年有了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到1980年1月1日才开始生效。但3年后这部法律规定的程序被破坏了。1983年有一次全国性严打，推行‘依法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并颁布了《迅速审判法》。尽管时间不长这个法律就基本废止了，但它留下一个从重从快的政策。在后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每面临一些重大刑

事案件的追诉，普遍程序比较快，尤其遇到当地有集中行动，比如集中执行死刑造声势时，司法机关没有保障必要的慎重所需要的时间。”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邱兴隆对本刊记者说。他曾因涉嫌非法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在石家庄被关押，5年多后才被二审宣布无罪释放。他记得，1994年“十一”，也就是聂树斌被逮捕的这个节点，石家庄正在开展集中严打，一批重案要案的人员都被押赴石家庄体育场开万人大会，邱兴隆第一个被绑缚上台。在后来公布的聂树斌被行刑的照片中，跪在聂树斌旁边的就是邱兴隆当时的一个年轻狱友——他因为盗窃被判处了死刑。

可以说，1994年聂树斌案发生时，刚好处在我国司法变革历程中最严格的时期。单从案卷的记录来看，他的口供非常一致，从头到尾没有翻供，审判的严厉和程序的快速，看起来就更在情理之中了。唯一显得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案子被写成了通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刑案高发期，也是一个刑侦手段相对落后的时期。针对命案的技术侦查手段非常有限。现在河北一个县级刑警支队就能做的DNA检测，当时却必须送去北京公安部二所鉴定处。在侦破时间和侦查经费都很有限的前提下，破案更主要还是“走群众路线”——通过对案发现场周边的走访排查，锁定嫌疑人，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口供，形成证据链上最关键的环节。聂树斌案算是这一侦查模式的“成功典型”，它被参与办案的民警写成通讯《青纱帐迷案》发表在当地报纸上，中国人大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记得：“那个年代刑事案被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并不多，所以这个‘青纱帐里的杀人案’就显得很醒目。报道主要是经验介绍，一个恶性案件是如何通过一些关键线索迅速锁定嫌疑人，顺利拿下口供。我当时看到证据的资料很少，单看报道也觉得挺好的，就在人大法学院讲犯罪侦查学时给学生讲了，是作为正面案例的。”

证据规则

何家弘如今是国内研究证据学的知名学者，他说：“我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当老师，1990第一次去美国西北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又去读法学博士学位。在西北大学的时候，我受到西方证据法学的影响很大。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对证据法的研究是很薄弱的。当时国外的很多理论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包括一些概念，比如‘排除合理怀疑’、‘毒树之果’，我们连怎么翻译都不知道。”



聂树斌案原案发地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玉米地现已变成南北水调工程途经之地

(于楚众 摄)

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刑事案件的定案和审判中，我国证据应用的薄弱，何家弘记得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黑龙江石东玉案。“这是1989年的案子。石东玉开始被认定杀了人，判了死刑，后来改为死缓，所以这个人当时没有杀。案子被纠正也很偶然。另案发现真凶，就启动了案件复查。原先在案件定性时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衣服上的血迹。当时做了血型鉴定，嫌疑人衣服上有A型血，被害人也是A型血。那时候司法执法水平都不高，办案人员习惯认为血型对上了，那衣服上的血迹就是被害人的。这实际上是个错误的认识。”

“这个案子的复查也挺不容易的，复查人员说服被害人家属开棺验尸，取了被害人头盖骨，拿着被告人的血衣，到北京来做DNA鉴定，首先就找到我们人民大学的物证技术鉴定中心，找我的导师徐立根教授，咨询陈旧血痕的DNA鉴定问题。后来，我们介绍他们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其实还没用DNA，是

先做了血型，结果发现当年伊春市法医的血型鉴定错了，被害人的血型是AB，他们给验成了A型。“因为侦查机关在基础证据上的低级错误，石东玉坐了6年冤狱，直到1995年——也就是聂树斌被执行枪决这一年，石东玉案得到了纠正。当时《法制日报》为这个案子做了篇专题报道，标题是《我没有杀人》。”

证据和确定其是否真实有效的证据规则，就像一个案子的内部肌理，细密隐蔽，但又至关重要。一个错误的证据就可能使案件成立的皮囊轰然倒塌。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证据体系除了技术手段的落后，更有证据规则上的模糊。何家弘告诉本刊记者：“比如我们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的应用，包括用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严禁’一词其实还是很严厉。但是，我们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任何规则说明刑讯获得的口供怎么办？法律没有说这些非法获取的证据要排除。所以实际上刑讯获得的口供在实践中都被采用。我们的法律

规定往往是口号性的、号召性的。我们一直讲实事求是，讲客观真实，办案人员、检察官、法官都觉得刑讯不好，但口供是真实的，真实的就能用。客观地说，很多刑讯获得的口供确实还是真实的。但排除刑讯获得的口供，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考量。真实的口供如果靠刑讯获得也得排除，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再比如，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很重要的证据规则。他们界定的‘传闻’是证人在法庭以外所做的陈述，这实际上就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要求，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传统。证据只有在法庭上讲的，才可以采纳，你在法庭之外，你对警察讲的，你对检察官讲的，这都是传闻。这就是基本规则。这和我们大量用笔录，询问笔录、证人很少出庭的状况截然不同。从2001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研究刑事证据法，后来变为修改《刑事诉讼法》，其实一直想解决证人不出庭的问题，但至今进步不大，证人出庭率还是很低。”

有感于国内证据规则的空白，何家弘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开始转型，从主研犯罪侦查转向证据法，他说：“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强证据法学的研究，包括证据规则的制定。”若干年后，因为“真凶再现”的契机，聂树斌案再次进入大众视野，被发现这个曾经在犯罪侦查学上的正面案例，如果从证据学角度细致勘察，结论却大不相同。

“真凶”再现

2005年1月18日凌晨，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在公安局值班，睡梦中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河南省荥阳县索河路派出所的一位女指导员。她告诉郑成月，索河路派出所在春节前的治安大排查中，发现了一个身份可疑的外乡人——工友们叫他“大王”，是农村人，但十几年没有回过老家，在乡土情结非常重的中国农村很少见；怕警察，一见警车或者穿警服的人就闪躲；而且还曾因一桩涉嫌拐卖婴儿的案子受到警方调查——他和同居的女子将自己第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送给别人，得了4000块钱。

这个可疑的外乡人叫王书金，老家在河北广平县南寺郎固村，是郑成月追缉10年的一起凶案嫌疑人。1995年，郑成月从中国政法大学完成学业后到了广平县公安局，一开始没有分配工作，每天只是打打杂。10月的一天，也就是农村收完玉米的季节，在南寺郎

固与泊头村之间的小道路北100米的地方，掰完玉米棒子的秸秆地里，露出一口干枯的钢管井，井里有一具女孩的尸体。女孩在广平县一家工厂打工，已经失踪了几天，被发现时尸体腐烂膨胀。这是郑成月接触的第一起凶杀案。他和同事按照当时惯常的侦查方法，走访排查邻近村庄的年轻人。那是个约5000人的大村，当搜索从第一队转入第二队时，发现南寺郎固村的村民王书金不见了。他的妻子说：公安在第一队搜索时，王书金回家磨了把刀，揣上身就走了。

虽然上了公安部的通缉令，但王书金自此消失了。此后10年间，每到逢年过节，他父亲的生日，郑成月都会安排便衣去王家附近盯梢，但从没有任何发现。王书金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不会说普通话，只能干些粗笨活儿，所以也只逃到了几百公里外的邻省河南，像在老家一样找了个砖窑讨生活。但因为从没照过相，警方没有他的任何影像资料。除了“身高170，皮肤较黑，右眼角有一个被拖拉机喇叭盖儿磕伤的不太明显的疤”之外，没有其余可以锁定他的特征。王书金14岁曾因强奸一个8岁女孩，被判刑3年，自此成为家族中的耻辱，兄弟姐妹也不与他亲近。郑成月记得将他带回河北指认犯案现场时，围观的村民众多，甚至有被害人家属赶来要拿棍棒打他，他的家人中只有父亲来了。“他看见他父亲，眼里一点泪没有，不表态，说了句‘我爹胖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见过？’他说就刚才，‘我爹就在村口站着’。”郑成月对本刊记者回忆，“他的脸，表情给人感觉是整个往下沉的，苦瓜脸，从来不笑，也看不出什么情绪。从荥阳把他带回广平时，怕他太紧张闹事，我们在车上跟他说笑话，想逗他笑、放松精神，他一点都没笑。我在前面坐着，从后视镜里看他，觉得这小子跟正常人不一样。”

郑成月至今还保存着第一次审讯王书金的完整视频。王书金穿着敞怀的棉袄，旧得有些看不出颜色，头发长而蓬乱，胡子拉碴，说口音极其浓重的广平话。虽然是接受审讯，但并不显出紧张畏缩。神态略带点疲惫和懒散，声音平淡，听不出任何情感起伏。如果不懂当地话，只看视频，会以为是两个人在闲话家常，完全感受不到一问一答间，说的都是10年前田间地头惊心动魄的死亡瞬间。

王书金供述了1993到1995年间，自己在河北犯下的四起强奸杀人命案，其中三起在郑成月管辖的广平县内，案发地都是王书金打工的砖窑和住所交界的区域内。还有一起在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里，案发地与他当时打工的砖窑相距约100米。他供述自己曾在



(新华社供图)

左图：自认聂树斌案“真凶”的王书金

右图：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月

这里将一个“披肩发，穿一件白底蓝点的连衣裙，内穿粉红色内裤，脚穿白色尼龙丝袜子，胸前半截白色小背心，头上没有发卡，骑一辆红色24自行车，穿的是红色高跟凉鞋”的女人拉到地里，实施奸杀。王书金指认的案发现场，是在一片自南向北的青纱帐中，唯一一块垄沟自西向东排列的玉米地。而据田地的主人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他的这块地里只发生过一起凶案，凶案的嫌疑人聂树斌早在10年前就被枪决结案了。

阻力

郑成月今年56岁，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他熟知一些命案侦查的规律，比如死在半道上的，多半是强奸杀人，死在家里的，仇杀居多。强奸案的现场最重要是寻找阴毛，根部有DNA，而有厮打痕迹的命案现场，死者指甲缝隙里可能就残留着凶犯的皮肤等关键证据。在当警察前，他还在部队做过侦察员，有很好的记忆力和多年历练的现场还原能力，对10年前的村庄道路记忆犹新，能随手画出案发时的现场地图，还能绘形绘影地描述当年审讯王书金时的情景。



每讲一段，就微微探身侧头，笑眯眯地问：“还有啥要问的？”但他不那么耐烦回答自己讲述逻辑之外的问题，表现出多年刑侦警察的决断力和不容置疑，有极强的专业自信。

抓获王书金原本是个好消息。王书金供述的几起



案件，现场指认时位置找得很准确，受害人的尸体也能被她们的家人辨认出来，帮广平县警方解决了几起妇女失踪的悬案。第一个抓到他的荥阳县公安也在等着庆功，郑成月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2005年3月，王书金的羁押期限快到了，必须进入审查起诉阶

段。他供述的四起命案中，有两起的程序却走不下去了。

一起是1993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王书金交代自己在村口东地拿着铁锹遛红薯时，将回娘家赶庙会的张某某半路截住，奸杀后埋到了一个变压器小屋的前面。这是他交代做的第一起案子。王书金供述死者穿

着与她丈夫记忆的一模一样，10年后指认的现场处，确实挖到了一具尸体，他描述当年作案时用的红色尼龙腰带，刨出来时还缠在死者身上。但在郑成月和同事在提取物证时遇到了麻烦。

2005年，中国刑侦对证据，尤其是物证的要求已经更为严格。“2005年涉及命案时，DNA都要做。”郑成月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得那一年他办过一个强奸杀人并焚尸的案子。“被害人被烧得面目全非，精液没法提取，现场的指纹脚印也都没有了。当时我们查了嫌疑人的活动时间，几乎能证明他杀人了，并且他被我们抓获以后自己也说得清楚，说看到受害人一个人，就跟过去了，跟她说‘走，咱说两句话’，一拐弯进了地，就跟她发生关系了，之后她跟他要钱，说不给钱就告他，他害怕了，身上真没有钱，就把她掐死了。然后抱了一堆玉米秸秆，点着把她烧了。”

“我们就跟检察院提请逮捕，但检察院说：‘《刑法》明文规定，只有被告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罪。’没有物证和证人，就把人给放了。现在这人还在家里好好的，每次看到我还打招呼。没办法，我们没证据。”

在王书金犯的第一起案子里，郑成月和同事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们提取受害者的遗体DNA，又从她母亲的耳朵上取了血，送到公安部二所做线粒体DNA。“半个月后回复说做不出来，让我们要么去上海，要么去沈阳。广平当时是全国贫困县，我问局长要经费到沈阳去，要2万块钱，局长说没有钱，锅炉都停了，供暖都不能供了。”

因为经费限制没做成DNA鉴定，缺乏确定死者身份的物证，张某某案无法定案，郑成月觉得这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王书金一共杀了4个，还有3个可以定罪，所以来省公安厅刑侦局说把这个案子删掉，不记罪，我说你跟检察院说，这不是我的事。”

有大麻烦的是另一桩案子。郑成月将剩余三起案子写成起诉意见书递交检察院后，很快收到了检察院发来的退查提纲。“其中第五项说：‘被告人王书金交代在石家庄打工期间强奸后将一名妇女杀死，此事是否存在，应查证将材料入卷后才能认定。’但是石家庄这个案子没现场，我们怎么提交？”

从王书金供述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后，郑成月就向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省公安厅发了公函，请他们配合调取当时的现场材料，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郑成月为此还专门跑了一趟石家庄。“当时办这个案子的郊区分局已经撤了，并入裕华分局。我到裕

华分局没人理我，后来找到一个刑警大队教导员，我看他桌子上放着一张我们发过去的函，他马上就扣在桌子上。我说：‘你给我出个证明，说明你们这里没出过这起凶杀案，我就走。’他跟我说：‘这事我们在商量。’这样我就只好回来了。”郑成月向本刊记者回忆，“这个时候王书金的羁押期限都到了，我不能再继续押了。当时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超期羁押就是非法拘禁，我办个案子还成犯罪了。我就跟县里的一个检察长商量，这事没人管怎么办？他说这好办，记者一给报道就有人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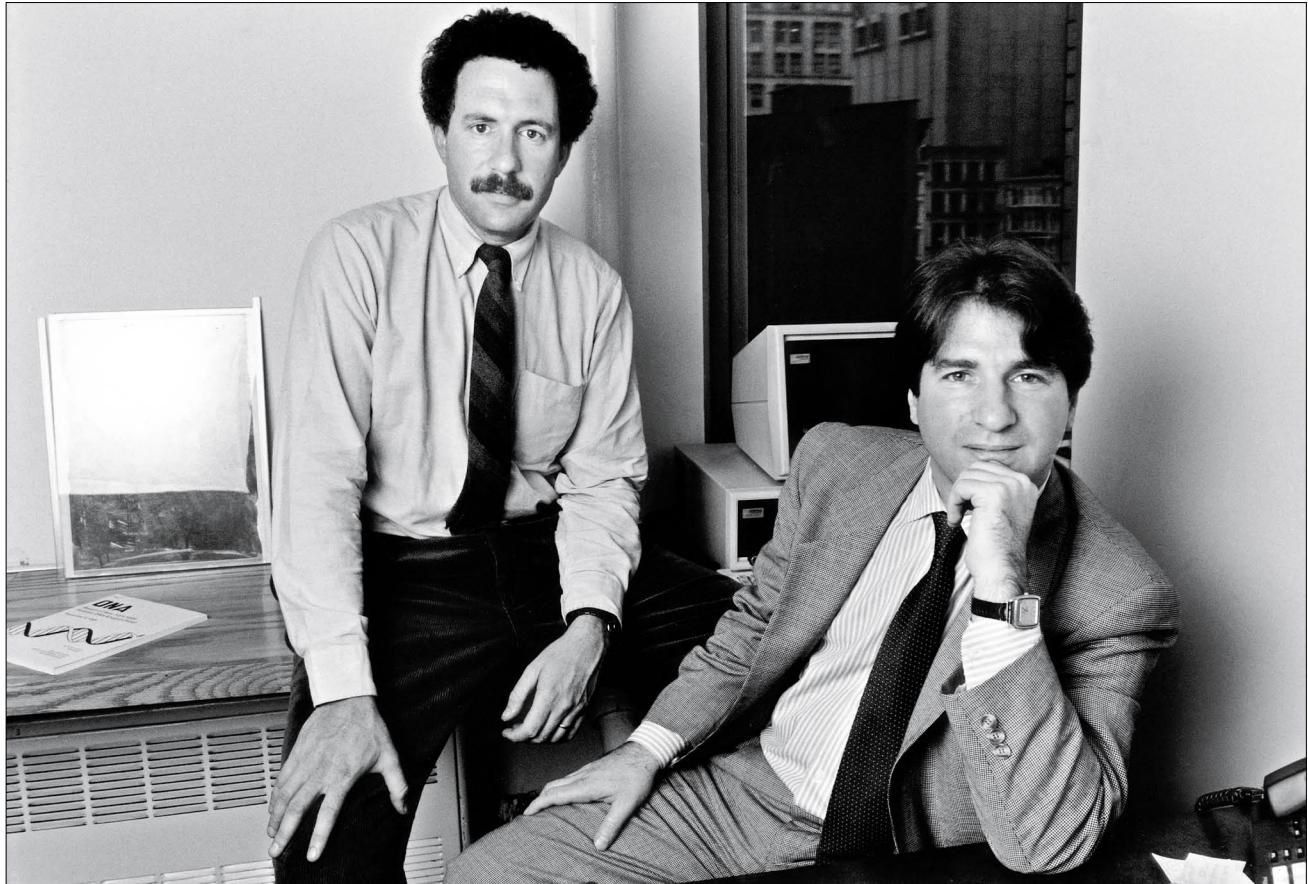
2005年3月15日，《河南商报》向全国媒体群发了文章《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了郑成月手里这起蹊跷却难以推进的案件。报道刊发后几天，河北省公安厅就派人到了广平。聂树斌案在10年后，重新进入司法机关和公众的视野。

分歧

2005年是研究中国刑事错案的学者都不会忽视的年份。除了聂树斌案曝出蹊跷的“一案两凶”外，还出现了湖北余祥林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案件。“那个时候社会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了，从2000年云南杜培武的案子，到2005年余祥林案在社会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加上和国外交流获得的信息也越来越多，美国的‘无辜者运动’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大家觉得刑事错案问题很值得研究，特别是从研究证据的角度来观察。我开始正面关注刑事错案问题。”何家弘对本刊记者回忆。

但至少在2005年，聂树斌案还没有进入学界关于“错案”的讨论范畴。“那时主要关注的典型案例还是已经确认的冤错案件，聂树斌案还没有入到这里面。因为案子程序还没走完，虽然舆论报道是‘真凶归来’，但当地一直有另外的说法。”何家弘说。

2005年3月25日——在《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见报后10天，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主持召开了案情汇报会，这是官方首次对聂树斌案做出的反应，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公检法领导都参加了会议。“第一个发言的是石家庄市纪委书记，”郑成月对本刊记者回忆，“他说，我们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对办理聂树斌案的原郊区分局各个办案民警调查询问，没有刑讯逼供，聂树斌被抓后主动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径。第二个发言的是石家庄中院管刑事的副院长，他介绍了逮捕起诉聂树斌的时间和程序，说我们接到案卷之后，



美国纠冤组织“无辜者联盟”创始人彼得·诺伊菲尔德（左）和巴里·谢克

多次开会，目前证据确凿充分，杀聂树斌准确无误。”

郑成月对案子的判断却截然相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聂树斌案我从第一天就说这是个冤案，至今我也这么说。”郑成月对本刊记者说，“为什么？我就给你说一点，王书金交代把人拖到玉米地强奸后掐死了，把衣服扒光了，在她身体的左边发现了一串钥匙，就捡起钥匙走，走到半道觉得不对，拿着死者的钥匙，以后被查到麻烦了。就转身回去，把钥匙扔到死者旁边1米远处。”

钥匙是这起陈年旧案中第一个浮出水面的隐蔽证据，也是郑成月最有力的质疑武器。受害人康某某当时租住在工厂附近，夏天穿裙子没裤兜，骑的自行车也没有车筐，就习惯把钥匙用皮筋绷在手上。而据案发现场的照片，在死者康某某西侧70厘米处的确有一串钥匙，在杂草碎土和玉米秸秆的掩映下，如果不是亲到犯罪现场，至少离现场相当近，是难以发现的。

但聂树斌当年的口供中却没有提到这串钥匙，警方也没有将钥匙作为定案的证据。当康某某的父亲要去她租住的房子取回她的遗物时，没钥匙开不了房门，警方就在结案前将钥匙还给了康父。

在2005年3月25日的汇报会上，郑成月讲出钥匙这件证据。“刘金国问检察院的院长：现场提取的证据与王书金交代的一致吗？院长说：一致。他又问：聂树斌交代了这串钥匙吗？我说没有。”郑成月对本刊记者回忆，“最后刘书记问我一句话：‘郑局长，依你看，王书金在石家庄这起作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理直气壮地说：‘刘书记，真要接触过王书金、提审过他的人，99%的人都会说是他，不是聂树斌。’”

复查

现在回过头来看，聂树斌案的再审在2005年有

一个很积极的开局。案情汇报会上，刘金国宣布了三点：第一，要成立两个专案组。河北高院牵头成立聂树斌案专案组，对聂案进行复查；河北省公安厅牵头成立王书金案专案组，对王书金案进行彻查；第二，拨款15万元保障专案组的正常工作；第三，尽快完成调查，争取一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媒体报告。

复查是再审的前置程序。一起案件是否再审的基本原则是“认为确有错误”，调查则是通过对原有证据和办案程序的重新审查，查明是否“确有错误”。地方政法系统通常是这一程序的执行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自查自纠”的阻力很大。“一方面谁也不愿承认错误。勇于认错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我们又总是公开讲要责任追究，因此复查、纠错就成了一种生死搏斗。一方是家属、律师和媒体，另一方就是公检法领导。”何家弘说，“而且我们对于启动再审的证明标准，规定得不是很清晰。认为确有错误就启动再审，那什么是‘确有错误’？”

在法学界的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把聂树斌案入在“可能是错案”的疑案范畴。“上世纪90年代的执法水平、证明标准都把握得很低，很多办案人员把握的是‘两个基本’，这也是中央有关领导讲过的，‘基本的案件事实清楚，基本的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地方又再把这‘两个基本’进一步理解为，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因此，证据在具体实务中就变成一个极为粗放的概念。往往最后案卷里现场勘查笔录、法医检验结论、证人证言、口供，粗看一大堆证据都有，但并没有对这些证据具体的审查评断。现场笔录证明了什么？尸检报告证明了什么？很多证据只是证明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但并没有证明是谁杀了他。”

证据规则不清，带来的就是法律边界模糊，进而导致过度依赖口供。“最后看来看去，能证明谁是凶手的往往只有口供。聂树斌案就是这样，最后还是只有口供能把这事和聂树斌联系起来。当初定案是这样，

对办案人员的问讯多是些程序问答，并没有进入细节追问——这或许是自查自纠的司法机器无法具备的功能。

而一旦要推翻一个既有结论，要复查纠错时，同样的问题又来了。”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3月26日，就在案情汇报会后的两天，聂树斌案启动了第一次复查。此后在2009年也有过断断续续对当年证人的问讯。最大规模的一次复查是2011年底到2012年2月，河北省高院负责复查此案的法官在国宾馆，对当年所有参与过该案的办案人员，从法医、侦查员到主管领导，都进行了一对一的问讯。但犯罪现场早已消失，聂树斌被执行了死刑，口述的现场都不可再得，复查的起点只能建立在当年的案卷和办案人员的陈述上——但已经属于成品的案卷，大多已具备符合程序的属性，这样坐在房间内问答式的复查，就像沿着1995年已经形成的对案件的认识路径再走一遍，很难有任何程序外的发现。一位看过复查案卷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对办案人员的问讯多是些程序问答，并没有进入细节追问——这或许是自查自纠的司法机器无法具备的功能。复查案卷中，被调查方最为频繁的一个回答就是：“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自纠自错还是所有阻力的来源。它有时会形成巨大的小群体利益。这种小群体利益让人在说假话或者推诿时没有罪恶感。不仅没罪恶感，甚至还有种内部英雄主义的感觉。”何家弘说。他很早就洞察了“自纠自错”机制背后，案件复查和纠错的推进乏力。自从成立刑事错案研究中心后，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很多。2011年，他参加了美国著名纠冤组织“无辜者联盟”举行的年会，并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刑事错案的主题发言。国际同行问，为什么不在中国成立一个无辜者中心，把你们的刑事错案研究中心改成无辜者中心？“我说我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是在如何推进观念转变和制度改革上，而不是放在具体错案的代理和纠正上。如果陷入个案，耗了很多精力，也不一定推动得了。他后来甚至摘下了办公室外‘刑事错案研究中心’的招牌，这块牌匾招来不少的各地上访者。”

沉默期

当司法机器缓慢甚至静止于问答式的“自查”程序时，它对外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沉默期：既不公布任何信息，也不对申诉方做有实质推进的回复。

“你们上次说我的儿子的事在调查，调查得怎么样了？”

“我们很慎重，正在调查，你回去再等等吧。”

从 2005 年开始为儿子的案子奔走以来，张焕枝就陷入这样的循环对话中。她有两本笔记本，记录着“真凶再现”后的 10 年里，她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笔记本上最多的记录是接受媒体采访和去各级政法系统各单位申诉。她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河北省高院，总是早上 8 点钟到达法院，登记、在大厅等待，几个小时后与负责审查此案的法官见上一面，说上十来分钟甚至几分钟的话，然后得到一个“再等等”的回复。除了一次因为极度失望，拒绝在会见笔录上签字外，她从来没有表现出过激的情绪，只是这样一趟又一趟往返在下聂庄到石家庄之间两个多小时车程的路上。

2011 年，一位学者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卡夫卡的小说《诉讼》来类比聂树斌案再审之路的停滞：乡下人在法的门前徘徊，想进去，却遭到守门人的阻拦。守门人的责任是阻拦，同时又让下乡人心存希望，仿佛总有一天他可以进入。于是，乡下人费尽口舌，经年累月，一直到死神降临之时也无法进入法之门。

张焕枝这么多年在“卡夫卡门”前，怀抱希望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的绝望，外人无从体会，或许只有律师李树亭能感同身受。在接手聂树斌案申诉前，他曾经代理过一桩有名的冤案。2002 年，河北省唐山市二级警督李久明在一起入室杀人案中被判死缓。李树亭在二审上诉时担任李久明的律师，他查阅案卷时已经发现一些证据纰漏和李久明遭受刑讯逼供的迹象，并将此写入二审辩护意见，但并未得到法院采纳。直到 2004 年真凶再现并得到查证，案子的平反仍然久拖不决，直到李树亭通过中国政法大学一位颇有声望的老教授，将案子的材料直接递给公安部领导，获得领导的签字批示后，李久明才获无罪释放。因此，当 2005 年张焕枝找他代理聂树斌案的申诉时，李树亭告诉她：“依据我本人的社会经验，这种案件操作起来会很困难：首先，案件发生年头很长，调查取证工作会非常困难。当时的知情人或者证人，对事件可能记不清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说；其次，有关部门不会积极配合。毕竟，如果是冤案，牵涉到公检法三个部门，执法水平和司法形象会受到损害，同时涉及国家赔偿问题，这会使相关部门消极应对此事。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当年的办案人员因为立功而荣升，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影响，会调动一切关系，千方百计阻挠案件的调查纠正。”

即便有这样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聂树斌案的推动之难仍然超出他的预料。一开始河北省高院说没有判决书不能申诉，而结案 10 年后的法院也不负责给他

们提供判决书。李树亭无数次去被害人家中，跟康某某的父亲聊天，为他提供一些法律帮助，终于在两年后获得康父的信任，拿到判决书。“他用一种不失尊严的方式给了我，把判决书压在一堆其他的材料下面。我拿去一口气复印了 20 份。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只是感觉太不容易了。”他以为他就此翻越了聂案申诉的最大障碍，但其实只是离“卡夫卡门”更近了一点而已。自从 2007 年 8 月高院接受申诉，并将聂案复查权转交河北省高院后，案子再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

2011 年，聂树斌案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公共事件，有不少律师跃跃欲试。邱兴隆在一次有关聂案的演讲中，谈到了“聂树斌案需要什么样的律师”：“聂树斌是一个死刑案件，而且是一个极有可能的死刑错案。至少，聂的亲属，包括他父母与姐姐，都确信他是冤枉的！担任他的代理人，就得理解他们失去亲人而且是亲人被错杀的切肤之痛，更应意识到他们虽然给不起你钱，但给了你那份信任的分量！所以，担任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必须投入更大的人性关怀。尤其让我不得不告诫自己的是，聂树斌虽然已死，但聂案能否昭雪事关他是否该死，甚至事关人是否该死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该死等关涉人本身的大问题。换言之，对聂树斌案的关心，实际上是通过对死者的关心而体现出对生命的关怀。如果我要担任聂树斌案子的申诉代理人，我必须拷问自己有无这样的人性关怀。”

因为具备这种人性关怀，李树亭接手了这个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没有翻案希望的案子，并且自费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但也因为这种人性关怀，他和家属一样背上了沉重的情感十字架。从 2007 到 2013 年，是司法机器对聂树斌案申诉保持沉默的几年。李树亭穷尽了他所有的资源和方法，托政法大学老教授递交中央领导的材料也被退了回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对于聂树斌案的申诉，应该可以的希望，和理应可以的愤怒，以及怎么都不可以的无力折磨着他。2007 年他甚至去湖北准备出家。他记得 2010 年，在石家庄的一个小公园里，张焕枝告诉他决定解除他的代理，他告诉我：“我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王书金的生活

2011 年 9 月 11 日，中秋节前一天，大约有 60 多名律师、学者和媒体记者汇集在石家庄，参加了“聂

树斌案研讨会”。在聂案沉寂的这些年，法学界对它的关注却一直没有平息过。“好像没人提起了，但其实没人忘记。”何家弘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在上课时讲错案纠正难，呼格吉勒图和聂树斌这两个案子都是会提到的。”

在石家庄的这次研讨会通过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呼吁书，要求对聂案进行重审。此外还提出了对王书金案的质疑：河北省高院审理王书金上诉案严重违反刑诉法规定。2007年7月31日，王书金案二审第一次开庭就已结束，本应两个半月之内做出的宣判，至今延宕4年，杳无音信。一个省高级法院，公然违反程序法律，其中原因何在，理应得到审查和解释。

这次研讨会可以算是学界和公众舆论，在“家门口”对当地政法系统的一次“宣战”。“我开始还怀疑河北司法机关可能会干扰研讨会的举行，但该研讨会出人意料地顺利进行。这时，我感觉到河北司法机关对此案似乎很有底气。”一位从业27年的老律师在文章中写道。何家弘也感受到了河北方面的这种自信。“2012年，我去给河北省检察院反贪系统的骨干讲课，课后他们跟我交流时讲：‘聂树斌案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方便跟您讲，但我们可以担保，这个案子没错。’他们内部的一些人会这样打保票。他们还说，以后可以把一些内部的证据给您看。”

在河北省公诉方的逻辑里，王书金“自认真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案发时，他正在距离现场约100米的砖窑打工，熟悉现场环境，公安勘查现场时围观的人很多，他很可能就在其中。而且公安在周边走访排查时，他也是被调查对象之一。有他的工友作证说，王书金在回答公安提问时，还被工地领班骂，让他不要胡说八道。这些信息都表明他之前知道这件案子。”一位接近河北省高院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至于他自认其罪的动机，“他逃亡了10年，心里知道总有被抓这一天，这10年里他一定对被抓后有打算。他供述了四起命案，检察院只认定了两起，但还有一起没认定的，他就从来没提过。通过认下一桩查不清的案子被定为立功，很可能得到从宽处理。真相反正很难查清了，为了保留证人，通常不会急于对疑似真凶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他也一直把这一点作为辩护和上诉的理由。他做的那些事情，脏得没法说，可他已经多活了10年。”

在这个讲述中，能听出对王书金极端的厌恶、愤恨和无可奈何。按当地的公序良俗和既有法律，王书

金都是确定的“坏人”。但他一直以一个“必死之身”，活在司法机器一道奇异的缝隙里。2005年他一审被判处死刑，以石家庄西郊玉米地一案没有被认定，将此作为重大立功的理由，提起上诉。2007年二审开庭结束后，省高院一直没有判决。王书金被辗转几次，最后关押在了河北磁县看守所。据此前媒体报道，自从他进入这个看守所后，享受着高于普通嫌犯的“高规格待遇”。看守所领导接到的指令是，如果王书金出了什么事，那下一个被关进看守所的就是你们自己。2013他被维持死刑判决后，代理律师朱爱民和彭思源都接到看守所所长的求助电话，请他们帮助多做做王书金的工作——“死刑判决后他情绪很不稳定。比如大家看电视正好好的，王书金会突然起身，‘啪’的一声关掉电视：我要死了，我心情不好，你们别看了。”2015年1月，他有一次轻微脑梗，“幸亏及时发现，医生和管教都松了口气”。私下里，磁县看守所好几位工作人员都曾请求朱爱民帮忙跟上级反映，看能不能把王书金转走，“担子太重了”。“一个确定的连环杀人犯，最后却要为他花费那么多的司法资源，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是这样？河北司法界确实也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位接近河北省高院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二次开庭

2013年6月，朱爱民接到了河北省高院的电话，宣布对王书金二审二次开庭。朱爱民觉得很惊讶。“感觉第一次开庭把该说的话，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突然要二次开庭？还审什么？”他对本刊记者说。二次开庭的声势颇为浩大，邀请了200多名各界人士到场旁听，聂树斌的母亲，甚至下聂庄的村干部都收到了听审通知。何家弘也接到了河北省高院的邀请。他说：“我想那时候他们对这个案子是有结论的，有自己的自信，认为检方手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事不一定是王书金干的。”

直到2013年王书金案二审再次开庭前，王书金的口供都被公众认为是判定聂树斌案是否错案最理所当然的证据。在犯罪现场已经消失、被害人和当年判定的“加害人”都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王书金的说法也是唯一的外部证据。“如果他一旦翻供，我们就什么证据都没有了。”2006年广平县公安局局长刘朝彬在回答媒体采访时就这么说。保住或者推翻他的口供，成为各方人士对二次开庭的最大想象。



最早报道聂树斌案存在疑问的《河南商报》原总顾问马云龙

朱爱民告诉本刊记者，得到二次开庭的通知后，他去看守所会见王书金，王书金告诉朱爱民，自己这几年辗转于河北省内包括石家庄、邢台等在内的多个看守所，其间被相关工作组要求翻供。对方承诺，如果翻供，就给其同居女友和两个孩子办低保。郑成月告诉本刊记者他听到的传闻——二次开庭前，由当时的省政法委领导带队，设立了模拟法庭让王书金翻供。一位河北省的县级公安局副局长也对模拟法庭有所耳闻，“听人说是政法委的领导直接坐镇，在邯郸住了3天，目的就是要让王书金翻供”。但是，王书金最终在庭上并没有翻供。

但对河北公诉方来说，事隔6年后宣布开庭，攻击点并不是王书金所说的“是”或者“否”，而是关于他口供中对于犯罪现场和过程的细节证据。在这次庭审前，唯有河北方掌握着聂树斌和王书金两人全部案卷。他们一开始依据“不告不理”原则（没有进入起诉的案子法院不能审理），拒绝将两个案子联系起

来。王书金代理律师彭思源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二审第一次开庭，就提出了申请，希望把被告人王书金交代的六起案件，尤其是没有起诉的两起案件查清楚，把相关卷宗调出来，尤其是聂案卷宗。法院合议庭当庭驳回我的申请。在开庭最后，我又说了一遍，希望申请调阅聂案案卷，他们再次驳回。理由都是与本案无关。”

但6年后，在二次开庭的现场，河北省检察院在对方律师没有事先看到材料的情况下，突破了“不告不理”原则，主动在庭上引用了聂树斌案侦查卷的证据，来比对王书金口供中的矛盾之处：第一，王书金供述的作案时间是下午1点半到2点之间，但聂树斌案当年认定的作案时间是下午5点半到6点之间。第二，王书金供述的杀人手段是掐脖子，并跳起来踩被害人胸腹，其间他还听到“喀嚓喀嚓”的声音，说明被害人应该有肋骨骨折。但原案卷中法医认定的死亡方式是窒息死亡，并未有胸部骨折的记录。第三，王

书金描述被害人和他身高相仿，但他身高1.72米，被害人只有1.52米。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案卷记载被害人尸体身穿白色背心，颈部压有玉米秸，拿开玉米秸后，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但王书金的供述中始终没有“花衬衣”这个细节。

“花衬衣”是这个案子的另一个隐蔽证据，就像“攻方”用那串钥匙来攻击“聂树斌是凶手”的结论时，检方也用“花衬衣”作为盾牌来守住“王书金不是凶手”的结论。王书金口供与原始侦查卷上的差异，到底是多年后回忆的“细节错位”，还是有更深的隐情，现在尚无结论，甚至永远都不会有结论。但这次公开开庭，确实让公众判断有了倾向河北方的动摇。一位参加过那次开庭的人士对本刊记者回忆，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就是公诉人与王书金之间关于“花衬衣”的追问：“公诉人问：‘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件花衬衣？’王书金回答没有。然后公诉人出示了原来案卷中的关于花衬衣的记载，王书金又说他忘记了，好像是有。我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凶手，感觉他在顺着公诉人的话往上靠。”另一位在现场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听完庭审后，几个学法律的朋友也对结论产生了极大的疑惑，在一起讨论案子中的各种可能性：“王书金知道一个隐蔽证据，但不知道另一个隐蔽证据。他到底是不是凶手？有没有共同作案的可能？甚或是先后作案？”

当检方在法庭上突然亮出聂树斌案卷中的证据时，朱爱民立刻提出抗议，要求休庭查看新的证据，法庭同意了他的要求。“这是我们的策略，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位接近河北省高院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河北方利用一次不合程序的“证据突袭”，“证明了案发现场有王书金根本不知道的关键证物，所以他不是凶手”。

王案和聂案

王书金案二次开庭时，何家弘虽然没有去庭审，但还是从证据法、法理上关注着这场审判。“它是很

为了获得聂案的更多信息，最早报道“一案两凶”的老报人马云龙决定帮王书金聘请律师，希望在王书金的审理过程中获得聂树斌的案卷。

怪异的。一场刑事审判，公诉方的检察官拼命说这事不是被告人干的，作为被告人拼命说这是我干的，这个错位确实很有意思。其实一方是项庄舞剑，一方是醉翁之意。公众关注这案子也是，并非关注王书金，还是关注聂树斌有没有罪。”

在聂树斌案申诉这十几年的起起落落中，王书金就像聂树斌的影子，因为后者才得以存在。他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也没什么钱，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凭证。刚被抓获时，没人给他请律师，刚好聂树斌案的申诉也不被河北省高院受理。为了获得聂案的更多信息，最早报道“一案两凶”的老报人马云龙决定帮王书金聘请律师，希望在王书金的审理过程中获得聂树斌的案卷。“2005年，最高法还没有收回死刑复核权，当时马云龙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想到要给王书金请律师。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没查清前，不能让河北省高院利用手里的死刑复核权把王书金杀了，这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王书金代理律师彭思源对本刊记者回忆。

这又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王书金的家人早就不和他来往，也不愿意出面为他办理任何手续，为了找到合法的委托人，他们辗转联系上了王书金被捕前和他同居并生儿育女的女子，说服那位女子以孩子的名义帮王书金签订了委托协议。最早聘请的律师是北京市衡卓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爱民。马云龙当时跟他约定，由马云龙所在报社为朱爱民报销代理后的出差费用。虽然只报销了两次，马云龙被报社免职，费用报销的协议不了了之，但通过王书金案支持聂树斌案“翻案”的方向却一直坚持下来。2007年7月，彭思源也在马云龙的牵线下加入了王书金案。“我们的策略核心是为了配合李树亭律师为聂树斌翻案。李律师和马云龙他们让朱爱民律师在王书金案一审时就向邯郸中院提申请，要求调王书金供认的六起杀人案的所有案卷材料，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拿到跟西郊玉米地案的相关供述。”

这是王书金案的开局。因为聂树斌案的再审申诉停滞不前，过去的十几年，攻守方一直在利用王金书案交手。从2007年王书金案二审第一次开庭到2013年二审第二次开庭的漫长时间里，博弈的形势一直随着外部司法环境和舆论压力的变化发生着微妙的改变。河北方从一开始拒绝将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到最后主动在法庭上公开将两个案子进行比对——他们在二次开庭前的自信或许在于，他们认为既足以在程序上维护聂案的无错，也可以在实体上证明“王书金是

真凶”这个新证据并不成立。

2013年9月27日，王书金庭审过后两个多月，河北省高院二审宣判，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死刑。这个判决中隐含着对“王书金是西郊玉米地一案凶手”的否定，也被学界评论为是“对聂案申诉的预决”，“下一步，驳回聂案申诉，即属王案司法对策的逻辑延伸，也应不是意外”。但何家弘认为：“河北高院在压力下通过这样的开庭审理来证明不能定王书金的罪，并以此说明判聂树斌有罪是没错的，这个思路其实是错的。不能用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是王书金干的，并不等于说就肯定了这事是聂树斌干的。”

对王书金的判定依据应该是2012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诉法。这部法律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做出了更细致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项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一位法学家把这些细则用概率做了个解释，“就是说，被告人为犯罪实施人的可能性至少应达到90%。按照‘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只要被告人有罪的概率低于90%，法院就应该判被告人无罪”。如果以此推理，“知道一个隐蔽证据，但不知道另一个隐蔽证据”的王书金，或许确实难以判定就是杀害康某某的凶手——这是一个基于“疑罪从无”的判定。但审判方也因此进入一个左右手互搏的尴尬境地——如果以此标准和立场来衡量同样缺乏物证、缺乏现场人证，甚至也不知道一个关键隐蔽证据的聂树斌，又该如何评断呢？

突破程序

这个疑问被抛给了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王书金二审判决死刑后，报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聂树斌案再起波澜后近10年，“聂案和王案终于在最高法院汇合了”。邱兴隆对本刊记者说：“现在纠错的和疑似的死刑错案都是发生在最高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的阶段，虽然有历史原因，但也可以说这是最高法院当时的一种不作为，出了错不能仅仅说是地方法院的错。从历史的角度、道义的角度来说，最高法院必须要担当这个责任。”

2013年，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上任43天后，召集法学界各个领域的专家，召开了一个关于司法公信力的座谈会。何家弘也在受邀之列。“司法没有公信力，司法就没有生命力，高法请专家从各个领域来

谈这个问题。我在这个座谈会上就提到了应该关注刑事错案问题，因为它对司法公信力是很大的杀伤。里面我就说到聂树斌案。这些影响特别重大的案子，你越是想拖着瞒着，越对司法公信的伤害更大，一方面是阻力的积累，一方面是纠错的呼声的积累，变成两股力量，越推动，案子的知名度越高，知名度越高，司法系统越谨慎。最后变成了我们司法机关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是不是能把这些案子作为一个动力推进我们刑事错案纠错体制的改革。”

但对一架庞大的司法机器来说，对一件有争议的案子如何确立再审原则，如何打破传统“自纠自错”的司法闭环，不仅仅是一些理念，还涉及一系列程序的突破和创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一位接近河北高法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河北高院早在2010年前就将复查结果上报最高院，认为自查聂案没有问题，申请把案子拿到别的地方去异地复查。“我都看到过文件，但对这个提议，高院一直没有答复。”

2013年王书金二审二次开庭后，一位知名学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曾专门著文探讨聂案启动再审的突破之道：由裁判单位邀请数位有影响且有一定实际司法经验及公正声誉的专家学者，以咨询会的形式对案件事实做出判断并提出处理意见。因本案的争议点是证据事实问题，会前应将全部案卷材料让专家在指定地点事先审阅。会议可由一位专家主持，法院和检察院的案件审查人员及该案辩护律师列席，可以介绍情况、发表意见并反驳对方意见。专家意见应当形成咨询报告，并向社会公布。专家咨询，是遇疑难案件法、检、辩的常用方法，咨询而非决定，不损害制度安排，不妨碍司法权行使。

早在2013年那次司法会议上，何家弘也针对聂树斌案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建议：“最高法院可以邀请三至五位法学专家组成聂树斌案的复查组，在全面公开地审查本案证据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启动再审的决定。这种案件复查组具有‘半官方’性质，即查办经费来自官方，查办人员来自民间。然后，最高法院可以总结经验，以涉诉上访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改良为进路，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分别成立半官方性质的‘申诉案件复查委员会’，并可以参照仲裁委员会的模式制定相应的规则。”当时高检高法认为这种动静太大，没有足够的动力，但其中有些想法他们是认同的，认为是合理的。后来高法审判监督厅提出异地重审，又提出搞听证会。这些都是在妥协中不断往前推进的动作。”

对一件争议很大的案子的再审评判，跳出原有司法机构的框架，似乎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山东晨浩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光武曾在聂案移交山东复查后，担任过一段时间代理律师。他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刑事案件再审在法律上没有规定的程序，所以各地都是自己探索。2013年的时候，我在辽宁省的营口中院参加了一个很有名的刑事案件的听证会。我感觉这种做法，于再审没有程序的情况下是很可取的一个形式。听证会在无形中扩大了案件的知情范围，让更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全面了解聂树斌案的真实情况。这比法院、公诉方、辩护律师三方开一个程序不太完美的庭，更具有公开透明的性质。于是2015年4月10日左右，我给山东高院也提出了开听证会的建议。当时审判长朱云三就表示可以考虑，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可能也考虑过，否则的话，我提出来以后，他们过两三天就同意通知了，太巧了。”

“当时在通知我们开听证会的见面会上，法官孟健专门给我核实，说‘我们想搞全国第一例听证，你以前真的参加过吗？’我说真参加过。民事吗？我说不是，是刑事。聂树斌这个案子听证不是全国第一例，但在山东是第一次。”

听证会

听证会安排在一个大概200平方米的大房间里。整个会场是山东高院专门向山东省政府请示拨划费用搭建的。中间是四面朝向四个方向的大屏幕，除了法官和当事方外，还有15名社会群体代表。他们是由中华法学会挑选出来的，在之前从来没有公开对聂案发表过任何评论和看法的专家学者。他们负责听取双方说法并发问。“整个听证会的设备，周边的电视机、录像设备，连一层一层的安检设备，全部是用经费买的新的。”陈光武对本刊记者说。

不仅是会场和设备，整个听证会的程序也是没有先例的——这也是后来在业界引发激烈争论的部分。首先安排放映的是一个约20分钟的案情介绍短片。“按常理，这个常识概括性的东西应该由山东高院做，结果是河北省高院准备的。”陈光武对本刊记者说，“河北省高院先用这个短片向大家介绍聂树斌的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还开什么听证会啊。”当时在新浪直播间为这场听证会做解说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听证刚开始有事先准备好的文字，先上山东高院的官网。说的都是原始材

料，不带观点的。但这个原始材料又是有选择的。不光有选择，我后来还发现，它还前后有调整。所以说从材料的编排上来讲，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

河北方显然为听证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派出了原办案单位公检法的几方代表，不仅带来了准备好的案卷材料，还现场放映了PPT，用指示棒点着屏幕为听证代表做解释。其政法委的领导也来到现场，在外屋通过电视关注着场内的情况。整个听证会从下午3点持续到凌晨1点多，一共进行了11个小时，其中留给申诉方的陈述时间大约是1个半小时。

“在听证会之前，最高法的人和我联系，说希望我关注这次听证会。后来‘新闻1+1’做直播，晚上8点我快出发的时候又接到电视台的电话，说节目取消了。”何家弘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也想改革，也想传递这样的信息给社会，可又担心失控的反应，怕出事。体制有时很自信，有时又不自信。”

何家弘在接到节目的邀请后，曾经准备了三段话。因为节目被取消，他准备的发言发到了网上，第一部分就涉及听证会的程序设计。“我认为这次听证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尝试。冤错案件，各国都有，而且冤错案件的发现和纠正都会遇到阻力。让司法机关自查自纠，往往会遭遇推诿拖延，所以一些国家就借助民间力量来推动错案的发现和纠正。例如，美国就有民间的‘无辜者中心’推进冤错案件的复查；英国则成立了半官半民的‘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我曾经提出过借鉴英国做法设立‘申诉案件复查委员会’的建议。我以为，这次聂案听证的基本目标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山东高院的听证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正的要求，例如，对听证结果不预设答案，在挑选听证人时尽量保证客观公正，在听证时让申诉方和原办案方充分陈述意见等。”

“不过，这次听证的设计也存在一些瑕疵。首先，听证的发言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求法院启动再审的申诉方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说服）责任，所以不仅应该先发言，而且应该享有最后陈述的机会。借鉴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审判的程序设计，可以先给申诉方一个半小时的陈述时间，再给原办案方两个小时的陈述时间，最后再给申诉方半个小时的时间做最后陈述。其次，这次听证不安排双方诘问和辩论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让双方的陈述更有针对性，应该允许双方旁听对方的陈述。最后，法院合议庭应该

把听证人的意见明确告知社会，例如，在 15 名听证人中，有多少人赞成启动再审，有多少人不赞成启动再审。当然，合议庭不能说出赞成者和不赞成者的姓名。这次听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设计来提升司法公信力。假如合议庭最后以模糊的语言宣布，本合议庭在充分考虑听证人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如下，那恐怕就会南辕北辙了。”

刑讯追问

在聂树斌案复查结束，并最终被最高法提审后，山东高院方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从复查情况看，聂树斌自己在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均没有讲过刑讯逼供问题，也没有发现刑讯逼供的证据。”业界对这个说法的解读是：可能会保守地改判。“这个保守的改判指的是错案不追究，就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好像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意见。”陈光武对本刊记者说。听证会结束后，他一位省政法系统的朋友在电话中“半真半假开玩笑说，其实要不是你们在听证会上提刑讯逼供和行刑时间这两个问题，早就结案了”。

是否启动非法证据的排查，是聂案进入再审后新的关注点。在听证会上，律师提出了聂树斌案卷中的一些疑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聂树斌的口供并不完整，聂树斌是在归案 4 天后才被逮捕并送入看守所的，之前都在留营派出所“监视居住”。但案卷中没有被监视居住的前四天的口供笔录。

“这一发现其实比任何发现都重要！因为这不但涉及作为强制措施的监视居住在当时的被变相滥用，而且还涉及能不能引发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的问题。”邱兴隆对本刊记者说，“尽管 79 版《刑事诉讼法》中的监视居住的本意是在犯罪嫌疑人自己的家中执行，但是，实际上，在 96 版《刑事诉讼法》之前，这一强制措施在当时的石家庄已被变通适用得面目全非。当时的石家庄，每一个派出所均有一间小黑屋，是专门供监视居住之用的。我不但亲身经历过，而且，我早在 1999 年出版的我的狱中手记《黑昼》中即以‘如此监视居住’为题做过真实记载。当时男女老少都被“监视居住”在一起，就一间屋子，不管男女解手都是蹲在那个房间里，比看守所条件恶劣得多。所以我觉得聂树斌案的主要问题，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个监视居住期间，因为它是失控的。在这种监视居住下，犯罪嫌疑人是在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

下接受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任意审讯！”

“在这成为复查‘盲区’的 4 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那 4 天中，聂树斌没闲着，警察也没闲着。我们不能肯定说本案有刑讯逼供，但是也不能排除刑讯的可能性。”何家弘对本刊记者说。在他收集研究的 100 多个刑事错案的案例里，“有 50 起是涉嫌杀人罪的，我们做了具体案件中的分析，从证据的角度看有哪些是虚假的，取证中有哪些问题。这 50 起案件里，47 个案件都有被告人的虚假口供，其他情况也有，有虚假的证言，有被害人虚假陈述，有鉴定结论错误的，但比较突出的就是‘虚假口供’，占 94%。从取证角度，我们分析，50 起案件中 48 起案件中都有侦查机关的不当行为，占 96%，这些案件中的不当侦查行为，首先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还有隐藏证据、假造证据，我记得一个突出的结果就是这两个数字：94%、96%，这二者之间有内在联系。但是在这些案例中，最终确认有刑讯逼供的只有 4 起，其他只能怀疑有刑讯逼供，因为刑讯逼供的取证是很难的”。

当案子被最高法提审，舆论都以为此案已经“翻案”成功，邱兴隆却在帮助律师李树亭做当年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调查。“为什么我要去研究这些问题？这也是我的学术观点。非法证据跟那个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两者之间是种属关系，种属关系就是说非法证据的外延要大于刑讯逼供，因为它还包括诱供、程序不合法的证据等等。最高法几年前就准备出台一个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曾公开过一个草案，展开过讨论，它所列的非法证据的范围比刑讯逼供要广得多，包括诱供都要排除的，但是遇到了强烈的阻力，所以这个解释一直就没出来。那么聂树斌案子中，是否存在各种形式的非法证据，这个个案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很可能就可以推动最高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早日出台。因为聂树斌案不是一个个案，它是一种现象，它由最高院提审了，那么这些经验教训都值得追究总结。”（感谢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的帮助）

在这成为复查“盲区”的 4 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那 4 天中，聂树斌没闲着，警察也没闲着。



聂案众生相：22年生死两茫茫

记者 王丹阳 插图 张曦

“聂树斌案”22年，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那些坚持的人，因其可贵的坚持与担当，深刻地影响着这一事件的走向，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016年6月25日，下聂庄村
张焕枝的22年申诉岁月

张焕枝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枣树、一棵核桃树，核桃树干细弱，跟她齐高，已经在试挂果。两年前村里土地统一流转，退耕还林，她家村前的两亩地夹在太行山东麓下的坡地里，如今是一片风过簌簌的核桃林。下聂庄村处在石家庄西郊25公里的鹿泉市，若从一条山前的柏油马路进村，修整一新的村道边绵延着宛如江南风格的白粉墙，一些有远见的村民在山前大道

开起了欧陆风情的农家乐，然而这一切风貌对于张焕枝来说尽可忽略。

聂树斌去世后的这 20 多年，对她来说是一大把循环往复、生死疲劳的申诉岁月。“那时候我才 50 岁出头呢，现在我 72 了。”她坐在屋檐下的阴凉里削着一大盆已发芽的土豆，老道地跟我们回忆着 1994 年之后的事，正如她在今年 6 月 8 日后几乎每天要那样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说着。时有车辆进村来到这座村最南头的四合院，再往南就是那段当地人称为连五寨山的太行山脉了，往西走一段上山的小土路是聂树斌的无碑的土坟，若没有记者的要求，张焕枝是不会轻易去的，对她来说扒开坟上枝蔓的山草就如同再揭一次伤疤。

她会把自家的门虚掩着，那扇门跟村里多数上了新漆、饰有楹联的门相比，一看就又矮又碜，但谁都知道这家女主人是村里的焦点，经常穿得如同城里人般整洁，因为随时要进城办事，回来后就是一拨一拨的不速之客。她有时都忘了对方是不是新客，最高法宣布聂树斌案启动再审后，很多含冤者来她家“取经”，她要问“你是第一次来我家吗？”不管生客熟客，张焕枝早已有种自来熟，拿出瓜果招待着。

张焕枝回忆起 1995 年 4 月 28 日仍然仿佛昨天。聂学生骑车带着三件夏衣来到看守所，想往里递衣服，小卖部的工人把他招呼到一边：“以后别送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他已不知是如何骑回家的，从此这个石家庄联碱厂的司机一蹶不振，在翌年吞下一瓶安眠药，人被救下来却引发偏瘫。22 年的天人永隔之下，夫妇俩无一日不是背负着一个如巨石压身般的谜团，在时断时续的来自法院的音讯下，拼凑着一个从未得到过儿子亲证的奸杀案。

那年，是 19 岁的聂树斌工作第二年，他在鹿泉综合技术职业学校的校办工厂电焊车间做技工，初中学历，因为天生口吃得厉害，成绩平平，交友也平淡如水，却跟张焕枝很贴心。还是学徒工的他有时对母亲说学电焊挺好的，“学会了是我的本事”。张焕枝总以为他还是个自己翼下的孩子，从没跟他谈过儿女之事，村里若要婚娶也都要等到二十二三岁，她想过几年后把儿子住的东屋装修下给他娶媳妇。

女儿聂树慧早在石家庄市里做小学老师，儿子聂树斌也工作了，家里四口就属张焕枝一人务农，她打理着家中两亩玉米和小麦，兼做村里的卫生员，鲜少出村。那年聂树慧给弟弟买了辆蓝色山地车，这在当年的城市都算是新奇物，而聂树斌已经拉风地骑在家和工厂的两点一线间了，因为得意，他有时会四处转

转再回家。

多年后，聂树慧痛定思痛，并开始相信是这辆车害了他。1994 年 9 月 23 日，聂树斌没有回家，聂学生晚上去到厂里也没问着，厂里说“他没什么事啊”。很快，聂学生在联碱厂接到一张写着儿子“强奸杀人”的逮捕证，他死活都不信。后来警察又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衬衣过来，叫他们辨认是不是他们家的。

石家庄《社会治安报》一篇题为《青纱帐静悄悄》的通讯写道：9 月 8 日，一位市电化厂宿舍的工人说入夏以来，宿舍前常有一个 20 来岁的男青年来回转悠，总是发现有女同志上公共厕所时便跟过去……他骑一辆蓝色山地车，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9 月 23 日下午，那个久违的骑车人出现了。“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经初步审讯，他交代了“我偷过东西，调戏过妇女，别的没干过”。9 月 29 日，通过“政策攻心”，终于承认拦路强奸杀人。

张焕枝始终不信儿子有这个胆，如果问她为什么那么肯定，她捡着土豆闲定地说道：“我们生的他，养的他，知道他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那时，儿子和她聊天时也会涉及与异性的交往，她说：“那都是正常范围的男女交往，我这个儿子我能掌控。”她从对儿子 20 年不到的印象里搜索着他“乖”和“听话”的细节，比如白天他们不在家，让他烧水扫地，“虽然这活对他来说生疏，但他都能帮你干”。其次，这个孩子从小不难带，也不曾在成长期间给她带来过麻烦。

如今的张焕枝说起话来不再像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农妇，她讲着城里的用词，有理有据地告诉记者为何儿子不会杀人，跟当初判若两人。当时，她是在郊区公安分局前哭着求着，就是要问儿子犯了什么法，并要亲自见人，但次次被堵在门口。1995 年 3 月初，案子在石家庄中院一审开庭，她在非公开的庭审后终于被准进庭看一眼，最后这一眼就是隔着七八米远，她大喊一声“树斌”，他抽泣中回头认出了母亲。“当时就感觉我儿子很委屈、无奈，有话要说的样子。”她坚定地说。

3 月 15 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此后二审没有开庭，只做了书面审理，直至 4 月 25 日，河北高院维持中院原判，此案告一段落，距 4 月 28 日被执行枪决，只隔了三天。瞬间的灰飞烟灭，让聂家陷入万劫不复的打击里，张焕枝这个在鹿泉生活了 50 年的农妇从那时起开始扛起法律的武器，一次次误打误撞地叩着法院的大门。

那是出于最朴素的疑问：“我儿子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枪毙他要告诉我。”

2005年3月15日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

2005年1月，河南郑州西面的荥阳县开展了一次例行的春节前治安排查，一名饭馆老板举报了一个怪异的人，至此，38岁的邯郸广平人王书金才被抓住，他在河南隐姓埋名了10年。当时，他和一个叫马金秀的湖北女人同居在工棚里，没有任何结合的手续，却生养了三个孩子。

这是最底层的相依为命，马金秀和这个无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一部分是因被生活所逼迫于无奈，所以甚至不用深究他的底细。他只是有个异常的习惯，即使在屋里也随时穿戴齐整，像是整装待发的模样，从不随便地袒胸露背。直到他被抓，这个谜团才解开：他是一个在逃10年的奸杀者。1995年10月3日，广平县公安在村里的枯井内找到一具女尸，后一天，王书金离开家乡广平县南寺郎固，慌乱地搭上县里的公交车，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一个8岁的儿子，媳妇是家里用女儿给“换”来的，据说有点半疯癫。

那年，同为广平县人的郑成月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成教班毕业回乡。他刚刚转业进入广平县公安局，做了一名刑侦员。在翻阅县里过往的案卷时，他翻到一个80年代初的强奸案，正是14岁的王书金强奸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手段极其恶劣。他说：“我马上联想到，同样是强奸，同样手段恶劣，极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人手。”失踪使得王书金自然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郑成月通缉了他10年，直到2005年1月17日晚上，荥阳索河路派出所给他打来电话。

翌日凌晨，郑成月见到了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王书金。也许是听到了乡音，他轻叹一声，防线完全崩溃，吐了四桩奸杀案。他曾想过是否要那么爽快地一吐而尽，毕竟两个孩子还小，如果再多撑几年，孩子大些再归案也好些，但10年的精神压力已让他喘不过气，之后他和郑成月、代理律师朱爱民这样坦陈过。

这四桩案子，甚至把荥阳警方吓蒙了，在连夜审问后，确定他在河南没有作案，才允许郑成月为他戴上脚镣，把他带走。王书金带着郑成月一连在广平认了三个作案点，2005年1月27日，他带着郑成月来到孔寨村指认现场。

2005年春节后，《河南商报》的记者楚阳去郑州参加了那个河南治安大排查的庆功会。这时，他已经写了一篇通讯叫《河北摧花狂魔河南落网》，从此“摧花狂魔”王书金风靡各个报端。吃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荥阳那个王书金的案子在河北碰到了钉子。“有一个石家庄的落实不了，已经有个罪犯叫聂树斌，10年前被枪毙了。”楚阳回报社后，将此事告知当时《河南商报》的总顾问马云龙。

当年刚过花甲之年的马云龙是河南叱咤风云的老报人，也是《大河报》的创始人，因为操刀了首度揭露河南艾滋病的报道《艾滋病在河南》，被免去了报社副总编的职务。后来，他只能以顾问的身份为别的报纸运筹帷幄，这次他本能地察觉到这事有疑问，派了个叫范友峰的记者一连去了河北四次。

马云龙只是记得，当他亲自到广平找到郑成月的时候，那个已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颇有微词：“你一个河南的报纸来我这干吗？”马云龙表示了对他的体恤，说出了对这个案子的看法，郑成月稍感有了同道，给他看了刑侦笔录。“只要是见过王书金的人，能肯定99%是他干的。”郑成月说，而马云龙却已在心里假设：这1%的可能性都是没有的，这就是一个冤案。

所以，在对比了王案的笔录，和之前零星的关于聂案的报道后，马云龙主持了一篇轰动全国的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发在3月15日的《河南商报》上。基于在案子侦破期间新闻操作上的原则和对郑成月的保护，他没有点出现场细节，而是用了“非亲临现场、亲自作案，他就不可能对现场情况做出如此精确的指认”这样的间接引语。

报纸甫出当天，马云龙带着范友峰和楚阳来到聂家，把报纸送到了张焕枝手里。初次见面，马云龙对她的印象就是个不谙世事，并坚信儿子不会杀人的“底层农村妇女”，但是她坚韧而执拗。范友峰第一次到她家的时候，仿佛是又揭了次伤疤。“不要再提了，还提它干吗，孩子都死了10年了。”张焕枝一说就涕泪涟涟。

“阿姨，你知道该怎么办吗？”“不知道，我现在很迷茫。”张焕枝并不能读太复杂的文字，即使拿着报纸也要别人告诉她是怎么回事，这回她知道了有个王书金出现了，还是邯郸那边的。“你应该请律师。”“律师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张焕枝当年跑了10年的法院，但她去了中院，甚至门都进不了，至于哪个庭判的，包括法官、书记员她一概不知。“那时候首先是感到无助，其次再感到害怕。”现在的她跟记者交流起来

已头头是道。

就在那一次会面后，张焕枝的申诉生涯出现了转折，马云龙说：“她从此精神一振，变了。”在村里，她曾10年抬不起头，闲言碎语会有，例如“公检法说是她儿子干的，为什么不说别人干的？”但那次后，她感觉这些流言“都不存在了”。她又来到了那片阔别已久的孔寨玉米地，她已经是第三次去了，找到那个叫段月珍的承包户，“就是想把一些问题闹清楚，看看这片地里发生过几次命案”。对方确认就那么一次后，她更坚信了。

马云龙给她介绍了一名叫李树亭的石家庄律师，她就开始跟着律师研究起了法律用语。“城里人说的话我都不懂，我每次就让我的律师帮我分析，其实也学不好，但我总得走下去。”她告诉我们。李树亭第一次接到她电话的时候跟她周旋了半天。“我有一个天大的案子你敢不敢接？”张焕枝问了六七遍，就是说不出来。“阿姨，只要不是把天捅破的案子我就敢接。”两人见面后，李树亭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免费代理了张焕枝的申诉案，张焕枝开始有了“我的律师”，转战北京最高法，每每稍有动静都让李树亭帮忙解释。

她还记得她初来北京时的惶恐，那是在2005年上半年。她只是认准了要上哪班火车，下车后往哪个通道走，坐几路公交车，这就来到了最高法，除此之外的北京她都不熟，就像在漫长黑暗的申诉路上，她从没旁逸过一步。她住的是法院附近的招待所，15块一晚的价格，一个昏暗的屋里五六个人，只有一个公用洗脚盆。“我老是找便宜的吃，一两块钱的烧饼。”在北京，她也没有得到什么进展，最高法只是问她要她拿不出的判决书。

为了这份10年未曾见过的判决书，她第一次鼓足胆去敲了康某某父亲康老汉的门。她已经走进了客厅，跟人家说：“我是聂树斌的妈妈，我想让你们复印一份判决书。”康老汉的情绪陡然激动：“你出去吧，我决不管这事，是你儿子把我女儿害了。”这个石家庄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女儿死后一直都未曾走出痛苦。

直到2007年，李树亭在康老汉家复印到判决书，这是张焕枝第一次目睹到那白底上的黑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某，至石郊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聂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某某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用拳猛击康的头、面部，致康昏迷后，将康强奸。而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康的颈部，致康窒息死亡。”

张焕枝又来到了北京，找到那个见过面的对接人。“你怎么又来啦？”她啪地在桌子上一拍：“我拿到判决书啦！”随之提交的还有一份刑事申诉书。当年11月，最高法给了张焕枝一封寥寥几十字的信函，让她交给河北高院，上面写着“已函转河北高院”，让她速与该院联系。

2005年3月24日，广平

“我没你苦，你失去了儿子”

北京律师朱爱民第一次在广平看守所看到王书金时是2005年4月的一天，那时，朱爱民特意试探了他一下。“石家庄那个案子，10年前就已经有个叫聂树斌的被枪毙了。”王书金瞪大了眼睛，望着朱爱民久久没出声。王书金心里当然知道，他在作案后的第四天就离开了孔寨，去到了市里的东风塑料厂，有一次警察来厂里排查，问到了他，他说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听说过。他有着难以置信的冷静，在老家做完案也是若无其事地张罗着人打牌。后来他还回过孔寨，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警察拉着警戒线，不过那时聂树斌还没有被抓。

马云龙请朱爱民担任王书金案律师，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新闻上若要继续追踪这个案件，就必须有合法代理人才好方便阅卷；二是他已直觉到一个将震惊朝野的疑案正在孕育中。果不其然，10年前早已销声匿迹的聂树斌案因为王书金案而从灰尘中抖落出来，而看似一目了然的王案又因为聂案而陷入一个至今还未有定论的罗生门。而马云龙、郑成月等等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原本可以在某个时段退出做个局外人。

当年4月，马云龙与记者找到马金秀，她在王书金被捕后半个月就另嫁了，她的生活能力让她无法不依傍男人。王书金在厂里颇讲义气，呼朋唤友地下馆子，还一个人付账，为此每年欠下一两千块酒债，要马金秀去还。他还总是和衣而睡，梦呓、惊醒，直到他被抓，一切都解开了。

马云龙发现一个难题，因为马金秀和王书金从来不算夫妻，是无法委托律师的。但她那5岁的大女儿可以，所以马云龙想让她作为委托人的监护人，去北京签那个委托代理协议。当时她新嫁的男人坚决不同意，怕刚进门媳妇万一有什么变数，后来，是《河南商报》出钱将这四个人一起带往北京，那男人才放了心一起去。朱爱民唯一一次与马金秀碰面就是这回，



下聂庄村口围坐的村民

那时，大女儿才及桌角高。朱爱民在马金秀要离开时问了她一句：“如果王书金被判死刑，你愿意带孩子来见他最后一面吗？”马金秀在这件事上的“理智”至今让他牢记着，她说：“孩子还小，我不想他们的生活以后有阴影。”朱爱民就不再问了。

朱爱民把马金秀改嫁的事告诉了王书金，并劝慰

他要理解她这么做是因为孩子小。犯下了四条命案的王书金不无舐犊之情，并说不怪她。这些年，他一直记挂着两个孩子，一直跟律师提起想看看现在的照片。朱爱民曾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非要在强奸后把人杀了，王书金的回答简单到让人惊讶：“瞅着都认识的，如果不杀她们，举报我怎么办？”



(于继众 摄)

2007年3月，邯郸市中级法院对王书金一审做出死刑判决，让郑始终愤恨不平的是，在他移送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石家庄一案没有列入。“拿着政法委的命令，把我叫到邯郸市公安局，当着刑侦局局长、我们公安局局长的面，叫我把石家庄那个删掉。”所以，四桩命案，最终列入起诉的是三桩。

3月12日，一审开庭前，张焕枝来到邯郸中院，在办公室里认出了郑成月，那个时候省纪委就在他隔壁办公室驻扎，时不时传讯他。“她一进屋就哭，拉起我的手说：‘你为我儿子的事受了不少苦吧？’我也掉泪了，我说：‘大妈，我没你苦，你失去了儿子。’”郑成月倒背如流地回忆着。

2009年时，他从副局长的位置上被劝退，理由是“要给年轻人个机会”，那年他才49岁。直到今天，他成了这个举国大疑案中的明星警长，局里把他叫去，让他“不要老是对媒体提49岁退下的事”。

**2005至2009年，广平看守所
“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

郑成月的老家十里铺村就在王书金的老家南寺郎固北面一两里路，他中学都是在南寺郎固上的，自称在村里认识很多人。王书金所杀的女人中，有一个人的哥哥和另一个人的大伯子都是他的同学，村支书也是他的同学。王书金被捕后，郑成月立即叫村支书通知他哥哥给他送衣服，而王书金已然是家族的羞辱。书记给他回电话，他哥哥王书会无论如何也不管，“死了也不管了”。“好，那就我管了。”郑成月很豪爽，虽然王书金这个“叛道者”一直是乡族眼中的异类，但郑成月慢慢成了他最亲近的人。

从此10年，这个家族没有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连律师朱爱民都未曾见过，他的本村妻子也早已在他失踪后带着孩子改嫁。王书金曾经在广平看守所里问郑成月：“你跟我哥说了没有，怎么不来送鞋和衣服？”“书金，你想想，你哥抬得起头吗，他不理你就对了。”

“记住，判什么你都罪有应得，你让正需要女儿的母亲失去了女儿，正需要妈妈的孩子失去了妈妈，正需要媳妇的丈夫失去了媳妇，你想想人家是怎么过的，你死还不应该吗？你只要认罪这就对了。”郑成月这样对他说。在公安大院押着的时候，王书金很听话，每次做笔录都老老实实地招那个石家庄的案子，让郑成月觉得这个案子办得特别顺畅，所以不容置疑。他对刘金国也是那样说的：“凡接触过王书金的人，都会认为99%是他干的。”

郑成月和王书金的交好来自2005年押他回广平的时候。车至河南安阳休息站，郑成月喊了声“停车”。“书金，这几天没好好吃饭吧，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不对，现在都说清楚了还有什么事？就等着吃香的



聂树斌

吧。”郑成月给他手铐上白布一遮，带他走进了餐厅，半晌没有新鲜饭菜，他看见门口有新乡烤鸡，那是当地著名的特产。他花 27 块钱买了一只，撕下一个鸡腿给王书金，“吃”。当时的王书金不无意外，拿着鸡腿窃窃地瞪着他，说了一句：“哎，长这么大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闲扯间，郑成月跟他提到 10 年来家乡的变化。“那时候咱们家里穷，现在都富了，村里都家家吃肉了。”王书金逃匿后几年，整个家族背负着在逃犯罪嫌疑人的阴影，随着他母亲的去世、前妻的改嫁和五个姐妹出嫁，家里只剩下一个说得上话的哥哥和老实的父亲。

就在开车带他回南四郎固指认现场时，村口出现一个老人：“怎么警车也来了？”他边说边让道。车过后，后座上的王书金平静地嗫嚅道：“我爹胖了。”郑成月方知那是他父亲，心中惊奇万分。“10 年没有见他爸，居然没有痛哭流泪，没有上去相认，你说正常人做得到吗？”他对我说。

在广平看守所，郑成月看了王书金 4 年，对他关怀备至，也一直提防所里犯人欺负他。郑成月对他的印象总结起来是：“这个人从来不会笑，哪怕你讲再有趣

的段子，我们都笑得受不了了，他也不笑。”王书金也从来不跟他提前妻、马金秀或孩子，在他一成不变的阴沉的脸上从来不会有回忆往昔时的任何感慨或追忆。回广平后，他成了一个完全的弃儿、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无根的人，只为身负几条命案而暂时留着气。

郑成月时不时给他一根火腿肠、猪蹄，让他吃好。郑成月说：“他心里有种温暖，他说我早认识你这个哥哥给我讲道理，我就不会有今天了。”后来朱爱民去看守所看他，他会问：“我哥呢，我想我哥了。”律师都一头雾水，想着是哪个哥哥。他曾跟郑成月说过，无论今后去到哪边都认他这个哥哥。

2007 年 7 月 31 日到 2013 年 9 月 27 日

邯郸，王书金的坚持

2007 年 3 月，王书金一审被判死刑，但他随即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诉，上诉理由是：“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没有包括他的全部罪行。”他坚决承认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应属特大立功表现，法院应予以考虑。从此，这个案子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翻转局面。“上诉人干了被告的事，被告干了上诉人的事，以至中国刑事审判史上出现了二审法庭控辩双方角色换位的颠覆性奇观。”对于执业 30 年的朱爱民来说也是头一次碰到，“实属罕见”。

朱爱民告诉我，王书金在一审法庭上自我陈述时，主动提起诉状里没有的石家庄案，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阻止发言。在案件进入二审后，王书金开始堂堂正正地以上诉人的身份出现，围绕这个案子进行陈述。其间公众也有不解，既然难逃一死，为何要对着这一桩穷追不放，让审判出现罕见的翻转，对此，朱爱民也只能回应，作为被告的律师他能做的是“尊重被告的愿望”。

检方认为，“上诉人王书金在那个地方附近打工，对周围环境比较熟悉”，由此引申出的推断是王书金可能早知道那里发生了命案，想借那次命案来浑水摸鱼，揽自己身上，由此延长活命的时间。“他没这个灵性”朱爱民对我说，“一般人总是尽量少一桩是一桩，王书金的头脑没那么复杂。”

在广平公安的笔录里，他否认了有外界信息来源：“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类似这样的案子。”王书金看电视只爱看戏。朱爱民记得，他在 2005 年 4 月 20 日初见他的那一刻，对他说“你给你自己量个刑”，他毫不考虑地答“我死定了”。

王书金也许没有想到，二审的过程时断时续，维持了6年，他自己也备受煎熬、血糖忽高忽低，在看守所里吃他最喜欢方便面和火腿肠，吃到虚胖。2007年7月31日二审第一次开庭，到2013年9月27日第三次开庭，河北省高院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处死刑的判决。王书金每次都为自己“过不了春节了”，却成了磁县看守所里待得最长的人，至今，死刑复核都在等待最高法的核准。

朱爱民还要时刻提防的一件事，是观察王书金总是起起落落的情绪，从客观程序上来讲，在每次见他时都询问他是否还坚持之前的意见。2013年9月27日下午，河北高院二审裁定之后，朱爱民去磁县看守所看他，他戴着手铐的双手握着一瓶矿泉水，递给了朱爱民。“这是接受委托8年来拿到的第一笔律师费。”朱爱民为他的转变高兴。这个被家族抛弃的人在看守所里所有费用都是公家承担，朱爱民还给过他几百块钱，因为他觉得自来水不好喝，要喝矿泉水。

“这个案子就是我干的，为什么不认定？我就是去了那边，那冤死的人也会找我打架的，真心希望把这个案子搞清楚。”那次会见中他那样说，朱爱民跟郑成月一样，认为他在坦白的时候眼里看不出一丝虚假，是一种真正“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人偿命”的单纯和实诚。“应该在我告诉他聂树斌已经替他死了以后，他受的触动是很大的。”朱爱民这样告诉我。马云龙虽从未见过王书金，但每次从郑成月和朱爱民那里听得他的消息，都认为这个人虽然罪大恶极，却有种“朴素的农村特有的乡土伦理观”。

“没有认定就很不公平。他们应该惩罚我，不应该惩罚别人。别的对我都无所谓了，只要把石家庄这起案子认定下来，我心里就踏实了。”从他焦灼和不解的表情里，朱爱民觉得他也想尽快结束这件事，也许对他来说，到了“那边”是另一种新生，只消把这边的事情都了结清楚，灵魂就安宁了。

王书金在看守所里等发落的那几年，仿佛是人生真正得到“社会化”的开始，他虽不会读写，却看了很多司法类电视新闻。初见时朱爱民听不懂他半句广平土话，要河北警方帮着翻译，到二审时基本能跟他交流，很有“逻辑条理和法律知识”，跟过去那个负罪感写在脸上、自闭孤立的王书金判若两人。

“这里面还可以看电视，看新闻。我看到中央在搞司法体制改革，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前一段时间我看电视，说要给律师更多的权利，让律师说话，这样就会不出冤案。”王书金说。

2007年11月5日至2014年12月12日

两案对峙，各自僵持

2007年11月5日，张焕枝拿着最高法的信给到河北高院后，此案就陷入了长达7年的沉寂，一直到2014年12月最高法宣布异地复查，移交山东高院。用马云龙的话来说，在河北的那7年是“纹丝不动”，沉闷得“看不到一丝星光”。此时的马云龙已经被撤了《河南商报》总顾问的职务，事件源于2005年8月一桩河南矿难中记者蜂拥领取封口费的报道，这位常爱顶风而上的新闻硬汉从那年起再也没有被任何国内媒体正式聘用过。

后来，他去到海口安家，在海边写书，并关注着聂树斌案的进展。他承认，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这件事是使他投入心力最漫长的。“每一次有动静我们这些人就会行动起来聚一聚。”他指的是和郑成月、李树亭、朱爱民等。

河北高院的沉寂和背后冥冥的掣肘真正让马云龙自感无力和渺小，每逢春节，他在海口打电话给张焕枝。“我只能劝她一句话，你咬着牙也要坚持，情况到了今天已经是最坏的了，还有什么能更坏？”他这样回忆道。如今，他回到石家庄的老家照顾患病的父亲，兼而写书，在最高法宣布聂案重审后他又开始“重拉战线”，与张焕枝等密切联系着。回忆河北高院按兵不动的岁月，他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李树亭以为递交到河北高院后总算是跨了一大步了，觉得应该很快能纠正，于是当年国庆节，为了纾缓两年来的抑郁和压力，去了湖北黄冈一座山上出了两个月的家。“我当时觉得我能做的已做了，只要等结果就行了。”他对我说。至今这位居士还留着光头，这个案子不动声色地形塑着他的人生。

2010年后，李树亭还退出了代理，他的解释是，当时一拖那么久没有动静，的确是该做的都做了。律师风波在网上也吵得沸沸扬扬，张焕枝的律师像走马灯一样地换，她家从不缺律师登门拜访，有时候都一拨一拨地来，那院子都快成了斗法逗秀的舞台，老人招架不住，也不懂法，只是一个个都应承下来。但是在解除委托协议后，李树亭觉得，他终于可以以公众的身份介入王书金的案子了，于是他来到广平县找郑成月，这次，去村里又走访个遍，从此两人的关系开始熟络。其实，他早在2005年3月就找过郑成月，当时这位秉公职守的老刑警认为他无权介入此案，没有理他。

除了李树亭，郑成月也去找了那两名女证人。“这

一天15点开始下雨，到夜里还在下。那段南北土路一碰到下雨，就变成胶地，步行都走不过去，为什么她能骑着自行车从那经过？这两个人我找过她们三次，还是这样说，这样说就好了。”他对我说。

2011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全国60名律师和学者联名在石家庄开了个聂案研讨会，写就一份呈交最高法和河北高院的呼吁书，敦促重审。

直到2013年，王案的剧情又来了一次跌宕。3月末的一天，朱爱民接到一个电话，说王书金在看守所失踪了。“工作组的人和我说，别让我蹚聂树斌案的浑水，我说事是我干的，我就按实说。我说不管你怎么说，我肯定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及聂家人，我还是实话实说。”

那次模拟法庭上，王书金的脚底心被木板抽翻一张皮，被拖到审讯室的铁凳上坐了半个月，“屁股都结痂了”，但他还是没有在第二次开庭上翻供。

2016年6月27日

郑成月在南寺郎固

退下后的郑成月反而更忙了，总是不停收到记者的采访要求，常有人请他带去村里转一转。广平县城到南寺郎固只有区区5公里路，郑成月熟门熟路，2005年10月，他在村里住了一个月，匍匐在王书金家的猪圈后，就为了等这个失踪的人出现。

王书金在认郑成月这个“哥哥”后，郑成月觉得理所应当该为他做些事，那就是如果他被执行后，应该把他的骨灰带回祖坟。而王书金的亲哥王书会早就和他“断绝了关系”，郑成月也知道凡是跟王书金有关的事，他都拒之门外。6月27日，我跟随他走进村里，这座典型的北方农村，仍然是一副前现代的衰败样，满是裸砖垒的平房，仿佛20年来从未变样。

郑成月来到村民王书银的家，他是王书金的堂哥，现在正经营着一个农资站，郑成月在当年办案时常去“打扰”他。那个农资站在一个破砖房里，里边又土又陋。“你跟王书会说说，王书金这事一定要办妥。”“我不跟他说，他不会理我的。”王书银就比王书金大一岁，却跟他无甚过从。“我们不跟他在一块玩，他上了一年小学就不上了，跟他没共同语言。”王书金刚一接触集体，就成了一个落单的人，低着头晃在乡间野外，村里人常看见他破坏庄稼，孤僻寡言。

辍学后，回家喂猪割草，空练就了一身力气。若问乡邻他有什么本事，一般都会认为他力气大，所以

干来干去都是在窑厂搬砖。70年代“文革”期间，村里虽然都是吃菜根稀汤的，但像他这样的文盲也不多。“一方面家里穷，7个孩子，只有两亩地，吃也吃不饱。再一方面，他不读了也是因为他自己不爱读。”王书银说。不管怎么样，他哥哥王书会读到了中学毕业，还在村里当了木匠。

王书会是家里的顶梁柱，排行老二的他还有个姐姐。王书金在14岁时出事后，去少管所待了三年，从此就被永远钉在乡族的耻辱柱上，王书会更是对他“张嘴就骂，抬手就削”。郑成月总是认为，王书金缺少爱和温暖，“没有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郑成月曾经跟地方政法委的领导解释，为什么广平的凶杀案就是不绝，他说“贫穷是犯罪的本源”。

可最关键一点，在性禁忌更严苛的北方农村，王书金一直是在暗自疯长的境遇下摸索着这羞于启齿的本能，他曾经对郑成月说，他在冲动时就是控制不住，“如果能有人像你这个哥哥给我讲道理，我不会走到今天”。

90年代时，该村还是乡级建制，后在撤乡并镇中归于十里铺乡。村内王姓人口占了三分之二。郑成月带我去找王家的老宅，眼前的是一座荒弃的院子，院子里野草和树木已经疯长成一个小林子。站在南边的乱砖堆上，透过芜杂的树隐约可见两间东屋，四间北屋，王书金和王书会婚后都在北屋挨着住。如今，王书会的屋外墙已经粉刷了新料，而王书金的屋子还是他逃走时的模样。父母都过世后，王书会为祖屋上了锁，搬离了此处，仿佛要永远把家族阴影锁在这院里。耐人寻味的是，南边的邻居是一对新婚的夫妇，在知道出了个王书金后也搬走了。

郑成月匍匐在村里候王书金的时候，曾经找过他的前妻，他记得那个女人有点癫，毕竟她是换亲换来的，没人敢嫁给王书金。郑成月问了她很多生活上的细节，更确定王书金就是凶手。被郑成月盯上后，他走上亡命之路，从广平坐车到济南，到聊城，又到石家庄，回到原来干过活的鹿泉，因为没有找到活，又到了安阳、郑州、在荥阳砖厂安顿了下来。

郑成月熟练地向我演绎着王书金当年作案的路线，把作案点一个个指出来。王书金的记忆之强令人震惊，就是因为日复一日单调、沉闷的底层生涯，让他把每个不寻常的时刻镌刻在心。郑成月的记忆也很精准，他对这里寸土寸路都了然于心，由此可见此案对他有多重要。“可以说我是这个案子里很关键的人物。”他说。这几天，最高法宣布聂案重审后，他每

张焕枝，不容易

文 / 徐文齐

命运面前，张焕枝没有放弃。她相信自己的儿子聂树斌。

家变

张焕枝说，她已经接待过三代记者，我算是最小的。对于她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这些报道她自己则很少看到。下聂庄村支书仵风书告诉记者：“聂树斌妈今年72岁了，扫了两年马路。这段时间为儿子的事情也挺闹腾，扫马路的事就停了。现在有人替她。她最近太忙了。”

她几乎一生都在忙于儿子聂树斌的事。1995年之前，是生养；1995年之后，是为亡人奔波。2005年王书金出现之后，她就更忙了。

聂树斌因强奸杀人而被执行枪决21年了，作为母亲的张焕枝始终不相信是他所为，她为了证明这个“信念”，而一直“奔奔波波”。

记者：在王书金出现之前，你们家是不是像有些村民说的，也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没做什么事？

张焕枝：做了，我可以说，只要有时间，我就到公检法去跑，但都是进不了门。

记者：跑去干什么？

张焕枝：当时跑不为什么，就问为什么枪毙我儿子，他犯了什么法了？当时他不告我犯了什么法枪毙他。你总得说他犯了什么法，才应该枪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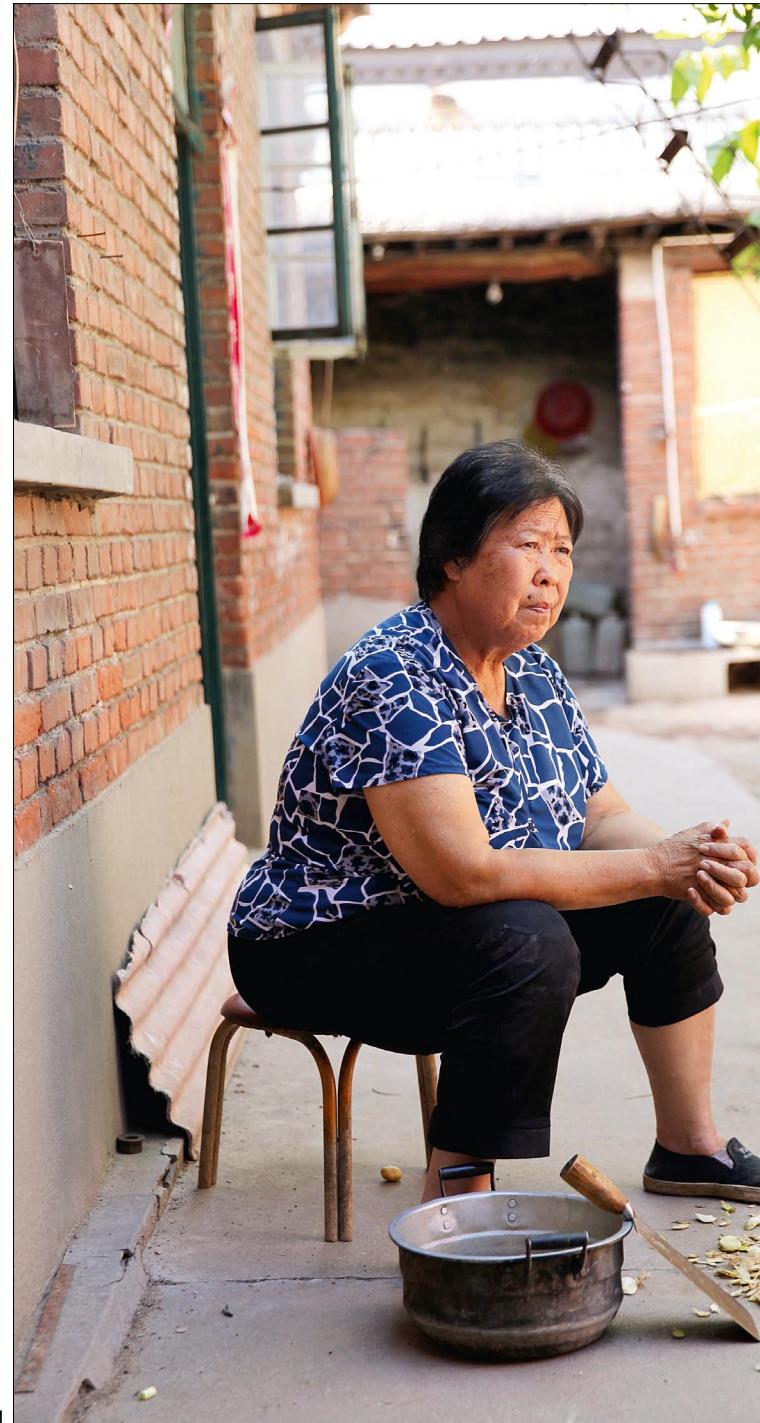
记者：主要是去河北省高院？

张焕枝：不是。检察院、公安，哪个法院都去，当时能找到的都找，哪个单位也进不了门。

记者：当时是不是已觉得不应该是聂树斌做的？

张焕枝：我压根儿就相信不应该是我儿子干的。我认为他这个案子，他不会去做的。我就不相信。一直都不相信。当时就怀疑。

张焕枝的名字，一直和聂树斌案捆绑在一起。聂树斌案一日悬而未决，她的名字就会被不断提起。对





1.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
2. 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
3. 聂树斌家聘请的辩护律师李树亭

于张焕枝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她也想过一种平淡生活。她告诉记者：“其实老百姓都愿意要平淡生活，不愿意要那种大起大落的生活。起来了，你会高兴；但是落下来，你绝对不高兴。你受到好的事情了，你觉得上去了……就像我吧，从前也就是个中等，算中等户吧，倒也挺平淡，可是没了我儿子，我们的幸福……可以说，天塌地陷，连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记者：其实你的幸福感主要还是来源于孩子？

张焕枝：对，对。还是得说，欢欢喜喜一家（人），怎么都好，根本不是说什么吃好穿好、吃赖穿赖，根本不是那个……可以这样来说，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得多得多，现在怎么都能过得去（但现在家里却没有了聂树斌）。

命运从她儿子那一夜未归宿和第二天公安局的人找上门来发生了改变。

记者：当时警察为什么怀疑是聂树斌？

张焕枝：不知道。他当时不是在家里被抓的。

记者：在哪里？

张焕枝：在马路上被抓的。他骑着车子去玩。

记者：没有给你们一个解释？

张焕枝：没有。

记者：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被抓的？

张焕枝：第二天。

记者：他晚上没有回来？

张焕枝：没有。

记者：那你们当天晚上着急吗？

张焕枝：不着急。

记者：为什么不着急？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住在厂里？

张焕枝：不是，不是。我认为他到同学家里去了。根本就没往犯法那块儿想，根本就没想。

记者：第二天是公安局通知你的？

张焕枝：第二天下午，公安局说，你儿子没有回来。他们说这个事情，我才知道，他们是公安局的。他们没有穿公安局的衣服。他们到家里来，说我儿子没回来，说是他们把我儿子逮了。我问：你们为什么逮他。他们说，有些个事情，仅仅就是怀疑他，我们问他。就这样。“仅仅是怀疑他，我们问他他。”

记者：你没有问他们怀疑他什么，为什么怀疑他？

张焕枝：我没有往这块儿考虑，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跟你说，我没想到，我儿子能犯法，根本就是不可

能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法院的判决？

张焕枝：（之前）不知道。那是律师告诉我的。法院和公安根本没告给我。

记者：什么时候律师告诉你的？

张焕枝：枪毙以后。

聂树斌之死，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也成了张焕枝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这个家庭不再平静，家里的小院也经常是人来人往。2005年之后，王书金以老百姓口中“真凶”的面貌出现之后，剧情发生惊人反转，这个家庭变化更大。邻居聂庆海说：“记者来得跟赶庙一样，来了一个又一个。”

坚信

张焕枝是一个很硬气的人，说话底气十足，做事果决，不拖泥带水。她的个性和能力是很多事情“逼”出来的。她好像海明威笔下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桑地亚哥，与大海搏斗，与大马林鱼搏斗，与巨鲨搏斗，但我们不知道，大海、大鱼对她来说象征着什么，是当下的社会环境，还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本身，或者像外界传说的一张细密的权力关系网。

张焕枝告诉记者，农村的事情并不复杂，她本人更加不复杂。“我们没文化的人，纯粹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官场的话不会说。老百姓说不了你们这些文言话。”她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要把自己家的事情解决了，一门心思。

如同桑地亚哥一心只是想要出海打鱼，并没有考虑在这过程中的艰辛。张焕枝也是一样，她只有一个目标，却没想到这过程会如此波折。邻居聂庆海告诉记者：“他大哥说过翻了案以后，不如不翻，不翻的原因是啥，死人把活人折腾死了。”外人也许会有这样的见解，但她本人却从未想过放弃。

记者：2005年王书金出现之前，你就坚持为聂树斌伸冤，2005年之后，更是往来奔波，做各种尝试。这之前和之后，你的要求，你想要得到的结果，分别是什么？

张焕枝：总的是一样的。之前，我想着把我儿子的事情，让我搞明白，就是这么简单。2005年以后，我更相信不是他干的，所以总的还是这一个主题，相信不是我儿子干的，那你就给我儿子一个清白。就是

这个，没有别的意思。

张焕枝的信念，就是“伸冤”的愿望，就是对“平反”的要求。她之所以一开始就怀疑，除了对儿子的信任和了解，还因为案子最初审理得仓促，以及对家人方面的不报。

张焕枝：刚开始，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说想闹清楚，我儿子到底是犯法没犯法，你总不能不吭声、不告诉我们，就把人枪毙了。枪毙了就应该通知我，最起码我应该收尸吧，总不能让他死就死在那地方吧，那是不可能的。那死个人，国家都不管？不可能吧！是不是？那时候只是想搞清楚，没有什么想法。

记者：现在老百姓似乎都还是比较相信法律，但他们觉得自己知道得很少，而公安法院专职干这个，必然掌握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情况。

张焕枝：一样。我跟老百姓是一样的。那个时候，跟你说，我光从我脑袋瓜里坚决接受不了，说树斌干的，说是你儿子干的，我直到现在也接受不了。我觉得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会干什么，不会干什么，我可以来说，我对他特别了解。但那时候，你不接受也得让你接受，就是这样的司法，老百姓确实没有办法儿。

记者：王书金出现之前，有没有想到，警察可能真的掌握了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实？

张焕枝：没有。我认为警察有些个事情……人命关天的事，你应该细之又细，但有些个公检法的人太渎职了。

记者：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当时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竟会那样。当时，你可能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相信，但因为公检法说了，你心里也会有一些动摇，是吗？

张焕枝：当时（停顿）……我（停顿）……法院这一块儿，没有在我的范围之内，我管不了，检察院我也管不了。但公安这一块儿，我当时就感觉他们在浮皮潦草做一些事情。当时，我就感觉到了，并不是感觉不到。有些个事情，我都感觉到了，（公安局的人）来了，就很敷衍了事地去问一问，没有说很细致地去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就能感觉到，尤其公安这一块儿。

对于当时公安办案情况，上了岁数的村民仵正贵同记者谈起过——

仵正贵：公安来调查几次，老百姓们都去作证，说这个孩子不是那样的孩子，对吧？腼腆得不行不行



聂树斌案律师团成员（左至右）：刘博今、陈光武、杨金柱（摄于2014年）

的，发生这个事，劫人家女的……他跟女的说个话，还脸红，他去劫人家女的？老百姓都有这个想法，这个孩子太腼腆，太脸皮薄……

记者：公安局是什么时候来调查的？是在枪决前还是枪决后？

仵正贵：之前吧。那个时候，咱们不在家。也都是听人说的，现在没了这个人了（注：指当时为聂树斌作证的人），离得不远，有两个上岁数的，90多岁了，死了。可会说了。（他）说公安来了，我给作证，说这孩子不是这样的人，不是那个性格，脸皮薄，见了人都不爱说话……

记者：公安还是认为是他？

仵正贵：公安也不听，那时候也不听。

由于这些种种张焕枝口称的“浮皮潦草”的办事方式和不合情理的程序，遂使张焕枝更相信儿子的清白，并为之奔走不息。

记者：你觉得你的性格是怎样的？

张焕枝：算是比较坚强。我也是受了很多苦。

记者：你说受了很多苦，在聂树斌案之前，在成长过程中，受过什么苦吗？

张焕枝：成长过程中，倒是顺风顺水，没有什么……就是为我儿子的事，奔奔波波，我确实不容易。

记者：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哭过吗？

张焕枝：哭过。没有流泪，那都是瞎胡说的。我也是个平平常常的农村妇女，也知道难，也知道自己办不成，也遇到好眼，也遇到冷眼，也遇到好话，也遇到不好的话。

记者：流泪是因为什么？

张焕枝：难呗，走投无路。

记者：会哭很久吗？

张焕枝：流泪之后就好了。

自立

所有东西中，苦难是最能考验磨砺人的。对张焕枝来说，真应了那句“祸不单行”的话。儿子的事情是一个打击，丈夫的事又是一个打击。

记者：你丈夫的身体状况（注：聂学生偏瘫，以前不能走路，现在勉强可以拄着拐杖走），是自杀之前落下的，还是之后？

张焕枝：自杀之后。

记者：吃的什么药？

张焕枝：安眠药。这么高一瓶子他都吃了。

记者：他从哪里买的？

张焕枝：不知道。

记者：他的性格怎样？

张焕枝：也算可以。但没有我坚强。

记者：他当时为什么要自杀？

张焕枝：主要是不想活了。失去儿子了。

记者：这个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张焕枝：对我打击比较大，促使我更坚强了。事情往前走不动，促使我更坚强了。无非是这个，别的也没有。

可以想象，聂学生自杀的当时对张焕枝不可能没有影响，但长远看来，或许确实如她所说，促使她更多依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在采访中，她多次提及这一点。

记者：你受了这么多苦，和亲戚朋友说吗？

张焕枝：没有。可能从心里，跟你说实话，觉得自己天塌地陷的日子不好过，老的（那样）——你见过我那个病老头，儿子没了，这怎么办，确实没有办法。

我的事情不用他们帮忙。你说，净是老百姓，他（们）没权没势。你想，那个政府部门，老百姓都进不去，有事情也进不去。

儿。起码人家家里，男人是健康的，儿子、女儿也都可以帮一下。我也没有儿子了。可以说，我就一个信念，自强自立。

记者：老聂家有没有人帮什么忙？

张焕枝：没有。他们都在外面住（注：聂学生有三个兄弟，老大在太原，老二在石家庄，老三是个鳏夫，他留在了村里。这三位老人目前都已去世）。都是老百姓，能帮什么忙？不是我不找人家，也不是说人家不帮忙，实际上人家没有那个能力去帮忙。那些个事情，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跟你说，这个事情，21年，我都没有撒手。

记者：你娘家的人有什么帮助？

张焕枝：娘家也没有。娘家离这儿也挺远，我不用他们。我的事情不用他们。你说，净是老百姓，他（们）没权没势。你想，那个政府部门，老百姓都进不去，有事情也进不去。不是说像咱们想的那么简单，有事就进去了，可以说连门岗都进不去。拿着身份证？拿着身份证也进不去！那个工作单位，那个办公室，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个能进，那个能进……

记者：那他姐姐呢？

张焕枝：她也不跑（动）。我也不让她跑。这样告诉你吧，为什么，因为她有工作。巴不得给你找事嘞！我不让她跑。

记者：在这件事上，她有什么精神上的鼓励，物质上的帮助？

张焕枝：我不让她参与。我实话告给你说，我就不让他们参与。你不参与，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些个政策我也懂，但是，你要叫我说你们的话，我确实说不了。政策基本上懂，我都是在框框之内。可以说，我都走着嘞。法律之外的事，我都不走。

村书记仵风书告诉记者：（张焕枝）这个人是真不错。这个“一案两凶”出来之后，搁一般老百姓，要跟政府去闹，去折腾。这个出来之后，好多英国记者、美国记者来了，她都不见。她说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国家的事，你们外国人帮不了我什么忙，只会炒作我的国家，你们没有必要为我这个事来。再就是，不上访。要是别人，早就跑到政府里了。她找就是找（河北省）高检、高院，除了这两个地方，别的她都不去。这两个都是对口单位。政府里，一次都没去。挺懂事的，挺好的一个人。

村干部边振山也说：村民都感觉到张焕枝头脑比较清醒，也没有给国家、给政府找什么大的麻烦。人

家自己都说，我不去政府闹，我就依照法律手段，去寻求我儿子的案子的清白和翻案，最终是相信国家法律。像 2005 年，不是有好多美国记者要来采访，人家态度就很明确，你是外国记者，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的法律。

张焕枝：可以这样说，我不跟他们（注：指那些上访者）一样。我的性格也不跟他们一样。我做事也不跟他们一样。我今天来你不给我办，我明天找，明天不给我办，我后天找，我绝对不闹事。跟你说，你到河北高院去问问，他们也佩服我。

记者：你就是跟他们讲理？

张焕枝：是。我从来说不像那个样。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没有用，确实没有用。你去那儿发火啊，干啥啊，咱的事情还是没有人办。发了火，有时候人发火说话都能出了圈，一出了圈，说实在话，那就不理性了。

也许她也曾有过不理性的的时候，或许也用过不理性的方法，但现在她很明白，那根本无济于事。可即便是采取张焕枝这种方式，也未必能够立即解决问题。她说：“这么多年，可以说，从 2005 到 2014 年，都没有效果。不是我不找你，是‘他’不作为，没有效果。就是那个判决书，也是我的律师找过来的。”

“不作为”是张焕枝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较多的词。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尽其所能提出最起码的合理要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却得不到任何回应，这就好像是弗朗茨·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土地测量员 K，一直想进入城堡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记者：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苦，什么印象比较深刻？

张焕枝：有什么深刻的？就是进不了门。进了门，人家（也）不理你，不给你办，你有什么法儿？那老百姓就找（他）吧，今天找，明天找。

记者：你觉得这中间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进不了门，为什么进了门也办不了？

张焕枝：我认为是不作为。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作为？

张焕枝：说不好，真说不好他们为什么不作为。那个事情，得去问他们。

张焕枝：我那时候（注：指 2005 年王书金出现之后），我跟你说，当时我相信河北高院会很快给个结果，不会拖延这么长时间，结果他 7 年都没有给个结果。我当时对政府，对河北这一块政法委啊，我抱

的希望挺大，结果他们就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我就是不管你，我就是不理你，我就是拖着你。最后 2014 年的 12 月 12 日，最高院把树斌的案子放到山东了。

记者：其实你还是比较失望的，也比较生气？

张焕枝：是啊（失望）。当然生气，你想想我能不能不生气吗？你调查，调查什么结果，你就应该告给我，结果他们 7 年没结果，这一点我作为老百姓，我确实接受不了。

记者：其实你对法律之前还是比较相信的，但是聂树斌案，有些执法的人，并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办？

张焕枝：我只能说，他们不作为。这山东一年半的时间就能查出结果来，同样是用的一个法律，河北为什么没有结果。我只能说，他们不作为，那怎么说呢？

记者：确实有些执法人员，不把老百姓的事当事。

张焕枝：可以这样说。

记者：我们自己觉得是头等大事，他们……

张焕枝：是，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在司法这块，有些个事情需要他们解决的时候，好多时候，他们就这样的态度（注：指不给解决），我能看到。因为 21 年了，我看到的社会现象，实实在在就是那样的现象。好多年，解决不了一个事情。

尽管“有关部门”一直不作为，一般普通人也只能坚持以合法的形式要求他们有所作为，尽管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却仍不能越轨；这个过程，诚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抗争可以，但要有“纪律”，那样他们也就无话可说。

张焕枝告诉记者，老百姓不能做什么，记者的帮助却很大。这个社会，话语权确实不掌握在单个人手里。但若没有个体的坚持不懈，则后续的一切都丧失了基础。在早前的报道中，律师李树亭则说，聂树斌案若不是张焕枝的坚持，也许走不到今天。

公平

西绪弗斯要将一块大石头推上山，每当快推到山顶的时候，石头又滚到了地上，他只好从头再来。张焕枝就好像那西绪弗斯，努力、坚持，一次又一次看见了光明，而光明也一次又一次从眼前消失。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折磨人心的故事，好像一个个现代隐喻，同样在表述着现世的荒谬。

但现在好了，大石头要被推上山顶。

张焕枝和聂学生的生活也要进入平静之中。当记

者问聂学生事情的最新进展时，他说：“等着最高法的意见呗，全国人民都在等着呢。”而对于最终结果，他说我们不能左右，但全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知道了，这是冤案。

是的，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聂树斌案牵动全国各地知道此事者的心，人们都等待着真正的公正判决。但对于何谓公正，张焕枝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你们家都围绕着这个案子？

张焕枝：我的老伴和我，现在心里没有别的问题，就是想着给儿子还个清白，没有别的想法，还回来清白就可以了。

记者：这件案子，因为年代久远，还有证据问题，可能最终也弄不清楚是谁干的，也许没法还谁清白。

张焕枝：要是按公平公正说，既然你不知道是谁，不敢肯定是谁，那你不管是谁，都给他清白就对了。你给树斌一个清白，王书金这块，也给他一个清白。剩下别的案子，是他（注：指王书金）负责的事情，他不是三起四起嘛，一个说一个，这三起一个一个说就对了，不能和到一块说，哪起案子是哪起。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是不是感觉到我们国家的法律进步了？

张焕枝：假如说，树斌得到清白了，别的案子还是做不好，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炒得热，但是好多人他是有事情才让你解决事情，而这大部分人得不到重视，光树斌这个案子解决了，我觉得也证明不了什么法律的进步。大家伙都得到温暖了，这才叫温暖嘞，对吧？你一个人得到温暖了，不等于温暖。我认为是这样。这样就公正了，你觉得呢？

记者：对。我们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聂树斌一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律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个事情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别的事情也理应如此。

张焕枝：那当然是，这就公平了。仅仅说这个事情得到关注了、解决了，树斌的案子得到温暖了，那大多数人都没有得到温暖，这怎么解释，怎么说啊？大家伙都得到温暖了，这才是公平。

记者：其实你为自己的时候，也是在为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的坚持，整体来说会发生一些改变？

张焕枝：说不好。确实说不好。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光为我家里事情，别人的事情我帮不了忙，确实帮不了。第一我没有能力，第二即便我关注，我也帮不上忙。至于说国家法律改不改，确实不是谁说了算的，不是我说了算的。

记者：能感觉到你也是比较同情有类似遭遇的人，想要帮助他们。

张焕枝：没有，没有，确实也没有去帮别人。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遭遇过。我也有跑不动的时候，也有人不理会我的时候，也有人不管我的时候。

命运

在村落中采访，记者发现，尽管聂树斌案最终结果还没出来，但这个老人因其人格和行事已得到足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普遍的，乃至全国性的。对于她所生活的村庄来说，相处才是最实在的，表现在人们的一个眼神、一次举手投足之间。

记者与下聂庄村的老人仵正贵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觉得张焕枝这个人怎样？

仵正贵：俺们村里，谁家过事，红白喜事，人家都要去的，都要找人帮忙。

记者：这是真凶出现之后才这样？

仵正贵：打她孩子出事之后，就不出去了；人家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没了，觉得有点躁。过几年，真凶出现之后，又去给别人做饭，给过世的做饭。人家孩子有了事，也没人去找人家了。人家不好受，你去找人家帮忙？……想到人家家里有这个事了，人家心里挺难受的，所以说，别的户就不去找人家，不想麻烦人家。后来人家又主动去找，去帮忙。

聂文秀曾经教过聂树斌小学一两年，她印象中的聂树斌是个胆小的孩子，一直坚信他不可能做出杀人的事。她告诉记者，以前张焕枝见人不说话，可以感觉到她心里的沉重，现在好了，见着人，高高兴兴地扬着头走路。

记者跟仵正贵提起，说张焕枝现在开朗些了。他笑着说：“不开朗，也就活不长了。”

命运，那正扼住我们喉咙的命运！在《老人与海》的结尾，桑地亚哥拖着大马林鱼的骨架上岸了，尽管他还是无所获，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未被命运打倒的人。

张焕枝，也是这样一位不屈的老人。命运最终给她什么结局，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孤身一人出海，已然拖着那大马林鱼的骨架上岸，人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鱼，而对这位老人，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敬意——尽管她只是如她所说做自己的事罢了。□

头条传媒
HEADLINE M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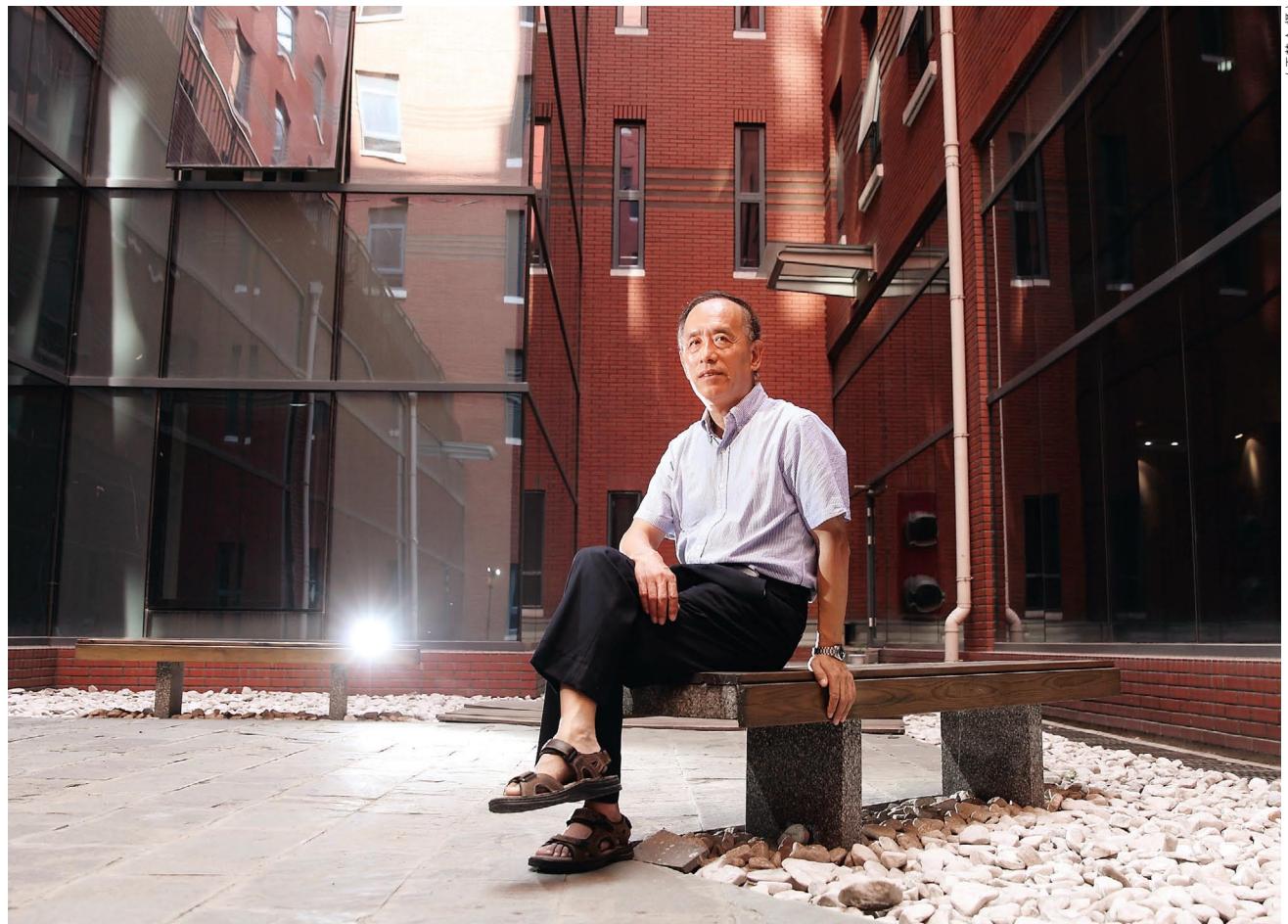
娱乐营销 内容智库

“在未来，每个人都有
十五分钟的成名机会”

—安迪·沃霍尔

我们制造明星
We Make Stars





(于楚众 摄)

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保生

错判，还是错放？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保生

文 / 闻一

疑案纠不纠？疑案是不是错案，是不是冤案？怎么看待证据的充分和不足？错放，还是错判？

从2005年余祥林案到现在的聂树斌案，前者亡者归来，无悬念无争议；后者真凶再现，一案双凶，证据上疑点重重，各执一词。刑事错案的积累有点类似形成一个“错案池”。被放入这个池的案子各有特点，但都共同等待着权力自我纠错、舆论关注和司法观念进步等的多重力量形成的合力的“打捞”。这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先被“打捞”的一定是没有太多纠错分歧的。每一次“打捞”会形成一次舆论高潮，带动

一批类似案件浮出水面。而沉淀到最后的，往往是最艰难者。

事实上，“最艰难者”未必是阴谋论导向下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司法现状下整体的认知边界问题。“最艰难者”往往考验一个社会司法文明和司法实践矛盾中的价值选择。

冤案和警察权

三联生活周刊：从我们观察，所谓冤案的出现和平反，通常有三条线索：一个是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一个是司法理念的变化，一个是司法实践的推动。是这样吗？从源头来看，我们国家错案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张保生：曾经我们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打击犯罪，然后以运动的方式平反冤假错案。过去我们一直习惯强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利益，那时候不叫保护人权，实际上是用惩罚犯罪来保护。出发点没错，但他没有把这个被告人也当作人民的一部分，在人治的情况下我们很少考虑这个事情：犯罪嫌疑人他们可能是“假”的，他们不是真的罪犯，他是嫌疑人。改革开放后三次“严打”留下不少冤错案件，那肯定是冤错案的高发期。

我们的司法理念还是比较传统的。整个的司法理念，第一个叫打击犯罪；第二个是疑罪从有，不是疑罪从无，是有罪推定，不是无罪推定。有什么理念它有什么样的制度。当然制度和理念它是互相决定的。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张保生：什么叫司法文明？是人类司法从愚昧和野蛮走向开放的过程。它的理念是不断在变化的。从全球范围的趋势来说，“二战”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我觉得现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活动的侧重点有点偏，总是在宣扬怎么打败德国、日本，怎么打败法西斯，但是“二战”最伟大的成果是什么呢？反而忽视了。实际上从文明角度《世界人权宣言》是“二战”后最重要的成果。宣言第七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在平等的诉讼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质证权利，质证权包括交叉询问和对质的权利，交叉询问“是对抗制的规定性特征之一”，“它取代了我们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刑讯制度”。还有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指出，你要给任何一个人定罪，都要有一个依法成立的法庭，经过公正公开的

审判。什么意思呢？谁能给别人定罪？法院。检察院行不行？不行。公安局行不行？不行。“二战”中间大量的秘密审判，审判前置，生命就给剥夺了。所以，“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进程付出巨大代价的产物，是人治到法制、野蛮到文明的大的转折点。也是“二战”后全球法治意识进步的节点。

但是这个阳光照到中国确实有点晚了，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我们实际上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搞一套自己的专政制度，除了搞运动以外，是一个狭义司法的实践。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理解这个“狭义司法”？

张保生：我们是一个流水线的体制。到今天也还是这样的。有一个说法，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说，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我们实践中叫“案卷移送”。聂树斌的案卷是侦查机关弄的，他们侦查的笔录啊口供啊证据啊都在这儿，然后你是检察院，检察院你看吧。检察院从这里边挑出几页来，说这几个不行，拿出去，基本上原封不动给法院，你看吧。那么这个人有罪没罪，是谁定的呢？公安。

所谓“公检法”三家，其实是一家即一致对付刑事被告的专政机关，这是一种传统的专政思维。这种“铁三角”或“铁哥们”关系是以侦查为中心的，“大哥”是公安机关，“兄弟们”意见不一致时还会有一个“家长”，就是政法委来协调案件。像赵作海冤案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这种传统的铁三角关系中，根本没有辩护方的地位，甚至连影子都没有。这违背了控辩平等的司法规律。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警察权”舆论很早就在讨论。它是人治社会的特征之一，它也是在打击犯罪保卫人民的思路下，执法效率优先的产物，特殊时期有存在的合理性。那它对于司法规律意味着什么？

张保生：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实现，应当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结合起来，突破传统的“公检法三家配合、制约”套路。对警察权的再认识是题中之意。

我去广东警察学院讲课，各省的警察学院进门会有个大台子，上面刻着周恩来的一句话：“国家安危，警察系于一半。”一个国家的安危啊，一半是靠警察。你说警察有多大？这个提法的背后，公权和私权就没有边界了。我2011年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去了三个月做访问学者，哈佛法学院东亚研究中心要求访问学者

都要做一个报告，我就讲了中国的司法改革，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韩国学者给我提了一个问题，她说你知道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是检察官签署逮捕令么？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公检法”铁三角的体现。实际是警察权的延伸。

张保生：在侦查中心的诉讼构造中，警察目前还拥有一些不受检察院和法院制约的特权。例如，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中侦查人员出庭的身份，《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将其规定为“出庭说明情况”，这无疑暗示了侦查人员出庭拥有“单向性说明”的特权。这是我国长期形成的“警察特权”，让警察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簿公堂，被认为是降低了警察的身份。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偏向于公权，偏向于诉方的理念和制度，必然导致错案率高。这是理论。那回到现实，我们巨大人口基数下降低犯罪率的刚性需求，仍然需要我们去对司法文明的理想做出妥协？

张保生：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雷洋。过去我们就是打击犯罪，但是打击犯罪你打击错了，无辜的人就会成为受害者。打击犯罪不就是为了保护人民吗？这就需要反思我们的司法制度。包括司法人权保障一系列，无罪推定原则、法庭审判原则。公安机关你是搜集证据，法院证明他有罪，你不能自己给人定罪。它会带来一系列观念的变化和挑战，怎么看待疑罪？怎么看待死刑适用？

往更深里说，就是我们的司法，是报复型司法还是恢复型司法。报复型司法其实古已有之，刘邦“约法三章”不就是杀人者死嘛。亚里士多德说什么叫正义，他叫矫正性正义。什么叫矫正型正义呢？第一个要求说，你要是打我一拳，我要踢你一脚，因为正义就是天平嘛，往这边倾斜了我就要往那边倾斜一下，他说这个还不够。矫正型正义是矫枉过正，什么意思呢？你要把我一只眼睛打坏，我就要把你两只眼睛都打坏。这样大家才知道，不要把别人一只眼睛打出来，因为你要把别人一只眼睛打出来，人家就会把你两

过去我们就是打击犯罪，但是打击犯罪你打击错了，无辜的人就会成为受害者。打击犯罪不就是为了保护人民吗？这就需要反思我们的司法制度。

只眼睛打出来，所以大家就不去犯罪了。这个叫报复型司法。

报复型司法，过去全人类都是这样，我们把犯罪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恶，邪恶的恶，杀人者死。刘邦说的也对啊，杀人者死，这样大家都不杀人了嘛，要不然随便杀人也不行啊。对待恶，宁错勿纵。恢复型司法，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疾病，所以我们叫矫正机构，逐渐地把犯罪理解成一种社会疾病。如果它是一种社会疾病，那司法机关有点像医院了。你不能说谁到你这看病你就把人杀了啊，所以你要给他治病。我们社会整体的刑罚理念还是比较落后的。法治国家的标准，一个就是权利意识，还有就是诉讼社会。

2010年北京出了一件事，有一个17岁的德国小男孩在鼓楼被杀了，一帮记者就到首都机场去采访男孩的妈妈。男孩的妈妈从德国飞过来，她儿子死了啊，大家都问她说你有什么要求，记者们等着她的愤怒，但是她说了让我们都很震惊的话。她说她没什么要求，如果说有要求的话，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中国的司法机关不要判杀她儿子的人死刑。这个故事值得我们去反思很多问题。

2005到2010年，渐进中的转折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2005年，这一年前后，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余祥林案，纷纷出现；这一年也是聂树斌案中一案二凶出现的一年。这是偶然吗？如果对这个国家而言，意味着对冤案纠正的重视，对司法文明的启蒙，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张保生：还是有个大的背景。从“十五大”，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改革，里面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但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懵懂的。觉得这个人治不行了，要搞法制建设，四中全会后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但并不非常清晰。

这里面有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国外思想的引入，但这些可能都还不是最直接的原因。主要的还是司法实践。我们叫“亡者归来”，比如说你杀了人，你杀的这个人活着回来了，这肯定是冤假错案。这是谁都不可否认的。你不得不承认。怎么承认？承认之后，怎么办？问题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司法实践遇到了绕不开的问题。这个问题回应了国家在观念上、理念上正在发生的变化。纠错成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而这里面，命案又

成了刑事错案纠正的突破口？一个口子就这样被撕开和切入，是这样吗？

张保生：是。我国公安机关长期奉行“命案必破”的理念，但侦查活动所获得的证据总是不完全的，总有一些因证据不足而无法破获的“冷案”，甚至还会有一些像美国肯尼迪总统被刺案等因证据逐渐失效而永远难破的“死案”，如果不顾证据不足非要破案，只会迫使侦查机关制造冤案，念斌案、呼格案等冤案就是例子。

在“命案必破”盛行的时候，公安局一破案马上开庆功会，给警察发个几等奖，集体立功。你们抓住他了，集体立功，然后你们把这个送到检察院，这个法院能判他无罪么？一看无罪，你们庆功不就是假的了么。你怎么能庆功呢？你只是抓到一个嫌疑人，不是抓到罪犯了，法院还没判呢，你们抓错了也有可能啊。2013年公安不提“命案必破”了，但这种长期形成的司法理念，不会随着公安部一纸发文便烟消云散。这是以侦查为中心的具体体现，这个背景下，法院没有权威性，也没有有效办法去改变现实局面。

那从2005年以后，问题来了。亡者归来，怎么办？人脑袋一掉，像呼格案，你平反了又有什么用呢？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损失太大了。它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冤假错案我们免不了，但是我们先把死刑的冤案给控制住。这个抓得很关键。

三联生活周刊：有意思。我们看到了实践和理论互动中的司法文明进程。那这个标准怎么定呢？

张保生：所以，2010年对于刑事错案问题，对于司法改革，都是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点。这一年，两院三部出台了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一个是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一个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这两个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司法界——包括法官检察官，也包括学者——法治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整整30年，我觉得正好符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

你要重新注意下这两个文件会很有意思。这里面没有说刑事案件证据规定，我们先从死刑开始。其实人的自由权利和生命权利同样重要，但是把死刑的错案作为突破口的思路可以看得很清楚。死刑案件要讲证据，不能说光是打击犯罪了，我们要讲证据规则、证据制度了。

然后为什么要同时配发了一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呢？这两个文件一块发，传递出一个声音：我们也意识到冤假错案是怎么来的，就是刑讯逼供来的，就是非法证据获取来的。所以第一个，死刑的冤案我要控

制住，死刑的证据一定先要坐实。先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一步一步来。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个“证据规定”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它出台背后一定有很多博弈？

张保生：当然。这两个文件是最高法院起草的，两院三部，两院是检察院和法院，三部是司法部、公安部和安全部。会签了大概一年半，不容易。

但是签了以后，因为它这个条件土壤不成熟，我们的证据理念、我们的政法队伍不适应，所以它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因为没有案例，所以排除不了。所以要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就必须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讲清楚，以侦查为中心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大胆地去平反一些案子，以疑罪从无的理念去再审一些案子，是一个因势利导的问题。

关于错判和错放的大讨论

三联生活周刊：死刑冤案的平反作为突破口，而这里面也有容易纠正的和争议明显的。洗冤到了深水区，就会出现像聂树斌案这样迟迟没有结论的案子。公安觉得他们办的是铁案，但证据环节的薄弱也是事实。又有二凶的出现，但对“真凶”的指认，证据环节同样薄弱。这个是不是就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张保生：我们之前讨论了冤案产生的广义背景。而它的一个狭义背景就是证据制度。证据制度实际上涉及一个大的概念，就是事实与证据的关系。这又是一个司法理念的问题：什么是事实？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讲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不是物质的总和。

实际上我们的司法界不分客观存在和事实，也不分事实和证据，这几个概念他们都是混着用的。什么叫事实真相？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司法部分，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现任第二巡回法庭庭长的胡云腾起草。他那时候到我们学校做讲座，他说起草文件过程中拿不准就给我们学校一个老教授打电话，最后表述为，司法要查明“客观真相”。但事实上没有客观的真相，只有事实的真相。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认知错误和表述混淆意味着什么？

张保生：意味着，这导致我们整个的司法理念，



左图：湖北“杀妻”冤案受害人余祥林 2005 年 4 月 13 日被当庭无罪释放。回到家乡，他到母亲坟前拜祭

右图：2014 年 12 月 15 日，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公布再审结果。获知无罪判决后，母亲在儿子坟前失声痛哭，叹息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

都是以追求“客观真相”为目标。“命案必破”就是在这个理念指导下的产物，除此之外，我们政法战线长期以来的这套传统的司法理念还包括：实事求是，不枉不漏，有罪必罚，有错必纠，终身追究。

三联生活周刊：听上去都对。

张保生：事实上都不对。证据是案件事实与认识主体之间联系的唯一“桥梁”。就是说，事实认定者只能凭借证据间接地认定案件事实，根据它们可以推断过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必须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判断，从证据到待证事实的经验推论才能认定事实。

就像做“拼图”游戏。能否完整、准确地“拼出”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仅取决于能够获得多少可用的证据，而且取决于事实认定者辨别证据真伪的能力。但这同时又意味着，事实认定者具有某种天然局限性，只能“隔着”证据来认定事实，证据就像一面“折射”案件事实的“镜子”，镜中看花，本身就有发生巨大错误的危险性。我们称之为“证据之镜”。因为有“证据之镜”，所以错案的发生有不可避免性。

而“实事求是，不枉不漏，有罪必罚，有错必纠，终身追究”的导向，和“命案必破”对公安的导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有错案。

现在一些地方检察院在工作考核中，仍然在宣传“批捕准确率达 100%”“起诉准确率达 100%”，甚至“五个 100%”“七个 100%”的“政绩”。然而，这些考核标准的荒谬性在于，根据证据之镜原理，检察院作为刑事控诉一方，其所搜集的证据片段不仅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其中有些证据还可能是虚假的。这种单方证据，由于受到控诉之目的性影响，在经过法庭质证之前，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日本检察机关的起诉率很低，在 44.6% 到 26.1% 之间，不起诉率很高，为 26.9%。我国检察院的起诉率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有个课题研究数据显示，我们四个检察院从 2000 到 2005 年的酌定不起诉率均不到 0.04%，这意味着，我国检察院的起诉率可能高达 99.96%。这么高的起诉率，再加上 100% 的起诉准确率，虽然可以说是为“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神能标准做了最好的注脚，但同时却为





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等法治原则在中国司法过程中的实现做了最差的注脚。检察院 100%，法院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所以我一开始强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文明遗产，只有法院才有权说谁有罪，实际上前置程序没有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说错案本身是“证据之镜”的证据原罪带来的客观存在和常识。反常识的代价，是制造更多错案。

张保生：我们通过审查证据，公检法在法庭上举证指证，审查出来之后，做出来一个判决，是对过去的事发生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判断，有多大可能性？这个是通过证明标准来体现的。民事诉讼，咱们俩说一件事，我的证据比你的充分，我 51% 你 49% 你就输了，这叫优势证据。刑事证据是多大呢，95%，永远达不到 100%。

“确信无疑”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它叫“两个毫不”标准。这是美国一个大法官解读的：第一个，毫不犹豫；第二个，毫不踌躇。你是法官，你把案子审完以后，我问你，这个人有罪

没罪，你毫不犹豫毫不踌躇地说：“肯定是他干的，他肯定有罪！”如果犹犹豫豫地说：“是不是他呀？”那就不是确信无疑，而是半信半疑了。确信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不是数学上的“绝对的确定性”。确信“无疑”要排除的不是一切怀疑，而是合理怀疑。法官在听审了关于被告人犯罪的全部证据之后，不能毫不犹豫在刑事诉讼中，确信无疑标准是减少因事实认定错误而给被告人定罪风险的主要工具。这个确信程度究竟应该有多高？95% 左右。这是个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 95% 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怎么来的？

张保生：不是人定的，是根据错案率倒推出来的，算出来的。判 100 个案子会有 5 个错误。在美国，有数据表明，在强奸谋杀案审判的死刑定罪中，重罪审判的错误率大约为 3.5% ~ 5.0%。

2010 年“两院三部”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就是为了解决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之前我们大概是 70%，我们叫高度盖然性，高度盖然性的概率大概在 0.75，那么 2010 年的变化就是把它提到了 95%。证明标准提高了之后，指控困难了，就会减少冤假错案。

但还没有解决“不枉不漏，有错必纠”这一套证据理念、司法理念的问题。比如在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通知》里面仍提出，“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不枉不漏”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实际上要求证明标准是 100%，而不是 95%，要是 95% 的话应该这么说：宁可错放 5% 的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也有意思，同一个文件里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明理念和实践有着多么巨大的冲突。

张保生：所以我认为从 2010 到 2013 年，又是在这种冲突下，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2013 年，最高法院沈德咏大法官和最高检察院朱孝清大检察官对此有一场争论。沈德咏认为“在刑事司法领域，不搞无罪推定，就难免不搞有罪推定；不搞疑罪从无，就难免不搞疑罪从有；任何形式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实质上都是疑罪从有”，从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出发，进而提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他说，不枉不纵“这种观念看似不偏不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极易滑向宁枉勿纵”。一项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做到不放掉一个坏人，但应当百分之百地保

证不冤枉一个好人。而朱孝清则认为，要对人民负责，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兼顾。公正司法包括防漏，必须做到不错不漏。因为如果错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感受不到公平正义；如果漏了，案件的被害人就感受不到公平正义。这场影响很大的争论表明，要彻底摈弃“宁枉勿纵”的错误观念和“不漏不错”的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根本上，这是两种价值选择。

张保生：对。因为“证据之镜”，证据的不完全性、非结论性、模糊性、可信性等，都决定了事实认定的结论具有盖然性、似真性或可错性。如果错误不可避免，那就要求在两错之间进行选择：要么错判无辜者，要么错放有罪者。

错放和错判是两种错误，都是错误。“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理论根据源于贝勒斯的“道德成本原则”：“我们应当使法律程序的道德成本最小化。”贝勒斯说错放只有经济成本，错判是经济成本加道德成本，它侵犯了无罪不治罪的权利。陈新良还说了一句话，你错判一个也等于错放了一个，你把呼格给杀了你把真凶给放了，成本更大，所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种选择体现了司法制度对无辜者人权保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司法将人的“生命”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置于“查明事实真相”价值之上的价值排序。

三联生活周刊：在更高层面的文明理念上，“查真”显然远不是全部。

张保生：所以在我们的司法理念里“实事求是”的问题在于此。实事求是即“每求真是”，并无其他价值考虑。但证据制度是讲三个基础，一个叫认识论基础，第二个基础是价值论基础，第三个基础是概率论基础。价值论基础这块，证据法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促进事实真相的发现，即求真；二是维护普遍的社会价值，即求善。这两种功能具有竞争关系。”求真并非证据法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其最高目的。

比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显然旨在求善，而非求真。包公那时候什么证据只要能证明你犯罪，我不择手段，只要能惩罚犯罪，伸张正义，不择手段，这是人治的特点。法制社会的证据制度，是要择手段。举个例子说：作证特免权规则旨在表明，通过破坏这些特殊关系而获得查明事实真相的价值，不及牺牲查明真相而维护这些关系的价值。中国是“亲属特免权”发祥地，早在两汉时期就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制度，该制度被西方许多国家吸纳后，在刑

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提供对被指控配偶不利证言的特免权。遗憾的是，尽管大家都明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但夫妻作证特免权目前在我国仍是空白。然而，以牺牲夫妻关系为代价而一味求真，偏离了人类司法文明发展的方向。

非法证据排除得越多，要达到95%的证明标准就越难，错放的可能性就在增加。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文明程度的差距。三四年前有一中院的法官问我一个具体案例：有两个人在加拿大杀了一个中国人，这两个人是中国人，没加入加拿大国籍，当地警察非法取证，法院判决，排除非法证据，把这俩人给放了。这俩人跑到中国来了，觉得没事了，结果被中国警察抓了。当时我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刚刚颁布，那加拿大排除了我们排除不排除。我说死刑你肯定不能判，无期你也不能判啊。人家那边无罪，我们这边判无期，一下子司法文明程度悬殊太大了。后来他们判了7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法律的杠杆作用、社会控制作用。在加拿大，法官排除非法证据把他俩放了，没问题，社会治安不会恶化。只要是警察非法举证就排除，不影响社会的整体犯罪率，但是在中国可能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法制的问题，一个是证据制度的问题。法制是一个完整的制度，证据制度是它的一部分。治安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司法文明。具体在司法实践中要考虑这两个向度的互相影响。

再举个例子：前两年黄浦江出现了1万多头死猪。起因是我们一个小法官给一个贩卖死猪的人判了7年徒刑。过去我们家猪死了，你是收猪的，我把它卖给你，我要给你70块钱，因为这个死猪不能卖，你要安全处理它。现在你来收猪，我给你50块钱，然后你把它再卖肉，现在把你判了7年徒刑，一下子把所有贩猪的人吓傻了，把买的死猪全扔江里了。这就是法律的社会控制作用。

大法官胡云腾有次说，彭宇案后，中央电视台天天在播，这根本就不是学雷锋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定两条证据规则就解决了。国外就有这样的证据排除规则，一个叫“和解和提议和解”证据，一个叫“支付医疗和类似费用”证据。这两个证据是要排除的，你不能拿我们和解用的钱作为证据起诉对方，不能用支付医疗的费用作为证据来起诉对方，你得用别的来证明。这也是司法文明的例子。

纠错之门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接着问，无论是因为“证据之镜”的规则本身导致的错案，还是因为各种主观错误导致的错案，为什么冤案都给人申冤无门的感觉？聂树斌案也好，呼格案也好，似乎都有种用人治对抗人治的解决路径。

张保生：这实际上又回到我们“有错必纠”这个理念了。我不说“错案”我说“冤案”。应该是有冤必纠，而不是有错必纠。我们前面讨论了错放和错判，是两个价值取向下不同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冤”，是“错判”。中国刑事错案就有五种之多，其中包括，两种事实认定的错案：无罪认定为有罪，有罪认定为无罪；三种法律适用的错案是：此罪认定为彼罪，轻罪认定为重罪，重罪认定为轻罪。然而，如此众多的刑事错案种类，以及认为“有错必纠”，源于对司法证明盖然性或似真性的无知。其危害性，一是与无罪推定原则抵触，如果把证据不足、达不到证明标准的“错放”也视为一种应纠的错误，会动摇刑事法治的基础，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刑事错案本质的认识，而且分散了错案救济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宝贵的再审和司法监督资源。

所以为什么让人感到“难”？简单说，五种错案，就像五个门。四个都是假门，只有一个才是真正需要向受害人打开的门。中国的再审案件大部分都是假的，都是不应该再审的。可以说，冤案大多是在检察和侦查环节制造的。检察院抗诉，不是因为法院判这个有罪他抗诉，而是法院判了这个人无罪或者重罪轻判他抗诉。

虽说法律适用的错误也是“错误”，但从世界各国再审程序看，“其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具有既判力的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错误”，而且主要是纠正无辜者被错判有罪的冤案。因此，对于法律适用错误和事实认定中的错放，应当考虑适时使被告人受到“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保护，一般不必由检察院、法院启动再审追诉程序。

现在就是法院在试图打开这个门，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一定是要支持他。现在聂树斌这个案例的意义就在于此。

通过打开这个门把那几个假门都关上，没有那么多再审，只有这一个再审，你要开只能开这个门。只有被告人才有再审的启动权，才有这个门的开门权。一开这个门惩罚的是谁呢，在某种程度上惩罚的是当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要求是一致的，控辩平等是审判中心应有之义。这样必须打破传统的以侦查为中心的公检法铁三角关系。

事的检察院和侦查机关。不是说法官不会犯罪，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大多数是前面那两道工序出了问题，前面就没把住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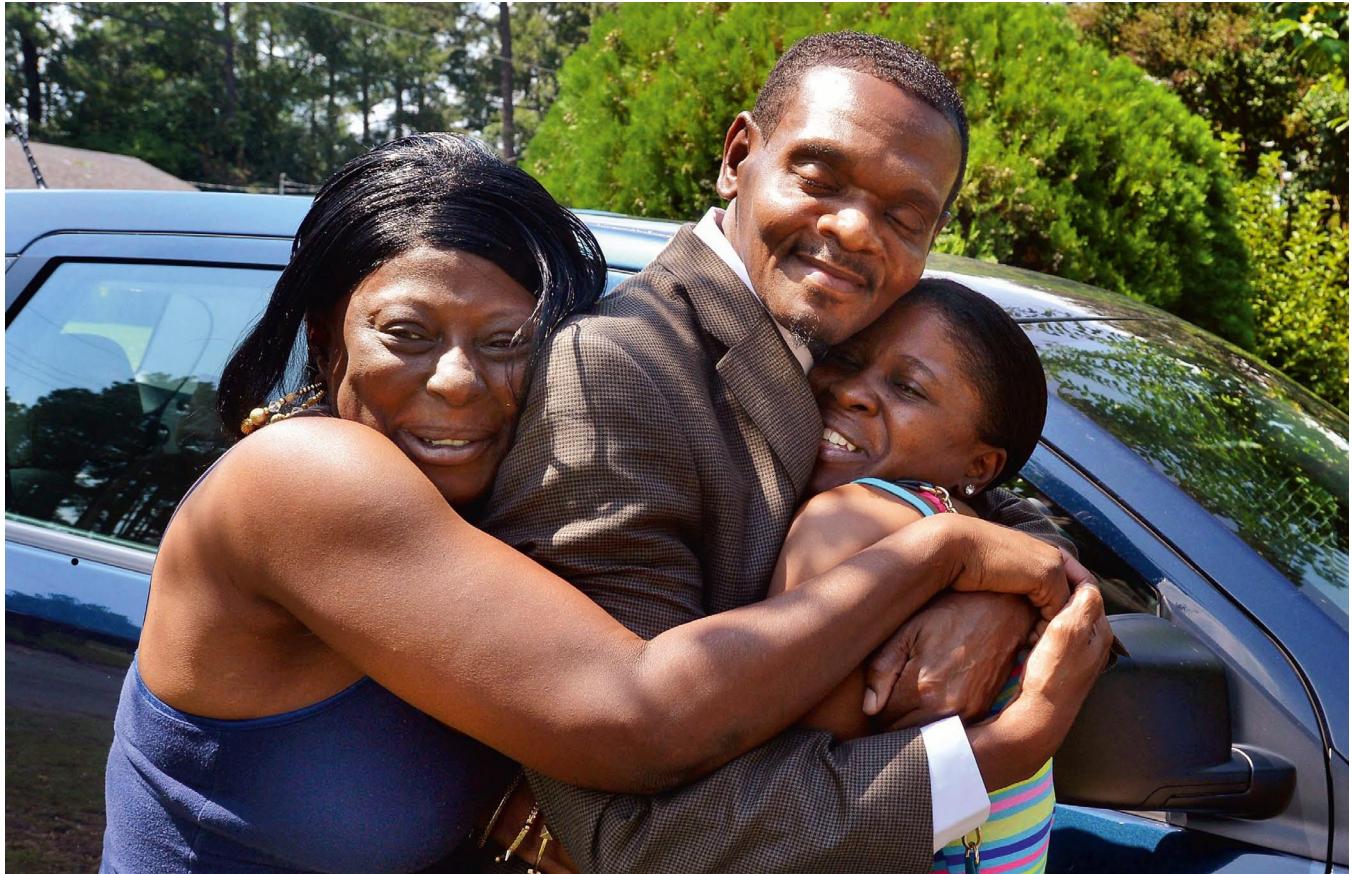
打开这个门的目的是为了确立以审判为中心，这就是往法治国家走的关键一步，如果你不是以审判为中心，永远都建不成法治国家。

三联生活周刊：以审判为中心，还要解决控辩平等问题。

张保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要求是一致的，控辩平等是审判中心应有之义。这样必须打破传统的以侦查为中心的公检法铁三角关系，对侦查权和检察权的行使依法予以限制，大力加强辩方权利保障，确立以被告人为主体的辩护权利保障体系，实现向以审判为中心的控辩审三方互动关系的转变。

审判有点像体育比赛，两个队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中国不是，中国是有一个队可以打裁判的，我可以抗诉，我还有反贪局，可以监督。检察院既是侦查机关，又是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三权都在他手里，法院只有一个审判权，这种状况下，权力不对等，不可能实现审判中心。

还有一个推动错案平反的认识问题：终身追究，还是依法追究？错案终身追究制或“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是“不漏不枉”“有错必纠”的必然产物。“不漏不枉”这个口号貌似公允，实际上是要求事实认定达到100%的准确性，这显然是人类法官和检察官无法企及的“神能”标准。2012年河南省高级法院《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对所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要求，进一步把司法人员推向高处不胜寒的“神坛”。对此应当深入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从证据法角度，将可错性作为应当尊重的司法规律。二是从比较法角度，研究法律职业化和职业保障的内涵，明确只有因法定事由，经法定程序，才可被追究责任。确立豁免制度，明确法官和检察官的正当职务行为不受追究。□



2014年9月3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费耶特维尔市，亨利·麦科勒姆被无罪释放后与堂姐妹拥抱。1983年，麦科勒姆和他的兄弟被判奸杀一名11岁女童，至今坐牢30年。最近有DNA证据显示凶手另有其人

错案率4.1%： “控辩交易”与“洗冤工程”并峙的美国司法

文 / 王丹阳

冤案一直是真实的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司法制度，都需要正视它并校正它。

受冤的奸杀案

“任何国家部门都不比法院更重要，也没有一个国家部门会像法院那样受到公民那么多的误解。”这是美国当代法学家罗纳德·M·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

的话。有时候公众与法律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应该互信，却时而互不信。俗话说公义自在人心，就因为如此，法院有时候的判决实在不得人心，于是一种人情与公权力的矛盾时而在撕扯着彼此的良性互动。

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将最佳解释性报道授予一篇由两名独立记者撰写的报道，叫《一桩难以置信的奸杀案》，报道描绘了公检法如何将报案者变成精神恍惚的傻子的过程。2009年华盛顿州林雾市，一个18岁的孤女玛丽遭到了入室强奸，然而警察在质疑她的说法前后矛盾后，把胆小的她逼到说这是一个梦。其中心



美国当代法学家罗纳德·M. 德沃金

理学家也介入，证明了她在动荡的童年期曾遭受巨大的来自原生家庭的打击，由此让警方更确定她需要心理辅导。

新闻里放出这样的报道：“本周早些时候关于西华盛顿某女子的强奸案，被公开承认是自己编造的狼来了的故事。”玛丽被指控虚假报案，需要接受心理健康辅导，同时被监督缓刑，处以 500 美元法庭相关费用……

在玛丽被视为大骗子后的两年后，那个强奸惯犯在科罗拉多落网了，林雾市的警察找到玛丽，给了她一个大信封，里面是数位强奸受害人接受质询的信息、撤诉材料和 500 美元诉讼费的赔偿。但玛丽在此事后的惊讶地崩溃了……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警方在“有供无证”的案件面前，极容易轻易懈怠或放弃，或者直接追索报案人本身的经历上的残缺来指正自身的问题。在 2008 到 2012 年中，联邦调查局认定，47 件向林雾市报案的强奸案中，10 件无事实依据，是国家相同类型案件的 5

倍。在强奸案高发的美国，处理难度高，办案压力更大，于是错案就多了。

1997 年，美国有一个经典的冤案，后来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专有名词叫“诺福克四水兵”(Norfolk Four)。诺福克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港口城市，也是全国最大的美军基地，当年那里住着一个刚新婚不久的 18 岁女孩米歇尔，在某夜被奸杀了。此案由老刑事侦探警察福特负责，他的风格是刑讯逼供，比如胁迫受讯者虚构前科、一连十几个小时不给犯人吃饭，锁在无窗的小屋里侦讯，如果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就用手指戳对方胸口狂吼“撒谎”，再用死刑恐吓对方。

第一个被侦讯的是她家的邻居威廉斯，无辜者威廉斯若无其事地接受了测谎试验，却被告知没有通过，实际上是福特骗了他。在一个晚上的逼供后，威廉斯已经累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于是就承认了谋杀。5 个月后，福特收到一份 DNA 检测，证明米歇尔指甲里的血迹并不是威廉斯的，福特一不做二不休，让威廉斯“补

充交代”，如法炮制出还有同犯一起，于是他的室友水兵迪克被抓了。

这个案子的其他不实供述者，心里都明白，自己在虚假坦白，为的是避免死刑判决。迪克不同，在福特无数次威逼诱供后，逐渐确信自己的确杀了米歇尔，即使那晚他其实是在军舰上值守。但是麻烦来了，以后由于案犯的DNA，总是不匹配犯罪现场的DNA，在福特要求下，迪克7次补充坦白，共同作案的人数逐渐增加，一直达到8人。迪克在幻觉与现实中摇摆，对每一个新版本都深信无疑。从此以后，该案沦为“两种疯子”的主导：一种是丧心病狂，不断矫枉过正、殃及无辜；另一种是被逼疯的无辜者……迪克，甚至不由自主地成为检方的“明星证人”。

直到2000年11月，一份名为《正义被剥夺》的杂志，登了一位无辜水兵的父亲的信，披露了其中四位诺福克水兵的遭遇，才引起了纽约卡多佐法学院“洗冤工程”(innocence project)的注意，4年后由13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义务代理了此案，并向弗吉尼亚州长递交一份特赦请愿书，而20位州联邦调查局的退休特工也在“独立”审视这个案子后呼吁放人。这个过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翻转是，此案中两个陪审团，十来个陪审员联合声明，称“坚信(firmly believe)四水兵是无辜的”，他们为自己把他们送进监狱怀有“非常糟糕的感觉”。所以陪审团中一半成员声明当时判错了。

导致冤假错案的司法迷信

美国大法官休尼特有句名言风靡法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什么致使正义迟到？美国的犯罪电影导演似乎在攻击政府上付出了不懈努力。90年代一部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应该说这部电影对国人来说是一次认识上的撞击，它不但歌颂了光辉的毅力和人格，还让我们知道监狱——这个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工具也未必就具完全的合法性，

银行家安迪被法院冤枉杀了妻子和妻子的情人，要在肖申克监狱里度过一生，那却是个地狱般的世界，里面什么暗渡陈仓、龌龊勾当都有，乃至他得以钻了空子帮狱警逃税，最后用从外面搞来的鹤嘴钳截穿了监房的墙壁……在这个时候，人们会觉得法律从国家权力过渡到专政机器是那么没有界线。

十几年后美国又有一部荡气回肠的监狱片《守法公民》，讲了一位费城的警员谢尔顿，他的妻女遭到了

暴徒的奸杀，最终罪犯与检控官媾和，把罪行推到另一个从犯身上，而罪犯本身只服了10年徒刑。

谢尔顿在10年后杀了那个刚刑满释放的罪犯，故意引火上身入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跟安迪做了一样暗渡陈仓的事，只为了揪出公权力幕后的黑手，当年的办案人员一个个被“影子杀手”谋杀……在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黑幕交易时，法院象征社会正义的基础已经全然崩塌。

当法律沦为权力机构手中的特权，正义的天平就可能进一步偏差。所以英国有句谚语，“迟来的正义非正义”(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意味着公权力办案要慎之又慎。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是在公共生活中维系公平的利益往来、保护私有制的合法性，那么，既然法律界早有这么一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毋庸置疑的共识，为什么还会发生有如德沃金说的“受到公民的误解”呢？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描绘了一幅冰冷的法律巴别塔的图景，主人公K被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控诉，为了申诉无罪他天天在法院门口徘徊，但屡次被守门人挡住，最后他被押到了刑场……作者借K的口吻指出：“从哪方面说，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一个刽子手就可以代替整个法院。”

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Petro J.)及其夫人在《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书解释了冤假错案屡禁不止的原因，也就是一种过度依赖司法的迷信：“监狱里每个囚犯都声称自己无罪；我们的司法体制很少冤枉好人；有罪的人才会认罪；发生冤案是合理的人为过失；目击证人是最好的证据；错误的有罪判决会在上诉中得到纠正；质疑一个有罪判决将会伤害受害者。”

该书还将导致刑事冤案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六种：虚假供述、采信告密者的陈述、劣质的辩护、不可靠的科学、政府的不当行为和目击者的错误证词。作者以著名的安东尼·迈克尔·格林强奸案举例，展示了警方诱供时的技巧，安东尼在1983年时在休斯敦路过一个强奸现场，他报了警，却被受害人指认就是案犯。

被害人在警官的诱导下做出辨认，她的证言从“其中有个人很像行凶者，但是还不够像”，变成了“就是这个人”。在她并不那么确定时，警方给他带来了一批更大的照片，包括格林照片的放大版，“我们告诉她我们有一些照片，其中可能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嫌疑人”。女孩又一口认出格林，“就是这个人”。格林服刑27年后被无罪释放，他在牢狱里“自学法律，为自己找出路”。



1957 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让世界对陪审团制度崇敬有加

4% 的错案率

虽然美国的法律文化奉行“宁纵不枉”原则，但仍然避免不了冤假错案。从 1994 年开始，全美已有 300 多起冤假错案曝光，其中 97% 以上是谋杀案和强奸案。作假、逼供、诱供、伪证、鉴定失误等屡见不鲜。2014 年，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萨姆·格罗斯 (Sam Groth) 参与了一项“全国除罪登记”(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 的项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指出全美已经执行的死刑犯人中，有 4.1% 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也就是说，每处决 25 人，就错杀 1 人。

“美国关于死刑的记录保存得尤其完好，然而其他刑事案件的档案则不足以让我们对错案率进行估算。这个数字可能低于 4.1%，也可能比它高。不过，在美国这个每年数百万起刑事判决的国家，超过 200 万人被关押在监狱里，所以即使错案率只有 1%，也会造成数万人蒙冤的悲剧。”格罗斯在一篇登在《华盛顿邮报》上文章里写道。

这份报告还指出，原本死刑判决中，1.6% 后来改判了无罪，35% 以上后来减刑了。格罗斯的调研组登记

了 1625 名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服刑人员，平均的关押时间超过 9 年，2014 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三名无罪释放人员已因谋杀罪服刑了 39 年……即使这样，格罗斯仍认为他们是幸运的，“绝大多数错判的无辜者不曾被发现，绝大多数冤案得不到平反”。

截至去年，除冤登记已经记录了从 1989 年以来的 1733 个平反案了，2015 年有 149 人获得平反，破历史纪录。项目组披露，从 2011 年算起，每年登记的冤案数在翻倍。除罪登记每周都会收到四五封来信，虽然不能确定全是蒙冤的清白者，但那些信读来心碎。但这个项目只是一个学术编撰项目，并无实际代理权和核实无罪申诉的权力，格罗斯只好回信给他们，表示爱莫能助。

2004 年，美国出台《无辜者保护法》，这是得到参众两院 277 名议员签署的立法案，旨在促进刀下留人。该法设计了两种救济途径：保障所有罪犯有通过 DNA 检测证明无罪的权利；保障所有犯罪嫌疑人在任何诉讼阶段都享有充分、有效的法律服务。截至 2010 年，这项立法为 257 名嫌疑人洗脱冤屈。

除此之外，在全美耳熟能详的“洗冤工程”也在实际操作层面帮助这些无辜者。1989 年，美国首次运

用 DNA 技术为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洗冤，从此学界提出了“洗冤工程”的倡议。作为非营利性的民间法援助机构，它先是通过电话申请，由教授、学生、律师研讨有无翻案的可能性来决定是否受理，目前全美各州都有这个机构的分支。1989 年以来，通过 DNA 技术推翻的刑事案件已达 350 件。

但是，在 DNA 的获取上，很大程度受制于检察官是不是愿意配合，因为 DNA 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在有着根深蒂固的“控辩交易”传统的美国司法界，检察官甚至暗中主导着案件的走向，以至于都没有到法庭阶段就已经被摁在暗箱中靠钱解决掉了。所以 DNA 可以成为检察官的心病，他们是不会轻易提供的。

即使是通过 DNA 检测纠正的冤案，也主要是强奸案，但在其余类型的案件中它就不一定管用了，所以只能石沉大海。再方面，要检察人员受到追责也不可能，要证明他们在冤案中存在不当行为很难。至今，美国只有一件冤案追究了司法人员的责任，那是 2013 年得克萨斯的案子，检察官隐瞒了当事人无罪的证据，导致该人被判处 25 年。最后，这名检察官仅以藐视法庭罪被判 10 天监禁。

司法判决上的趋利避害法则让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错判，从侦查到审判的每个节点都可能发生贻误。上世纪 90 年代，英国也创立了一个“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CCRC)，是由皇家司法委员会提案而设立的非政府组织。CCRC 成员从行政和司法机构剥离出来，由首相提名，女王任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具有 10 年以上律师经验，三分之二具有刑事司法经验。

CCRC 是仅对议会负责，行使独立职权的机构。被告或当事人一旦有量刑上的质疑，可以通过 CCRC 来向上级法院提交上诉，CCRC 自行决定是否受理案件。这就相当于在个体与法律机构之间介入第三方力量，为案件提供一个缓冲地带，CCRC 委托独立侦查人员对案子进行复查，自由收集新的观点和证据，自 1997 年来，经这个机构移送上诉的案子撤销率和改判率达到 70%。

“控辩交易” 滥行

有资料表明，在格罗斯参与的“全国免罪登记”中，有 151 起，约占 10%，为控辩交易(plea bargaining)造成的冤假错案。据他们估计，所有定罪的重犯中，无辜认罪者比例在 2% 到 8% 之间。纽约南区联邦初级法院法官杰德·拉科夫 (Jed Rakoff) 认为：“即使我们更加保守地假定这个比例不超过 1%，考虑到美国 220 万囚犯中有超过 200 万进行过控辩交易——也就是

说，估计有 2 万多无辜者对虚构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最后被投入监牢。”

托马斯·杰斐逊曾说：“陪审团制度是人们构想出的唯一的锚，有了它我们才能防止政府与其宪法原则背道而驰。”但现在，陪审团制度似乎已完成了使命，因为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不需走上法庭。控辩交易可以说是美国至今为止受争议最多的司法痼疾，这是一套由检察官主导的关门交易制度，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由控辩双方私下完成交易。

有一个惊人的数据表明，美国在 2013 年刑事指控的案件中，97% 通过控辩交易解决，上庭受审的不超过 3%。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庭外和解”的方式在美国大行其道。南北战争前，控辩交易并不多，刑事被告要么经受审判，要么坦白，法官享有充分自由裁量权，但是内战后，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大，南北流通加剧后，犯罪率上升，导致原有法庭负荷过重，不得不另寻他法。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由于控辩交易使有罪的被告人得以逃避部分法律制裁，它被视为魔鬼的契约，因此从未真正成为主流实践。但在美国，控辩交易已成为家常便饭。虽然最高法院最初对控辩交易制度表达了保留态度，但最终还是批准了独立代理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协议谈判，并认可该制度有益于司法系统的运作。”杰德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强制性最低刑期和强制性量刑准则。后者是两党在 1984 年国会上达成的，旨在避免非理性的量刑差异，弥补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刻板僵硬，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然而，有一件事很快变得明显——由于量刑准则及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存在，联邦刑事案件几乎不再经由陪审团审判了。”杰德写道，1980 年时，联邦案件的被告受审率还有 19%，到 2000 年已下降到不到 6%，而从 2010 年至今，这个数字不到 3%。

量刑准则与强制性最低刑期一样，都成为检察官的武器，实际上促使被告人被迫同意控辩交易。在美国司空见惯的贩毒案上，控辩交易就极大减轻了法庭的负担，却滋生了大量黑幕和龌龊行径。1973 年颁布的《洛克菲勒毒品法》规定，贩卖海洛因、可可因或大麻超过 2 盎司的被判处 15 年以上徒刑，这就为贩毒案安上了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律标准。但是后来，这个法律又变更为在实际操作中，仅犯“贩卖海洛因”的可以避免强制性最低刑期，只需根据量刑准则，服刑两年以内。但如果被告拒不认罪，他将被以串谋贩毒罪名起诉，其中贩卖毒品仅是一小部分。很多贩毒

者为了息事宁人，给钱走人。

量刑准则和强制性最低刑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量刑权滑落到了检察官手中。但是控辩交易毕竟让犯罪率下降到半世纪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授予检察官严惩的权力，对犯罪率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大多数美国人觉得现在比几十年前安全得多，这种安全感极大地提升了生活品质。既然对检察机关的赋权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为什么我们还要吹毛求疵？”杰德说。

杰德说，控辩交易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弊端是，被告会认为只要律师能搞定控辩交易，减少在狱中的服刑时间，他们会将认罪看作是一种理性选择，尽管他们中可能很多是有前科，而这次是无辜的。于是在律师介入后，他们也称自己有罪，上了法庭后法官又大量依赖检察官的声明。“有时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自己也知道被告的认罪中有‘人为成分’，他们将共同拟定一份巧妙包含基本事实却不涉及细节的书面认罪声明，并让被告当庭朗读出来。”

消失的陪审团

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更好的避免冤假错案的方式，法庭虽然象征公平正义，但是它的控制权还是在贵族王室手里。在16世纪，欧洲一直延续着一种比武审判(trial by combat)的传统，就是以控方和辩方的比武输赢来决定谁赢得审判。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有钱的一方赢得官司，因为他们可以聘请身强力壮的替身。这种方式到了19世纪还在欧洲一些地方存在。

而对于新大陆美国来说，陪审团曾经被视为美国司法制度先进于别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标志，它让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打嘴仗式的对垒有了更进一步的客观评审空间。该制度的雏形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政治家梭伦设立了一种叫“赫里埃”的公民陪审法院，陪审法官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选举，轮流参加审判，审判结果由陪审法官投票表决。而在古罗马，审判权也在公民大会手中，每个案子由30~40名法官共同审理。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湮灭后的2000年左右，有学者发现，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埃塞雷德二世法律》(the law of Ethelred II)中，又出现了陪审的痕迹，于是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说法开始盛行。这项制度在英国历史上经过模糊的演化，被誉为一种“英国人生命的守护”制度(security of Englishmen's lives)。有人说：“他的政治上的作用体现在附属于专制政府的特权的保护，法律上的作用体现在它的力量和行动有时并不是和

已存在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一致。”

真正将陪审团制度发扬光大的是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美国在殖民地期间利用这项宗主国的制度保护着本土人的利益，在独立后，人们对大陪审团制度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更是将它视作自由和民主的保护伞移植到美利坚。只是今天，在陪审团即将名存实亡的当口，美国的法律学者开始呼吁要维持稳定的审判流。

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在1976年时联邦法院每100个民事案中有10个是开庭审理的，到了2008年，只有1%的民事案经由审判结案。而在这些案子中，又包括了法官审判和陪审团审判两种，陪审团审判的式微不容置疑，在西方也导致“vanishing jury trial”(消失的陪审团)的说法。

50年代时，一部美国电影《十二怒汉》风靡影坛，也让世界对陪审团制度崇敬有加。一个不良青年被指控杀父罪，于是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进行的投票，只有全票通过才能够让罪名成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急躁武断，都想快点投了票离开，只有一人坚持投反对票，并认为“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最后，在看似确凿的证据下，他发现了一个证词上的误差，才使得其余心急如焚的人一个个投下反对票……影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那对父子，只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记录下了陪审团慢慢翻转的过程。

在美国，检察官判刑半年以上的刑案，可以申请陪审团审判，这些人可能对案件进行了全程跟踪，但并非一定来自专业领域。但这种审判形式某种程度上因专业性不够而增加了错案率，它一定程度上成为冤案免责的挡箭牌。因为他们审后就解散了，以至于如果判错了，也没人会被追责。

1998年著名的埃尔金斯案，就是陪审团的一大败笔。俄亥俄州的埃尔金斯的岳母死于一次入室奸杀，而她6岁的外甥女在惊慌失措后说是姨夫将外婆杀害，因为他们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警探在老人的房间里仅收集到一片破裂的指甲和纽扣、假牙。10个月后，案件在陪审团的审理下，听取了48位代表控辩双方的证言。虽然陪审团得知埃尔金斯的DNA与犯罪现场的不符合，但还是听取了小女孩的陈述，埃尔金斯被判谋杀罪入狱。

后来，埃尔金斯的妻子一次次质证外甥女，小女孩说：“我从来都不确定，而且我越来越不确定。当时我也想说我不确定，但警察却安慰我不用难过，告诉我不用为了揭露是姨夫干的而担心，说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切证据。”埃尔金斯在服刑6年后出狱，原因是“洗冤工程”通过DNA检测帮他重获自由。□

房产税传闻再起

主笔 谢九

每隔一段时间，有关房产税的消息总会跳出来成为热点，最新的传闻是，房产税可能最快于2017年征收。不过以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房产税征收的难度来看，明年征收房产税仍是小概率事件。

房产税最快将于2017年征收，这一传闻的出处是有一位税法专家表示：“本届人大任期是到2017年底，因此预计房地产税法最快将在2017年底前通过，慢的话可能会在2017年底提交审议，在下一届人大任期内通过。”这段讲话最终被外界放大成“房产税最快将于2017年征收”。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近期发布报告，建议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开征房产税，也使得房产税这一话题再度升温。

过去10年来，关于房产税的传言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从来没有一次传言成真，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如果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近期推出房产税的概率比前几次传言更低。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低迷，一季度房地产市场的意外回暖，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尽管依靠房地产作为经济引擎始终存在巨大争议，但无论喜欢与否，中国经济目前的现实就是如此。在民间投资增速几乎被腰斩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暖，确保了整体投资不至于雪崩。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也为钢铁等商品市场带来一轮小阳春。

如果失去了房地产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滑。目前国内房地产虽然在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出现回暖，但是整体高库存的局面并未改变，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房产税，对于购房者在心理上将带来巨大压力，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再次陷入冰封，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也是不言而喻的。

过去10年来，房产税呼声最高的时期出现在上届政府期间。上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是打压调控，在上海和重庆推出了房产税试点，全面推出房产税也几乎是呼之欲出，但即便如此，房产税最终也并没有真正落地。本届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态度有明显改变，虽然也强调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危害，但并

没有以打压调控作为主旋律，反而在限购和货币政策方面逐步放松。因此，无论从中国经济的客观现实，还是政府对于房地产的主观态度来看，过去10年没能推出的房产税，在近期推出的概率将是极低。

另外，征收房产税在技术上面临的困难，在过去10年来也并没有实质性改进，这始终是我国征收房产税的巨大障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近期就公开表示：“房地产税迄今已经试点征收了5年多，但是操作难度很大，有的地区税收成本甚至和税收收入相当，另外一个地区征收房地产税，使得人才向周边地区转移。”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曾表示，中国的房地产税，是土地国有制下对私人住宅征收的财产税，这在国际上难以找到借鉴先例，即便将来全面开征，规模也远不及私有制下的房产税规模大。

我国房地产是住宅私有而土地国有，住宅所有者只对土地拥有70年的使用权，而不是像大多数国家那样的永久产权。而房产税属于财产税，是对产权所有者征税，而我国居民仅对房屋拥有所有权，但对于土地并无产权，如果对居民仅有使用权的土地征收财产税，首先在法律上就存在障碍。

另外，我国居民在购房时已经一次性支付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如果再次征收房产税，显然属于重复征收。理论上应该扣除土地价值，仅以房屋价值为税基，但是在70年土地使用年限下，不同年限的住房如何估值？70年到期之后如何征收？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老问题，迄今未有明确说法。前段时间就曾有新闻报道，温州等地有部分房屋因为20年的土地使用权到期，需要花费三成房价续地。在土地公有制下，如果购房者既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又要缴纳房产税，显然法理不通。所以，在这样的难题面前，房产税面向所有者普征并不现实，只能是针对拥有过多房屋的所有者征收，更多类似一种奢侈税。

2011年，上海和重庆作为试点城市率先开征房产税。当时也都设定了较高的征收门槛，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并没有带来实质性影响。重庆的征收对象是高档住房，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以上的住房，被纳入房产税范围，交易单价在均价2倍以上3倍以下的住房，税率为0.5%，3倍至4倍的，税率为1%，4倍以上的税率为1.2%。

上海房产税的征收对象是“本市居民二套房和非本市居民新购房”，征收方式是“新购住房应征税面积×新购住房单价×70%×税率”，其中家庭人均60平方米为免税住房面积，适用税率暂定为0.6%，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的，税率可暂减为0.4%。在试点5年之后，房产税的效果并不明显，既没有有效增加政府税收，也没能有效抑制房价。也正是因为试点效果不佳，房产税的试点也始终局限于上海和重庆，而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我国的房产税最终会以怎样的版本面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征收房产税的目的。在多数人看来，征收房产税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调节房价，二是增加政府税收。如果是以这两大目的来设计房产税，房产税可能很难实现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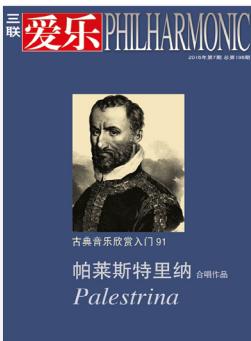
从调节房价来看，显然是过高估计了房产税的功能。房价涨跌更多受到供求关系和货币供应等因素影响，税收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房价走势。从其他征收房产税的国家来看，基本上没有先例表明，房产税可以有效地抑制房价。从我国房地产历史来看，过去针对房产税卖方的税收，包括营业税、20%的个人所得税等等，最终都被转嫁至买方，反而提升了房价涨幅。所以，如果导致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根本因素没有改变，而贸然征收房产税，最终房产税的成本也有可能

转移，反而助推房价上涨。

从增加政府税收来看，更是房产税不能承受之重。前些年房产税的概念刚刚在国内兴起之时，有很多人将之视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潜在收入来源。由于我国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但是随着土地越卖越少，土地财政模式终究不可持续，所以亟须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地方土地收入明显放缓，征收房产税或者物业税在当时开始浮出水面。但是由于我国土地公有制和70年使用权等现实问题的存在，房产税大面积普征始终面临很大的法律和制度障碍，以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来看，由于征收门槛较高，房产税对于本地的财政收入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希望房产税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甚至以此抵消土地财政收入，那么房产税的税负之重将不难想象，势必会遭遇民众的大面积抵制。

税收的功能主要在于筹集收入和调节分配。如果以房产税作为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手段，将面临巨大的税收成本，最终可能反而得不偿失；但是如果作为调节分配的工具，在我国贫富分化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对于一些占有房产过多的“房叔房姐”们课以重税，并且借鉴国外经验，将房产税收入主要用于社区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此房产税或可形成良性循环。□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七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1

- 一位有烟火气的圣乐王子——漫谈帕莱斯特里纳及其作品
- 朱可心、孙健、吴尘对帕莱斯特里纳的《马尔采鲁斯教皇弥撒曲》、《雅歌》和《武士歌弥撒曲》的精彩解读
- 纪念册** 萨拉热窝废墟上“首演”的《g小调柔板》
- 访谈** 女高音歌唱家芭芭拉·邦尼访谈录
- 话题** 名家谈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上）
- 爱乐笔记** 又见埃莱娜·格里茂
- 早期音乐** 阿尔坎杰洛·科雷利（下）
- 乐史空间** 夏里亚宾：现在我的表停了
- 歌唱家档案** 歌唱家黄英的访谈
- 作曲家档案** 小记者曲界的三位“诺瓦克”
- 唱片说明书** Jan Panenka 与莫拉维茨
- 作品** · 安妮亚·洛克伍德的声音艺术
· 青年时代的穆索尔斯基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1

那群 30 年前，在长江激流中搏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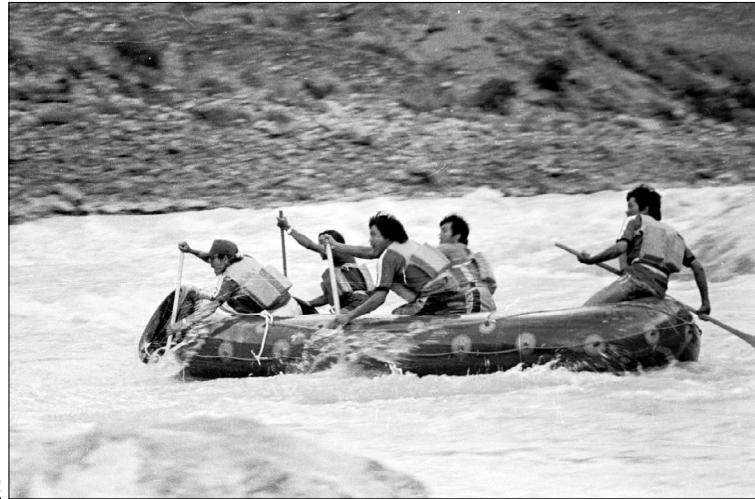
记者 / 刘敏



1. 1985年，肯·沃伦来华做长江首次漂流的消息激起了长漂热。沃伦领导的中美队全套设备都从美国空运而来，队里有三名中国队员，他们的船上都竖着中国国旗

2.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成立的科漂队在金沙江上补拍的漂流镜头

3. 张国宪为科漂队设计了统一的户外服装，也因此加入了科漂队



2



3

“长漂”这个词在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寻觅，昔日轰动一时的探险竞争，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多少少还记得，又正在他们的脑中渐渐湮没。

虎跳峡的僵持

几年前，李大放带了一个旅行团去云南丽江的虎跳峡参观，他是四川中国青年旅行社海外部经理，平时自己很少带团出门。

虎跳峡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以山高谷深、雄奇险峻而闻名，成人民票65元。买票的时候，李大放悄悄问售票员：“我是1986年的长漂队员，能不能给我免一张票？”

结果，一个团的票全都被免了。虎跳峡景区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峡谷之所以全国闻名，起因就是1986年的那次长江漂流。

时光推回到 30 年前，1986 年 9 月初，云南丽江，虎跳峡。

此时的虎跳峡还没有什么名气，科漂队已经在这里滞留了 16 天，长江漂流已经进行了快 3 个月了，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此前一路顺着源头而下的新闻报道，如今都卡在了虎跳峡。

这里是长江上游最危险的路段，虎跳峡全程 16 公里，落差 207 米，金沙江水在这里终年不停地沸腾奔流。科漂队几个月前曾来这里考察过，一名队员在枯水期时登上了江心的虎跳石，眼前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只觉得狂风吹动着身躯，水汽扑打着脸面，寒气夺人。站在上面往下看，流量达每秒 500 ~ 2000 立方米的金沙江巨流仅从这只有十余米宽的通道上倾泻而下，形成了巨大的瀑布，简直是不可思议，可謂是举世奇观。巨石以下，水雾蒸腾，泡沫满江，水声震耳欲聋，传至数里。在上面不一会儿，愈觉得害怕，赶紧撤离。”

此时丰水期的虎跳峡只能更令人生畏：巨大的江水被虎跳石分成两股，呼啸而下，形成了两个十余米的跌水，激起的水柱浪花高达十几米——谁都能看出来，乘坐橡胶筏从这里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此前洛阳队用密封船放了一条狗下去，密封船在大浪中迅速消失，再浮出来，密封口早已被大浪敲开，船体撕出来两尺多长的口子，狗也不见了。这验证了科漂队之前的测估数据：在上虎跳峡及中虎跳峡的跌水瀑布处，密封船体表面所承受的打击和挤压在每平方米 7 吨以上。

7 月 27 日在叶巴险滩群，就是因为密封船破裂，已经死了三名队员。更早之前已经有人临阵脱逃了，一名队员最早拉着队伍偷偷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又最早独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30 岁的李大放进入金沙江后，每天下水也很害怕，他说“就跟打仗一样，发令枪响，所有人一起埋头向前冲。胆子都长在队友身上，大

30 年前的那场长江漂流，一共持续了 5 个月时间，中美队、洛阳队、科漂队三个队伍共有 11 名队员遇难。

家都下水我就跟着下水，也不可能自己当逃兵，太丢脸了”。

因为要实现“一寸不落漂流长江”的口号，虎跳峡不得不漂。有三名队员主动报了名，但更多的队员是沉默。科漂队在等新的特制密封船，也在僵持。

媒体越聚越多，最后已经有四五十家媒体在这儿守着了，对长江漂流，媒体已经长篇累牍地报道了 3 个多月时间。这相当于一场 20 世纪 80 年代的真人秀，记者们当然希望这里有精彩的故事。“那就是写稿的作料了。”李大放说。

所有人都在等，指挥部在等上级指示，队员们打牌，出去玩，回家探亲。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们：“你们太撇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

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

9 月 9 日，密封船到了。9 月 11 日中午临行前，指挥部当众念了李大放母亲的家书：

“如果你们信任我的儿子，把冲锋的任务交给他吧！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国家的，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几天后的媒体报道里这样评价这封信：“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下水前，李大放把信要过来，第一眼就变了脸色，但什么都没说——他一看字迹就认出来了，这封信是他哥哥写的。

“最后的伟大征服”

30 年前的那场长江漂流，一共持续了 5 个月时间，中美队、洛阳队、科漂队三个队伍共有 11 名队员遇难。

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肯·沃伦，一名被中国媒体称为“世界漂流探险家”的人，1985 年，他与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要来中国做长江的首次漂流。

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让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师尧茂书发问：“漂流长江这条东方巨龙，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首开序幕？”1985 年，尧茂书为抢在美国人之前，自己独自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进入金沙江

后遇难。

1985年9月5日,《四川日报》头版以《长歌祭壮士》一文高度赞扬了尧茂书的行为,作者戴善奎感叹道:“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

“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刚刚能吃饱肚子,整个社会长期僵化,各方面刚刚开始放松,肯定要反映在新闻媒体上,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英雄主义的故事。”赵坚和戴善奎是同事,当时他们都是《四川日报》的年轻记者,后来共同去报道了长江漂流,多年后二人又一起变成了《华西都市报》的创刊领导。但在1985年,他们都刚刚参加工作,正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大稿子。《四川日报》此时只有四个版,七八千万人的一个省就看这么几张版面,头版上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长歌祭壮士》结尾的一句是: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赴”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这一句引出了无数的“后继”者,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要求继续尧茂书的长漂,并且,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

事实上,肯·沃伦在探险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今日搜索他的英文信息,会发现几乎全都跟1986年的这次长江漂流相关。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肯·沃伦野外探险公司”,用当下的话语讲,肯·沃伦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探险活动的美国中产阶级。

30年前的美国,漂流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商业活动了。国家体委工作人员褚斯鸣在1985年去美国接受了肯·沃伦的漂流培训,他发现当时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75%是有组织的。像肯·沃伦这样的商业公司会承包河段,“就像今天的北京汽车牌照一样,都是有配额的,比如一条河旺季时每天可以100人下水,几家公司分配这个名额。肯·沃伦属于这条河道的开拓者,等他老了,就可以把额度卖掉换作退休金。”

肯·沃伦到长江漂流,一是为了探险,二是为了开发长江旅游,他如果成功漂完长江,今后就可以带美国人过来做商业探险,此次培训的中国队员未来能在旅游里帮他做桨手。

同一条长江上,中美两方完全是在做不同时代的对话。

因为呼声太踊跃,1986年4月21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科漂队”)。河南洛阳

8名青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又组建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简称“洛阳队”)。两支队伍都在肯·沃伦来华之前一个月,抢先在长江源头下了水。

李大放是科漂队队员,他此前是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正打算要辞职,还没找到下家,看到招募赶紧报了名:“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队伍里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青年工人,他是少见的大学生。整支队伍都笼罩在一种亢奋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相比之下,李大放的目的显然不纯粹:“我出去募捐、跟别人宣传,也都是说中国的母亲河要由中国人第一个漂。我的动机太个人主义了,不能暴露出来,只能装在爱国主义的大口号下面。”

1986年6月,长漂开始之后,中国的两支队伍始终处在跟美国人竞争的压力下,每天都在抓紧时间赶进度,生怕被肯·沃伦超过。李大放到处转转的念头很快就落空了,他提了几次能不能上岸去周边转一转,说了几次,没人理会,也就不说了。

也是因为赶进度,科漂队并没有留下什么视频资料,现在大家能搜到的漂流视频基本都是肯·沃伦的中美队留下来的,这也是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之一:中美队随队带了一个摄制组,拍摄探险和长江上游两岸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未来会制成两小时的专题片,卖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

“就跟现在的制播分离一样。”褚斯鸣讲起昔日中美队的运作模式,已经能跟现在的中国产业一一对应上了。肯·沃伦夫妇是拉赞助的高手,那些被中国队羡慕的“价值10多万美元”的漂流船、全套高科技的装备,在妻子简·沃伦的书中都有赞助商明细:防水电台、相机防水罩、煎锅、睡袋,甚至是沿路“送给孩子的玩具”,都有不同的出处。其中“必胜客”的创始人之一鲍勃·齐斯霍姆(Bob Chisholm)还捐助了5000美元,交换条件是让肯·沃伦帮他弄一张西藏的狩猎许可证。

中美队在7月21日下水,其中三名中国桨手前一年在美国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漂流船怎么打气、保养、修补,日头太毒要放多少气,喝的水要用过滤器过滤,从碗到锅怎么一层层嵌套固定在船里节省空间,遇到大浪团队要配合,几个人划桨,几个人要赶紧过去压重……褚斯鸣出发之前没想过长漂的成功概率:他充分信任肯·沃伦的技术能力,他不知道长江真实的面貌,他二十出头,从未想过“死”这件事。



(蔡小川 摄)

而沃伦夫妇一直怀疑两支中国队草草上阵的安全性，为了抢进度，中方在最佳漂流期的前一个月匆匆下水。“我们理解，并且非常尊重中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在这件事上展示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在两位资深漂流运动从业者看来，“中国队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9月初，中国的两个队已经率先到了虎跳峡，此时中美队才刚刚进入金沙江。双方不知道彼此的确切位置，但褚斯鸣此前勘察过虎跳峡，水太大了，美国漂流通常急流按难度被分为“I”到“VI”级，在上游就已经出现过超出VI级的水域。

美国队最终没有机会真正到虎跳峡去做决定，褚斯鸣现在判断，按照漂流运动的衡量标准，虎跳峡，美国人是不会漂的。

洛阳队和科漂队的队员跟美方从始至终都没有直接接触，洛阳队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

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洛阳队已经确定了要先漂下去。《渡口日报》一位女记者劝王茂军：“不要被不负责任的记者们煽动，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王茂军回答他，漂虎跳峡是自己情愿，如果死了，就死得其所。

最后，女记者拿了一个本子让洛阳队写几句话。王茂军提笔写下：“长江巨澜 / 积之于涓涓细流，中华振兴 / 有待于万千黎原。”

王茂军也让女记者给她签个名，对方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她告诉王茂军，自己没有豪言壮语，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王茂军当时就愣住了：“她走后，我又想了半天，是我太华而不实，尽喊空洞的口号，还是她世界观有问题？”

中国式漂流船

9月11日，1时35分，步话机传来指挥部下水命令，科漂队队员王岩、李大放乘坐由重庆长江橡胶厂为漂流队特制的“中华勇士号”红色飞碟式密封船，在欢呼声中向虎跳峡漂去。

密封船最早是尧茂书的设想，他曾经想过把两条敞篷船扣在一起，人躺在里面漂流。肯·沃伦全套设备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其中并没有这样的船只。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这些年一直从事商业户外探险，他觉得密封船是个笑料：“所有玩漂流的都会问，这是什么啊？从行业角度是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东西。”

人一旦进入密封船，就完全失去了对船体的操控。7月27日冲击叶巴滩时，密封船在跌水下不停打转，在船里的三个队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水在不停地绞，直到巨浪把密封船打烂了，人才被冲出来。队员孔志毅已经被晃昏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毫无知觉地消失在巨浪中，队员张军和杨洪林被江水吞噬，至今都没找到尸体。

2时26分，李大放和队长王岩乘坐的密封船冲进上虎跳峡口，船舱内漆黑一团，只有一个手电照明，有一个对讲机跟外界联系，两个人共用一个用汽车内胎做的氧气袋。密封船从近8米高的虎跳石侧面跌下，顿时就像“进了洗衣机一样‘砰砰砰’地撞”。围观者看到小船几次陷入滚滚白浪，几秒钟后又冒头出来。密封船被翻倒、被撞击、被激流冲过了两道十几米的大跌水。捆在船外的汽车内胎被打掉了一个，舱门已经撕开了一个几厘米的口，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但好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冒险就结束了。

“李大放、王岩被拉出舱口，李大放高呼：‘我们胜利了！’王岩壮志未酬地说：‘我还要冲满天星！’有记者和队友关心地问他：‘是否想到过死？’他说：‘想过是真的，不想才是假的。不能怕死，怕死就冲不出虎口。’”（资李申：《他们是怎样征服“上虎跳”的》，1986年9月27日，《科学报》1版）

30年里，李大放也反复被问到这个问题：当时到底怕不怕死？“漂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平静，根本不去想可能一下就起不来。”他念念不忘的是记者骂他们“孬种”的刺激：“后来还有记者说，在密封船里面，懦夫和勇士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就算给你密封船，你要有相当的胆量才敢进去。”

在后期进过密封船的科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自传里描述过对密封船真实的恐惧：“如果说在长漂中最恐怖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在水上，也不是在疫区，而是独自走进密封船的时候……全身蜷在橡胶味道之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最恐怖——以至于我以后的噩梦环境都发生了我被活埋在黑暗之中。”

李大放下水的前一天，9月10日，洛阳队已经抢先成功漂过了上虎跳。

9月12日，洛阳队郎保洛、孙志岭两名队员冲击中虎跳，仓促准备的密封船被大浪打破，孙志岭遇难，郎保洛逃生上岸，被困在悬崖下的一处凹窝内。次日，24岁的记者万明在报道郎保洛被困事件时，发稿路上被山石砸中，当场身亡。

4天后，9月16日，郎保洛被成功解救。一年后，

左图：中美队队员、今年59岁的褚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当年长漂时的年纪，他把沃伦的失败定义成一个梦想家的悲剧

右图：中美队队员张继跃每天依然坚持跑步健身，他开了一家户外探险旅行社，接待欧美和日本游客来华探险

（蔡小川 摄）





1986年，成功漂完金沙江上虎跳后，科漂队队员李大放被兴奋的人群拉出密封船，高呼“我们胜利了！”

在1987年的黄河漂流中，郎保洛等七名队员遇难身亡。

就在营救郎保洛期间，肯·沃伦9月13日在巴塘宣布中美队解散：由于漂流到四川白玉县境内河段，遇到密布的险滩和特大的激流，船只损坏严重，无法按原计划抵达宜宾。

早在8月3日，中美队一名随队记者大卫·夏普因为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逝于通天河河畔。“就是因为大卫的死，又听说中国两个队已经在下面死人了，所有人都开始害怕了。”这一点跟李大放一样，褚斯鸣在长江上没有跟队员讨论过怕死的事情：“这太私密了，你说的话是想影响别人，给自己加分的，人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演员。”

科漂队里，有人为了逃脱最危险的路段，把手包起来假装受伤，依然在积极地喊：“上！上！上！”——伤员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这跟战争时期是一个道理。中美队的反应是频繁出现的争吵，队员说肯·沃伦的领导能力有问题，说队员之间有性格冲突，指责摄制

组不帮忙干活儿，互相怀疑对方偷吃食物……褚斯鸣知道，越来越激烈的争吵都是表象，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怕死，想掩盖自己的恐惧。

“大家来都是商业合作，是为了探险，没想把命搭上。”队伍已经分崩离析了，先有三名桨手和一名医生离队，又有三条船被激流划破无法修补。中美队最后弹尽粮绝，像个牛仔一样始终独来独往，不太会稳定队伍的肯·沃伦自己离开了队伍，中美队十几个人分成了三路，先后弃船求生。最终，三组人几天后居然同时在巴塘汇合，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

肯·沃伦知道丢盔卸甲的这支队伍无法继续漂流了：“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另外，在不同的河段采用不同的漂流器材是十分重要的。”

荣誉

整个1986、1987年，漂流队的队员们都走不出长漂的状态。

李大放做了大半年的报告会，北京、辽宁、天津、四川……各地巡回做报告。漂了下虎跳峡的队员杨欣，回到攀枝花电厂就涨了两级工资，被选为团中央“十二大”代表；科漂队队长王岩，漂了上中下虎跳峡，被推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庆37周年联欢晚会。戴善奎因为200多篇关于长漂的连续报道引起全国反响，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出了虎跳峡，一切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张国宪是中途加入科漂队的队员，他此前是成都印染厂的设计师，给科漂队设计了印有“中国”大字的队服，之前他以为漂流队的队员都是高高壮壮的，见面才发现：“撇得很，这群人能漂，我有啥不能的？”

但从长江上越往下走，这群在他眼中没什么出奇的队员们，在外界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沱沱河、通天河的藏民们很难理解这几支漂流队，洛阳队跟藏族工人费劲口舌，对方仍不明白漂流有什么意义。租汽车时，北京籍的个体户对花重金漂流十分不理解：“2万元买成肉，在家能吃几年！”最后谈妥价格，老司机还要吆喝一句：“我赔着本儿送你们去爱国。”

在金沙江漂流时，西藏一侧的居民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电视，李大放明显感觉到，巴塘县的迎接是上边安排的，政府人员都不怎么积极。“越是闭塞的地方对我们反应越是平淡。只有到了通讯发达、文明的地方，我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渡口，万人空巷，确实可以那么讲。”

渡口市，就是今天的攀枝花。张国宪上岸时，浑身脏兮兮，满脸都是大胡子，岸上迎接的学生们热情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他的两只胳膊，张国宪被架着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

科漂队漂过宜宾，之后的长江通航路线上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所迎接的只有山呼海啸的欢迎。到南京时，欢迎仪式上前国家女排队员孙晋芳也出席了，她对科漂队说：“你们的成绩跟我们当年五连冠一样，都是壮举。”

张国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重庆体院，队友们在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做报告，他坐在观众席里跟运动员

们聊天。“你们好了不起哦，好羡慕你哦！”邻座年轻的运动员看着张国宪，满眼都是真实的憧憬：“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得不了冠军，你们几个月，就挣了这么大一个冠军！”

“那个时候真的是举国狂欢，真把大家当作了胜利归来的壮士，把我们的虚荣心激起来了。”李大放这时已经彻底不能再讲自己“出来玩玩”的动机了，媒体已经把这件事塑造成了弘扬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精神的调子。“境界都是庞大的宣传机器造出来的，队员也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嘛。”

等回到重庆老家，邻居见到李大放就叫：你娃儿还活着回来了嘛！你要没回来，你哥可就完蛋了！

邻居告诉李大放，听说了虎跳峡的那封假家书，李妈妈把大儿子臭骂了一顿：“我二儿死了我就要找你算账！”

“她怎么可能容忍自己儿子去死呢？”过了这么多年，李大放没跟哥哥说那封信的事。他不怨恨哥哥，在那种环境下，“哥哥也是受了舆论炽热的裹挟，并不知道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是什么感受”。

“我在巴塘时接到我哥的电话，你想想我哥费了多大劲，把电话从重庆摇到藏区，再摇到了乡上，你想想那得花了多大力气？”

“我哥哥很激动，说全国都在关注你们！电话里叽里呱啦讲了很多大话。我当时听了心都凉了：你懂啥子？我这下水有可能就要死！”

“但我当时又不好说这个。我哥哥是跟着报纸看热闹，占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觉得这个仗打得好！他没想到下面尸骨遍野。”李大放说。

假镜头

2016年6月末，我跟李大放约在成都一家商场里见面。他个头不高，外表普通，坐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并不起眼，在这里讲30年前的长漂，聊着聊着总觉得有点尴尬，每一个词都跟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李大放带我去了张国宪的工作室，长江漂流之后，李大放去了中青旅工作，张国宪先调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又在90年代的下海大潮里，出来开了一家视觉设计公司。大多数科漂队的队员都换了工作，又多多少少跟长漂有关系。这些年媒体最常采访杨欣、杨勇、冯春三人，长漂后分别转行去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都在围绕着长江工作，

他们夏天都不在成都，这正是出野外的时间段。

还有一些人假托自己不在，事后我才知道，前几天刚刚有媒体采访冯春，“90后”的记者问了许多科漂队、洛阳队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冯春很不满，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只接受正面报道，不要说负面内容。

30年前的媒体宣传话语，已经给这场漂流定下了调子，就像杨欣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样：“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为了这些能献出生命的精神——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长漂最后的结果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精神，通过这个唤起一种精神、唤醒了一代人，给人感觉是只要我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年复一年，大家依旧延续着报告会上的说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怀念80年代。这30年里科漂队发出的声音最多，洛阳队几乎杳无音信：他们大多数主力队员都在1987年6月的黄河漂流里遇难了，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管理各种自发组织的漂流行为，“各新闻单位对未经批准的漂流探险活动，不得公开宣传报道”。

死去的人更不会说话。那些在长江上消失的人，也永远地沉默了。

张国宪前些年一直在照顾队员杨前明的母亲。1986年，杨前明是跟着好友张国宪一起参加科漂队的，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你去，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死后，杨妈妈听说了这句玩笑，一直耿耿于怀。独子早逝，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老妈妈沉浸在悲伤中一直出不来，去汶川县南部的映秀镇出了家。

杨妈妈自己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偶尔有游客会过来烧烧香。有一年，一车游客烧完香就在寺庙里闲逛，其中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闲聊了起来：“老妈妈，你是哪里人，怎么自己住在这儿？”

杨妈妈告诉她：“我是成都的，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出家到这里来了。”

女游客突然不吭声了，再一看，她已经满脸都是泪水。

“杨妈妈也很惊奇，这个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的是王振的老婆，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

——1986年11月19日，科漂队大队伍已经漂到了南京，一路鲜花掌声马上就要胜利抵达上海了。队员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返回金沙江莫丁大滩补漂，

以实现“一寸不落”的长漂诺言。船过莫丁大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时，三人在扎木滩落水遇难，至今没找到遗体。

“当时女孩已经怀起了娃娃，王振死了，她就把娃娃打了。”张国宪听到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自己也听哭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巧的。女游客喊她杨妈妈，还给她写信，后来也中断了联络。”

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山上的庙子整个垮了。杨妈妈当时在成都，幸运地躲过一劫，但寺庙里杨前明所有的遗物也随之消失了。受此打击，没过几年，杨妈妈就去世了。

中美队的中国队员们这些年很少接受采访，他们在长漂这件事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角色，褚斯鸣、张继跃等人30年前后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一次商业合作，跟国家、跟荣誉没什么关系。褚斯鸣和科漂队、洛阳队从来没有来往，他觉得大家做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褚斯鸣也怀疑科漂队是否真的“一寸不落”，公开的视频资料里科漂队有个最著名的镜头，是一条敞篷橡皮艇冲上浪巅，瞬间翻船，队员们在江水中游泳搏击。

“那条船是个光板船，一点物资都没有，他们真正的补给到底是怎么运输的？而且那个浪实在太小了，这点技术都没有，后面到底是怎么漂的？”中美队经历的最危险的江段，肯·沃伦把四条18英尺长的漂流船扎到了一起，每条桨有14英尺长，合起来变成了一个10.8米×7.2米见方的菱形船队。就这样的大阵仗，“有的浪一下子就冲得立起来了，我抬头再一看，离浪尖还有船队这么长的距离。你说得有多凶险！”褚斯鸣在江上捡到过前面中国人队伍的塑料桨，不到两米长。“我说天呐，他们想凭这个东西漂长江一定要死人的。”

听说几名中美队队员都提到了那个翻船的镜头，张国宪一下子笑了，他没想到中美队这么多年还在纠结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告诉我真相：那个镜头是假的。

中国两支队伍在金沙江上基本没有视频资料，镜头是为了报道大家特意补拍的，所以船上没有物资，吃水浅，遇到小浪立刻就翻了，也好显示队员们艰苦拼搏的精神。

“一寸不落是真的。”旁边的李大放说，随后他们也补充了一句，有时候浪太大，人被冲下水，下游在

哪捡到船，就在哪里继续往下漂。“路太难走，也不可能再拖回去重漂了。”

30年过去了

2007年，《户外探险》杂志中国版的年度金犀牛奖评选，给肯·沃伦颁发了年度荣誉奖。长漂20周年刚过，以此纪念他：“开启了一扇通往长江探险的大门。世界各地漂流者们认识了这条伟大的河流。”

沃伦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因为大卫·夏普的死，和未完成的商业合同，陷入了不断的官司，最后自己的漂流公司也被迫破产。虽然官司都以他的获胜告终，但这个身高1.9米、体形强健的运动员长期处在心力交瘁之中，一个下午，在修剪草坪时，肯·沃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10年之后，长江漂流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为什么还写长漂？”每个采访对象一坐下来都要问这个问题，随后又是同样的一句话：“长漂不好写，故事太多了，你一篇文章写不完。”

长漂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

对肯·沃伦来说，留下的意义只有悲剧。褚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的年纪，他现在北京宋庄经营一个园区，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但因为高血压，每天要吃降压药。“我已经59岁了，哪能像沃伦一样再去冲击长江。”他觉得30年前的沃伦抗击的是命运，“小人物的无用挣扎，再努力，在自然面前也微不足道”。

褚斯鸣说自己很少跟别人讲长漂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回头加他的微信时，我发现他的微信号是“rafter1986”（“桨手1986”）。

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还在成都，他开了一家户外探险公司，这些年一直在带国外旅行团到四川探险，漂流也做过不少。现在看来，肯·沃伦那个漂完长江，再漂雅鲁藏布江，一路开通旅游到恒河的计划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条经过中印之间的线路，根本不会让外国人从这里顺流而下。

更何况，长江也变了。金沙江已经被水坝彻底改变了模样，赵坚这些年去看过很多次，“基本都拦完了”。叶巴大滩附近正在修水坝，过不了几年，第一次密封船事故的区域将会变成一片平湖。杨欣最近几年的重点工作，就是呼吁停止烟瘴挂的水电站修建计划，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他对长江源头的情况了解得更多：“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因为层层水坝已经阻隔了长江。1986年的长漂已经成了千古绝唱。”

科漂队现在有个微信群，一群平均年龄已经60岁的队员们平时经常在里面聊天。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来历，队员从一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整个长漂笼罩在英雄主义情怀下，很多冲突后来已经被抹平了。有几次提到当下的新闻热点，大家吵得不欢而散，后来就再也没人提了。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人一直在长漂的旧梦中走不出来。

虎跳峡景区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正是那名最早离开长漂队伍的队员开的。这名队员后来又组织了珠江漂流、黄河漂流，但他始终都不是主力队员，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危险的江段，其他队员最不能理解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个人还在孜孜不倦做长漂这个工作。那个小博物馆孤零零地矗立在景区内，小馆长一直活在过去的岁月中。

科漂队有一个更正式的博物馆，2013年6月，长江漂流纪念馆在成都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内开馆。我去的时候正是盛夏，工作日来参观的游客不多，一小时内，只有几个小学生飞奔进来，转了一圈，不明所以地走了。

玻璃柜里的橡皮筏已经落了厚厚的灰尘，纪念馆里的展品都是科漂队员们捐赠的，没有洛阳队和中美联合队的实物展品。

征集展品时，大家跟李大放要那封虎跳峡家书，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来。“信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展览这个？”

纪念馆仍然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在媒体的长枪短炮的簇拥中，一个男青年正在读着什么。图片说明是：冲击上虎跳峡前，科漂队现场指挥部的李申向队员宣读李大放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母亲为儿子漂流鼓劲打气。□

（感谢实习记者杨文轶对本文的贡献）

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因为层层水坝已经阻隔了长江。

从公立到国际：转学背后的教育理念

口述 / 夏娟 采写 / 吴琪

“在学生低年级阶段，我们关注学生是否开心？不开心是否会表达、会倾诉，是否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到了中学阶段，我们在意学生有没有擅长的科目，他们有没有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做出努力？因为这很可能是学生以后谋生的手段。”



(黄宇 摄)

夏娟

7岁女儿的转学决定

我在国际学校工作了十几年，两年前我女儿上小学时，我和先生给她选了北京一所相当不错的公立小学。我们希望孩子在公立学校打好中文基础，等到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再转到国际学校。

我女儿在这所公立学校表现不错，是班上成绩拔尖的学生。我们给她学习上的压力不大，她读学前班时，我们很认同那所学前班的理念，老师们很少教孩子写字做算术，孩子们天天不是游泳就是轮滑、画画，过得很开心。我觉得基础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孩子如果在运动或兴趣爱好上，能专注于某一两项特长，他们以后应该也容易把这种坚定的劲头用在学习上。

2015年秋季，因为北京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活动，我女儿的小学推迟了开学时间。我所在的国际学校8月中旬就开学，所以我想着让女儿暂时到国际学校读三个星期，她自己的学校开学后就回去。哪知女儿在这里待了三周后，不愿意回到公立学校。我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因为三周前女儿还表示非常喜欢她的学校，怎么会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女儿告诉我说：“以前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感觉到，有真正玩的时间。到这里来了，才知道在学校里是可以玩的！”我问她：“你们学校不是有很棒的操场吗，还有攀岩设施啊。”女儿说，这些设施从来没有让他们玩过，即使体育课时大家在操场上，但是都得听体育老师的指挥，基本都是排队后按要求做运动，不能随便玩。

我详细咨询了我们学校低年级的外教老师，像我女儿在公立学校读了一年后转学，会不会与国际学校的同学有明显差距。这位外教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女儿能在两年后达到班级里的中等水平就很不错了，如果要达到班级里的领先水平，恐怕得到小学五年级了。

我听了之后比较犹豫，有些担心如果孩子不适应转学的变化，自信心会受到打击。我认为孩子的成长需要持续不断的成功经历，无论是在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还是与老师的互动方面，愉快成功的经历能够帮

助孩子建立自信，为一生的努力打下基础。所以我认真地跟女儿谈了一次：“你在国际学校的同学是一年级的英文水平，你的英文只有幼儿园水平，如果转学，你在原来学校的优势就没有了。”女儿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要转学，请你相信我。”

一个7岁的孩子，如此坚定地为自己做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让我们感到吃惊。女儿读过的这所学校，已经算公立学校圈里有实验精神的小学了。他们一个班30个学生，规模不算大，老师的教学水平不错，对学生也亲切。不过女儿一年级上学期开家长会时，我们家长跟着孩子上了半天的课程，老师讲课的节奏快，半天时间听下来，连成年人都觉得精神紧张。老师们说得多，学生们的声音就被听取得少，他们的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遵守统一的规范上。到了第二学期我去开家长会，我们家长能感觉到，学校也在追求教学上和管理方式上的改革，只是这种改革的变化是需要时间成本的。这三周偶然的经历，让女儿看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

我女儿转到国际学校，一个班20多个同学，人数与之前学校相比，变化不算大。但是她明显感觉精神上放松了，内心有安全感，很愿意与老师分享各种感受：出现了问题愿意告诉老师，老师不会责备，而是关注学生；遇到快乐的事情也愿意跟老师说，老师会一起分享。这样当孩子感觉需要帮助时，他们懂得如何寻求帮助，内心总是觉得有人是支持他的。

国际学校的宽松，并不是缺乏规范，实际上国际学校遇到原则性的事情，处理起来是非常严格的。但是西式教育有一套引导学生的方式，不是简单通过“控制”达到管理的目的。比如老师们在给学生养成查字典的习惯时，会给学生三张纸条，每个纸条代表一次向老师求助的机会，三次机会用完了必须自己查。这样就把决定权交到了学生手里。他们可以向老师求助，能够体会到老师的人情味，但是他们也需要明白，这种帮助不是无限制的。

在教室的墙面上，有一个代表每个学生表现的图表。图表上有绿色、黄色、橘色、红色等不同等级，代表着老师给予学生行为的不同评价。比如当老师放音乐让学生们收拾课桌书包时，如果音乐停下来，还有人没收拾好，老师会把写有他名字的夹子挪到下一格，表示一种无声的监督。

目前女儿在国际学校学习了一年，她的英文阅读水平基本上是每个月提高一级水平，所以她每个月都

老师们在给学生养成查字典的习惯时，会給学生三张纸条，每个纸条代表一次向老师求助的机会，三次机会用完了必须自己查。

在换小组。到了二年级末期，她的老师说，她还差很小一步就能达到年级中等水平。我知道女儿这一年很努力，国际学校的课程并不是很轻松。我们这里小学是IPC课程，中学是IB课程，一年级的学生就需要了解文体的不同形式，比如小说该怎么读、纪实性报告怎么读、说明书该怎么读……。他们需要先对每一个学科的知识全貌有个了解，然后每个年级都在程度上不断加深。比如女儿二年级文学课的一个作业，要求介绍一位名人的生平。同学们分成小组来做研究，他们首先通过网站、书籍等信息寻找线索，对比几个感兴趣的名人，然后挑出一个人来做细致的研究。最后的作业需要通过绘画的形式来表达出这个名人的生平，比如介绍哥伦布的同学有可能画出大海与轮船等。小组的几个同学分工，有的擅长绘画、有的负责整理打印，有的负责向全班同学陈述报告。这样关于知识的学习不是老师生硬地教授，而是同学们通过调查研究来合作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锻炼了人与人交往的能力。

一个项目做出来，老师会给学生打分。有时候有同学向老师报告说，小组里的某个同学没有为这个作业做出多少贡献，所以影响了作业的得分。这时候老师会问：听说这位同学生病了，你有没有关注到这点？其他人有没有为团队多做一些事情？老师鼓励学生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

总体来说女儿在学习上有时候也会说累，但是作为儿童她的心不累，精神不累。

概念为驱动的教学

我从2000年开始进入国际教育领域，那时候去参加IB课程的国际会议，我惊奇地发现大家讨论的是2020年我们的教育会是什么样的。IB课程最初是联合国为了解决外交人员子女读书的问题，委托给相关组织来研发的课程。它不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课程体系为基础而自成体系，广泛吸收了许多发达国家

老师需要提供给学生的，一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一是让学生获得对信息的辨别、筛查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明白哪些信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家主流课程体系的特点。IB 课程的研发者从 2000 年就在为 2020 年的教育做准备，2014 年 IB 有了一次重大的教学大纲的改版，大纲的改版只是行动中的一步，最终是为了朝着 2020 年的目标行动。

IB 课程强调人的终身学习的能力，教育不只是教授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传授概念，让学生懂得运用知识和技能去理解概念。新大纲特别强调“以概念为驱动的教学”。IB 中学项目 (MYP) 课程有 8 个学科，每个学科都分为 ABCD 四个标准。大致来讲，标准 A 代表对学科知识和技能的理解，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是学习的基础。很多东方国家的教学大纲特别看重知识和技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教学大纲里，89% 的内容都处在 A 标准。标准 B 是对知识的应用、标准 C 是交流、标准 D 是对学习内容的反思。后三点与标准 A 同样重要，因为它们考察的是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而不仅是零散的累加的知识。

IB 中学项目 (MYP) 课程每个标准的满分是 8 分，对一般学生来说，达到四五分的水平比较容易，但是若想拿到高分，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对于老师来说，他们给学生评分时有非常明确的参考标准。每门学科在每个年级，都有四个档次的评分标准，每个标准又至少有三点具体要求。所以老师在给学生评分时，有着非常明确的参照，给学生做解释时，也能让他们明白，每个学生在哪方面有优势，哪方面做得不够好。这样学生也觉得公平，因为老师的评分是有据可查的。西方课程设置体现出了细致的调查研究精神，他们对不同阶段学生的大脑认知力、心理接受能力等各个方面做过详细研究。所以每一门课程为何如此设置、对老师对学生有着什么样的要求，都是明确的，有据可查的。

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学生：这个世界真正的研究并不只是放在某一门学科里，而是建立在多种学科之上，所以学生们要跨过各个学科的界限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然后得出自己的看法。我

们的教学经常采用跨学科的形式，

比如七年级学生的课程，当他们的数学课在学习统计分析的时候，体育课就应用到这些知识。在体育课上，学生们三人一组，用四种泳姿来测速，然后根据数据来分析哪一种泳姿更快。当大家发现自由泳速度最快的时候，再研究细化的知识：游几下换一次气最合适？脑袋离开水面呼吸时，仰起多少角度更好？然后，老师会让全班同学拿自己的数据，与奥运会上的运动员游泳成绩对比，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来切身感受哪些因素决定游泳的速度，以及大家可以如何改善游泳速度。

我们的这些教学方法，是希望学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整合知识提出新的观点。学生通过对数学和体育两种方式的运用，能够解决和研究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最后每个小组的三个同学，都会上台一起向全班同学陈述，讲讲自己小组的分析结果和结论是什么。这样学生最终的收获不只是具体知识，而是对“变化”这个大的概念有了感受，他们通过这个小的研究，了解到变化中的可控因素。

当我们面对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 21 世纪的人才应该具备 3C 的素质，这 3C 是 communication、creativity、collaboration (另有一说 3C 是：care、connection、creation)，既有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还得具有关怀人的精髓，充满创造性。信息时代知识无限丰富，学生不用老师教就已经获得很多知识，这时候老师需要提供给学生的，一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一是让学生获得对信息的辨别、筛查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明白哪些信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产生新的观点，这就是创造力的体现。

在学生低年级阶段，我们关注学生是否开心，不开心是否会表达、会倾诉，是否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学生一旦在学校里遇到问题，他们应该懂得如何反映和解决问题。到了中学阶段的学生，我们在意的是他们有没有擅长的科目，这很可能是学生以后谋生的手段，他们有没有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做出努力？学生如果学习方法出现问题，那就需要针对学习方法辅导他们；学生如果是心理出现问题，老师会根据情况，看是否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介入。当心理辅导人员需要介入学生家庭时，老师会退出。

我们也遇到过有些学生投诉某位老师，认为老师的教学质量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与家长沟通，希望家长鼓励学生多问问题，当他们在课堂上感到疑惑，一定要尽可能地当场说出来，这样老师就更能明



2012年9月21日，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学生们在参加校庆80周年文体活动

白，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另一方面，学校的其他老师、行政人员会去听这位老师的课，这样学生能够感觉到，他们在反映问题之后，事情出现了变化，大家都在关心他们的感受，并且试图解决问题。

从学校角度来说，希望家长和学生能够接受老师的成长。并不是每个老师天生就能当好老师，学校会给需要改进的老师非常具体的帮助。当家长和学生感受到学校的积极反馈，以及看到了老师的改变，哪怕还是这位老师在教书，反映问题的家长和学生的感受完全变了，最后能够接纳老师。有的老师实在是不能符合教学的要求，最后只能离开。我觉得学生参与这个过程也很有意义，我们实际上是在教会学生——怎样对待别人？当学生感觉到老师出现问题时，可以跟谁去讲？当某个老师的教学水平明显不足时，学校和家长们要不要关心他，帮助他？如果老师个人没有进步，最后只得离开，学生也会因此明白：一个人如果努力不够，机会不会一直等着他。

其实教育是一个永远有遗憾的艺术，每个孩子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家长的第一次。老师面对着的教育对象总在变化，他们也在探索如何更好地了解每个学生，给予最适合的教育。

学校相对于家长来说，是个专业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是个强势机构。家长的需求多种多样，学校办学方向却只有一个。但是教育是学校与家长的联合，所以学校在自己作为专业机构提供教学的基础上，也会很重视家长的意见。学校对家长来说是开放空间，每个月都有固定的 coffee morning (咖啡早茶会)，家长可以和校长一起喝咖啡，进行交流。每个月有很多活动，比如集市、运动会、学科活动，家长参与到学校里边的机会不少。学校毕竟是长年研究教学的机构，老师是专业的教育人员，所以也请家长们给予学校和老师更多的信任，一起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飞行者波音的 100 年

主笔 ◇ 李三

1967 年 4 月 26 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的一架波音 707 飞机上，空乘人员在为乘客提供餐饮服务



1919年，威廉·波音与飞行员埃迪·哈伯德驾驶B&W-C型水上飞机完成了美国首次国际邮件递送飞行

这家航空飞行器制造公司的历史，在相当意义上，就是这个行业历史的缩影。这种传奇，并不多见。

波音公司的官网上，有一个精心制作的大事记，背景是从高空俯瞰的大地，“时间轴”自上而下从1916年到现在，浓缩了波音百年的壮阔历史：1916～1926年，创业期；1927～1938年，早期；1939～1945年，战争年代；1946～1956年，战后发展；1957～1970年，喷气机和登月火箭；1971～1996年，更高、更快、更远；1997年～现在，架构未来。时间轴很长，鼠标需要滑动好一会儿，即便如此也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个大概。百年间太多犹如神的存在，在人类飞行史上，波音有很多故事值得细说。

在退休以后的很多年里，有着“波音747之父”

尊称的乔·萨特在机场候机时一直有一个习惯，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观察747飞机，“数飞机”是他用来打发时间最有趣的消遣。有一次在日本成田机场候机的两个小时之内，乔·萨特居然看到总共55架747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从登机廊桥走过的当口，他快速地做了一道心算题，假如按每架75%的搭载率计算，在短短两个小时里就有超过2万人乘坐747而来。这个发现曾让乔·萨特内心有一种此生无憾的激动：“站在那里，看到747飞机一架接一架降落在跑道上，这一幕仿佛在讲述，我们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这些年因为采访的缘故，本刊记者曾两次前往埃弗雷特工厂，那里是波音747、767、777和787飞机生产线的家园。工厂位于西雅图Downtown50公里开外，驶下高速路，一座超巨型的建筑就出现在面前，驶入城区，能看见像帆船一样的大型客机停泊在高速公路两侧的旷野里，绵延不绝的大型工厂厂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Boeing。

梦想、专注、超越、敢想敢干、完美主义、有冒险精神……如果用这些拟人化的词语描述波音公司，毫无疑问，它就是一名当之无愧的“飞行者”。

始于远见的起飞

威廉·波音 (William Boeing) 28岁时第一次看到飞机飞行。1910年1月，他和朋友们一起前往洛杉矶参加美国国际航空大会。100年前，飞机还只是特技飞行员和冒险英雄展现胆识的工具，每逢航展，观众们总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远方出现一个黑点，逐渐变大成为一架飞机，在天空中俯冲腾跃，感觉简直难以置信。和当时在场的许多人一样，看到飞行员表演空中特技，威廉·波音想当然地去请求飞行员带他体验一下飞行，结果被拒绝了。

威廉·波音年轻富有，当时他的木材生意已经很有规模，但他真正留给后人的是在1916年所创建的公司。

1915年夏天，威廉·波音认识了美国海军上尉康莱德·威斯特韦尔德，两人对航空飞行有着共同的兴趣。在西雅图飞行展期间，他俩搭乘一架小型水上飞机在华盛顿湖上终于获得了一次真正意义的飞行体验，飞机简陋，没有座舱，他们只能直接坐在机翼前缘的蒙布上。很多年后威斯特韦尔德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这次飞行，惊叹于飞机怎么在空中没有散架。不过，这次简陋但真实的飞行已经足以让他俩兴奋不已，并且坚信自己可以造出更好的飞机。之后，威廉·波音独自到洛杉矶另一位航空先驱格雷恩·马丁开办的飞行学校学习飞行，他买了一架马丁浮筒飞机回到西雅图，继续练习飞行。

1916年，威廉·波音以1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成立了太平洋航空产品公司，一年后更名为波音飞机公司。公司最早落户在一个船坞，它所在的建筑物之后被人们称作“红谷仓”，刚开始只有几名木匠和裁缝，飞机原材料包括帆布、胶以及木头。他们将马丁飞机的单浮筒改为双浮筒，用以改善飞机在起降时的稳定性，令人遗憾的是，没等到飞机完工，威斯特韦尔德被派往东海岸工作，只能由威廉·波音自己完成飞机制造。1916年6月29日，威廉·波音亲自驾机首飞，这架飞机以两人名字的首字母命名：B&W。

那是一个向往飞行的时代，类似波音飞机公司的企业在欧美不下数十家，大家以莱特兄弟发明的飞行器为起点，竞相发展航空行业。每个加入者都在想：“我

们能如何应用它呢？”

波音公司第一款取得商业成功的产品是应美国海军参加“一战”的急迫需求而研制的C型水上教练机。受益于美国军方的订单，波音飞机公司受雇的员工超过300人，产量急速增加。然而，随着战争在1918年戛然而止，来自军方的订单很快枯竭，三分之二的雇员被解聘，波音飞机公司甚至一度干起了家具制造。飞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威廉·波音需要为这个核心问题寻找答案，公司就这样迎来了百年历史中的第一次转型。

美国幅员辽阔，邮件运输市场很大，当时州际公路还没有出现，即使走铁路，一封信也需要一周才能从西海岸到达东海岸，相对原始的飞机等来了空运邮件的契机。当时飞机的可靠性极差，人员伤亡率很高，伴随着危险，空运邮件方兴未艾。1919年，威廉·波音亲自驾机在西雅图和加拿大温哥华之间穿梭，由此设立了北美大陆第一条国际航空邮件运输线路。一时间，邮件运输几乎变成了“一战”后航空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然而不久，航空邮件很快开始为更赚钱的“货物”让路，那就是付费乘客，能够承受高昂飞行费用的人们愿意尝试航空旅行了，航空业也因此迎来爆发式增长。

威廉·波音认为，如果没有航线用于飞行，那制造飞机也没什么意义。20世纪20年代，对于飞机制造商而言，与其他供应商和制造商联合是明智之举。波音首先和发动机制造商普惠公司合并，随后，这家名为联合飞机与运输公司的新公司开始一系列并购行动，短短几年内，它就成了非常成功的航空控股公司，即使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国家经济遭受重挫的情况下，它仍在兴旺发展。它继续收购其他运输公司，将线路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全国性机构，并很快掌控了全美50%的航空邮件和客运业务，发展成为联合航空公司。

然而，在大萧条时期，很多公司在苦苦挣扎时，成功者是很可能招致羡慕嫉妒恨的。联合飞机与运输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国会宣布了令人瞠目的惩罚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运输乘客和货物的航空公司的合并使得过多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必须拆分。

这是威廉·波音一段传奇生涯的顶点，他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股票，永远地离开了航空业。

然而，到这个时候，人类飞行的梦想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了，因为威廉·波音，这个发源于莱特兄弟自行车铺的产业已经被彻底改变。“不要让任何航

空业的创新机会同我们擦肩而过。”这是威廉·波音给公司提出的使命，如薪火一般传承至今。

从“信使”到载客的转变

波音 40A 型机是专为邮件运输打造的，这是第一架非军事用途的飞机，体现了威廉·波音对航空业竞争的远见——尽最大可能赋予飞机最先进的设计和工艺水准。它的机身结构采用了焊接钢管，还有一个气冷式发动机，重量比其竞争对手轻了 90 公斤。波音凭借 40A 型机参加投标，赢得了美国政府在旧金山和芝加哥之间运输邮件的合同，也使波音公司迈入了航空运输业。

1927 年，美国航空业的英雄查尔斯·林白出现了，他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首次完成单人横跨大西洋飞行。这次飞行在当时的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他访问了美国 83 座城市，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看到了他，听到了他的声音。“必须发展与邮件运输线路并驾齐驱的客运线路。为发展航空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机场。”林白对客运航空未来的看法毫无疑问是具有前瞻性的。

在当时，航空客运业只是一个概念。40A 型机的前舱可以腾出两个人的乘坐空间，而且前提是飞机不需要这些空间装载邮件。最初的航空客运是让人坐在邮包上面，全程坐在开放的机舱内，乘客身体必须足够结实，才能经得起这种方式的旅行。但在后林白时代，富人们开始认真考虑航空旅行。波音推出了 80 型飞机，这是第一架具有客运用途的波音飞机，可以搭载 12 名乘客，客舱舒适暖和，有皮质的装有软垫的座椅。80 型飞机还引入了乘务员，一些拥有职业护士执照的女性在飞机上提供服务，安抚乘客的不安。

1930 年，波音公司推出了一架称之为“单翼信使”的全金属单翼飞机，这架飞机拥有可伸缩起落架，根据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流线型机身，飞行速度是前一代双翼飞机的两倍。很快，波音又开始研发更具革命性的波音 247。波音 247 算得上第一架现代民用飞机，装有可调螺距螺旋桨、机舱加热系统、收放式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除冰器以及自动驾驶仪，它成为当时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焦点。20 世纪 20 年末期到 30 年代的大量新技术被运用在了这架飞机上。

波音公司收到了旗下联合航空公司 60 架飞机的订单。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波音 247 订单中，有一架被中国私人用户购买，这架飞机的主人就是“少帅”

张学良，波音 247 陪伴着张学良在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重大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身影。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正进入飞机的黄金时代。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回忆当初，真的有一种“大银幕”的感觉。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会在星期天下午蜂拥至机场，观看飞机起飞。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登上飞机，航空旅行当时是富人的专属，是遥不可及的梦。每当有从西海岸等地方来的飞机降落，就会有一些摄影师守在那里，因为他们知道，飞机上可能会有一些名人。坐飞机的时候，人们会盛装打扮，女士们会戴上珠宝，穿上最好的衣服，男士们还会打领带。航空公司很快意识到，为了争夺这些乘客，他们需要互相赶超，奢华的配置在当时司空见惯。

波音 314 “飞剪船”水上飞机就是那个奢华旅行时代的代表之一。“飞剪船”这个名字可以同时让人想到航行和飞行，它既是飞机又是船。其他公司也在制造类似的机型，但没谁可以像波音为西雅图泛美公司打造的“飞剪船”那样巨大而华丽，它们象征着航空飞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它外形看似有些笨拙，但银色机身既漂亮又大气，每架飞机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只要是船可以停靠的地方，它几乎都可以降落。巨大的“飞剪船”也许算得上是曾经建造和飞行过的最浪漫的民用飞机，但事实上，虽然“飞剪船”声名远扬，但波音只生产了 12 架。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波音公司陷入了麻烦。它拥有生产创新飞机的历史，但它的对手——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却在黄金时期掌控了航空客运的市场，1934 年，波音被迫将员工从 1700 人裁减到 700 人。随着“二战”阴云逼近，波音公司转入军用飞机制造。

波音 707——驶入喷气时代

机场是 21 世纪的十字路口，每年超过 30 亿人次乘飞机旅行。如此规模的旅行要归功于喷气式飞机。

有些飞机有两个发动机，有些则有四个，无论其大小，也无论其属于哪家航空公司，几乎所有的飞机都有着类似形状，机翼在机身两侧向后延展，喷气式发动机则悬挂在机翼下方。这种设计如此完美，以至于在整个 60 多年的喷气时代，几乎没有改变过。

现代喷气客机的诞生，据说和“二战”末期在德国森林中发现的一个秘密有关。

“二战”期间，纳粹一直在秘密研发他们所谓的“奇迹武器”，其中就包括最先进的飞机，为此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时间和人力。德国人之前已经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服役的喷气式战斗机——梅塞施密特 Me 262，这架飞机标志着高速飞行革命的开始，它曾经是天空中最快的飞机。到“二战”末期，同盟国在德国多次发现形状怪异、带有后掠翼的德国飞机，这些飞机机身装有后掠翼，形如箭头一般。这个发现引起了行家的警觉，因为自莱特兄弟以来，当时的飞机全部采用的是和机身垂直的水平翼。

战争结束时，波音公司的人员前往德国一探究竟。在纳粹政权败退之际，他们所有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变得唾手可得。一个被称为“德国空军秘密科技计划”（简称 LUSTY）的项目进入大家的视野，各国为了这个秘密计划展开激烈争夺。该计划曾经由著名的航空工程师冯·卡门带领，他是一位匈牙利籍犹太人，希特勒当权后，他离开德国去了美国。受美国空军委派，冯·卡门把美国最优秀的航空科学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就包括波音公司首席空气动力学家乔治·施瑞尔。专家团队最终找到了那个藏在森林中的秘密。它的伪装级别很高，以至于屋顶上种了草，还有鹳在草里筑巢，这里被人们称作福肯罗特，曾是德国航空技术的顶级研究中心。

他们找到了这个设施的负责人，希特勒曾让这个人立即炸掉整个设施。但他参与了设施的建设开发过程，对这里充满感情，所以并没有炸毁它。他把美国科学家带到了地堡，里面有不可思议的飞行方面的机密信息，不仅有实验室、储油设施，还有七个风洞。谜底解开了，原来德国人在进行后掠翼方面的研发。

后掠翼的设计表明，德国人已经解决了困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难题，这两个国家都能制造喷气式发动机，但没有飞机能够利用它们。当在水平翼的传统飞机上使用喷气式发动机时，当飞机加速时，机翼上方的气流会达到超音速，但其实飞机本身并没有达到，这就会在机翼上方产生激波，让飞机变得难以控制，会出现失去升力等问题。通过机翼后掠的设计，德国人可以延缓机翼上方激波的出现，使喷气式发动机的优势得以利用。

乔治·施瑞尔立刻意识到了福肯罗特的这项研究的价值。他写了封信回国，告诉同僚们：“你们最好到风洞里来一睹究竟，正因为此，他们的飞机才飞得那么快。”

波音公司当时正与另外三家公司为制造下一代美国轰炸机而竞争，这架喷气式飞机计划被命名为 B-47。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波音公司的设计一直在围绕水



“波音 747 之父”乔·萨特与首架 747 飞机

平翼飞机进行。乔治·施瑞尔大胆地打了一个电话，立即叫停正在推进的 B-47 项目的所有设计工作，而将之转变成一架后掠翼的涡轮喷气式轰炸机。

后掠翼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应该把发动机安在哪里呢？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嵌入在机翼中，波音公司觉得这样太危险了，因为如果发动机出故障，它会爆炸，会严重损坏飞机。波音设计师对于发动机起火有着惨痛的记忆，这是研发 B-29 轰炸机时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发动机悬挂在机翼下方。

在飞机研发过程中，最可怕的就是“颤振”——机翼发生奇怪的振颤。人们在风洞中测试模型，有些部分会被吹落，有些会断裂。由于机翼会像果冻一样来回晃动，他们必须经历这个驯服飞机的过程。在反复试验后发现，如果能让发动机本身的重量加在机翼下方的临界位置，就能让颤振得到控制。这一重大发现，最终成就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机翼，这种机翼让飞机的飞行速度提高了一倍。1947 年，波音研发了世界上第一架后掠翼大飞机——B-47。

当波音第一次向美国空军展示 B-47 时，空军派出了一架战斗机前去伴飞，伴飞的是老一代战斗机，没能追上 B-47 轰炸机。轰炸机比战斗机的速度快，这种事情之前从未发生过。之后，波音得到了生产一

个机队的 B-47 轰炸机的合同。但 B-47 终究是一架军用飞机，让乘客享受更高舒适度的喷气式客机的这一想法，则需要想象力以及科技的飞跃。

比尔·艾伦在“二战”末期成为波音公司的总裁，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梦想家，他曾经在波音公司担任了几年的企业律师。艾伦成为公司总裁时，政府正在取消与公司签订的 15 亿美元的合同，B-47 轰炸机则是一个例外，正是这架飞机带领美国空军进入了喷气时代。

1950 年夏天，艾伦决定自己尝试一下喷气飞机。他爬上了飞机，爬进这只巨兽的肚子里，坐在了飞行员后面。B-47 将艾伦带到了超出一般客机飞行高度数千英尺的地方，时速超过了 600 英里（约 965 公里），速度超过一般客机将近两倍。这是他第一次乘坐喷气式飞机，飞机上非常安静，这次飞行给艾伦巨大的信心：“这就是乘客想要到达的地方。如果我想到这里，乘客也会这么想。”

说服航空公司相信喷气式客机并非易事，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螺旋桨飞机机队，转而去接受昂贵的未经检验的喷气式飞机。乘客对喷气式飞机也有疑虑，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不是太快了。但艾伦很有信心：“我很肯定，一个人一旦乘坐过一次喷气式飞机，一定会发现这远远优于他惯常的出行方式。”于是，在 1952 年，艾伦为波音公司制定了下一步计划：制造一架原型机，他下决心要用这架飞机把波音公司和民用航空业带入喷气时代。

制造商已经习惯于航空公司订购 30 架或者 50 架飞机，这分摊了制造原型机的成本。而设计原型机的资金风险很大，波音在原型机的投入超过了 1600 万美元。在当时，1600 万绝对算得上巨额投资。1954 年 5 月，707 原型机滑出了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南部的波音工厂。

但现实是，当时没有一家航空公司愿意将波音 707 视为旅客出行的未来，下线一年后，707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失败的产物，没有航空公司愿意购买。于是，在 1955 年夏天，艾伦找到了波音公司的首席试飞员特克斯·约翰斯顿帮他销售飞机。

特克斯·约翰斯顿喜欢穿着牛仔靴、戴着牛仔帽飞行，是那种能够夸大现实、善于虚张声势的人物。当时主要航空公司的高管们正汇聚在西雅图参加行业会议，艾伦抓住了这一机会，邀请他们参加在华盛顿湖上的划船比赛。与此同时，约翰斯顿驾驶飞机飞过赛场上空，然后再调转方向飞回来，把飞机展示给赛

场上的那些潜在客户。艾伦没有给特克斯·约翰斯顿任何具体指示，事实上他只要驾驶飞机飞过人群就足以轰动了。

当时周围的观众大约数以万计。飞机突然转弯，看上去就像要失控一样，特克斯·约翰斯顿飞过人群，决定做一个侧翻滚 360 度被称为“桶滚”的特技动作。约翰斯顿到底在干什么？艾伦的心跳都要停了。约翰斯顿飞了过去，然后转了个方向，但是他没有回来，它又在航线上来了个桶滚。据说当时艾伦这样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全指望这架你刚才驾着翻跟头的飞机了。”约翰斯顿看着他说：“是你让我销售飞机的。”

这次展示精彩绝伦，但航空公司的高管们仍然认为向喷气式飞机的跨越太过冒险，只有泛美航空公司的胡安·特里普是个例外。这位泛美国际航空公司的传奇创始人在 1927 年借助佛罗里达和古巴之间的邮件运输线路开创了自己的航空公司，他是一个梦想家，他下的赌注无人能及，特里普订购了 20 架波音 707，但他一直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直到 1955 年 10 月，在纽约一次国际航空会议尾声，特里普“不经意”地透露说：“明天报纸上，会有关于我进入喷气时代的新闻。”几乎所有主要航空公司的高管都参加了会议，特里普的消息震动了航空界。

乘坐 707 客机旅行很快风靡一时，甲壳虫乐队乘坐了 707，滚石乐队也乘坐了 707 客机，所有人都想乘坐 707。它创造了一种气氛，一个传奇，一种魔力，泛美航空的 707 飞机上提供鱼子酱，还有烤牛肉、酿龙虾，有两三种主菜可供选择，还有非常优质的红酒和香槟。

喷气式客运的应用将使整个世界突然插上翅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大西洋的移动模式完全改变了，乘坐飞机穿越大西洋的人数超过了乘船的人数，这倾覆了海上航行的黄金时代。胡安·特里普狂妄地夸耀：“一瞬间，我们缩小了地球。”

波音 747——不了的传奇

“更高，更快，更远。”这三个词始终是航空业的引擎。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军用飞机已经可以进行常规性的超音速飞行了，但可以在几小时内运载乘客跨越大洋和大洲的超音速客机从未在天空中出现过。

60 年代早期，英、法联合研制了协和超音速喷气式客机，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客机。肯

尼迪政府展开讨论，美国是否应该研发更大、更快并且能够超越协和的飞机。但肯尼迪已经让美国投入到更具野心、更具挑战性也最为昂贵的登月项目，因此他在超音速客机方面行动缓慢。

但泛美航空公司的胡安·特里普认定，民用喷气式飞机进一步迈向未来的时机到了。他像看待之前的那些前沿事物一样，把超音速飞机看作是又一个前沿事物。胡安·特里普有一个天赋，就是找到办法操控别人。他做了一笔交易，花数千万美元订购了6架协和超音速飞机，有计划地把这一消息透露给美国媒体。对此，肯尼迪总统很不高兴：“你帮我给他带句话，并且明确告诉他，我觉得他应该撤销合同。”这是总统与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的通话内容。胡安·特里普的计划成功了。肯尼迪总统宣布支持制造美国超音速客机。

波音、洛克希德和北美航空公司争夺制造超音速客机的政府合同，波音公司凭借革命性的设计获得了胜利。在西雅图展示的波音超音速客机的全尺寸模型令人瞩目，它拥有变后掠翼、四台巨大的发动机，可搭载300名乘客，飞行速度为2.5倍音速，这架飞机突破了之前所有民用喷气式飞机的设计。但是，即便是它最忠实的支持者也认为，一架突破科技极限的飞机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

但胡安·特里普没有这等耐心，他可不愿意在自己的第一架超音速客机上等待数年时间。与此同时，他还想要一架能够“填补空白”的飞机，如果他无法拥有最快的飞机，那么就拥有最大的。胡安·特里普深信，如果他拥有一架座位数达到707两倍的飞机，泛美航空就有能力装满它，并进一步降低航空旅行的成本。于是，特里普再次找到了他的好友——波音公司总裁比尔·艾伦。747的诞生据说源于这两位男士在游艇上的一段对话。特里普说：“如果你能造出来，我就会买。”而艾伦当时说：“如果你买它，我就会造。”然后两人握手成交。胡安·特里普签订了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商业合同，购买25架747。

波音和泛美把赌注都压在了这架飞机上，如果失败，两家公司都得倒闭。比尔·艾伦不仅让波音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研发747飞机，他还允诺特里普，自己会在4年内造出飞机。

当特里普和艾伦最初握手时，他们知道自己寻求的是什么，但他们不在乎。他们就是想要这种飞机，其他那些惹人恼怒的细节不是他们需要担忧的。把他们的想法变为现实的重任落到了一位工程师的肩上，

他的名字叫乔·萨特。

乔·萨特进入公司近20年，从事喷气式飞机研发方面的工作。747的外形看起来是707的2.5倍，但这极具误导性。事实上，这是一架完全不同的新飞机，当时除了萨特之外，没有人意识到这一事实。萨特回忆说：“胡安·特里普的想法是打造一架能够搭载400人的拥有两层客舱的喷气式客机，他痴迷于制造两层座舱的飞机，他想让飞机看起来像远洋客轮。但研究表明，我们还有更好的创意。”

解决方案是制造一架机身更宽的飞机，所有400名乘客全都坐在同一层。这将成为第一架拥有两条通道的飞机。接着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谁来告诉胡安·特里普他不会得到拥有两层客舱的飞机呢？波音派出了米尔特·海涅曼向泛美公司展示。他来到位于纽约的泛美大楼会议室见特里普。他测量了会议室宽度，刚好20英尺。于是，他有了一个巧妙的开场白：“坐在这个房间中，就像是坐在波音747飞机上。”就这样，特里普放弃了双层客舱的想法，但他认为，一旦波音的超音速客机问世，747将被改造成货运飞机。

波音要把这架飞机设计成好的货运飞机，同时又是优秀的客运飞机。这是唯一要符合双重要求的飞机，但如何装货呢？一种方式是通过机头装货，于是，波音就给飞机的机头设计了一个货舱门，就在驾驶舱所在的位置。所以，波音把驾驶舱设计在了上方，于是，机头上面就有了一个凸起，这也造就了747的标志性外形。

当时，尽管从波音747的尺寸和发展潜力来看，已经可以和超音速客机媲美，但美国纳税人承担了超音速客机的研发费用，747的研发就只能由波音公司自掏腰包，而且钱就要用完了。这个项目每天的花销为500万美元。这其实就变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要赶在公司失去债务偿还能力之前交付飞机。

乔·萨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中包括面临很多的削减成本的压力。“管理部门认为，我这里的工程师太多了，可以削减1000名。可事实上，我不仅不能削减，反而还需要再加800名工程师，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场灾难。在某些时刻，你需要大胆迈步，去击球，不管这是一记什么球。我得做出决定，应该说出真相，我觉得那可能是我在波音公司的最后一天。”最终的结果比想象的好，乔·萨特保住了自己的工程师，但交付期限没有改变：在4年的时间内必须让747问世。

1969年2月9日，世界上第一架宽体民用飞机747出现在了跑道上，准备开始首飞。没有人见过如



此大的飞机升上天空，对于任何一家飞机制造商，无论他们多么信心满满，但当轮胎离开飞机跑道时，才是真正的考验。747的尺寸产生了轰动效应，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和航空公司客户都蜂拥而至，他们想要目睹这架非凡的新飞机首飞。那是西雅图一个普通的清晨，有些雾气，有些潮湿。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然后起飞，完美无瑕。当747飞入天空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波音747代表了航空业的一切，科技、工程以及对创新的无限追求，都凝结在乔·萨特的巨型飞机里。747首飞之后的半个世纪，依然在不断生产，并在世界各地服役。这是天空中最易识别的飞机，是喷气飞机时代和全球旅行的象征，它改变了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与人的交流方式。

几年前，本刊记者在采访747-8的研发团队时，波音副总裁布鲁斯·迪肯森在谈起乔·萨特时充满敬



1. 1947 年，英国歌手艾尔顿·约翰在美国加州巡演期间和他的作词人伯尼·托潘在乘坐的波音飞机前留影。身后是随行的歌手、工作人员

2. 1968 年 9 月 30 日，美国华盛顿，首架波音 747 飞机出厂

3. 波音公司首席试飞员特克尔斯·约翰斯顿

意：“毫无疑问，他是 20 世纪伟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1966 年，乔带领项目组成功研制出世界上首架大型宽体远程喷气式客机，波音公司取得的伟大成就与他以及他的团队密不可分。”在乔·萨特退休后的 20 多年时间里，波音公司一直为他保留着办公室。“即使到了现在，乔还时常来到办公室询问进展状况，我每个星期至少跟老先生交流三次，他给年轻的工程师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他有时候还会来到工厂的办公室，

聚精会神地看着 747-8 飞机在流水线上的组装过程，有时候一坐就是大半天。”

波音 787——新世纪的梦想

今天，飞机的研发和制造几乎被两家公司所控制，它们是波音和空客。在过去 20 年中，空客和波音一直在挑战对方，不断挑战极限。不管对哪家公司而言，



1967年10月16日，美国波音公司的三位工程师在讨论设计图纸

当决定制造全新飞机时，所面临的风险都是前所未有的，2000年波音就处在这样的时刻。

空客宣布自己要制造最大的喷气式客机A380，这是一架拥有双层客舱的飞机，直接挑战波音最具代表性的747。要打造出什么样的飞机和空客竞争呢？波音研究发现，旅客和现在的航空公司其实是在寻找一架可以低成本长途飞行，并直接把他们运送到最终目的地而无需中转的飞机。波音把这种飞机称为“音速巡航机”。音速巡航机与现存的民用喷气式飞机有很大区别，它拥有三角翼，后置发动机，前面有两个小的前翼，它的机身是由复合材料而非金属制造的。它是为快速飞行打造的，能以接近音速的速度飞行。这引发了业界的想象，航空公司有两个需求：一是飞机的速度提高20%，就可以满足乘客所需，更快地到达某个地方；二是，如果速度提高20%，理论上所需的飞机数量就少20%。

速度的提高是有代价的，波音上一次把速度作为首要追求的尝试是在20世纪60年代研发超音速运输机，但研发始终停留在全尺寸模型状态。问题在于，

一旦把速度提高到那个水平，飞机就变成了“油老虎”，而燃油成本是所有航空公司始终关注的问题。航空公司告诉波音，他们想要一架既能长途飞行，又可减少燃料消耗的飞机。这样一来，就得牺牲速度等性能。

波音不会再在速度和大小上下注，他们看到了对超级省油的中型客机的需求市场。波音公司把这架飞机称作“787梦想”，他们所构想的这架飞机最多能搭载335名乘客，以传统速度飞行，但它却拥有很多原先用于音速巡航机的先进科技，在飞机设计方面的大胆程度几乎是向未来跳跃了两代。

波音787梦想飞机将不再用金属制造，而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这是一个带有革命性的飞机项目，波音公司对设计和制造787的研发成本进行了预估，结果超过了100亿美元。波音决定寻找战略伙伴，以便将研发成本的40%分摊到多个供应商那里。787创新的地方不仅在于业务外包，这也是一次既可分担风险，又可以降低成本的尝试。简而言之，波音向供应商提出想法，然后让供应商去设计零部件。波音选择了一些公司来设计和制造大型部件，这些合作公司承

担设计部件、创造新工装和设备，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和成本。

最大胆的创新在于一个新的加工工艺：长长的碳素纤维带被机器人设备以精确而复杂的模式铺设出来，形成确切零件的形状，比如机翼或者机身；接着，巨大的部件被运送到一个称为热压罐的超大密封室内，在热力和压力的作用下硬化，就像是把飞机放进了烤箱里。预制部件从巨大的热压罐中生产出来，这之前需要几百张铝板、上万铆钉，耗费无数个工时才能完成。

2004年4月，日本全日空公司决定购买50架787，正式启动了787项目。更多的订单接踵而来，航空公司收到承诺，新飞机将于2008年初打造完成。波音公司当时出售的是设计，然而，距离交付真正的飞机只有不到三年时间了。

波音的最初规划是成为系统集成商，从全球供货商那里收集零件，这样波音就可以在三天内把787“扣合在一起”。这无疑是航空制造商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把世界各地制造的庞大部件运送到一起？多年来，波音737的所有部件都是在堪萨斯制造，然后通过火车运送到华盛顿州的总装配工厂。但787的零件来自大洋的另一边，来自四大洲。

4架747被改装成了“载梦者”大型货机，这几架“巨无霸”有着加大的机身，以及横向开启的机尾舱门，它们在世界各地飞行，运送机尾、机身、机头、机翼等部件，把这些零件运送到美国的总装工厂，其中一个位于华盛顿州的埃弗里特，另一个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其他大型零件，比如发动机和起落架，是通过陆地和海洋运输，这些零件在送来的时候都已经预装了所有系统和线路。

拥有全球化的供应链，供应商的责任比以往都要重大。未经检验的制造模式，以及整套的新技术，这些都让波音787在制造中与问题相伴：有个供应商提供的合成蒙皮出现了褶皱；机尾一个部件上的紧固件被错误安装；本应紧密连接的两个结构中间出现了缝隙；还有一些部件在送到装配工厂时并未完工。

波音有自己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也有合作公司，以此类推。不同文化和交流的问题是一大挑战，这就更加剧了它的复杂性；而且不仅是供应商出现问题，离第一架波音787的交付期还有几天的时候，波音发现了自己设计中的一个缺陷，机翼和机身连接处的压力超出预期，这迫使他们重新设计，交付时间被进一步推迟。

到了2007年底，波音公司面临梦想飞机延期交

付、赔偿以及名誉受损等问题。为此，波音组织了一个团队，向意大利、南卡罗来纳州、堪萨斯州还有日本派去了数百名工程师，以解决供应链出现的问题，对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个供应商的介入变成了永久性的，波音最终用超过10亿美元买下了它们。

2007年7月8日，波音787下线简直就是一次好莱坞式的出场，在华盛顿州埃弗雷特波音总装厂，波音员工、航空公司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政府和社区官员等大约1.5万人出席了庆典。在787飞机下线前，波音公司在美国人非常喜欢的7月7日举办了一场极具观赏性的体验飞行活动，在距西雅图不远的波音飞机交付中心，各种型号还在销售的波音飞机按照编号和时间顺序依次出场。7点07分，波音707起飞；7点37分，波音737起飞；7点47分，波音747起飞；7点57分，波音757起飞；法航预订的777飞机是最后一个起飞的。

2009年12月，梦想飞机终于实现首飞。2011年9月25日，波音向全日空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梦想飞机。很快，其他航空公司也陆续收到了787客机，这架飞机终于开始服役了。787飞机内饰设计的各个方面都体现了波音的研究结果，客舱的顶部做了一些处理，让它看上去像是一个圆顶，这让乘客感到进入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而不是进入一个圆筒；舷窗的尺寸显著增大，可以通过按钮控制透光度，从透明到全暗需要约一分钟，航空公司可以很好地控制机舱内的光线，当乘客早晨醒来吃早餐时，灯光就会变得像黎明时一样。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787让航空旅行变得更加有效，乘客会感到更加舒适。因为机身采用了复合材料，787不再担心受到腐蚀的困扰，可以将客舱空气湿度从大约3%～4%增加到10%～12%，这样乘客就不会觉得干燥。因为复合材料比铝更加坚固，因此客舱内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787内部空气的压力更高，这会让乘客呼吸顺畅，减少旅途疲劳。

关于辐射型航线的争论基本结束了，人们不想在枢纽站转机，点到点的理念占据了上风。这是由商业策略、技术和常识所驱动的。当第一批787投入使用后，波音在更小、更有效的飞机上的赌博，成功预测了空中旅行的趋势。

百年波音意识到，在高风险的民用航空业中，每次成功都来之不易，有些会永远地改变世界的旅行方式，就像787一样，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飞机之一，虽然它的诞生历经波折。□



(宋连峰 摄)

波音的中国故事

主笔 李三

关于飞行，有很多浪漫的演绎。听国航讲述波音的故事，不止于浪漫。

波音的中国之缘

波音与中国的长期合作始于现代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带领庞大的随行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搭乘的就是一架波音707飞机。访问之后，中国订购了10架波音707，这是波音与中国航空紧密合作的开始。

事实上，在波音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说到和中

国的关联，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王助。王助出生于1893年8月10日，1915年受北京政府海军部派遣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飞机制造，1916年6月王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取得了硕士学位。这一年，威廉·波音在西雅图创立了太平洋飞机产品公司，但作为其合伙人的海军工程师威斯特韦尔德此时却接到了归队命令。在离开西雅图之前，威斯特韦尔德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写了封信，希望他能给公司推荐一名毕业生。王助就是这名被推荐的学生，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也因此成为波音飞机公司首任工程师。

B&W-1是波音公司的第一型飞机，因起飞与着陆成功率很低，销售不佳，王助加入波音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架飞机进行改进。他没有辜负波音的期盼，

仅用 5 个月时间，就在 B&W-1 飞机的基础上设计出一架双浮筒、双翼的 B&W-C 型水上飞机，并于第二年成功通过了试飞。B&W-C 型水上飞机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注意，他们认为这种飞机兼具巡逻艇和教练机的双重功能。于是，这段故事就有了这样的结尾：一份来自美国海军价值 57.5 万美元的 50 架 B&W-C 型飞机的订单落在波音公司手中。正是这份订单所带来的第一桶金，波音公司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该机还承担了邮件和货物运输任务，并作为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被载入史册。

如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场，在几代人结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波音也与中国建立了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正如波音公司董事长、总裁丹尼斯·米伦伯格所说，毫无疑问，波音的未来依赖于与中国的成功合作。

波音预测未来 20 年内，中国将需要 6330 架新飞机，中国也将因此成为波音民用飞机最大的客户。中国运营的所有民用喷气机中，超过 50% 是波音飞机。40 多年来，波音向中国市场交付了 1000 多架飞机，中国是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首个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国家。

就工业合作而言，波音是中国航空工业最大的海外客户。目前，超过 9000 架飞行在世界各地的波音飞机上都安装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组件。作为波音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了所有波音机型的制造，包括 737、747、767、777 和最具创新意义的 787 梦想飞机。

一代代飞行员与迭代的飞机

2014 年 10 月 9 日，是波音 747-8 客机正式入列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大日子。这一天，国航退休飞行员周殿卓应邀前往西雅图波音工厂，同为国航飞行员的儿子周大宁则受命将 747-8 客机飞回中国。

入列仪式上，周殿卓、周大宁父子俩身着深蓝色的飞行员制服，同时出现在现场。在驾驶舱内，周大宁注意到退休的父亲本能地拨动着开关，启动各种程序，他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飞行早已成为这个家庭重要的内容。波音 747-8 把两代人聚集到一起，也把无数的记忆片段串联起来。两代中国飞行员，历经近半个世纪，从老式苏制飞机到最先进的宽体民航机，他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的变迁。

如今 68 岁的周殿卓回忆起自己的飞行经历，他

说几乎就是波音 747 在中国的飞行史。上世纪 80 年代，时值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民航被赋予架起中外沟通桥梁的使命。波音 747 是世界上第一款可以跨洋飞行的远程宽体客机，是人类民航史上里程碑式的传奇，自然吸引了中国的目光。1980 年 2 月，国航的前身——民航北京管理局引进了波音 747SP 型飞机，国际远程航线从此开启。

1981 年 1 月 7 日，民航北京管理局使用波音 747 飞越太平洋，开辟了中美第一条航线：北京—上海—旧金山—纽约。在旧金山，时任女市长在致辞里留下了充满诗意的一句话：中美通航使漫无边际的太平洋变得像一条河。

中美航线的首航机长是那宝恩和尹淦庭，他们收到了旧金山管制中心主任赠送的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机组的飞行过程。他们的飞行被美国同行评价为：好的通话，好的进近，好的落地。

当时的机组乘务员刘玉梅还记着当年第一次去唐人街的情形：“见到华人特别亲切。他们问我们是从香港还是台湾来的，我们说是从北京来的。很多老华侨听到后又惊又喜，一下子冲了过来，抓住我们的手失声痛哭，那个场面，直到现在还让我忍不住想流泪。”中美开航后，中国民航走上了快车道。1981 年 4 月，中国民航又开辟了北京—洛杉矶航线，令美国航空界



左图：中国民航从美国进口的一架波音 747SP 大型客机，从 1980 年 3 月 24 日起入役航班。图为波音 747 客机的乘务员为中外乘客服务

右图：波音公司首任工程师王助，他成功设计了 B&W-C 型水上飞机



国航飞行员周殿卓与周大宁父子在驾驶舱

(沈铁 摄)

人士对中国民航刮目相看。此后，747-200型飞行引进，西欧、北欧及俄罗斯等城市陆续直航，形成了以北京通向世界五大洲的航空网络。

1988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立，同年，波音推出了747-400型客机，开启了一场驾驶舱的革命。与过去747家族的飞机相比，波音747-400航程更远、燃油效率更高，噪声和运营成本更低；同时，该机型全面采用了电传系统，先进的电子显示屏代替了老式的仪表，飞行员从操作者变成飞行计算机的管理者，机组也由“五人制”改为“三人制”。新的操作模式，对于国航的飞行员是巨大的考验，仪表上的信息全部用英文显示，也给一代飞行员提出了挑战。45岁的周殿卓开始攻关，他在家里厨房、卧室贴上英语便条，一边做饭一边背单词，驻外的时候休息时间也几乎都用来背英语。第四次英语考试，他终于过关，终于有资格担任747-400机长。

波音747以独特的双层结构所带来的“大奔儿头”外观为人熟知，也因中美开航、海湾撤侨、极地飞行、生物燃油试飞等重大事件深深嵌入了中国民航的历史。

这些往事，周殿卓有些亲身经历，有些多次听同事们提起，说起来都是如数家珍。他现在退休居住在机场附近的生活区，他说：“在小区上空过飞机，看见凸个头的飞机都很激动，很多回忆……从707飞到747-400退休，不亏此生。”

从小泡在飞行员堆里的周大宁两岁就被父亲带上飞机，当飞行员可以说是他与生俱来的梦想。“我从

小就是听着飞机引擎声，看着我父亲这些飞行员穿着制服、威风神气的样子长大的，我想不出自己除了当飞行员还能干什么。”1995年，周大宁在航校第一次自己驾驶飞机，毕业后，通过考核成为国航飞行员，2002年他成为国航机长。他当飞行员时，波音747-400已经是国航主力机型。

这些年，周大宁飞过传统的737，后来飞737NG，还驾驶过BBJ公务机……国航硬软件系统频频升级，周大宁成为从747-400机型改装到747-8的第一批中国飞行员。

说到747飞机家族的优点，周大宁就像说起特别靠谱的兄弟：“747这个飞机，它的安全系数确实高，你看它每一次换代都显得偏保守，周期比较长，但是验证特别扎实。扎实、可靠性，就是747的招牌。”

从事了37年维修工作的肖南也有同感，他现在是国航上海维修基地的主要负责人，刚参加工作时他是中国民航首批进行747机型改装的机务人员，在747机型运行早期做了较长时间的跟班放行工作，从SP机型一直维护到747-400机型，他经历了所有747在国内的机型。在他而言，机型的变化是记录时间流逝的另一种方式：“波音747的技术确实进步得很快，从SP到400，完全变成电传系统，差异很大。在400之前，我们有时候在执行完任务后，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会在一起交流一下。后来引进400，我们和飞行队形成了一个空地交流会制度，分享经验、研究问题，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制度。”

回顾关于747机型维护的几十年，肖南有许多心得体会：“一开始我们都是去波音学，人家都是专家，我们是学生。后来时间长了，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也开始跟他们讨论、提建议，在工作中总结经验，在波音的手册上增加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

飞越北极是一个颇具挑战的经历，当时中国民航飞越极地的难点主要有三个：途中通信设备会受到磁场干扰、备降场少、天气寒冷燃油易结冰。肖南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航做了大量技术准备，专门编写了用于指导极地飞行的《极地运行航线验证实施方案》，制定了包括北极航路选择、运行控制、通信导航、后勤保障等在内的一整套实施方案，组织飞行、乘务、运行控制、机务等有关方面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培训和演练，对飞机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检查和改装；在手册中规定，每次飞行前，必须进行燃油冰点测试。“这些措施，最后保证了极地飞行的成功。”

2013年12月29日15点36分,CA1873航班在武汉天河机场安全落地,国航飞行总队三大队刘丹丹,作为B737-800机型首位单飞女机长圆满完成了首航任务。

刘丹丹1985年出生,2004年被国航招入民航大学飞行技术专业,2008年毕业并完成B737-800机型初始改装训练,随后进入国航飞行总队第三飞行大队。5年之后,她从一名飞行学员成长为单机长。2014年3月5日,波音民用飞机集团的总飞行师、女机长琳达·欧莱迪和刘丹丹有过一次对话。这位驾驶过波音737、747-400、757、767、777、787以及空客A319、A320等机型,同时还拥有直升机驾驶执照的传奇女机长真诚地向刘丹丹表示祝贺。

回忆起高中时看到国航不限性别的招飞简章,刘丹丹感慨自己的幸运,她说,我觉得飞行是非常神奇的事儿,你可以从来没有接触过它,但只要沾了一点边,只要有一点念想,就会迷上它,根本不需要预热,一下子就会融入你的血液当中。

第一次飞行的感受是那样奇特,每当回忆起来,刘丹丹都是一种享受:“之前上过一些地面准备课程,并且有很多的理论知识,也都有一定的基础,但当教员第一次把飞机拉起来,第一次感受飞行,觉得地面跟书上写的一样,地面都变小了,人也变得像蚂蚁一样,都回到了书上。但是再飞一会儿就离开了书本,有了立体的感觉,身体几乎完全悬空,感觉非常奇妙。那一路的奇特景色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或许,这就是飞行的魅力,是即使在地面风驰电掣也无法替代的翱翔的感受。

在国航,可以听到很多关于飞机、飞行的故事,那些过往的典故在亲历者的讲述里总是栩栩如生,国航B-2059号的退役飞行就是其中一件。

2016年3月26日19时,执飞CA1313/4航班的国航B-2059平稳降落在了首都国际机场,那是它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她是国航引进的第一架波音777-200型双通道宽体机。从1998年10月28日入列直到退役,B-2059已在国航机队服役18年,总飞行时间45.8122万小时,完成起落1.9128万架次,这在全球同类型机队中名列第一位,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安全新纪录。”

在一篇记录退役飞行的内部回忆文章中,这架飞机被称作“她”,而不是“它”。有一段文字生动记录了国航B-2059的退役之飞,对局外人而言,这不过是国航机队正常的新老交接,但对国航而言,那是一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执行国航B-2059最后一班飞行任务的飞行机组分别是飞行总队六大队教员戴宁、杨锋,以及副驾驶韩远峰,巧的是,戴宁和杨锋都曾是18年前迎接B-2059回国入列的首机组成员。“我们共同执飞过一个又一个的航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起落,更陪伴着她从引进到退出。我们要陪伴她完成最后一次完美巡演!”18年相守相伴,作为“蓝祥云”在国航生涯的见证者,他们的话语间流露出留恋和不舍。

19点22分,M07机位,“蓝祥云”在飞机地面引导员的指挥下,滑入机位。

“驾驶舱,您好!我是地面,飞机轮挡已挡好,请您松刹车,辛苦了!”

“飞机状态很好,刹车已松,圆满完成任务,大家辛苦!”

.....

守候在机位上迎候飞机的是Ameco北京基地长航程飞机分部波音科机务杨海光。为了接B-2059飞机,他还特意理了发,刮干净胡子,穿上一件新工作服,提前来到岗位上做好接机准备,他是想用最饱满的精神最后一次“接”她回家。当晚,杨海光和同事们按照工卡逐项为B-2059飞机执行了航后工作。3月27日凌晨3点,航后工作全部结束,杨海光戴着崭新的白手套,庄重地为B-2059飞机关上了机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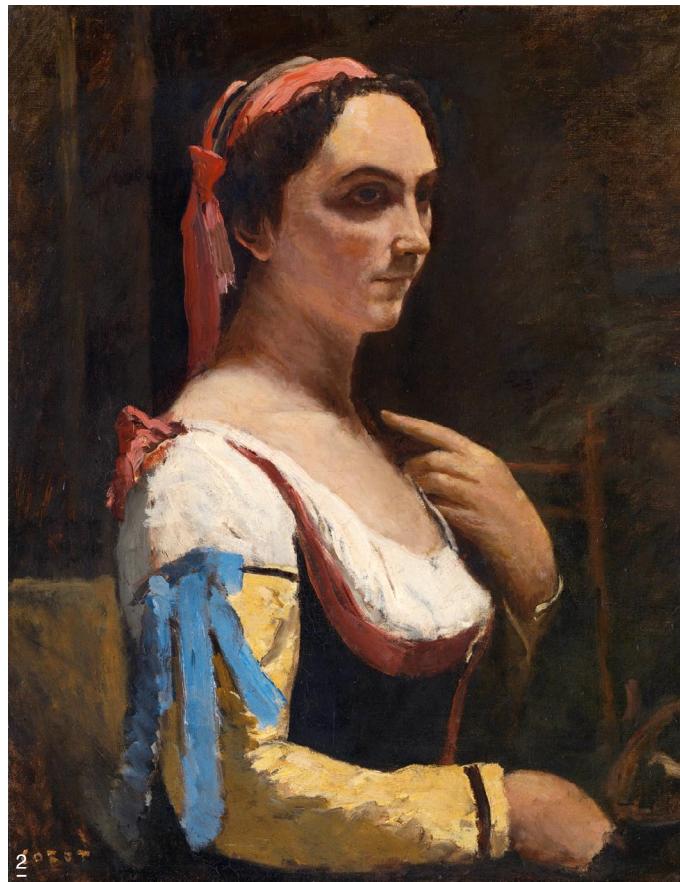
由B-2059及其后续引进的9架波音777-200飞机共同组成的国航波音777-200机队,在国航的中、短程航线运营中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国航一个时期的代表性机型。在B-2059的飞行日志中,赫然记录着“5·12”抗震救灾、APEC会议运输、利比亚撤侨、北京至台北两岸直航等多次重要运输保障任务。在飞行的6000余个日子里,她伴随并见证了国航机队乃至中国民航的蓬勃发展与进步。

加入星空联盟之际,国航曾对777-200机队进行了客舱全方位升级改造,改装后的飞机为三舱布局,即公务舱、豪华经济舱和经济舱,与星空联盟其他公司波音777机型客舱布局达到一致,从而将国航带入全新的市场领域。B-2059也是国航第一架波音777彩绘飞机。2009年,蓝色与金黄色交织的祥云主题彩绘代替了她原有的白底蓝条的国航传统涂装,稳重又不失鲜亮,让人过目难忘。由此,她成为国航机队中为人熟知的“蓝祥云”,也被飞行爱好者们亲切地称作“水深号”。□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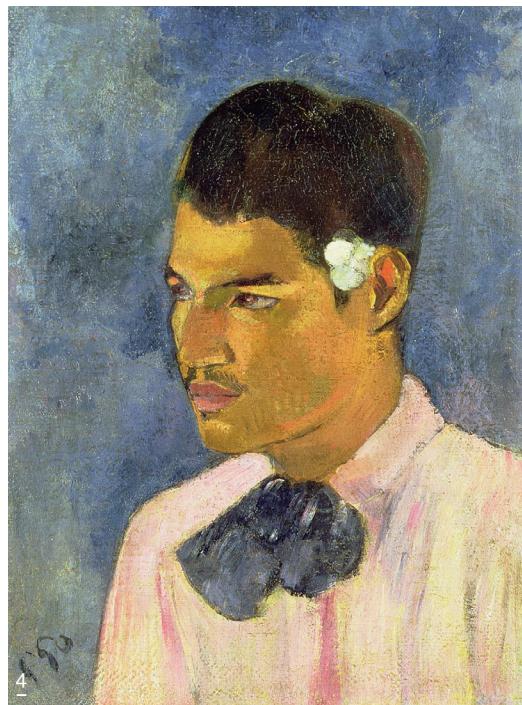
1. 印象派画家德加收藏的法国 19 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名画《鲁杰罗拯救安吉利卡》



2



3



4

画家的藏画：谁是谁的热爱？

文 曾焱

当一位大画家倾心去拥有另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他们的收藏和博物馆、画廊的收藏有什么不同？谁是谁的热爱？谁又几乎是所有画家的热爱？他们自己的绘画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受其藏画的影响？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6月21日，正好赶上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的大展《画家之画：从弗洛伊德到凡·代克》（*Painter's Paintings: from Freud to Van Dyck*）开幕。这是2016年早就令人有所期待的一个展览，国家画廊据称为此策划和准备了4年时间。80多件作品中，既有他们压箱底的馆藏，也有从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借来的宝贝，有画作甚至说是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20年之久。

从弗洛伊德开始

放在中国绘画史里，其实“画家之画”这种话题没有多么特别。以中国文人传统，艺术鉴赏从来讲究私藏和私赏，除去拜师，递藏是习得书画和精进技艺的重要途径。“雅集”就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聚会形式，尤其北宋李公麟绘画、米芾题记的驸马王诜的“西园雅集”，成为后来历代画家摹绘的母题。雅集主人多为书画大家或文坛领袖，选个合意的日子，将同门好友召集到宅第花园，摆酒吟诗，谈书品画。主人手里若是没有几件值得观赏的收藏，怎能应付得来这样的场面？所以大画家兼为大藏家，或藏而优则画，在中国古代都很寻常。研究中国文人书画风格，也要论及他们的收藏脉络。像明代书画“吴门四杰”之一的文徵明，他和他的后人都是名倾几朝的大收藏家，而吴地巨富项元汴，家族收藏可比皇家，子孙中如项德纯、项圣谟等人，日日在家揣摩古今名作，自己也成就为一代书家和画家。

但在西方，画家和宗教在早期所形成的供养关系，教堂在艺术传播中充当的公共空间的角色，以及18世纪开始萌生的博物馆公共收藏体制，都使得西方画家和他们的个人收藏之间没有那么显性的关系，相关记述多见于艺术家传记或者个展资料中，而很少有像伦敦国家画廊这次的《画家之画》，以倒叙索引的艺术史研究方式——从20世纪的弗洛伊德（Lucian Freud）、马蒂斯（Henri Matisse），一路回看到19世纪末的德加（Edgar Degas），19世纪中期的莱顿（Frederic Lord Leighton）、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和劳伦斯（Sir Thomas Lawrence），18世纪的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以及17世纪的凡·代克（Van Dyck）——通过八位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画家的个人眼光，将欧洲绘画在近三个世纪的变化线索呈现出来。

展览开篇是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藏画。他死于2011年，生前提出将自己收藏了10年的柯罗画作《意大利女人》（*Italian Woman*）交给伦敦国家画廊保存。弗洛伊德有不少名画收藏，包括19世纪末法国印象派时期的德加和塞尚、英国19世纪的康斯坦布尔，也有他同时代的画家好友培根和奥尔巴赫。但这幅本身肖像《意大利女人》无疑是展览中最迷人的一幅。馆长加布里埃尔·费纳尔迪（Gabriele Finaldi）透露，《画家之画》展览的想法其实就源起于弗洛伊德的这一捐赠：当国家画廊在2012年最终迎来《意大利女人》入馆的时候，目睹原作的人都惊叹它的不同凡响。柯罗通常被认为是法国18世纪枫

丹白露画派的代表，收藏家都渴慕他的风景画，但弗洛伊德的这件收藏却让人看到，柯罗的人物也如此简朴而完美。策展人安娜·罗宾斯（Anne Robbins）介绍，弗洛伊德是在2001年一场拍卖会上买下它，柯罗对人物体积感的表现以及令人意外的粗粝笔触都让他印象深刻而无法舍弃。《意大利女人》回家后，弗洛伊德将它摆放在他顶楼的休息室里，和奥尔巴赫的画、德加的雕塑相对，他每天躺在床上都能看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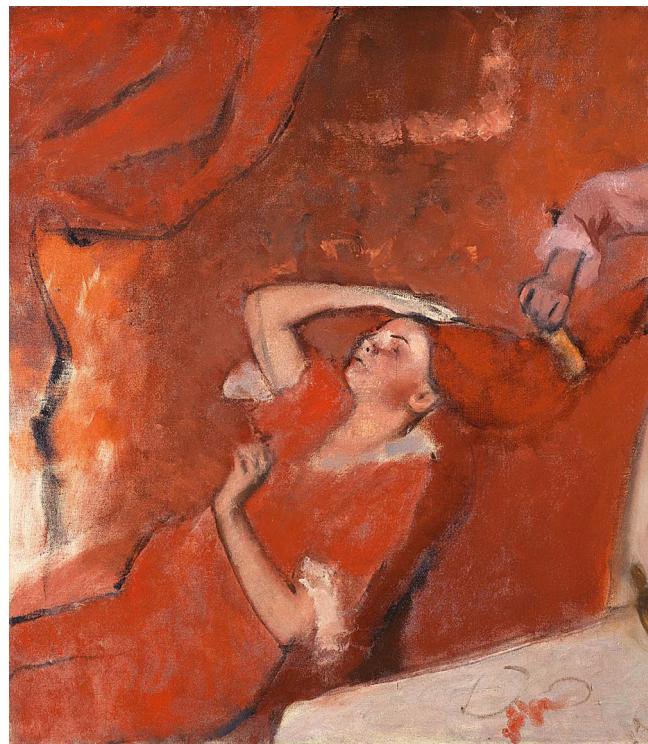
“对于画家而言，拥有一件画作，意味着最深层次地与之相处，并在过程中发生一种亲密的、极其强烈的创造性对话。”罗宾斯于是想到要做一次盘点，看看在全部馆藏里有多少画作是像《意大利女人》一样，入馆前属于画家们的私人收藏，或由画家推荐购藏。这份清单出来后是令人惊讶的，竟有70多幅，其中多数曾为大师拥有。

狂热的德加

展出的8个“画家之画”，最狂热的收藏者大概要数印象派德加。馆藏中至少有14件德加的私人藏画，这还不包括他生前一直留在手中不愿出售的7幅自己的画作。这批馆藏几乎全部来自1918年巴黎的一场拍卖——在德加去世后一年，他的收藏就被人送到了拍卖行。

与德加藏画一起陈列的，还有老照片，拍摄的是当年他家起居室的陈设。德加的购藏主要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从那些挂在墙上、每天围绕着他的画作来看，德加的品位很高、视野比较宽阔：除了几件早期古典大师作品，他偏爱的显然是19世纪上半叶的大师杰作，比如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虽然一个新古典主义，一个浪漫主义，风格相差甚远。

对同时代人的画作，他偏爱马奈和塞尚。他也买了很多其他印象派画作，但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热爱之外，也有情谊的因素。在印象派团体中，德加会参加一些咖啡馆聚会，但和其他画家的生活交集并不多，因为阶层差距太大。他出身富裕，一向衣食无虞，不需卖画为生。他不算外光派，对风景和光线兴趣寥寥，所以也较少和其他画家一起去巴黎郊区或法国南部写生。但他对依靠卖画生活和创作的朋友都尽力帮衬，尤其是对比自己年轻的画家，方式就是在他们最困窘的时刻，买他们的画。后印象派画家卡米耶·皮萨罗就回忆道：德加在帮助那些缺钱的艺术家时如此善意和细心。他帮过高更，在展览上买他的画。还有几位纳比派画家，像莫里斯·德尼、保罗·塞律西埃、皮



埃尔·伯纳德和爱德华·维亚尔，他也像对高更一样待他们。画家之间有互换作品的习惯。德加藏画部分，有几幅就是如此得来，像那张印象派女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的《梳头的女孩》，是他在1886年第八届印象派画展上，用自己一张色粉画——《盆中洗浴的女人》换来的。

德加和巴黎很多艺术经纪商关系不错，他也因此便利，用自己的画作去交换他们手里的其他名画而无需偿付现金，通常是估算一个价格，然后留下自己几幅价值相当的作品。1895年，他从经纪商蒙特涅克（Montaignac）手里取走一幅德拉克罗瓦的肖像画《史温特男爵》（Baron Schwinter），交换条件是他自己的三幅色粉画，总估价1.2万法郎。另外他还有两幅重要收藏——马奈《抱猫的女人》，以及曾被禁公开展出的《处决马西米连诺皇帝》的残片，都是他用自己作品换来的。名作《处决马西米连诺皇帝》有油画和石版画三个版本，其中油画在马奈去世后不知下落。德加想要把好友的这幅画重新合体，他让经纪商沃拉尔帮他找到两段残片，是原画面的中央部分和左下方的马西米连诺的下半截身子，并说服对方四处打听，又买回另外两小段。我们现在伦敦国家画廊看到的大画由四



左图是马蒂斯 1918 年左右收藏的德加作品《梳发》，右图是他自己 1919 年的画作《漫不经心的阅读者》。研究者指出，从这两幅画中，可以看到一位画家为什么会渴望拥有另一个人的画，以及藏画对他们自己的绘画发生了什么影响

块拼接，画面中央几个持枪的士兵群像基本接近完整。

从以上画作的购藏时间可以看到，德加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简直就是巴黎艺术市场的疯狂买家。他的雕塑家朋友阿尔伯特·巴索罗姆在给另一朋友的信中写道：“德加一直在……买，买。每天晚上他都自问该如何为白天买的那些东西付账单，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开始了。”人们都听说了德加的癖好，开始在拍卖中和他抬价，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德加看上了什么，他会不惜代价要得到。

多变的马蒂斯

不止一部回忆录里提到毕加索和马蒂斯在 1910 年后逐渐失和，但在展览的马蒂斯藏画中，我们却看到不止一幅毕加索作为私人礼物的馈赠。两个大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是对手、目标，也还是朋友。

1941 年，巴黎“二战”沦陷期，移居法国南部尼斯的马蒂斯将自己一幅素描送给身在巴黎的毕加索，致谢老毕帮他照护滞留巴黎城中银行金库的财产。一年后，作为回赠，出手大方的老毕把自己两幅立体主义肖像作品《多拉·玛尔》送给了老马。这两

幅画被马蒂斯挂在他租住的尼斯雷吉纳旅馆 (Regina Hotel) 的房间里，和那段时间他拥有的塞尚、德加和库尔贝画作在一起。

马蒂斯的收藏习惯和弗洛伊德、德加不太一样。他的眼光和趣味总在变化，并在自己进入新的风格变化时寻求不同的画作，所以他的收藏数量很小，并极少长久保存藏品。他频繁和经纪商交易，就算曾经不计代价得来的画作，如果为了买进他更喜欢的新东西，或者仅仅为了获利变现，他也舍得出手卖掉。展览中有一幅从私人藏家手中借展来的高更——《耳后戴花的年轻男子》(Young Man with a Flower behind His Ear)，是马蒂斯 1900 年从巴黎著名画商沃拉尔手中买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足够的钱，为此不惜分期付款，据说还典当了他送给妻子的结婚戒指。高更此作画幅很小，画的是他 1891 年第一次去到塔希提岛时认识的一个土著朋友：年轻男子面目英俊而单纯，在耳后别了一朵白色栀子花，和他的褐色皮肤、粉红衬衫和黑色领结，以及后面的蓝色背景形成丰富层次。马蒂斯看到这幅画时，被它的色彩和线条迷住了。他那一时期的绘画也从中受到影响。但到了 1908 年，他便准备出让当年千方百计得来的这幅画，试图用它

去交换雷诺阿的一幅慵懒的女人像。到1915年，他终于卖掉了这幅高更画作。

另一个故事是1899年，当马蒂斯在沃拉尔的画廊里第一次看到塞尚的《三浴女》(Three Bathers)，他立刻对自己刚付钱买下的凡·高那幅《阿利斯康墓地》兴味索然。

刚搬到尼斯的时候，他手头窘迫，但仍然倾囊而出，200法郎买了一幅塞尚的画，而当时这是他和妻子一个月的全部生活开销。当然，这幅画后来也被出售了。

德加的《梳发》(Combing the Hair)是马蒂斯保藏时间较长的一幅。这件作品本身也有点传奇性。1918年，伦敦国家画廊曾经从巴黎那场德加拍卖专场买下了这幅画，后来觉得画质粗糙，又从馆藏中清理出去了。马蒂斯很快从经纪商手中买到这画，一直收藏到1936年，才通过儿子皮埃尔在纽约开的画廊转手出去。有意思的是，买它的下家仍然是伦敦国家画廊，时任馆长克拉克(Kenneth Clark)亲自选中了它。

马蒂斯在拥有这幅画的16年里，从来没有谈论过它，但伦敦国家画廊的专家认为，马蒂斯二三十年代的室内画不排除受到德加这幅画作影响，比如对织物的描摹，对橙色和红色在画面中的大胆使用。他们展示了一幅从伦敦泰特美术馆借来的《漫不经心的阅读者》(Inattentive Reader)，是马蒂斯1919年的作品。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买了德加的《梳发》。

当然，没有任何一幅藏画可以比得上塞尚的《三浴女》在马蒂斯心中的位置。它对马蒂斯的艺术带来了本质的改变，让他学会“像雕塑一样绘画”，并且这种影响持续一生。1936年的时候，马蒂斯说：“37年来我一直拥有这幅画……我从中找到了我的信仰，也获取了韧性。”

画家的“粉丝”情结

展览中有幅安格尔的油画《鲁杰罗拯救安吉利卡》(Angelica Saved by Ruggiero)，是德加最心爱之物。画题取自16世纪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名篇中英雄屠龙救美的情节，安格尔以此在1819年为卢浮宫画了一幅大画，但也许是这个宏阔场面的文学题材同时可以让他展示在绘画女性裸体方面的卓绝，后来他接连又画过几幅同题。德加拥有过的这幅，曾经属于安格尔密友弗雷德里克·雷塞(Frederic Reiset)的私藏，此人做过卢浮宫素描馆和绘画馆负责人，是名望极高的一位学者，去世后收藏被拍卖，德加不计代价地拍得了这幅久慕的画作。

出于对安格尔和这个画题的景慕，德加后来又设法购藏了一幅构图完全相同的安格尔素描，现在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在艺术史上，德加的舞女被认为和安格尔伟大的素描有一种承接关系，看来也是有据可循。

对德拉克罗瓦的画，德加同样狂热地渴望拥有。德拉克罗瓦年少成名后，几乎就直接站在了以学院派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他和安格尔各拥一个独立展厅，有点像是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擂。

而德加却偏偏同时是他们两个人的“死忠粉”。他开始收藏时，两位大师都还在世，他几乎利用一切人脉去寻找购藏两人作品的机会。他一生购藏的德拉克罗瓦作品仅油画就有15幅之多，更不用说其他色粉、素描和稿图。用自己三幅色粉画换得的《史温特男爵》，是德拉克罗瓦最优雅的全身肖像系列中的名作。德加曾在家中将此画与安格尔的那些优美的肖像作品放在一起，不知是否刻意为之。也许从两个对手看似无法兼容的技法和观念中，德加恰好找到了自己所要的。这幅画最后的结局也有戏剧性：1918年，德加的私人收藏被拍卖时，与伦敦国家画廊直接叫价争夺这幅男爵像的是巴黎卢浮宫，而伦敦国家画廊最后志在必得之势，可能和画里浓厚的盎格鲁元素有点关系：德拉克罗瓦画了一个巴黎社交圈里的花花公子，他的打扮和身后花园却完全是英范儿；另外德拉克罗瓦一直很喜欢英国19世纪画家托马斯·劳伦斯的肖像画，为此1825年曾到伦敦拜访，回巴黎后就画了这幅肖像。

被德拉克罗瓦仰慕的这位劳伦斯爵士也在“画家之画”的展览清单中。后半部分，他和另外两位英国古典绘画大师——沃兹和雷诺兹成为主角。但也许是英国绘画在17~19世纪始终无法和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相比，作为英国之外的观众，对这部分内容稍感平铺乏味。他们的收藏偏好大都指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米开朗琪罗、提香、拉斐尔，或稍后荷兰画派的伦勃朗和佛兰德斯画派的凡·代克。

在展览的末尾，凡·代克和他“提香房间”(Cabinet Titian)的故事看起来是接近完美的。在画家去世后，他的收藏清单里共有19幅提香画作，它们大多是人物肖像，美而高贵。这些藏画意想不到地在凡·代克后来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他在画室里临摹的母本，也成为他在那个时代出人头地的资本。1627年，当法国路易十三王朝的摄政太后玛丽·德·美第奇到安特卫普造访凡·代克的画室，参观“提香房间”时，凡·代克的艺术人生在同时代人的眼里达到了巅峰。他和提香分享荣耀。人人都爱提香，不是吗？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 一个栖息之地

绘画..阿梗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 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白谦慎访谈：“审美”的疑思

记者 周翔

我们进入历史，用各种方法来解释它，我们比的不是谁发现真理，而是谁被大家认为更合理地解释了这个历史现象。



白谦慎

随着浙江美术馆的“真山难老·傅山作品展”最近拉开大幕，300多年前的傅山再次回到公众视野的中心。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等著作聚焦于明清之际这位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著称的书法大家，以学者的眼光穿透遥远的历史纵深，打开了书法史新的问题空间。这本出版于10年前的书，不仅在专业领域成为研究傅山的权威著作，在一般爱好者中也广为流传，甚至将白谦慎变得有点儿像傅山的“代言人”。

不过，白谦慎本人却并不认为傅山是自己学术研究的中心，或者说至少不构成他要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对白谦慎来说，傅山更像是一个“入口”，是讨论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探讨学术思潮影响之下的书法美学重大转折的合适人选。因此，书中主标题的“世界”与副标题的“嬗变”就格外重要，通过傅山，白谦慎讨论了清初金石学和碑学兴起之间的关联，以及碑学对此后中国书法的深远影响。确切地说，他对傅山的研究，不是单纯对于个体人物的传记式兴趣，而是将他当作“反映当时时代特征最恰当的人物”——“时代”及其“嬗变”才是他问题意识的真正焦点，其中往往包含了更复杂、更异质的现象。这些人物、事件、作品、时代所勾连起来的宏阔视野和错综关系，构成了他“艺术社会史”的研究，也反映在他关于傅山的另一本专著《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中。

2001年在重庆一个小镇上看到的理发店招牌“娟娟发屋”启发白谦慎写下《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一书，将此前更多对“史”的考察和在当下社会里的观察转为“论”的话题，讨论审美背后的心理和权力机制。在书出版之时，白谦慎曾表示这是一本比《傅山的世界》还重要的书，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看待。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虚构的一个故事——以著名书法家杨达和面馆伙计王小二为核心人物、充满荒诞色彩但背后又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的故事。杨达欣赏王小二的“素人之书”，而最终陷入困境。这让人想起，傅山在他的时代，不曾夸赞过没有经过训练的“猛参将”与“学童”之书？与傅山的问题一脉相承，白谦慎的讨论沿着碑学的发展一路往下，直击问题的核心：对“天趣”的推崇，是否自身正包含着艺术观念和审美标准无法自我解脱的矛盾？经典有标准吗？经典如何形成？背后有怎样的无意识，又有多少永远处于悖反的理论？

作为“入口”的傅山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写出傅山的专著之前，书法界对傅山的研究和对其书法的评价是怎样的？

白谦慎：山西关注傅山的比较多，因为他是山西人。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直毋安排”）的理论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也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他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艺术家，但是关注度有的时候是跟时代风气、环境有关。他的连绵大草现在我们关注比较多了，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的书比较流行，但就不见得过去大家不知道他。书法界一向认为他比较狂放。奇的这一面那时候倒没有完全被发掘出来，他喜欢写异体字，是我先提出来的。在我之前，关于傅山书法的书也有几本，他们可能更多是从书法本身的审美角度，当然也会涉及到一些历史；而我是从傅山的历史背景来讨论，历史观可能更强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傅山的交游与应酬》这本书里重点写了他与魏一鳌、戴廷栻这两个人的交往。傅山的交往面很广，圈子里不乏更有名的学者、官员，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作为讨论的代表？

白谦慎：历史的研究常常是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材料。就像敦煌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是因为它保留下来了，而你并不知道和敦煌同时代的长安壁画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让你写一篇唐代长安壁画的文章，你只能根据文献，基本没有任何视觉材料，很难写。傅山的朋友很多，但比如顾炎武和他的交往材料，就只有几首诗和笔记里面提到，没法写。而他和魏一鳌的交往有几十封信在，跟戴廷栻起码有100封以上的信，而且他们的文集经常互相提到对方。为什么选这两个朋友，就因为他们材料最多，足够拿来谈一个古代现象。根据这些材料，还可以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来拓展。傅山跟魏一鳌的交游主要是谈一个清代官员跟明代遗民之间的关系；戴廷栻经常帮傅山办事情，帮他卖字，我就从这里拓展出去谈应酬书法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应酬书法里面包含的人情世故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傅山写字时的很多状态，而不是空泛地谈书法与文人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您对傅山心态的揣摩很细致，是不是也有很多自己在现实里的观感？

白谦慎：是，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把艺术家给神化了。写傅山的那些心态，主要还是因为材料多，所以能够归纳出来。当然材料多了以后，你还得关注这个问题。过去也有人熟悉材料，但是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像八大山人、王铎的应酬书法，现在都有人研究了。应酬书法太多了，这是中国的主流。我在分析的时候一定是有现实关怀之下的观察的，他

留下来的东西你可以推测，今天的人情世故你也要了解一点。我们说读历史你要知人论世，历史和今天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人性往往又有相同的地方，这就允许我们在历史材料基础上做一定的推测。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傅山的书里带入了很多文化史、社会史、社会心理与文化结构这些维度的考察。您是从傅山进而一步步扩展到这些问题的，还是从这些问题的考察中反过来更理解了傅山，从而成书的呢？

白谦慎：很难讲是先有一个观念然后再去找材料呢，还是熟悉了材料再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两者是一种互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式，已经开始比较注重世俗的一面，但还是得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比较有把握地谈一些问题。所以熟悉材料非常重要，完全从理论出发就容易走入臆测，发挥得太远。我那时候基本采取的是以山西为主，扩及到傅山的朋友。北方当时的文化和南方比其实是差别比较大的，北方文风不如南方文风这么盛。在北方，山西读书风气不是很盛，经济也比较落后，所以同时代的文人留下的文集就少很多。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傅山是个著名书法家，他大量的信札、药方都被人当作书法作品保留下来，所以有相当丰富的资料，使得我能够根据这些资料来比较完满地描述当时的一个个案。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魏晋以前的篆隶在晚明清初成为新的书法学习的典范，背后是有总体的时代倾向和悬殊背景，但在大量的古碑文字中，傅山独爱“丑”“拙”“不衫不履”一类，他自己也知道，能够明白他的这种趣味的“同道”也不多。在您看来，他是否有一味求奇的倾向、追求与众人品味不同的一面？

白谦慎：他是有这个意图的。他反甜俗，甜俗就跟大众的趣味比较接近，所以要采取一种拉开距离的东西，“反俗”一直是他做区隔的一个方式。所以宁丑勿媚，是和一般流行书体进行区隔的方式。

他的这种审美是符合他本身的逻辑的：追求奇、追求惊世骇俗，发现里面的美。我们在研究艺术史或者审美心理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为什么爱这个？具体怎么解释，这个心理结构怎么产生，始终是一个谜。我们只能把它推进到某一步，知道傅山喜欢什么样的趣味，然后做出一定的解释，但是真正的为什么，始终是没法确凿说的。如果都能像科学那样解释出来的话，人文学科就不存在了。我们只能从一

般的推断来看它的合理性，这也是人文学科为什么可以有不同解释的原因。我们进入历史，用各种方法来解释它，我们比的不是谁发现真理，而是谁被大家认为更合理地解释了这个历史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随着碑学的兴起，推崇碑文以纠正一味尚帖的书法传统，在后来发展到了清末康有为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是否也有点矫枉过正了？

白谦慎：就是沿着碑学的逻辑越来越深入，倒也没有说“太”怎么样，你看印象派到毕加索也是越来越怪，人为什么走向这条路？不知道。但是你看到大家越来越能接受这种变形、怪的东西，达·芬奇那个时代不可能这么画。所以如果问到为什么，我们很难回答，只能做一个推测。但是这种推测本身有多大的准确性和说服力很难说。

谈论书法，不止于书法

三联生活周刊：碑学沿着自身逻辑发展到康有为这个观点，背后所涉及的书法创作、艺术理论问题在您的《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这本书里讨论得更深入。您对当代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书写的关注，促成了这本书。在日常生活中留心收集各种文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的？这些文字是否启发了您提出古今中外未受严格训练者的书写是“无古无今”这个概念的？

白谦慎：我大概从1992年开始收集这些文字。好多原因造成的这个判断，我那时候上了关于经典形成的一个课，同时也观察到国内一些鼓吹日常书写、“民间书法”的，慢慢地就观察思考到这些问题，2001年看到“娟娟发屋”这个牌子受到了启发，就开始做了比较完整的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的这些分析是不是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社会文化背景、书写者背景的维度，仅仅从审美趣味的角度来谈论书法时，会有显得过于主观、完全依靠阐释的危险？

白谦慎：其实不见得。中国古代讲“形质”，另外就是“神采”。形就是技术层面、物质层面的，神采就是意境、精神气质方面。这都是审美范畴的讨论，在中国有非常强的传统，就是非常纯地讨论审美和技法的传统。引进更多社会背景，反而是后来的。但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社会的因素，没有伦理的因素。从审美的角度也能谈得非常深入，但是这个要求的对话

者圈子就比较小，完全是有共同书写基础的。他们常常会讲一些非常内行的话，其实是非常启发人和贴切的，但如果你没有实践的经验和体会的话，你不太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就像音乐一样，傅雷给傅聪写信，你那个踏板要踩得重一点轻一点……你要是没有钢琴的经验，你哪里会知道这个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种审美系统里面，王羲之、赵孟頫等人的字是不是达成共识会更容易些，傅山的争议性就比较大？

白谦慎：对。像孙过庭说王羲之是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李世民讲王羲之基本上就是至善至美了，无论是形质还是神采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那就是说没有缺点。像这种比较接近“漂亮”，技法上又比较完整的书法，一般说来有更大的接受群。那么像傅山那种追求丑的，接受群就会小一点。傅山这个时代的趣味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也就是我们从过去的流美开始转向一个更加生拙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它就像西方的印象派，印象派也是和传统的古典比发生很大变化了，但一开始印象派的画基本还是美的，但到了高更、凡·高、毕加索，我们理解的美、那种感到愉悦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但是它有自己的一套。它的接受群体会少，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观在不断地扩大。经典也是很复杂的，有核心经典，有主要经典，还有边缘经典，经典是在流动的。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讨论一些人面对古代普通人与当代普通人的书写的不同态度时，您有一点嘲讽的意思，对吗？

白谦慎：就是一个反讽吧。说敦煌里面一个不会书法的小孩子的字是“神品”“神境”，在当代的马路上你敢这么说吗？如果用这种品评语言把它捧得高得不得了的话，马上就是王小二的故事提出的疑问：那么好，能参加书法家协会吗？写这些字的人根本就没什么书法训练。书法家这样说等于颠覆了自己，你练了半天不如不练的人好。这就等于把儿童绘画捧到了大师的高度。儿童绘画都是画得很天真浪漫的，稚拙，处于前文明时代，天趣十足。但你把天趣抬到了很高的地步后，你自己就给自己制造了麻烦——因为你失去的就是天趣，你所有的训练让你失去的就是天趣。当你又反过来追求天趣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造作的天趣，还比不过原来真正的天趣。那你学它干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之下，傅山曾直言对与他同时代的武参将和学童所写文字的夸赞，他的态度比起

现在，还没有这么悖论吧？

白谦慎：一点儿不错。欣赏和具体的模仿是两回事儿，傅山那时候觉得小朋友写得好，但是不把它当范本来临，后来就开始引进范本系统，引进了临摹和学习的系统，这就带来问题了。当下的人仅临摹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有其合理性。只是当他们要将自己的实践理论化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出现了悖论，产生了问题。把古代死掉的“素人之书”抬得很高的话，我就会问：为什么要“与古为徒”啊？马路上这样的字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句“让王小二们成为永久的无名氏，这也是书法家们的集体无意识”，让人印象深刻。

白谦慎：古代的“王小二”们已经被拉到经典系统了，现代的“王小二”他们不愿意拉。因为理智上会觉得当代人怎么能拉进经典系统呢？所以塑造一个杨达不是要影射谁，而是设置一个悖论：你如果真的把他们搬进了经典系统，你会造成价值系统大量的混乱。有个学者冯象，看了我虚构的这个故事之后，就马上跟我说，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其实也遇到这个问题，它的悖论和困境跟这个是一样的。当这个多元真正地开始动摇它最基本的信念的时候，它就会退回去了。审美多元化，到最后等于挖自己的根基。打个比方，在有些文化中，歧视妇女是合法的，不但合法，而且还有道德基础，西方能够接受这个吗？但你不能接受的话，你怎么能说你是多元文化呢？

我更多是揭示一些悖论，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只是不断提出这些问题。我的书2003年出版后不久，曾经有薛龙春写过一篇文章叫《白谦慎的困境》，就是说白谦慎最大的困惑实际上是审美究竟是权力的结果，还是自然逻辑的生成。

三联生活周刊：这跟当代艺术的困境也有点像。在您虚构的这个故事里，王小二写的“发发面馆”也是作为当代艺术而非书法作品被国外大收藏家收藏的，多少也折射了当代艺术的某些侧面。

白谦慎：有关系。这个故事里面我用了很多当代艺术的观念，比如说不到展厅去，打破生活和艺术之间的界限。打破了半天，其实来定位什么是艺术的人，还是那些想打破它的人。为什么我睡觉不是艺术，他睡觉就是艺术？还是因为他有那个观念，他自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睡觉才可以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其实他的睡觉和我睡觉根本没有任何区别。你打破了，为什么我就不算？所以它的逻辑不断推到极限，英文讲的 push the envelope，推到边缘推到最后，就像

当我们说当代某个人的书写有古意、有古风的时候，实际上是他的书写掺杂了某种古代用笔的方法。

徐冰讲的，彻底否定自己，自己给自己挖坟墓。我有艺术家朋友看了这个故事就说，你懂当代艺术。这谈不上，我了解得比较少。我比较关心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关心权力怎样定位的。

三联生活周刊：相对来讲，书法界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体系？

白谦慎：对，当代艺术冲击了它的时候，它最后不是祭起了一面大旗嘛：技法。现在艾未未、邱志杰他们都做过农民工的东西，都是想打破这些界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是以自己这个艺术家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观念，点石成金地让那些东西成为艺术。一般的民众在其中依然是无名氏。艺术家并没有打破生活和艺术的观念，他们依然自己来定位什么是艺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当代艺术越来越观念化的原因。这跟虚拟经济其实挺同步的，我们的实体经济一少，虚拟经济也越来越多。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对书法写作中“古意”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它是和特定的历史形态相关的，需要有历史生疏感才能造成，那么如何去理解有时说一个当代书法家的字“有古意、有古风”这种评价呢？

白谦慎：古意跟我们的历史知识有关。你不能说崭新发亮的东西就不古，我们发现的漆器就是崭新发亮的，但是我们的紫砂壶要有包浆才古。所以只有当你知道材料本身的历史，知道它虽然崭新也可能很古的时候，你的概念才不会被一般的破旧、陈旧、有“包浆”所约束。所以历史知识在这里就非常重要。在书法上，古不古是跟文字发展的历史有关系的。我们看到大量的汉简，知道这是古的。当我们说当代某个人的书写有古意、有古风的时候，实际上是他的书写掺杂了某种古代用笔的方法，比如拐弯的地方，比较圆润、厚重，用更多的中锋笔就容易产生古意；稍微地挑一挑，就带有隶书的方法。在唐楷里面加一点隶书的味道，古意就出来了。这都是掺杂的技法，就像流行音乐加了民乐或者其他元素一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美国同性恋“骄傲游行”里的政治范儿

文 / 驳静

现在美国，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公司企业，参加同性恋游行，支持LGBT群体，都成了门“挺好的生意”。

“改变世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2015年，当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全美同性别婚姻合法时，许多长年致力于维护同性恋权益的法律工作者，都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改变世界”，这是个听上去很酷的议题，它太酷了，以至于许多人把它挂在嘴边。这些人可能包括漫威中那些超级英雄们，硅谷里那帮创业极客，但在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乃至辐射到的更大相关群体的心目中，没准就真的是这些同性恋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

而参加一年一度的6月同性恋游行（Pride March），则是最容易实现也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件事。

游行当晚看新闻，说今天的同性恋游行开始没多久，希拉里就到场了，是政治人物一贯的那种出场方式，前呼后拥，安保随行。不过报道里写，她在游行队伍中待了10多分钟，也跟人握手了，也跟人交谈了，就是没有发表公开讲话，围观民众却表示，“她的到场就是无声的演讲”。走了一段路，他们就钻进了一辆车，说是要赶去印第安纳州，到那里就英国脱欧发表一个演讲。

我们到得晚，完全没看到这位炙手可热的总统候选人。可是，一到游行主街第五大道，还没来得及选一个可以倚着栏杆的位置，就被迎面而来的队伍冲击了一回。他们既严肃，又充满幽默感，他们的自我定位是“骄傲游行”，那是1970年第一次游行就提出来的口号，折射出一种自我鼓励的意味。如今，经过40多年的努力，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都是成功的，这种骄傲就变得更为显而易见。

街道两边的铁栅栏外，围满了路人，而街道恐怕更像是一个舞台，想要拍到舞台上表演的好照片，倚在第一排当然更好。我端着相机，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就有穿着高跟鞋、碎花裙的男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士，在我面前跳舞。跳完一段，她停下来跟我边上的一位摄影师聊了几句，我看到她满头大

汗，好在穿着清凉，在众多打扮更夸张的同仁面前，这位看上去像男扮女装的女士几乎没能引起我猎奇的心态，一切在她身上有种奇异的和谐。

游行队伍中还有许多儿童，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跟围观群众一个接一个击掌互动。我能看出，孩子们的眼神里是迷茫的，他们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伸出小手，迎击一个个伸出来的手掌，甚至漏击一个的时候，停下来犹豫着是要补上，还是跟着人群继续往前走。栅栏外围观的孩子们，同样兴奋地哇哇大叫。有一个方阵分发的粘纸上面写着“nice leg”，一个年轻小伙儿看到这个肤色黝黑手舞足蹈的场外小姑娘，特地走过来跟她对话，一共给她贴了四个，小姑娘转头一脸兴奋：“妈妈，我有四条漂亮的腿了，四条！”

这种施加在孩子身上无形的影响，在社会学家看来，可能是所谓“文明的进程”中最为深远的影响之一。观念的形成和外语学习一样，有赖于儿时的生长环境，不过，更为霸道的生活植入在于，他们的同学甚至他们自己，其双亲可能就是一对同性恋。我见识这样声势浩大的游行，第一反应是觉得感动，隐隐感到，“这似乎不容易”，这些骄傲的口号背后，大约有许多自我挣扎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我同样清楚，那是因为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环境，而对同性恋的认知也直到读大学才开始发生。

在游行队伍里看到有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为我的同性恋女儿骄傲”。一位母亲，可能出于爱而努力接受儿子的同性恋身份，也可能因为她从小受到的教育而坦然接受一个同性恋女儿，这两者，毕竟是大不同的。

游行以方阵的形式分批前行，当银行、餐馆连锁、互联网大佬这类公司的方阵依次出现，巨大的Logo写在明显的位置时，能感觉到游行背后浓郁的政治口味。经历了2015年全美同性恋婚姻合法后，以及希拉里的短暂出现，今年大概是个“同性恋游行小年”，不过，不久前奥兰多同性恋酒吧枪杀事件，仍然为这次游行的重要性添加了政治砝码。同性恋游行成为一个绝佳的软性宣传秀场，大公司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事实上，大公司对LGBT这个议题的态度，是一条逐渐明朗的曲线。

克林顿执政期间，理查德·索卡瑞德（Richard Socaride）曾服务于白宫公共关系办公室，与那些资助选举的企业主们联络感情。他回忆20年前的这段经历，发现即便是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这类通常他们



6月26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现身纽约同性恋“骄傲游行”

都挺愿意参加的活动，如果是跟同性恋事宜挂钩的，响应者寥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之前，收到了一封支持信，上面有379个美国大企业CEO的签名，这意味着，如今这些公司也都站在了赞同同性恋婚姻的立场。

这个签名对LGBT群体而言，更为切实的意义在于，这些大公司里的薪资福利尤其是医疗保险覆盖配偶的政策，实现了同性恋与其他人的平权。支持信中甚至宣称当时只限于异性婚姻的法律，“从一定程度上有害于我们实现公平，并且不利于我们雇用到最优秀的员工”。

大公司经历这样的立场变化，尤其是互联网公司，支持LGBT群体利益代表的开放自由精神与许多公司的形象设定是一致的。但民意在这个议题上扮演的角色显然非常重要。事实上，在美国这样一个选举植入生活的国家，民意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表述，民意调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候选人的态度，至少候选人在公众面前的立场，是经过盘算和衡量的。

在这一点上，被许多人称为一手促成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裁决的奥巴马就是例子。2008年首次参选美国总统时，他对同性婚姻的公开态度是“不赞同”，因为其时黑人教会内对同性恋婚姻的反对态度是激烈的。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奥巴马最终选择了争取黑人教会的选票，因而修改措辞说，他支持的是“同性

关系”。而从内心，他本人对同性婚姻是支持的，这一点由他当时的竞选顾问大卫·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在《信徒：我在政界的四十年》(Believer: My Forty Years in Politics)一书中证实。

这个功利性的态度选择，有数据作支撑。按照每年都对美国社会就同性恋婚姻态度做一次调查的盖洛普机构(Gallup)的数据，2008年，支持同性婚姻的公民是40%，而到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时，支持者已超过反对者；也正是在这一年，奥巴马正式表示支持，事实上，他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就有一个已婚的同性恋女儿。

到了今年总统大选，两个党派的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对LGBT的态度均是支持，这大概也和去年盖洛普的调查数据结果是60%相关。

对LGBT群体的支持程度，历来是美国政治人物必须做的一道选择题，他们要在同性恋和教众两类选民中做出排他性选择。看上去，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当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后，反对者多为基督教人士，他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让我反对同性恋，就是侵犯宪法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此话一出，不由叫人感慨，同性恋此次真正进入主流，就像若干年前，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以“性别歧视”对雇主提出诉讼。□

迈泰奥拉：最高机密

文 / 张宇凌



上图：圣三一修道院（1475年，迈泰奥拉，希腊）

下图：圣尼古拉斯修道院内部壁画（欧梵尼丝·斯特里萨斯作，16世纪，迈泰奥拉，希腊）

这正是一种疯狂的表态，迈泰奥拉不仅仅是“在天空之上”，也是“在死亡之上”的。

希腊东北部的迈泰奥拉（Meteora）是巨岩柱上东正教隐修院聚集的地方。这里位于色萨利平原西北，靠近品都斯山脉。60万年前，此地海中的大陆架升高，又经过几十万年风化作用，留下了奇特的砂岩和砾岩石柱群。9世纪希腊境内的偶像破坏运动造成了许多东正教修士从大城市逃亡，他们来到迈泰奥拉，开始分头独居在岩洞，甚至



岩石的缝隙里。隐居者平时并不互相交流，只在周日或重要的宗教节日一起聚集在最大的一个山洞里举行弥撒。

14世纪，一位名叫阿萨那修斯的教士从另一个著名的隐居圣地阿索斯山带来一批修士，在最宽敞的岩柱顶上搭建起第一个修道院，叫迈泰奥容(Meteoron)，也是他把整个地区叫迈泰奥拉，意谓“漂浮在天空之上”。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势力也在希腊扩张，越来越多的东正教组织开始寻找隐修的安全处所。在鼎盛时期，迈泰奥拉共有24个修道院。虽然今天仅存6个。

观看迈泰奥拉的最佳视角，是在高处的公路边，可以看到整个区域灰色的石柱顶端的砖红色修道院，如同一只只巨型蘑菇，屹立在高阔的希腊蓝天下。这种“柱上”的栖居方式，从基督教早期就在东方盛行。隐修的祖师是埃及的“沙漠教父”圣安东尼（约251~356），他追随着《圣经》上的两句话。一句让他放弃世间的财产：“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和合本第19章第21节。）另一句叫他放弃世间的忧愁：“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和合本第6章第34节。）他果真放弃一切去往一个住满蛇的废弃军用城堡独居。他独居的两个任务，就是一个要和内心的情欲征战，一个要和魔鬼的权势征战。

跟迈泰奥拉的建筑形式具有隐喻性联系的隐修原型也出现在东方。叙利亚出现了坐柱者西门。西门据说一天醒来，就发现自己不在床上而在一根石柱子上，一说是上帝的恩典让他上了这根常人根本无法爬上去的石柱，又有一说是因为他向美女求爱，上帝惩罚他把他抓来石柱子上。总之西门在石柱上待了30年，人们把食物用绳子和吊篮送给他，他30年在柱上赢来无数信徒，而叙利亚之后还出现了很多追随他的柱上隐修者。

西门的传说不可求证，但石柱这样的形式却隐喻着东方隐修派的一种终极幻想：坚定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却又不受这个世界的任何干扰；让人们知道，却不让人们碰到。接近心灵深处的神，但是同时接近人性深处的魔鬼。所以要住在无法攀登上去却又坚不可摧的石头上，又因为要放弃一切，所以只要很小的面积。隐修不是一种被动的栖居方式，而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投入方式，修士被称为“上帝的精兵”。正因为

不会放弃信仰，才找到最危险和不可能的地方建筑他们的城池，结合一种极度危险和一种极度坚固，正如同人们投入信仰这个动作本身的气质一样。在万年的石柱上，垂直近500米的悬崖高度，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然只能用大网兜和吊篮放绳子的方式上下，那时候的参观者都自称，当你被吊着垂直上下500多米的时候，你必须经历一种“信仰的飞跃”。至于绳子会不会断，修士们声称“只能看神的意愿”了。

这正是一种疯狂的表态，迈泰奥拉不仅仅是“在天空之上”，也是“在死亡之上”的。“007”的导演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觉得干间谍也是一个意思，要求你在极度危险中极度地稳固，所以选中了迈泰奥拉现存最古老的建于1475年的圣三一修道院，拍摄《最高机密》(For Your Eyes Only)的最后一场。或许曾经的迈泰奥拉确实也是只能为信仰者所开启的“最高机密”。

迈泰奥拉现在一共有6个修道院，4个男修院，2个女修院。其中有一个叫圣尼古拉斯的修道院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16世纪克里特画派的首领特欧梵尼丝·斯特里萨斯(Theophanis Strelitzas)曾经在这里修行，留下了一个礼拜堂的壁画。克里特画派是一个以描画圣像为基础的画派，其中的画家几乎经历了跟修士们同样的命运。在土耳其势力逐渐扩张的15世纪，艺术家们越来越频繁地从首都君士坦丁堡搬离到克里特岛，由此而形成了这个派别。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克里特岛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重要的艺术中心。虽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海中，但克里特画派中偏向东方教义传统的一些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却都在修道院中。特欧梵尼丝的壁画就几乎全部在阿索斯山和迈泰奥拉石柱群中。他的画风奉行克里特派对东西方艺术的综合，但更有特色的是对拜占庭传统的严谨尊重。人物都偶有锐利清晰的轮廓线，肤色棕黑，脸颊上用集中高强度的小高光，衣服色彩华丽，衣褶完全是几何抽象的，拒绝单点透视系统，动作是受约束的。

克里特画派的魅力正在于在一个完全了解西方文艺复兴传统的背景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只能说与信仰相关：东方教会强调神秘论，强调神与人的同在。但又要在这样的“同在”中保持其神性。所以这些形象是具有肉身的似乎与我们同在，却又由于其抽象和超透视性而是非现实的。拜占庭传统确实由于其信仰保守的激烈强度，反而留下了某种激进的建筑和视觉形式，迈泰奥拉和克里特画派都是最好的证据。□



奥斯特玛雅：戏剧只是我谋生的手段，这很讽刺

文 / 奚牧凉 供图 / 邵宾纳剧院

6月30日，德国邵宾纳剧院版《理查三世》的全球第一百场演出，在天津大剧院开始了。

礼炮桶喷射出的金银纸屑漫天飞舞，身着华服、手捧香槟的英格兰约克王室众人，合着现场演奏的令人血脉偾张的工业金属摇滚乐，谈笑风生地走上舞台。而就在这战争胜利后的轻歌曼舞中，脊背佝偻、双腿罗圈的理查三世，一把抓过从天花板垂下、犹如拳击场主持人所使用的“吊麦”，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既然我做不成附庸风雅的情郎，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

我只好横下心来，决定做一名恶人，仇恨眼前那没日没夜的欢乐。”

作为今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闭幕大戏，《理查三世》早已令中国戏剧圈翘首以盼甚久。其实这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名篇，不少戏剧观众早已对其在中国上演过的各个版本如数家珍：林兆华2001年的版本使用了6段外国人拍摄于中国的影像，王晓鹰2008年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包括2011年曾来华演出的、由200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丽人》导演萨姆·门德斯与主演凯文·史派西携手打造的英国老维克剧院版本，以及今年刚刚在BBC播出、由卷福主演的英剧《空王冠》（第二季第三集）……总之，



奥斯特玛雅导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剧照

对邵宾纳剧院的这版《理查三世》，中国的戏剧观众已不止于想要重温其“篡位暴君阴谋得逞后身败名裂”的经典故事，他们从京沪奔赴至天津甚至哈尔滨，皆因该剧的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

说奥斯特玛雅年少得志绝不为过。1996年，年仅28岁的他仅凭大学期间导演的三部作品，就成为柏林巴拉克小剧场的艺术总监，在他的领导下，巴拉克小剧场被德国权威戏剧杂志《戏剧今日》评为1998年度最佳剧场。三年后，雄踞柏林剧院排名前五之内的邵宾纳剧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随后又将他任命为剧院的艺术总监。而在2004年，奥斯特玛雅又成为世界三大戏剧节之一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特约评

审委员，他导演的《沃伊采克》成为阿维尼翁戏剧节历史上第一部用德语演出的剧目。

奥斯特玛雅最早的成功，来自于他率先在德国排演了英国“直面戏剧”剧作家诸如萨拉·凯恩、马克·雷文希尔等人的作品，并启发了德国著名当代剧作家创作出相似的作品。与“直面戏剧”的风格异曲同工，奥斯特玛雅也高举“亲密与暴力”的戏剧美学旗帜，他的戏剧风格被总结为带有左翼批判现实倾向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但让奥斯特玛雅获得国际声誉的，譬如2011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还是他对莎士比亚与易卜生的现代解读与排演。在他2002年排演的《玩偶之家》中，娜拉成了高级复式公寓中身着端庄白色衬衣和短裙的女主人，她会挥舞着《星球大战》中的“光剑”在丈夫面前排练热舞，而她的肉体则被三位男主角“轮流享用”：丈夫海尔茂与解开上衣纽扣露出胸罩的她热吻，丈夫的朋友阮克大夫抚摸她的丝袜美腿，丈夫的仇人柯洛克斯泰则强奸她未遂。剧末，终于认清了丈夫真面目的娜拉没有出走，而是端起了手枪，扣动扳机十余次，将丈夫射死在家中的大鱼缸里——在此之前，这群被囚禁在鱼缸之中被观赏的金鱼，正是充当着男性附庸的娜拉的写照。

而他在2008年排演的《哈姆雷特》中，让哈姆雷特“真的疯了”：丹麦王子大腹便便、邋遢疯癫，吃土、露点，摔打食物、高唱黄歌……一反惯常的英俊、忧郁形象——这部作品去年曾借林兆华邀请展来华，成了很多中国观众与奥斯特玛雅戏剧的首次接触。

对自己的两类创作，奥斯特玛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做当代剧作时，因为大家对原著不了解，所以我会尊重原著，探寻将其呈现给观众的最好的形式。经典剧作大家耳熟能详，可以重写，我就得找寻新的形式。”新的形式不意味着彻底抛弃经典剧作的原著，他说：“核心内容我会保留下来。”他甚至曾说：“把我定义为一个专门标新立异，挑衅传统的导演，这实在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以《理查三世》为例，奥斯特玛雅介绍了他排演莎剧的工作方法。很重要的起点是对莎士比亚原著的重译。在德国，创作者在排演莎剧前通过重译剧本本来梳理对莎剧的理解与表达，这十分常见。奥斯特玛雅指出，因为英语与德语在音节上的差异，翻译时内容与音韵很难兼顾，所以在此版《理查三世》中，他们为了便于观众理解，便将莎剧英文原著的诗体翻译成德语的散文体。此版的译者，是从上世纪末便开始与



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

奥斯特玛雅共事的梅焰堡，他将原著压缩至只有 150 分钟的演出时长，理查三世母亲这样的重要角色都被尽数删去，仅存的故事主干让演出变得十分紧凑、利落。与原著最大的差异出现在剧末。理查三世披挂上阵后，几乎所有角色的台词，包括原著末尾里士满在战胜理查三世后的独白皆被略去。理查三世在梦到因自己而死的冤魂后，叹息“我若死去，没有人会来为我的灵魂哭泣”，而后便挥剑与“空气”一番搏斗，几回合后败下阵来，“尸体”被拴住右脚倒吊而起。从全剧起首的愤恨，到末尾的悲壮，在奥斯特玛雅看来，理查三世“不仅是敌人打倒了他，也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奥斯特玛雅还曾表示，他会给演员 10% 的即兴表演空间，“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哈尔滨大剧院演出时，“理查三世”艾丁格听到台下观众的手机铃声响起，随即在台上模仿起电话，并示意观众轻声，说“This is my wife”（这是我老婆）。去年《哈姆雷特》

在天津大剧院演出时，“哈姆雷特”艾丁格甚至从舞台上一路跑下来，攀爬到了二层的观众席。“我觉得做莎剧，互动就是很重要。”奥斯特玛雅解释道，“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不像现在，当时的场面很混乱，演员需要靠互动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互动就是莎剧的特点之一。”

很多人好奇，奥斯特玛雅用了什么演员训练方法。2005 年，奥斯特玛雅曾应林兆华之邀，以“梅耶荷德的演员与空间训练方法”为题在北京大学开设过一场为期三天的工作坊，曾参与现场的著名青年导演黄盈回忆他的方法：“例如演员们在一个空间里行走，几个拍子后，要保持一个雕像式的、有戏剧张力的静止造型；还例如，托住一根棍子以保持其平衡，找寻身体的感觉。”这些训练，有别于推崇现实主义、注重体验生活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有梅耶荷德戏剧体系推崇假定性、注重给人美感的形体造型的意味。

但如今，奥斯特玛雅的答案就变成了兼及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我有很多种训练方法，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我称之为‘讲故事’，就是我给演员们提供一个剧中的情境，然后他们要改编、表演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情境，和剧中的情境加以比较，以加深他们对剧作的了解。”奥斯特玛雅说，“这样就可以避免表演上的‘陈词滥调’。你知道有些演员的表演不是在模仿生活，而是在‘模仿戏剧’，模仿其他演员。”从 1999 年就开始和导演合作的艾丁格，也告诉本刊记者：“我觉得奥斯特玛雅一直希望激发我们的，就是让角色的特点与演员的个性相契合。”

如今的奥斯特玛雅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戏剧风格与“粉丝”群体，他是“德国新一代戏剧人”的典范，就连他执掌的邵宾纳剧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他而与德国其他很多剧院“老龄化”的观众年龄结构殊为不同，观众主要是 15~35 岁的青年。

奥斯特玛雅曾在美国戏剧学家马文·卡尔森 2009 年出版的《剧场比战争美丽：20 世纪末的德国舞台导演》一书中表示，导演一旦超过 40 岁，就会与发展中的文化脱节，因而他们应该就此放弃导演工作。而今年，奥斯特玛雅已经 48 岁了。如此说来，这位在德国乃至世界风头一时无两的明星导演，也许不久以后会结束自己的导演生涯？对此，一向有些“不苟言笑”的奥斯特玛雅回答说：“我很期待有一天，我有足够的钱而不用工作，因为我喜欢阅读、游泳、画画、听音乐。戏剧，只是我谋生的手段——请记住，这件事本身，其实很具讽刺意味。”□



奥斯特玛雅执导作品：

上图：《人民公敌》剧照

下图：《哈姆雷特》剧照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阿巴斯执导的电影《樱桃的滋味》剧照（1997年）

阿巴斯：伊朗电影巨匠

文 / 宋诗婷

这位享誉世界的伊朗导演，最后一部电影计划在中国拍摄，可惜因为去世，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伊朗电影的精神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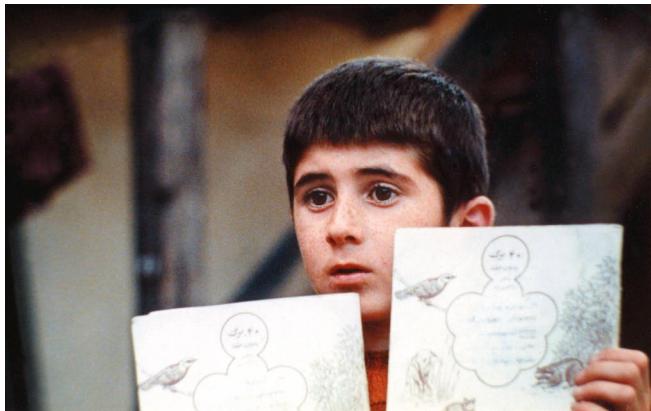
7月5日，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因胃癌在巴黎病逝。这位伊朗著名导演的离开轰动了全球文化界和整个伊朗。包括马丁·斯科塞斯、泽维尔·多兰、贾樟柯在内的众多中外导演纷纷在社交网络上发文悼念。阿巴斯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千名伊朗市民和文化界人士聚集在德黑兰北部的电影之家，集体悼念这位伊朗电影的精神领袖。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电影和戏剧的热爱是从喜爱基阿鲁斯达米的电影开始的。”伊朗女导演纳斯利说。中国影迷对于伊朗电影的了解也是从阿巴斯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VCD、DVD最流行的年代，电影爱好者热衷于从那些正版或盗版碟片中了解国外电影的最新动态。在那个“淘碟”的黄金时代，阿巴斯的电影尤为抢手。他的“乡村三部曲”和《樱桃的滋味》

《十》等作品是文艺爱好者的《圣经》。中国影迷从阿巴斯的电影里看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风貌，而阿巴斯构建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上的新影像风格，也影响了一代中国导演的电影审美。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于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期的阿巴斯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小学六年级之前甚至没和班上的任何人说过话。当时，画画是他排解孤独的唯一方式，这种“绘画疗法”几乎陪伴了阿巴斯的整个童年。“我爱画画，但我的画并没有好到可以成为画家的地步。”阿巴斯接受法国《电影手册》采访时说。

但阿巴斯依然靠绘画这门手艺进了大学。在阿巴斯的自述中，他提到：“首次高考失利后，他在交通警察部门谋到了一份差事。工作期间，他在好朋友阿巴斯·柯汉达里的介绍下，结识了一间美术工作室的负责人——穆哈盖克。随后，阿巴斯在美术工作室补



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电影剧照（上至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命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

习，再次参加高考时被德黑兰美术学院录取。”

阿巴斯从来都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他常常旷课，也不愿意按照学校的规定修读课程。大学时，他依然没有放弃那份在交通警察部门的工作，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前后共花费 13 年才完成了大学学业。

20 世纪 60 年代，伊朗的电视行业刚刚兴起，商

业的短暂繁荣使得这个国家急缺电视广告人才，还没毕业的阿巴斯加入了这个新兴的创意产业。凭借自己的绘画功底，他先为几家公司制作书籍封面、广告画等平面广告，随后进入塔布里电影公司的广告制作部，开始尝试撰写广告脚本。在 1960 到 1969 年间，阿巴斯撰写和拍摄了 150 多部广告片。这段广告拍摄经历让阿巴斯对摄影技术和影像语言有了初步认知，也是他真正走进电影行业的敲门砖。

1969 年，“伊朗青少年智力发展研究中心”（简称 Kanun）的领导人费鲁兹·西尔凡路看到了阿巴斯拍摄的一则煎锅广告，非常喜欢，于是邀请他加入研究中心。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伊朗电影史中，Kanun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所官方机构致力于吸引艺术家参与教学，并在中心内创立了电影部。阿巴斯是该部门聘请的第一位导演，从一开始拍摄短片，他就得到了该协会的资金支持，享受到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即便在伊斯兰革命期间，Kanun 仍凭借其官方背景，得到了政治上的庇护，电影制片工作没有受到过多干涉。

很多伊朗电影研究者认为，1969 年阿巴斯加入 Kanun、创立电影部是“伊朗电影新浪潮”的开端。正是在 Kanun 的支持和阿巴斯的尝试下，伊朗的儿童电影得以发展。阿巴斯之后，包括索拉布·沙希·萨雷斯、戴瑞奇·迈瑞、贾法·潘纳希在内的伊朗知名导演都曾在 Kanun 拍摄过电影。

阿巴斯早期的电影作品都有一定的儿童教育功能。在 Kanun 拍摄的 10 分钟短片《面包与小巷》是阿巴斯的导演处女作，这则短片也是 Kanun 电影部的第一部作品。电影讲述了一个简单的小孩与狗的故事。小男孩带着法棍回家，途中被一只难缠的小狗拦住去路。小男孩寻求大人的帮助，却不被理睬。最终，他从法棍面包上掰下一小块，丢给小狗，最终得以顺利回家。在这个简单的故事中，阿巴斯传达了一种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态度，同时也在影片中植入了牺牲与分享的人生观。

《面包与小巷》之后，阿巴斯又拍摄了另一部 10 分钟短片《课间休息》，这部短片延续了《面包与小巷》的风格，采用非职业演员，运用纪录式的拍摄手法，以一个孩子在平常生活中面对的小问题为切入点，再次诠释了“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回家”的主题。

与所有“伊朗新浪潮”时期的导演一样，阿巴斯的早期创作也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整个青少年时期，阿巴斯都没有过成为电影导演的理想。小

学时，他经常能得到一些破碎的电影胶片，当时，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些胶片的用处，只是像收集邮票一样，把这些男男女女的影像收藏在相册里。在阿巴斯的记忆中，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是在他11岁时。在姐姐朋友的怂恿下，他们坐在电影院里观看了一部由丹尼·凯耶主演的电影，电影快结束时，阿巴斯睡着了。

阿巴斯真正开始有意识地看电影是在十六七岁时，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给少年时的阿巴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受采访时，他曾回忆：“青少年时期看的影片中，很少有令人沉思的与众不同的电影，只有这一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电影院出来，我独自走了很长的路。我在看完一部好电影之后通常做的事，就是让自己迷失在一条又一条的小巷中。”

然而，谈及自己的电影传承，阿巴斯却认为，虽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带给他启发，但与大师作品、文学著作相比，生活带给他的灵感要更为丰富：“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任何一位电影导演，会比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更具影响力。”

阿巴斯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完成于1974年。这部名为《过客》的电影依然讲述了一个和孩子有关的故事。足球爱好者卡齐姆想去德黑兰观看国家队比赛，他从父母那里偷到钱，日夜兼程地搭客车赶到德黑兰。所有人都以为卡齐姆即将达成愿望，但此时的卡齐姆疲惫不堪，他躺在草坪上睡着了，错过了那场梦寐以求的足球赛。回到家乡后，卡齐姆向伙伴们分享了这次勇敢而精彩的旅行，隐瞒了错过球赛的事实。

《过客》被认为是阿巴斯在伊斯兰革命前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乡村三部曲”的主要元素，以及伊朗儿童电影的创作模式。电影中的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阿巴斯有意识地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主角带着“看足球赛”的目的上路，伊朗乡村和城市的风土人情通过孩子的视角展现。最终，孩子原本的目标没有达成，但却收获了另一种体验和感悟。《过客》之后，阿巴斯又拍摄了《结婚礼服》《报告》等长片作品，影像风格与《过客》一致，孩子的世界依然是他最重要的创作主题。

镣铐下的舞蹈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取而代之，成立了

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次革命对伊朗电影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它终结了由“新浪潮”带来的电影创作的短暂繁荣，以更为严苛的文化审查和宗教审查制度限制电影的制作和发行，使得伊朗电影工业大幅度萎缩。阿巴斯拍摄于革命前后的电影《案例一，案例二》也受到牵连，因电影中有诸多前朝达官显贵的镜头而未能顺利发行。

随着政局的稳定，当局开始重视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宣传作用，逐渐制定了一套基于宗教信仰而建立的电影审查制度。与此同时，官方成立了相应的基金会，以扶持本土电影的发展——一面宣扬主旋律，一面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从这一时期开始，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电影人开始“戴着镣铐跳舞”，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于伊朗电影的新道路，这次的伊朗电影复兴引起了世界电影界的关注，被视为“伊朗电影第二次新浪潮”。

阿巴斯拍摄于1987年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这次“新浪潮”的起点。电影设定在伊朗青少年教育刻板、腐朽的背景之上，讲述了小男孩阿穆德不小心把同桌穆罕德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让同桌免遭被开除的惩罚，他一个人带着作业本上路，多次往返两个村子，寻找同桌住所，归还作业本的故事。

这部展现两个孩子间友谊，暗讽大人世界刻板、冷漠的电影为阿巴斯赢得了国际声誉，他凭借这部电影拿到第42届戛纳电影节艺术电影奖和第42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伊朗电影来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意义更为深远，它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电影创作视角，开启了伊朗儿童电影的序幕。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后，马基德·马基迪导演的《小鞋子》《天堂的颜色》，贾法·潘纳希导演的《谁能带我回家》《白气球》等儿童电影先后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得奖或受到好评，这些作品让“儿童题材”成为伊朗电影的重要标签。

评论界认为，阿巴斯开启的儿童电影题材放弃了诠释宗教或道德戒律为题旨的“伊斯兰电影”模式，“采用一种温和的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叙述方法，把镜头对准儿童的纯真世界，透过儿童的形象来折射人类的良心和人生苦难，并最终将伊朗电影推上国际影坛”。

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后，阿巴斯在同样的取景地拍摄了另外两部作品——《生命在继续》和《橄榄树下的情人》，这三部作品被称作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

“乡村三部曲”秉承了阿巴斯一贯的创作风格，

阿巴斯很少在电影拍摄前撰写完整的剧本，台词和场景会随演员和摄影师、录音师等幕后团队的状态而随时调整。

彼此间又有着紧密的关联，其背后的创作方法一直被反复讨论。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地震波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取景地柯盖尔，而电影中的小男孩阿穆德的家也位于地震区域。阿巴斯以电影导演带着儿子进入灾区，寻找电影中的小男孩为主题，拍摄了“乡村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生命在继续》。阿尔哈德·海拉德曼饰演阿巴斯的导演角色，而导演的儿子则由剧组中另外一位工作人员的儿子出演。

阿巴斯曾在地震发生后探访柯盖尔地区，打听电影中的演员情况，那次探访让他萌生了拍摄《生活在继续》的想法。然而，电影真正开拍却是在发生地震的11个月之后，距离他的灾区之旅也有5个月时间。“这5个月的延迟是必要的，这样我才能有时间去消化我所看到的景象。我极力避免虚假的激动。”阿巴斯不愿自己的电影中有廉价的感动或者讨好观众的煽情，他需要找到精确而克制的视角来呈现这次寻找之旅。

《生活在继续》的呈现的确是冷静的。阿巴斯让电影中的导演和儿子乘着汽车一路接近目的地，目睹了震后灾区人民的平静生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最终却没能如观众所愿找到电影中的小演员。这种手法与阿巴斯的早期电影《过客》类似，电影的推进建立在明确的目的之上，却以未达成目的，但收获了更高层次的圆满为结局。

《生活在继续》中有这样一场戏：导演坐在一幢破旧的房子下，与刚结婚5天的男青年侯赛因对话。这场戏成为阿巴斯下一部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的动因。

《橄榄树下的情人》沿用了《生活在继续》中的演员，导演阿尔哈德·海拉德曼到侯赛因所在的村庄拍戏，在男主角无法胜任的情况下，侯赛因成为新的男主角，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爱慕的女孩塔赫莉搭档饰演夫妻，从而有了再次追求对方的希望。

“乡村三部曲”在内容上呈现出某种互文关系。这一创作手法在模糊真实与虚构的影像风格之外，又

创建了新一层的真实与虚幻，开拓了电影呈现的维度。当屡次被问起为何会拍摄三部相关联的电影时，阿巴斯曾回答：“人们经常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试着做过各种回答，但哪一个都不是真的。最近我才刚刚找到答案：我与这些影片中的人物之间产生的情感迫使我继续跟他们一起拍片。”

阿巴斯曾分享他的创作方法，他以拍纪录片的方法拍摄剧情片，剧中使用的非职业演员仅仅需要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完成拍摄。阿巴斯在自述中提到，他从不会在没有采景的情况下创作剧本。

在实际的电影拍摄中，阿巴斯也显示出一种控制之下的随意。他很少在电影拍摄前撰写完整的剧本，台词和场景会随演员和摄影师、录音师等幕后团队的状态而随时调整。很多时候，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并不明确知道，阿巴斯究竟要拍摄一部怎样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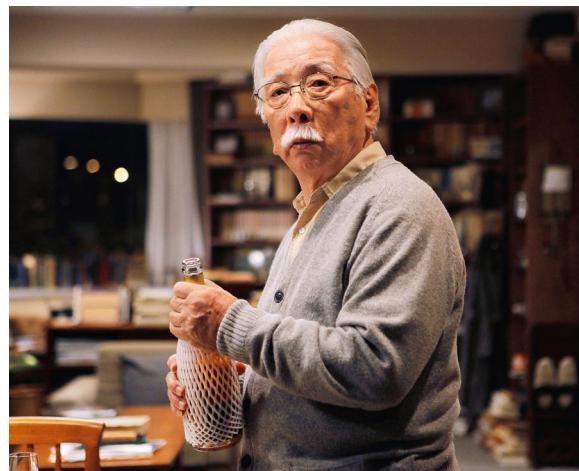
阿巴斯与非职业演员的默契配合曾得到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夸赞。通常，在电影真正拍摄之前，阿巴斯会与演员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以感染对方，帮助对方融入电影的情境之中。他曾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对《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的男主角侯赛因讲解自己对于贫穷与富有的见地，在多次重复中，侯赛因掌握了阿巴斯的理论，并将其变成自己的思想，最终真实地呈现在电影中。

这种以“重复”而达到目的的方式也常出现在阿巴斯的电影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小男孩多次与母亲重复相同的对白，三次跑过Z字形山路；《生命在继续》中，导演数十次掏出印有小演员照片的海报询问路人；《橄榄树下的情人》里，侯赛因反反复复对女孩诉说着类似的告白……阿巴斯在电影内外都创造了一种独有的有关“重复”的美学，这种美学事关人性的执著与无可奈何。

除“乡村三部曲”之外，阿巴斯最为淘碟时代的中国人熟知的另两部电影是《特写》和《樱桃的滋味》。前者是阿巴斯个人最喜欢的电影，这部电影完全打破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而这种手法在“乡村三部曲”的后两部作品中得到了延续。《樱桃的滋味》获得了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部男主角为自杀寻找帮手的电影深入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将阿巴斯一直在电影中展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发挥得淋漓尽致。

走向世界

阿巴斯的电影在伊朗之外拥有大批拥趸，尤其在



上图：阿巴斯在意大利拍摄的电影《合法副本》剧照（2010年）

下图：阿巴斯在日本拍摄的电影《如沐爱河》剧照（2012年）

法国和日本，阿巴斯的受欢迎程度一度让他本人受宠若惊。法国“新浪潮”领袖让·吕克·戈达尔对阿巴斯的电影推崇至极，他不遗余力的推介是阿巴斯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

1994年，戈达尔曾写信给当时的纽约影评人协会主席阿尔蒙·怀特，他在信中婉拒了协会颁给自己的电影奖项，并以“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的论断谴责阿巴斯在美国所遭到的冷遇。

相较于阿巴斯在国际影坛的一致好评，伊朗国内

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在“乡村三部曲”、《樱桃的滋味》和《特写》收获国际赞誉时，伊朗境内对他的批评也随之而来。部分文化界人士和观众认为，阿巴斯电影中的伊朗贫穷、迂腐，他正在用伊朗最不堪的一面去满足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从而得到荣誉和利益。

当年，《樱桃的滋味》在戛纳拿到金棕榈大奖，阿巴斯领奖时礼貌性地亲吻凯瑟琳·德纳芙，这一动作也激怒了伊朗的保守派。在伊朗，男人不可以

开场合亲吻妻子以外的女性，阿巴斯的这一举动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谴责，并影响了其电影在伊朗境内的公映。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后，阿巴斯的很多部电影都未在伊朗国内上映。在戛纳谈及《生命在继续》的公映情况时，阿巴斯曾评价伊朗国内的电影观众：“这部电影在伊朗没有公映。它在西方电影节上所获的奖项在电影宣传海报上是被禁止提及的。制片人也认为这些奖项没有任何价值，他不太欣赏这部片子。我相信，灾区的居民也不会喜欢它，因为在我们国家，闹剧占据着绝对优势，人们没有兴趣去看一部真实的影片。很多观众由于在电影结束时也没明白孩子们遭遇了什么而感到上当受骗，认为导演没有履行诺言，寻找孩子只是一个旅行的借口。”

阿巴斯从来都不是在拍摄自说自话的作者电影，在他的观念里，电影是由创作者和观看者共同完成的。他对于观者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思考良多，这些思考也体现在他的实验性电影《希林公主》中。在这部完成于2008年的电影中，阿巴斯将包括朱丽叶·比诺什在内的100多位女性观众安置于同一个放映厅，让她们共同观看由波斯神话改编的电影《希林公主》。摄像机从头至尾只拍摄观众的近景和特写，捕捉在不同电影情节下，她们的动作和神态。这是阿巴斯对电影画面、声音和观众反馈的一次实验。

阿巴斯对国内的电影观众感到失望，但每每被西方记者或电影从业者问及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他总会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几句。他把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作被打破的头：“要是你的头被打破了，最好让它破在帽子底下，不该到处去说，因为没什么用处——没人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阿巴斯觉得，伊朗的审查制度固然严苛，但审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即便不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审查，家庭、学校、伦理，甚至是自我，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审查。而对于电影导演而言，越是在压力之下，大家越能找到好办法和新的表现手段。

阿巴斯在电影创作的中后期开始尝试与欧洲的电影公司合作，伊朗的Kanun不再是他的唯一依靠。从《橄榄树下的情人》开始，法国CIBY 2000电影公司成了阿巴斯重要的投资方和出品方，阿巴斯也因此有更多时间生活和工作在欧洲。

欧洲资本的介入使阿巴斯能够在伊朗之外拍摄电影。2010年，他在意大利拍摄的电影《合法副本》于法国上映，电影不仅赢得了好口碑，还帮助女主

角朱丽叶·比诺什拿到第63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电影的取景地在意大利，镜头中呈现了更为精致的质感。这一次，阿巴斯探讨的是符合意大利国家气质的艺术话题，男女主角也由贫穷的伊朗乡村青少年变成了欧洲中产阶级男女。尽管电影拍摄环境和合作对象发生了变化，但电影在创作手法和表达主题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阿巴斯风格。电影剧情在男女主角的不断移动中展开，两人针对“艺术赝品与原作的相对价值”展开讨论，并把这种讨论延伸到两人的关系上。他们时而陌生，时而变成拥有15年婚史的夫妻，阿巴斯又用一种新手法呈现了真实与虚幻的转换。

除戈达尔之外，日本导演黑泽明也极为推崇阿巴斯，把他视作印度现实主义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的接班人。阿巴斯本人是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爱好者，他曾用DV拍摄致敬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五》，并把这部电影带到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展映。

与导演间的惺惺相惜相比，2012年在日本上映的电影《如沐爱河》才是阿巴斯与这个国家最为紧密的联系。这部法国投资、日本拍摄的电影是阿巴斯第二次在伊朗之外的国家拍摄长片。《如沐爱河》的全部演员都是日本人，电影讲述了一个援交女大学生与男友、援交对象（退休大学教授）之间的纠葛。电影中，男女主角在行进的汽车中对话，喋喋不休的女邻居，嘈杂却层次丰富的背景音，开放的结尾，都是阿巴斯式的电影美学。

这两部电影之后，阿巴斯身上的伊斯兰属性愈发弱化，电影中留存的是最普世的价值观和阿巴斯永恒的人文主义关怀。

如果阿巴斯没有去世，按照原定计划，中国将是他选择的第三个伊朗之外的取景地。2014年，阿巴斯决定与中央电视台微电影频道合作，拍摄一部暂定名为《杭州之恋》的电影。为了这部电影，他曾四次造访杭州，在中方团队的陪同下，走街串巷地考察、选景，并拍摄了一部展现酒店保洁员日常生活的纪录片。然而，这部筹划中的杭州爱情故事因阿巴斯的突然离世而永远无法开机。□

（参考资料：《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法国《电影手册》杂志特刊《Qui êtes-vous Monsieur Kiarostami》，《TIFF Bell Lightbox 2016：In Conversation With Abbas Kiarostami》）

（实习生李辛夷对本文亦有贡献）



松果生活

一万个生活家

一万种生活方式



集体记忆：不完美的过去

记者 曹玲



我们对事件的集体记忆往往是不准确的，理解这一点可以更好地解决冲突，预测一个群体或者国家可能在未来采取什么行动。

不同人的“二战”

对于历史的记忆，一种叙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德国空军持续轰炸了8个月，伦敦大约2万人丧生，100万家庭被夷为平地。当时，伦敦人冷静地凝聚在丘吉尔身后，充满了决心和勇气，毫不畏惧希特勒。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真相并非如此。通过当时的信件、日记和报纸，他们得出结论：当时

的伦敦人惊慌失措，疲惫不堪，无法入睡，总是处于哀悼亲人的状态；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伦敦人口被疏散到农村，丘吉尔到了被轰炸过的地方时，经常是“嘘”声一片，人们的士气并不高涨。

事实上，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的伦敦充满了动荡和绝望，而日后的美好描绘则代表一个群体的虚假记忆。为什么人们的记忆会出错，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70周年，华盛顿大学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亨利·瑞迪格(Henry Roediger)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民众对此的认识是：日本拒绝投降，偷袭珍珠港，美国为了终止战争，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所以杜鲁门总统和将军们下令扔下

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从而结束战争。相比之下，俄罗斯盛行的说法是：美国投放原子弹只是为了震慑苏联，默许美国战后的要求；日本原本就濒临投降，战略上来说投放原子弹是不必要的。

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不同的记忆共同体对过去有着不同的解释。

简单来说，集体记忆指的是一群人记住过去的方式。集体记忆可以由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组成，共同的记忆可以关于事实也可以关于解释。对于任何我们所属的重要的社会群体，每个人都有集体记忆。家庭成员可能会记住他们的经历或者一个特定的事件，比如一家人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胜地度假。

记忆自古以来就是被人们重视和探究的心理功能之一。希腊人的“故事”，意思是“老奶奶”。古时候，总有老奶奶在家里的火炉旁，对一群围绕着她的小孩们讲故事，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把之前的记忆延续下来，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把这些故事叫作“老妇人的故事”。

如今，生活中也随处可见集体记忆的痕迹，当你一遍遍听父辈讲述家族的故事，然后再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当你奔赴异国他乡，找不到心里归宿时；当你在博物馆深处感慨万千时；当你在民族战争纪念活动中同情或悲愤时，你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了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明确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一般认为，记忆是一种属于个体的心理感官行为，但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或曰集体记忆。

人们对集体记忆如此感兴趣缘于两个原因：第一，从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对群体现象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集体意识、集体表征、集体心理、集体记忆等一直是众多学者所感兴趣的重要主题；第二，从情感角度上讲，对于群体延续和发展的追问、思考以及展望，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责任，集体记忆的研究是关乎群体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一个重要命题。

瑞迪格认为：“集体记忆的实证研究是一个相当新的方向，研究人员开始注重很多资料来源，诸如报纸、访谈，以及通过检测某些单词或者短语在大量文本中的出现频率进行研究。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大规

模调查人们对事件的回忆，直接评估人们的记忆。”

詹姆斯·维特奇（James Wertsch）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曾著有《集体记忆的声音》（*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一书，他和瑞迪格进行了一个大型在线调查，关于11个战斗民族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当他们要求人们回忆“二战”时，美国人报告的重要事件数不胜数，但大多数人都回忆起了珍珠港事件、诺曼底登陆，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等。而当俄罗斯人被要求列出“二战”的关键事件，他们大多给出了另外一组场景，比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围城、库尔斯克会战等等。

以库尔斯克会战为例，德军与苏军共投入了约280万名士兵，出动了8056辆坦克，空军部队参战飞机超过了2000架，创下两个纪录：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以及最大规模单日空战。此次战役导致超过100万人伤亡，被历史学家广泛认为是战争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此战之后，德军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苏联红军从这里开始了收复国土的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场对于苏联人来说如此重要的战役，在美国人看来却不足一提。

这两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没有重叠的部分，并不等于说彼此没有关于对方的历史知识。对于集体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而是那些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和生存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此，即使对同一个事件，也会有表现不同的意义理解的不同说法。例如，美国人称诺曼底登陆，俄罗斯人称“开辟第二战线”。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二战”甚至不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战争。

即便是在同一群体里，集体记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着新一代人的变化而变化。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把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视为“二战”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但不同的群体又持不同的观点。老年人（那些曾经在战争时期活着的人）从正面角度来看投弹（10分制的测量中大约是8分），因为原子弹结束了战争，他们过上了美国式的生活；而大学生眼里这是一个负面事件（大约3分），因为原子弹爆炸导致成千上万平民受伤和死亡，而且不管怎样战争肯定会很快就结束）。2015年，奥巴马访问广岛时，美国的新闻提到自战争以来民意调查评估显示，民众对原子弹爆炸事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被遗忘的总统

集体能记住，意味着集体也会遗忘。瑞迪格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研究美国总统如何被迅速地遗忘。

他的研究要求人们在5分钟之内尽可能多地回忆起美国历史上的总统，实验分别在1974、1991、2009年进行了三次。参与调查的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现任总统是谁，除此之外，人们总是能够回忆起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之后是林肯。林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任内领导北方打赢了美国内战，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而被历史学家和媒体反复提起。再其次，被人们较多回忆起的是那些离今天比较近的总统。

瑞迪格发现，肯尼迪和尼克松被遗忘得比较慢，但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福特被迅速地遗忘了，虽然他们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1974年，97%的大学生能想起约翰逊，1991年下降到71%，2009年这个数字只有42%。

另一方面，也许美国人知道总统是谁，但不能在5分钟内回忆出来。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瑞迪格和合作者们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一个大型的认知测试。他们给人们提供了123个不同的名字，一次一个人，其中包括41位总统（比如扎卡里·泰勒），没有变成总统的副总统（比如利维·莫顿），其他著名的美国人（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有一些听起来像是总统的名字（比如托马斯·穆尔）来混淆视听。虽然最终识别率远高于之前的研究，但是一些总统仍然被民众认识不足，比如切斯特·阿瑟（被46%的人识别）、富兰克林·皮尔斯（56%）、米勒德·菲尔莫尔和本杰明·哈里森（都是65%）。

此外，71%的人认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总统，39%的人认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物理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是总统。“这些错误可能是因为‘我记得历史书上有这个人的名字，所以他肯定是总统’。”瑞迪格认为。

研究还预测，到2100年，仅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还会记得主持了“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的总统尼克松，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还会记得曾任“二战”盟军欧洲最高统帅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启了“冷战”的杜鲁门、让美国积极介入越南战争的约翰逊以及美国历史上唯一未经选举就接任副总统以及总统的福特。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建国的皇帝和亡国的皇帝一般为人所知，比如第一个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以及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朝代

中间的大多数皇帝并不为诸多中国人所熟知，只有几个皇帝因为突出贡献而被写入教科书里而著名，比如文帝、景帝是由于文景之治，汉武帝刘彻是因为北击匈奴，光武帝刘秀是因为中兴汉室。即便统治者们往往希望功勋卓著、流芳百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被迅速地遗忘了。

集体记忆不仅会改变对过去的回忆，也会影响未来的行动。2002和2003年，美国政客为入侵伊拉克进行辩护，支持者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证明入侵的正当性。他们认为，阻止萨达姆类似于拦截一个新的希特勒，在他入侵邻居的领地之前发动战争。辩论的另一方则把伊拉克比作越南，他们认为美国介入了一场当地争端，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利益，这样做可能会卷入一场旷日持久和代价高昂的战争。

了解一个国家的记忆，需要掌握一部分他们的民族身份和展望。当然，国家没有记忆，但国民保持的记忆往往有共同的主题。2014年，维特奇曾通过集体记忆分析乌克兰事件后普京为什么无视西方的反对，做出令西方政治家困惑的一系列行为。他认为，“集体记忆之所以是集体的，是因为每个人都使用着相同的叙述工具”。维系俄罗斯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叙事就是对外敌入侵的强调。在这些叙事中，敌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屈辱，俄罗斯人经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终战胜了敌人。在苏联顽强反抗希特勒入侵的战争中，整个世界见证了这一叙事所发挥的作用。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相同的故事已经上演了数百年，只是反抗对象有所不同，例如13世纪反抗蒙古人，同一时期反抗“日耳曼人”（条顿骑士团），16世纪反抗波兰人，18世纪反抗瑞典人，19世纪反抗法国人，20世纪再一次反抗德国人。这些事件在几百年无数次的复述中生成了一种通用的公式化的叙事模板，被俄罗斯记忆共同体的成员广泛而自动地使用，用来理解历史中的事件，同样也被用于解释当下发生的事情。

“心理学关于记忆的大量研究表明：首次接触信息，或者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讨论、复述会深深影响被记忆的内容，事实上这一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有信息说服人们他们某一记忆是不正确的，他们仍然会保有这一记忆。”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集体记忆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如此，我们就会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即便我们并不认同。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更好地预测一个群体或者国家可能在未来采取什么行动。”维特奇说。□

大北鼻遇上小北鼻，重返“孩次元”你准备好了么？

《本杰明巴顿奇事》中，布拉德·皮特的身体返老还童，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的身体无法实现超自然的逆转，不过心理上却可以用孩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腾讯视频最新推出的孩次元体验真人秀《放开我北鼻》就让一群“鲜肉”体验了进入“孩次元”的欢乐。刚刚播放了两期，其新颖的形式、搞笑与温情并进的节奏，以及大北鼻和小北鼻的真性情流露都让这个节目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放开我北鼻》首次提出“孩次元”概念，用孩子的眼光、角度重新定义现实世界，重回孩童时代。节目中清一色的鲜肉和一群不足5岁的萌娃，发生各种逗趣萌事，大北鼻带着小北鼻，让鲜肉们纷纷进入“孩次元”的世界。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里，年轻男孩子应该还处在玩着游戏谈着恋爱，自己都还是个大孩子的阶段，一如节目里刚刚出现时的于小彤。这个个头很高，情商还没长到这么高的大男孩在节目里处处体现出了时下“90后”的特色：带着孩子们在墙上乱涂乱画；让去买菜做饭结果买了一堆零食，让另一个“穷人孩子早当家”的马天宇哭笑不得。马天宇则是相对早熟的男孩子代表，会做饭、懂事理，虽然偶尔也会“崩溃”，也会和孩子们闹着玩地斗嘴，但总的来说表现得非常出乎观众意料。

与他们形成鲜明反差的萌娃们则是选用了5个素人小朋友。节目中，孩子们作为主导，引领鲜肉们走进童真的世界。在500小时的生活里共同成长，时不时地用二次元的眼光来还原孩子们的世界。于是我们看到了呆萌可爱、性格各异的5个小主角：有懂事的小萝莉，呆萌的小吃货，偶尔刁蛮的小公主，时时耍帅的小帅哥。素人娃娃没有明星的光环，且小孩子的天真烂漫除去了作秀的可能，一切的行为都可谓是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地大哭，闹脾气，打闹，不睡觉不吃饭，尿裤子……一切都是面对萌娃的必经之路。鲜肉们的“无措”和萌娃们的“无序”构成了节目最大的反差萌看点。

鲜肉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也拉近了距离。一开始马天宇和于小彤的自我介绍为“马天宇爸爸、于小彤



爸爸”，但是后来孩子们已逐渐改口为“马天宇哥哥、于小彤哥哥”，称呼上的转换瞬间将两位成人带入了北鼻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节目里，通过鲜肉与萌娃相处，解决层出不穷的状况，见证了大北鼻和小北鼻的共同成长。一开始鲜肉们会用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和要求5位萌娃，但是当他们转变角度，就会发现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大北鼻们也在与小北鼻的相处中潜移默化地进入孩童视角。

孩子们也用实际反应告诉我们他们的变化，从开始时哭着要妈妈到习惯了有事扑向哥哥们的怀抱，从各种不要和抗拒到慢慢听话，连最小的哈琳都学会了原谅打她的小朋友，最萌的噗噗也执着地念完了规定的广告词……

以孩子的语言、孩子的思维来看待世界，你会发现世界大不同！所以，看“孩次元”的《放开我北鼻》，你准备好进入这个好心情的世界了吗？



第五种力？

文 / 苗千

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实验小组，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长时间未引人注意的论文，将近一年之后，却在物理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的物理学家认为这个发现意味着基础物理学将被改写，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将被拓展，暗物质谜题即将被解开，也有人认为这篇论文和数据都不值得信赖，不值得过多关注——结果到底如何，最终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匈牙利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阿提拉·卡撒兹纳霍凯 (Attila Krasznahorkay) 与同事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并在 2015 年 4 月把它发布在了论文预印本网站上。这篇论文在网上的最初几个月并未吸引太多关注，直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员巴尔托什·福纳尔 (Bartosz Fornal) 在网上搜索时偶然搜到这篇论文，这个消息引起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粒子物理学家冯孝仁 (Jonathan Feng) 的兴趣。

匈牙利物理学家们的论文《对铍-8 原子核反常粒子对的观测：可能指向一种轻的电中性玻色子》(*Observation of Anomalous Internal Pair Creation in Be8: A Possible Indication of a Light, Neutral Boson*) 最终于 2016 年 1 月发表在著名的《物理评论快报》(PRL) 杂志上。这个匈牙利研究小组利用质子轰击锂-7 原子核，产生出不稳定的铍-8 原子核，随后铍-8 原子核迅速衰变为电子-正电子对。根据物理学标准模型的预测，电子-正电子对的数量应该会随着测量角度的逐渐增大而减少，但是实验人员惊讶地发现，在 140 度的方位，电子-正电子对的数量忽然反常地增多，出现了一个高峰 (bump)。实验人员声称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反复进行测量，发现这种情况纯属偶然的概率只有两千亿分之一——这意味着某种尚且不为人所了解的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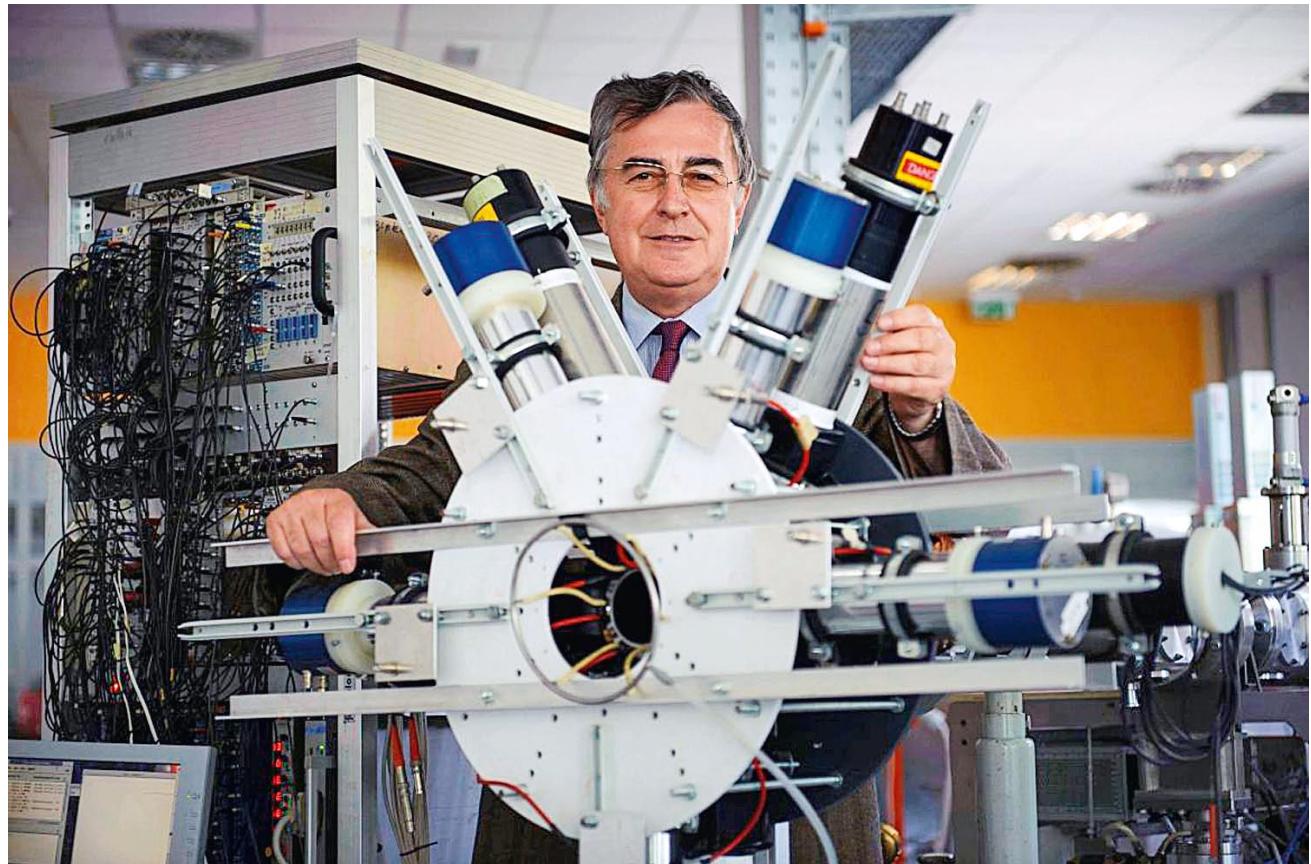
论文主要作者卡撒兹纳霍凯认为，这个现象意味着可能存在一种新粒子。而最有可能的，正是无数粒

子物理学家们苦苦寻找的，承载了自然界中第五种相互作用的“暗光子”。这种目前尚存在于理论中的基本粒子不仅将拓展人类描述自然界一切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也将把困扰了物理学家多年的暗物质纳入到基础物理学的框架中——在理论上，暗光子可以像光子一样与普通物质发生相互作用，而同时也可以与暗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毫无疑问，这个猜测一旦得到证实，将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必将开启物理学的新纪元。

人类目前认识到了自然界存在的四种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除了引力相互作用尚无法被纳入到标准模型内之外，暗物质、暗能量等物理现象也无法利用标准模型来解释。因此很多物理学家怀疑，自然界中还存在着涉及暗物质的第五种相互作用，而暗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传递，就是由理论上的玻色子——暗光子来传递。在这样的背景下，匈牙利研究小组发现的反常现象，说明可能存在一种质量约为 16.7 MeV，仅为电子质量 34 倍的玻色子，自然而然会令很多物理学家联想到这可能正是承载着第五种相互作用的关键粒子。

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JLab) 进行的暗光实验 (DarkLight Experiment) 是一个由几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主持的持续了数年的实验项目，它正在寻找的就是普通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桥梁：暗光子。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暗光实验项目把高能电子束射向氢气，高能量的电子一旦与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的氢原子发生撞击，就有可能产生出假想中的暗光子，随后人们就有可能观测到暗光子衰变产生的电子-正电子对。目前，暗光实验正在寻找 10 MeV 至 100 MeV 质量范围之间的暗光子，在得到消息之后，他们将把 17 MeV 质量设为实验的首要对象。这种暗光子如果真的存在，暗光实验将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发现它。

美国加州大学的粒子物理学家冯孝仁分析了匈牙利研究小组的论文，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这种可能存在的基本粒子并不是理论上的暗光子，而是另外一种被他称为“X 玻色子”的粒子。这种粒子



匈牙利物理学家阿提拉·卡撒兹纳霍凯

承载一种极短的相互作用，其作用范围只有几个原子核的距离，而且可以与光子和中子发生相互作用。冯孝仁认为，这种质量较轻的玻色子之所以长时间没有被发现，正是因为它与质子和中子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光子恰好相反：X玻色子可以与中子发生相互作用，却躲避质子。他在网上发布了论文《从铍-8核跃迁发现的疏质子的第五种力证据》(Evidence for a Protophobic Fifth Force from ${}^8\text{Be}$ Nuclear Transitions)，而目前欧洲核子中心的科学家们也开始在LHCb(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底夸克实验)此前的粒子对撞实验数据中寻找这种玻色子存在的证据。

显然并非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感到信服和激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物理学家奥斯卡·纳维利特-昆西奇(Oscar Naviliat-Cuncic)查看了这个匈牙利研究小组的实验数据和历史，发现这个小组关于铍-8原子核的实验，曾经在2008年、2012年和2015年

分别发表过三篇会议论文，他们在第一篇论文中声明发现了一种质量为12MeV的玻色子，第二篇论文声明发现了一种质量为13.45MeV的玻色子，到了2015年玻色子的质量则变成了16.7Mev，而在第三篇论文中，前两次论文中的数据都消失了。纳维利特-昆西奇认为，这样选择性地呈现数据让人无法认真对待这个研究小组的结论，或许再过几年，这个新玻色子的质量还会继续改变。

无论如何，这种可能存在的新粒子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兴趣，并且在还未得到确定时就已经承载了人们太多的期待，物理学家们太需要基础物理学出现些许的新意，而不是被长久地困在广义相对论和标准模型之中。现在人们只能等待，希望其他实验室进行类似的实验，让时间来判断这个大胆的假设。□

(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杂志和《Quanta Magazine》的报道)

那一夜 这一夜

文 / 张斌



法国球员安东尼奥·格里兹曼在 2016 欧洲杯决赛中带球进攻

去年 11 月 13 日晚，莫德·格里兹曼漫步在巴塔克兰剧院里，这是她生活在巴黎最心仪的去处之一。Eagles of Death Metal 乐队在此歌唱，更让那一夜平添了一丝期待，时针指向 21 点，莫德·格里兹曼将手机完全抛在脑后，拉着男朋友的手，让整个世界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吧，弟弟安东尼奥·格里兹曼作为首发前锋在法兰西大球场与德国队比赛，这本该是令人沉醉的夜晚。

抛弃手机，就是暂别这世界。21 点 20 分，法兰西大球场外两声沉闷的爆炸声，奥朗德乘坐直升机远遁危难，Twitter 和 Facebook 上恐怖瞬间传播开来，但莫德与男友全然不知。因此，当恐怖分子冲入剧院高声喊喝时，莫德与身边人竟认为这不过是恶作剧而已，演出的一部分，甚至还有人轻声笑了出来。顷刻间，枪声和爆炸声让剧院变为地狱，本能让莫德和男友向前扑倒躲避枪弹，混乱中一名女子倒在了两人之间。莫德的脸贴在地面上，双眼紧闭，她不敢看周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屠杀一直未曾停歇。

至今，莫德都无法回忆起身边那位女子的肤色、发式以及体态，她只是记得与之紧紧握在一起的那只手，女子的另外一只手与莫德男友的手同样抓在了一起，恐惧中这是唯一的支撑，三个人不敢有一丝一毫

的动作，装作死去，唯有握在一起的手一次次用力，彼此传递着活着的信息。身边不断有人中弹，奔跑和惊叫引来弹雨倾泻。就这样僵直地在地上趴了将近 90 分钟，三个人都生怕握着的那只手会瘫软下来，还好他们终于等到了警察冲入剧院的那一刻。

8 个月过去了，在家乡马贡的阳光下，莫德的微笑淡淡的，3000 人的小镇是他和弟弟共同长大的地方。20 年前，当弟弟开始踢球时，年长 3 岁的姐姐充当了未来伟大前锋面对的第一位门将。那一夜，剧院里死难者超过 90 人，死中得活，深夜 2 点，她和男友相互搀扶着离开剧院，走了很久才遇到一辆出租车，一再恳求之下，司机才准许他们上车，两人浑身血污，甚是吓人。

那一夜之后，莫德并没有求助于任何心理治疗，她还曾在马德里遭受空袭后，在电话里宽解弟弟的紧张情绪。但恐惧对心理的笼罩挥之难去。去年底在超市里，莫德身后的一个小男孩突然跑了起来，其实不过是去追赶自己的妈妈，但幻想中的惊恐让莫德浑身战栗，她以为人质事件又从天而降了。今年初，莫德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延续专业，为出落成大明星的弟弟做公关负责人，姐弟情深，这个角色非其莫属。在弟弟未曾出名前，姐弟结伴出游纽约，那些妙趣横生的小视频都是姐姐拍摄并亲自上传到弟弟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的。

随着法国队一步步向前，马贡小镇的父老一次次整齐划一地身着格里兹曼球衣，面带“格子”面具，在市政厅会聚，为自家的骄傲加油助威。自小离开马贡，格里兹曼在西班牙闯荡，但他极为恋家，只要有两天的假期便会赶回马贡，与家人团聚。杀进决赛自然会让小镇沸腾起来，恐惧的影子一直都在，一座金杯会让马贡乃至法国开心一笑，在心中去埋葬枪声和血污。格里兹曼理应记得姐姐在那次死中得活后特意做的略带苦涩的文身——Eagles of Death Metal 乐队主唱哭泣着拥抱埃菲尔铁塔。此前，莫德身上的文身包含着弟弟安东尼奥·格里兹曼的生日以及另外两个弟弟西奥的名字。

从 11 月 13 日到 7 月 10 日，那一夜到这一夜，法兰西需要驱散躯体内尚存的伤痛，需要举国欢笑，一场胜利就足够了。□

奥巴马要借用萨德扮演“硬汉”

文/宋晓军

7月8日，韩国国防部宣布韩美同意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则消息一出，一些媒体记者就纷纷打电话来要求采访。其实对此事的看法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容易被受众接受的“大众版”，一个是与美国大选相关的“大选版”。一般接受采访时我都会说第一个版本中的观点。而我在第二个版本中的观点则是：奥巴马要借用萨德扮演“硬汉”。

要解释“大选版”中的观点，首先要回顾奥巴马执政7年半来对俄罗斯、中国和朝鲜这三个相关国家在军事上表现出来的“软弱”。俄罗斯不仅兵不血刃地“拿回”了克里米亚，而且还在地中海、东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方向保持了军事存在或军事威慑。中国不仅实现了对钓鱼岛的常态化巡航和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而且还完成了在南海相关岛礁的填海造地和防御性武器的部署。朝鲜不仅完成了三次核试验和几次在军事上对韩国的“敲打”，而且还不断试射各种射程的火箭、导弹恐吓韩国和向美国“叫板”。针对俄、中、朝上述这些“军事性溢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其收效不仅受到了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军方将领的诟病，而且也给一些盟国带来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很显然，这些都可能是让民

主党在临近的总统大选中“丢票”的因素。因此，奥巴马必须要在大选临近之代表民主党扮演一次“硬汉”的形象。

说到奥巴马为“大选”在任期的最后半年扮演“硬汉”这个话题，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无论是在北约峰会后向中东欧国家派驻军力的问题上，还是派“里根号”航母去南海为菲律宾单方面提交的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公布站台，奥巴马政府貌似都摆出了一副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但毕竟其中还是留下了谈判和接触的空间。如北约峰会后要与俄罗斯进行的“大使级会谈”，如在“2016环太演习”中美海军首次与中国海军举行潜艇救援联演。唯独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事上，没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就越过了之前中、俄两国政要不止一次强调的“红线”。奥巴马的这一举动，给人的感觉是要通过中、俄两国迅速发出的“强烈抗议”来树立自己的“硬汉”形象。有意思的是，为了强化“硬汉”形象，奥巴马政府在7月6日还首次将朝鲜最高领导人列入了制裁名单，其效果就是营造了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三国的“抗议声”此起彼伏。当然，尽管奥巴马的这个“硬汉”形象要等到2017年12月“萨德”真正在韩国落地才能坐实，但毕竟在两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也算是奥巴马政府为民主党外交政策的一种“成功造势”。

最后我想说的是，奥巴马要借用萨德扮演“硬汉”，只是基于美国大选临近观察问题现象的一种视角。其实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根源，还在于美国试图利用各方利益交织最为复杂的朝鲜半岛维持其“前沿存在”的战略意愿。而在大选期间竭力敦促政府将这一战略意愿尽快兑现的，恰恰是与“萨德反导系统”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样的美国军火巨头。这些军火巨头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以朝鲜半岛为平台与中、俄两个军事大国展开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对于这一观点，不仅我在2016年第9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文章——《“萨德”入韩的博弈》一文中已有所表述，而且7月8日纽交所开盘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票走势向好也从侧面提供了一个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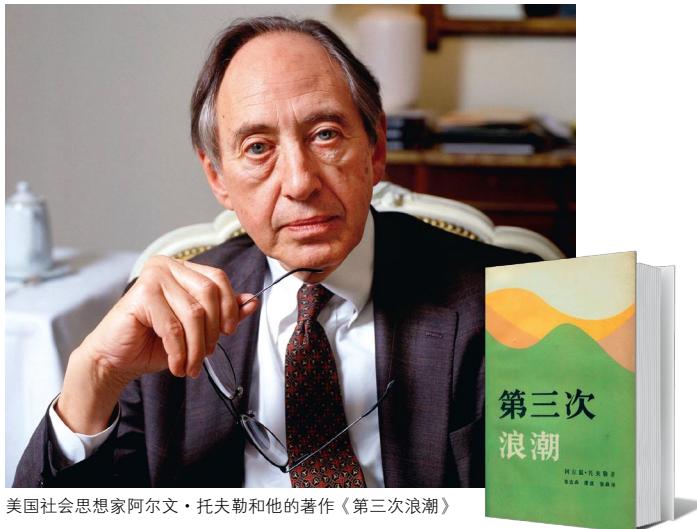


7月8日，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麦达和韩国国防部官员Yoo Je-hyeon在新闻发布会称驻韩美军将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翻转时间之镜

主笔 薛巍

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 6 月 27 日去世，享年 87 岁。他被誉为后工业化时代的大师，成功预言了电子邮件、互动媒介、网上聊天室、有线电视和虚拟现实的普及以及克隆技术的发展。



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和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

描绘未来

80 年代初，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很快就成为排名第二的畅销书，让许多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心潮澎湃。他的追随者中还有一些国家的领袖和商业大亨。6 月 29 日，美国在线创始人史蒂夫·凯斯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说：“我很荣幸见过托夫勒，他在我的人生以及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80 年，凯斯在上大学时读了托夫勒所著《未来的冲击》后深受启发，其中描绘的“电子全球村”促使他在 5 年后创建了美国在线。墨西哥富豪卡洛斯·斯利姆也曾向托夫勒寻求建议。

美国记者约翰·朱迪斯说：“阿尔文·托夫勒夫妇不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那样的天才，但他们

是严肃的经济史学生，他们的著作更接近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和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而不是约翰·奈斯比特和乔治·吉尔德。在 60 年代，他们最早理解了计算机技术造成的剧烈变化的人。”（托夫勒的书基本上都是他跟妻子海蒂·托夫勒合著的。）

6 月 29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托夫勒的讣闻。文中说：“托夫勒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社会科学学者、一位成功的杂志自由撰稿人，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他决定花 5 年的时间研究他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看到的文化巨变的起因。他的研究成果是 1970 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这本书卖出了几百万册，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使他举世闻名，现在该书仍在刊行。他在书中说，科学、资本和沟通加在一起引发的迅速变化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他对其在文化、家庭、政府和经济上造成的影响的预测非常准确。”

1965 年，托夫勒在《地平线》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未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创造了“未来的冲击”一词，用于描述个人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受了巨大的变化之后经受的粉碎性压力和困惑。这篇文章为他赢得了兰登书屋的出书合同。经过 5 年的研究之后，他在 1970 年出版了《未来的冲击》一书。他在导言中说：“从前，人们研究过去以阐明现在。而我则翻转时间之镜，深信有关未来的清晰形象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洞察力，帮我们认识今天。”他把未来当作一种有用的智力工具。

在托夫勒看来，这巨大的变化是技术引发的。他毕业于纽约大学英语系，并不知道“并非所有的 chips（薯条 / 芯片）都是土豆做的”，但他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信息技术的影响力。他在书中说，电脑的普及将影响人们的学习方式、记忆方法、做决定的方式。

他还创造了“信息超载”一词：“如果感觉层次上的过度刺激增加了我们对现实的曲解，认识上的过度刺激会妨碍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一些固有的限制因素。信息超载，使一个人接受超过他能处理的信息可能导致精神分裂。”

他描述的“体验工业”就是今天所说的虚拟现实：“顾客在模拟的环境中品尝冒险、危险、性的快感或其他乐趣的滋味。这种技术将重现古罗马的壮丽、伊

丽莎白女王的宫廷的华丽、18世纪日本艺妓场所的性态主义等等。”

托夫勒说，迅速的变化使人们更加自由，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焦虑，“早熟性未来的来临导致人们茫然失措。它可能是明天的最严重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吸毒人数的增多、神秘主义的兴起、野蛮和暴力的复苏、虚无主义和怀旧政治、上千万人的冷漠。他认为，人类为了求生存，为了避免未来的巨大冲击，必须加强其应对能力及适应性；“人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方法，使自身能安身自处。因为过去的一切社会基石，宗教、国家、团体、家庭或职业等，目前都已在加速推进力的猛烈风暴下摇摇欲坠了。”

信息技术的浪潮

在《未来的冲击》之后，托夫勒从个人如何应对社会的剧烈变化转向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朱迪斯说，《未来的冲击》是归纳式的新闻报道，从逸闻到观察到解释，《第三次浪潮》则是一套世界史理论的演绎。这两本书的心态也不一样，《未来的冲击》沾染了60年代的歇斯底里和夸张，《第三次浪潮》则更为冷静、乐观。

托夫勒认为，世界正从生产产品的工业化时代向生产信息的时代迈进。在新的时代，一切都去中心化了：人们更多地在家里工作，公司的等级制变平了，变得更加松散。政府的角色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服务于一个不加分别的大众客户，而是服务于相互竞争的利益。中央政府的许多功能要么被私有化了，要么还给了更能满足选民需求的地方。民族国家萎缩了，对贸易和环境的管制转移给了超国家组织或全球市场。正在出现的既不是一个由公司支配的未来，也不是一个全球性政府，而是一个远为复杂的体系，相当于在某些先进工业中兴起的矩阵组织。

他认为，第三次浪潮要求一种完全新型的领导作风。“一个领导人的才能不在于他自信专断，而在于从善如流；不在于他专横霸道，而在于富有想象；不

在于他权迷心窍妄自尊大，而在于对领导新世界的局限性颇有自知之明。”

托夫勒说：“任何严肃的未来学家，都不去做什么预言。只有电视中的预言家和报纸上的占星士才干这种行当。”但他书中毕竟做了许多预测，其中哪些被证明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呢？BBC记者柯特妮说，托夫勒正确地预测到了知识经济的兴起，他说：“21世纪的文盲不会是那些能读能写的人，而是那些没有能力学习和不断更新知识的人。”

他准确地预言了克隆：“人类能够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生物复制品。我们也将能养育出视力、听力超众、具有辨别气味的特殊能力，具有超常的体育和音乐技能的婴儿。妇女可以买到一个微小的冰冻胚胎，带到她的医生那里，请他移植到她的子宫。”

他还正确地预测到了消费主义的兴起：“使未来的人们深受其苦的，不是缺乏选择的机会，而是无力应付过多的选择。他们最终可能成为过多的选择机会的受害者。”在消费方面，他还说准了一用即弃的文化、自己动手的趋势。

他落空了的预测包括城市的衰落、水下城市的出现、太空殖民、无纸化办公、人际关系的隔阂。他曾经说：“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未来。但我们能够辨别出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模式。”

托夫勒远非唯一预见到经济从制造业向信息化转型的人，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有效地把这些概念通俗化。他写出了许多简短又睿智的话，如：“如果你没有战略，你就会成为别人的战略的一部分。”“未来总是来得太快，而且是以错误的顺序。”“问题不在于人们能否在严密管制和标准化的条件下生存下去，而在于人们是否能幸免于自由。”

托夫勒说，迅速的变化使人们更加自由，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焦虑。

那些看不见的危险

文 / 维舟

在现代社会之前，是谈不上有什么大范围的食品恐慌的，因为正是现代食品工业和大规模物流体系才使之成为可能。

虽然那些狰狞丑恶的形象时常令人恐惧，但真要说起来，最使人害怕（有时是畏惧）的事物其实并不是这些具体的形象，而是那些看不见的存在——在古代是鬼神，而在驱散了鬼神的现代，则让位于那些肉眼不可见的细菌、病毒或辐射。如果说大众有时对这种看不见的危险所表现出的忧虑与恐慌显得有几分歇斯底里，那毕竟也情有可原，因为对这类致命但却无影无形的存在，普通人除了相信某个权威（然而有时权威也不可靠）之外，你唯一所能相信的仅是自己的感觉而已。

在现代社会之前，是谈不上有什么大范围的食品恐慌的，因为正是现代食品工业和大规模物流体系才使之成为可能，而在此之前，人们都是分散地在当地就近获得食物的，即便偶尔食物中毒，那也只是孤立的个别事件。正因此，哈维·列文斯坦在《让我们害怕的食物》中认为只是从19世纪晚期起，美国人才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食物空前丰富，但人们对该吃什么却越来越焦虑不安。如果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不是偶然的变化。正是因为在“理性与进步”大获全胜的19世纪，“上帝死了”，现代文明自此步入一个由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而人们又被教导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在此情况下，所有人都要训练出一双“发现之眼”，学会从食物中“看见”那些事实上不可见的细菌、益生菌、维生素，或任何其他据说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这样，判断食物好坏的标准就不再是它好吃与否，而在于它是否有营养、是否健康。糟糕的是，这两者经常相互冲突，好吃的甜品、炸鸡块及肥肉所含的成分可能都会破坏你保持形体的努力。原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的感官系统就能迅速判断某种食物能不能吃，然而，在病菌理论和新营养学建立之后，人们逐渐变得不再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把决策权让渡给了

专家，因为只有专家才能分辨那些细菌和营养成分，告诉你应该各自摄入多少，以及哪些食物里包含着有益或有害的成分。这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大异其趣：神农是亲口去测试自然界中未经加工的某一种食材是否能吃，但现代的专家则是辨析那些仅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成分是否有益于人体。

如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把“营养”一词挂在嘴边，很难意识到这本身便是一种现代性体验。现代汉语的“营养”一词本身是近代才直译自日语的“栄養”(eiyō)，而日语又是用汉字意译英语 nutrition 的结果。“营养”与科学性话语紧密相连，一种食物的价值便自此以健康的价值作为基准。在传统社会，饮食往往是一种社交行为、一种享受，即便对食物本身，注重的也是好吃（美味）而非有营养——传统的山珍海味如鱼翅、鲍鱼、燕窝、海参，从营养学角度来说都谈不上多有价值，只有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下才会特别推崇。当然，“营养”本身也基于西方文化的思想，这种特殊的观念认为，人吃东西的过程是一个从宇宙中获取微量元素的过程，强调人体从环境中汲取物质来维持自身的运作。在现代人的潜意识里，身体逐渐被看作一台需要管理的机器：要维护它的运行、健康、活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仔细“管理”它所摄入的能量，并随时发现隐藏在食物中的那些看不见的物质，以及不间断的数学计算，因为摄入的某种元素（例如脂肪）的量变可能产生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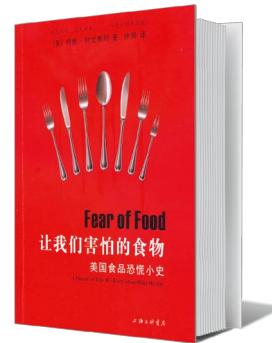
虽然人人都有享受美味的口腹之欲，但一旦涉及关键的健康和形体问题，那就都得让位。在大部分传统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健康乃至寿命，常常都抱有一种宿命论的达观态度，而肥胖甚至还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具有正面意义。但现代的丰裕社会则把这些价值观都倒了过来，美国人尤其如此，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雅典娜一样，一开始就是一种全副武装地跳出来降生的现代文明。美国人比谁都更害怕生病和衰老，而期望通过某种合理的（注意不是“享受的”）饮食方式获得精力充沛的健康生活，难怪曾有英国人挖苦说：“美国人都以为死亡是有得选的。”既然生老病死都不是必须坦然面对的“自

然规律”，而是有办法避免或改变的，那焦虑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你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而导致不够健康、不够苗条或不够长寿。

最能折射这种焦虑感的，或许是那些都市传说，诸如碳酸饮料其实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这样的故事，多少年来一直在流传。这其中有一个微妙的循环：人们信以为真的故事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但又正是这种世界观催生出了这些故事。正如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在《消失的搭车客》中所说的，“尽管他们对随处可见的细菌或害虫颇为厌恶，但是一些民间传说却偏偏要讲述这些讨厌之物对经过消毒的中心领域的入侵”，因为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们担忧恐惧这样的可能，才造成了越恶心惊恐的故事流传越广的局势。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出于对食品污染的恐慌，不同国家的都市传说所针对的批评对象不同：在德国故事中往往强调提防外国工人，而美国的传说则抨击大企业唯利是图。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现代食品工业之所以会引发消费者的恐慌，是因为一种食品在送到人们手里之前的种植、加工、运输和销售环节都变成了陌生的代理人企业在介入了，而这其中很可能由于工人的不负责任或企业利益的目的而被人动了什么手脚。想想现在一旦出现食品恐慌时使用的“召回”一词——那一般都是对工业制成品所使用的术语。由于人们的肉眼无法察觉问题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又不可能看到食品生产的全过程，那么很自然地，他们所能相信的就只能是不同食品的品牌了。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生产在食品加工中似乎总不免让人产生不舒服的联想，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竭力撇清，转而宣称自己所推出的是“无防腐剂无添加剂”“纯天然食品”等等。

在谈到如何免于被食物恐慌的风潮裹挟时，哈维·列文斯坦在书末建议：“我会说第一条策略是观察一下提出这些恐慌的人，然后自问：他们在这事里面有没有利益吗？”这也算得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思维，即认为许多人是出于私利的动机在推动话题的发酵。不过平心而论，有时（甚至往往）这些流行观念的提出者自身是真诚地相信这些建议的，也正因为它们不全



哈维·列文斯坦作品
《让我们害怕的食物：
美国食品恐慌小史》

然是出于私利，所以才能如此盛行；而那些大企业，只是在这些盛行的观念中发现了商机，并由此推波助澜，因为顺应消费者的偏见要比纠正它有利得多。

至于那些事后看来可笑的科学建议（“我很强壮，我爱吃菠菜”），固然有时也与利益纠缠不清，但多数情况下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科学本身就是一些有待证实的假设，内行人往往有着互相冲突的观点（所谓“每个博士似乎都有一个观点与他完全相反的博士”），甚至一个观点自身也包含着内在矛盾或复杂的因果解释，但在观念传播的过程中，假设往往就被当作了明确而不容置疑的结论，即便是深刻的见地也被略去了复杂的论证过程。

这些简化版本之所以胜出，往往只是因为这样传播起来更容易。正如谣言传播中经常看到的那样，一则谣言到最后往往简化到只剩下核心的几点信息。在向公众诉求时，完整地交代科学论证过程只会把许多人绕晕，因而最终便归结到某些简单易记的单一因素和结论性短语，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观念，群体性的信奉与恐慌，都是由此而来。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在很久之后，才逐步意识到，这种伪装成常识的简化结论，其实是有问题的。话说回来，这又岂止是在食品恐慌的问题上如此，在社会政治观念的流传上，这样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让我们害怕的食物：美国食品恐慌小史》，哈维·列文斯坦 著，徐漪 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阿摩司·奥兹

(黄宇 摄)

别想从奥兹那儿得到答案

记者  孙若茜 摄影  黄宇

为了接受“首届 21 大学生国际文学奖”——一个由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班的 21 位年轻作家评选出来的文学奖项，诺奖热门候选人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前不久来到了中国。他说：“当我第一次听说 21 名作家要给我颁奖时，我完全惊呆了。一个作家要得到同行的认可，往往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在梦中——难道我已经死了吗？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奇迹。”

来北京后的一个下午，奥兹在人大给年轻作家们上了一堂创意写作课。在课上，他说：如果要我布置一个作业，你们猜会是什么？去写一个大概只占半页纸的小片段——一个丈夫和他的妻子，吃完饭后到底谁去倒垃圾？写作的时候要同时站在双方的立场上，同时对两个人表示赞同，乃至同情，但又要同时对他们双方都抱有讽刺的态度，与他们双方都保持距离。当然，最后不必去关心究竟是谁去倒了垃圾。

此行，奥兹在不同的场合下进行了几次不同主题的演讲，说了好多闪闪发光的句子，完成了很多动人的表述。但这个小小的课后作业却成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就好像奥兹告诉了我他在写作中最重要的机密。让我想起他曾经在那本被公认为他最好的作品，带有半自传性质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的序言里说的，他写那本书是为了揭示一个谜：“聪慧、慷慨、儒雅、相互体谅的两个好人——我父母——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怎么竟是如此怪诞的方程式，也许好和好相加等于坏？”作家说他自己并没有在书中找到谜底。“作为读者，如果你希望在读过 500 多页之后发现究竟是谁犯下的罪愆，那么最好还是去读别的书。”别想从奥兹那儿得到答案。

为了解释自己出的题目，奥兹接着讲了一个流传在以色列民间的古老的故事：两个人牵着一头羊来到一个法官面前，其中一个张口说，这羊是我的。不出所料，另一个人说山羊是他的。法官听后，说：“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都是对的。”回家后，妻子问法官：“一只羊怎么可能同时属于他们两个人，你为什么说他们两个说的都是对的？”法官说：“亲爱的，你一样是对的。”或许在写作时，奥兹就是在把自己当成那个法官？

那并不简单。如果你愿意花一点儿时间提笔试试这一题，就会知道，其实很难。而如果你需要奥兹推荐一些写作的样本，大概，他的每一本书都可以充当这个角色。不过，我猜他应该会首先推荐他的《乡村生活图景》，因为这本 2009 年发行的短篇小说集，刚刚才有了中译本。当然，几乎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也都的的确确可以充当合适的范例。

据说，这本书的写作基于奥兹很多年前的一个梦。在梦里，作家到了一个以色列古老的犹太村庄，那里空无一人。起初，他在梦里拼命寻找一个人，梦做到一半，他又成了一个正在被寻找的人，开始逃跑和藏匿。醒来后，梦里的古老村庄成为这本书所有故事的发生地特里宜兰，它虽然不是梦里那样的寂寥、空旷，但是却同样忧郁，它正在衰败，像所有正被城市吞噬的村庄一样，它面临消失，即将被改造为富人们的度假胜地。在这个地方，奥兹讲了 8 个短小的故事，像那个梦一样，它们都关于寻找和藏匿，关于得到和失去。其中 7 个故事在相近的时段发生，彼此间拥有映照和关联，但这种关联是松散暧昧的，因此，你会在不同的故事里遇到熟悉的人，却并非进入罗生门。最终，每一个故事都留下一个谜，没有答案。

比如有一个关于村长本尼·阿弗尼的故事：一天中午，他正准备从办公室回家吃饭，忽然收到了一个年轻的阿拉伯小伙子送来的一张妻子写给他的字条：“别担心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字迹不慌不忙但足以让他觉得蹊跷。她去邻居家了？去买东西了？是不久就会自己回来，还是永远的告别，从此一去不返了？依照奥兹要求的那样，故事同时对双方表示出了同情和讽刺，他给出了足够的理由让这位妻子不再回来，也给出足够的理由让这次离开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很快，也许第二天，夫妻二人就会忘记。结尾，奥兹当然不会告诉我们答案，只是让本尼·阿弗尼坐在细雨中的长椅上，开始了等待。

再比如那个关于医生吉莉·斯提纳的故事：她的外甥刚刚出院，说好要到她家里休养几天。于是，在一个傍晚的公交车站里，她开始了等待。但直到末班车进站，她的外甥都没有出现。她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各种假设，他迷路了？上错车了？下错车了？她也开始四处寻找，企图发现一些线索，但最终，

她连外甥的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外甥究竟为什么没有来？显然，奥兹依旧不会告诉我们答案。作者只是让斯提纳医生极尽纠结和慌张，并告诉我们她为什么会对这个孩子有如此的爱。当然，越是那样近乎神经质，越是让人觉得她的外甥没来的理由或许极其简单，甚至于他可能都并没有和她约好会在那天出现。

故事没有答案，就像生活本身也没有答案一样。但是，因为奥兹的铺陈，当读到这些故事时，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你原本知道答案，只是忽然丢了它。奥兹说，他正是希望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就像你说自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但不知道到底丢的是什么。同样，有人可能在寻找一样东西，但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有人可能会害怕某一样的东西，但具体怕的是什么？有人在希冀一样事物，但你要问他究竟想得到什么？他回答不上来。”

奥兹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写作课老师。更有意思的是，这道写作的习题里，包含的不止奥兹的写作机密，似乎还有他的生活哲学。他几乎在以和讲这些故事同样的方式解答一切问题，在我们的采访里，他谈到每一个故事都同时包含着悲伤，但又同时都很可笑，就像“我的祖母以前常常说，这里疼，那里疼，到处疼，疼到几乎可笑”。谈到喜剧和悲剧并非来自不同的星球，“它们只是两扇不同的窗口，透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风景，是人生共同的后院”。谈到现实生活几乎同时也是魔幻的，比如，“人际关系就是一种魔法，当一个男人成功地让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笑起来，这就是魔法”。乃至谈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他为什么总是在推崇契诃夫式的结局，等等。

他总是在回答中首先建立出一对矛盾，然后用自己的逻辑把它们黏合在一起。他挑选的黏合剂，通常是那些生活中再微小不过的例证，而恰恰是这样，使他看上去似乎已经对生活达成了另一种真正的理解。

这种理解和思辨从哪儿开始？无疑是作家身处，并感受到巨大矛盾的时候。但我想回到的时间点并不是1995年1月6日，奥兹的母亲自杀的那天。虽然，那一天，他的父亲和约瑟夫伯伯，乃之整个以色列的国民都在为是否向德国索赔而进行着争论，这足以和对政治毫不关心、格格不入的母亲之间构成无法化解的矛盾。虽然那一天，影响了奥兹此后的一生。而我想回到的地方，是基布兹。母亲离开不到3年，当时15岁的奥兹就离开家，选择到基布兹——以色列当时特有的集体合作社区里生活。

此前，奥兹处在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生活之中，每天面对着的是苍白与陈腐，而门外，以色列正在建国的

热潮之中。在这种环境构建的矛盾里，奥兹的选择是，改变自己的姓氏——“奥兹”并不是作家的本姓，在希伯来语中，它是“力量”的意思，这无疑是一个人生命中要和过去诀别的重大决定。他说：“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这里的“他”，既是过去，是耶路撒冷，也指他的父亲——年幼叛逆的他将母亲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父亲。因此，基布兹是奥兹生活中毫无疑问的重要转折点。但是，这种转折的意义，并不是它带领奥兹走向了全然的反面去思考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从这里开始进入了一种对生活的思辨。

“耶路撒冷的生活中，基布兹以全然不同的面貌和美学形态监督并塑造着耶路撒冷新的道德和生活。当15岁的‘我’来到基布兹后，基布兹的面目开始丰富，也开始更加暧昧起来。劳动固然光荣，集体固然昂扬，理想固然纯洁，但是，作为个人的‘我’仍然蠢蠢欲动，想找寻个体存在的意义。”作家梁鸿说，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就选择了一种自我辩驳式的复杂语式对这段时间进行书写。同时，奥兹还有一本叫《沙海无澜》的小说，整体建构在了基布兹。它讲的是一个在那儿出生的青年，渴望摆脱固有的生活，追求更广阔的自由而出走，但几经波折，选择重返基布兹的故事。“它和《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我’思想上背离基布兹完全相反。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包含着奥兹真正的思考。奥兹没有以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衡量基布兹在以色列当代精神中的作用和价值，他在写一种生活的形式和内部可能包含的冲突。”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他不再以单纯的对错好坏来评判耶路撒冷的知识分子生活，评判一切。

事实上，奥兹一生的写作就是从基布兹开始的。他在书中提及当时读到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时所受的影响——“使我的创作之手得到了自由。”他这样写道：“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把我离开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或者我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脚踏但从未劳神弯腰触摸的大地重新带回给我。”在此之前，他几乎认为父母的窘困生活等等是不值得书写的。然而从那以后，他正视了“令人沮丧的诸多忧愁与虚伪、渴望、荒诞、自卑情结与乡野虚夸、多愁善感的教育和落伍过时的理想、备受压抑的创伤、无可奈何与绝望茫然……”作家认为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不堪，都像是得到了允许，开始进入他的写作。

于是，他才会在很多年的写作后对我们说：“我描写的单一主题是不幸的家庭”，“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写



根据奥兹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剧照

单一的主题，不幸的家庭”。

“很奇怪，当你从略显冗长和叠沓的叙述中跳脱出来时，你意识到奥兹是一个充满思辨和现实感的作家，但是，当你在读他的作品时，你感觉到他只在写家庭，他所有的文字都似乎在喃喃自语、循环往复地剖白着情感，夫妻、母子、父女，爱、婚姻、亲情。”梁鸿说。这种感觉，可能也来自于奥兹在写作中对现实和象征进行的完美杂糅。比如《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奶奶和细菌之间进行的对抗。“爷爷不得不每天早晨6点或6点半起床，拿着地毯拍子使劲地给她敲打床垫和寝具，晒晾被罩和枕头，给整个家里喷洒杀虫剂，帮助她无情地用开水煮蔬菜、水果、毛巾和厨房器皿。每隔两三个小时，他不得不用氯消毒液给厕所和洗涤槽消毒。……空气中弥漫着消毒灵、肥皂、乳膏、喷剂、毒饵、杀虫剂和爽身粉的浓雾，有些是从奶奶皮肤上飘出来的。”书中写道：“这些来自东欧阴郁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以至于通过建立自己的隔离区抵御其威胁。”于是，你无法分辨，奶奶究竟是在清除细菌，还是清除压在身上的苦难。

“虽然奥兹的作品包含着对以色列历史和政治的

探察，但他似乎并没有一定想通过家庭来寻找以色列的命运，而是致力于呈现以色列命运如何渗透、改变、塑造家庭及家庭中人物的命运，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呈现个人的存在形态。或者说，他致力于呈现：家庭，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纽带，它以何种悲剧的方式把大的社会冲突一一收纳并化为血液，由此生成个人的轨迹。”直到我们读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依然是如此。

再次回到奥兹的课堂作业，还会发现，他所提出的写作要求是可以让一个片段、一部作品经得起推敲的必要逻辑，但他没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写得迷人，什么样的语言更有吸引力。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它构成我们阅读奥兹的另一个重要的缘由，也因此依然要去他的作品中才能寻求解答。我能一下就想到的最好的例子，还是他那个让很多人念念不忘的小说《我的米海尔》的开头：“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这种循环往复的语调和伤感几乎存在于奥兹的所有作品之中。它究竟迷人在哪儿，以至于打动了你，被打动的人自然知道答案。□

“很可笑，又很悲哀。每个故事都是这样”

——专访阿摩司·奥兹

主笔 陈赛 记者 孙若茜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在一次访谈里说：“如果想知道我的写作风格，应该去看看耶路撒冷的石头。”耶路撒冷的石头有什么特别的吗？

奥兹：中国人对于石头的态度是丰碑式的，但耶路撒冷的石头，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总是在和光线游戏，光线稍有变化，耶路撒冷的石头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光线改变石头的颜色，早晨日出时，它们可能是粉色或者红色的，当太阳升高，它们会渐渐变成白色，到了晚上，它们又会变成蓝色或者绿色。各种各样的颜色，冬天的颜色、夏天的颜色……我希望我的写作也是如此。另外，就像耶路撒冷的石头，我希望我的写作也是极简主义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也会写政论。两种不同的写作可能会带来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人们或许会对你这两种身份有着完全不同的期待和要求，这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分裂感？

奥兹：不，我并没有精神分裂感。但我确实用不同的笔来写不同的文章。我的书桌上放着两支笔，一支用来讲故事，另一支用来写政论。我写政论的时候总是很愤怒，或者说，我只有在愤怒的时候才写政论。比如有人做错了事情，或者我们的政府做了冷酷无情的事，有时候我诅咒他们下地狱，他们读了我的文章，但并没有下地狱，所以我就接着写了一篇又一篇。但是，写故事的时候，我心中从来没有愤怒，而是充满了好奇、幽默、同情和怜悯。我的政论里有时会有答案，但我的故事里只有疑问。

三联生活周刊：但你总是谈到“妥协”，用一定的妥协来解决一些问题，这不像一个愤怒的人通常有的姿态？

奥兹：我相信妥协。所以，有时候，我对拒绝妥协的人感到愤怒。我对狂热分子和狂热主义感到愤怒。狂热分子和实用主义者之间不可能达成妥协。如果一个狂热分子说，你今天非死不可，你不可能拿出一个协议跟他商量，我周一周二死如何？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你无法使狂热分子妥协。

三联生活周刊：写完政论以后，你的愤怒会消失吗？

奥兹：它们会离开一会儿，然后就又回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奥兹：我已经老了，不会再幻想写一篇文章就能改变世界。我知道那不可能，但我试着让一些人重新思考。成功与否，我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谜。为什么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但三个月以后，她又爱上另一个？为什么你坐在餐厅里点了一份鱼，两分钟后又觉得还是点一份鸭子吧。为什么？这是巨大的谜题。所以，我的政论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我还是继续写，因为我觉得必须这么做，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但是，写故事就完全不同了。当我对一个问题有了答案时，我会写一篇文章。但当我听到自己的意识中不止有一种声音，而是两种声音、三种声音在彼此争论时，我知道我正在孕育一个故事，孕育一部小说。因为那些不同的声音，它们会发展、进化成不同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曾经竞选过以色列总理，是这样吗？

奥兹：不，从来没有。一位前总统曾经提议我可以作为新的总统候选人，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竞选。我连业主委员会都没有竞选过。“无可奉告”这种词对我来说纯属生理上的发音无能，怎么做得了一个政治家？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来谈一谈《乡村生活图景》。听说这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一个梦。梦的一开始你在寻找些什么，后来却变成了躲藏。真的有这样一个梦吗？还是你的一种隐喻？

奥兹：那是我很多年前的一个梦，它发生在以色列一个古老的犹太村庄里。在梦里，那儿空空荡荡的，我一人走在院子里、街道上、农场里，没有别人。醒来以后，我就知道，我的下一本故事会发生在这一片——正迅速变成富人的周末度假胜地或者别墅的古老村落。

三联生活周刊：你梦到的那片空旷的土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奥兹：我想更多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跟年华老去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某个逝去的朋友，我不知道。这得精神分析师来解答。但对我来说，独自一人身处那样一个正在衰落的村庄，



以色列“基布兹”儿童在参加普林节(摄于1959年)

是一种强大的感觉，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故事。你既然读过那些故事，应该知道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像梦一样无解。

三联生活周刊：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你的纪录片——《阿摩司·奥兹：梦的本质》。

奥兹：我们生活有一半是梦。我说的不只是我们睡觉时做的梦，还有幻想、恐惧，甚至当你坐在火车站、机场等待的时候，那些白日梦……这些梦占据了你一半的人生，甚至更多。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梦对你来说很重要？

奥兹：不仅重要，而且它是我生活的中心。这么说吧，做梦可比等着看牙医刺激多了。当我坐在等候室里等着看牙医时，我就会做梦或者幻想，它们比牙医的治疗要好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释？

奥兹：弗洛伊德几乎所有关于梦的理论都建立在性欲之上。性欲当然很好很重要，无所不在，但梦里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被他忽略了或者无视。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你在《乡村生活图景》中放入了自己所厌恶的一切，关于城市化、消费主义、

拜金主义等等，是这样吗？

奥兹：不，我从不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放进故事里。我放进故事里的，是我无法完全理解的、好奇的，或者让我感到害怕的东西——但害怕不等于厌恶。还有那些我梦到过的，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情，但我从不因为厌恶某件事情而去写一个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故事涉及很多让人沮丧、悲伤的事情，每个人似乎都生活在契诃夫式的悲剧里。你曾经说过，你所期待的巴以问题的结局是一种契诃夫式的悲剧，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但契诃夫式的悲剧结局真的就好过莎士比亚吗？

奥兹：我最爱契诃夫的一点就是他将喜剧与悲剧糅杂在一起的方式。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几乎所有人的结局都是死亡。而契诃夫的悲剧结局，是每个人都开心、失望、痛苦、幻灭，但毕竟活了下来。我更倾向这样的结局。

我并不认为巴以之间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根本没有幸福的可能，但我们必须选择，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结局——互相残杀，战斗到最后？还是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在悲伤中做出妥协，每一种妥协都是悲伤的。

回到故事中，这些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失去了一

些东西。它是关于失去。这是普世的主题，我们都在失去。我不知道对你个人而言是怎样的，但我敢肯定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每个人都经历失去。我们失去自己爱的人，失去一些希望，失去一些抱负。即使只是丢了一把车钥匙，那也是失去。失去时刻都在发生。

失去是痛苦的，但有时候也挺有趣，这正是这些故事要表达的。有时候我们说：“哦，又丢东西了，这种事怎么总是发生在我身上？”还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虽然丢了一些东西，但又找到了点儿别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材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以色列，或者在巴西、西伯利亚、赞比亚，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样一解释，听起来好像不那么让人沮丧了。

奥兹：我希望如此。比如这本书里最长的那个故事，一个中年女人，丈夫死了，孩子们也离她而去，她和80多岁的老父亲住在一个老房子里，还有一个蹭住的阿拉伯青年，他不付房租，偶尔帮忙做一点家务。有一天，老人突然开始抱怨晚上有人在房子下面挖东西，也许他老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是幻觉。但几天以后，那个年轻人也说自己听到有人挖东西。他是个阿拉伯人，他知道什么？也许是胡说八道？那个中年女人是很现实主义的，她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但过了几天，她也开始听到声音。故事讲到这里，真的有人在挖东西吗？谁会大半夜的在地下挖东西？考古学家、地铁工人，还是共同的幻觉？读者永远无法知道，但是很可笑，又很悲哀。每个故事都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好笑和悲伤同时存在，这是你所理解的生活？

奥兹：是的，好笑与悲伤，喜剧和悲剧，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星球。在学校里，我们总是被告知，它们分属不同的星球——喜剧，我们笑。悲剧，我们哭。但事实上，喜剧和悲剧只是两扇不同的窗口，透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风景，人生共同的后院。

问题在于距离。有时候，痛苦在这儿，你也在这儿，那就是悲剧。但如果痛苦在这儿，而你在那儿，它就不再是悲剧，而是喜剧。你会嘲笑自己的痛苦。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世事变迁，你也变了，12岁时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情不再显得那么可怕。每个人都是如此。一切事关距离与视角，看你站在哪里。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你的读者，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我的米海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没法

从那个故事的悲伤里走出来。那本书让人感觉你对婚姻是绝望的，任何婚姻都是没有出路的。但现实生活里，你却有着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你有感觉到其中的矛盾吗？

奥兹：所谓“快乐生活”或者“幸福婚姻”，来自好莱坞，来自电视，来自广告。“幸福”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不可能有永恒的幸福。如果没有糟糕的时刻、悲伤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知道“幸福”是“幸福”？就像一座山，没有山谷，哪来的山峰？

无论在《我的米海尔》里，还是别的书里，我描写不幸、痛苦、失败，因为它们比成功更有意思。成功可以为自己说话，你不必去写一个有关成功的故事，它不需要解释。但失败、崩溃、灾难、沮丧，它们需要被解释，需要被同情，需要共鸣。因此我更多地书写它们，而不是那些生活中令人狂喜的瞬间。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并不是对婚姻的本质感到悲观？

奥兹：不，我对婚姻本身并不悲观。让我感到悲观的是，有些人结了婚，就按照好莱坞的理想，以为从此万事大吉，只管幸福就好了。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药方。婚姻是一种日常的投资，你必须每天有所投入，但又不是交易，不是讨价还价，不是你付出更多，就得到多少。而是说，付出本身就是得到。在《我的米海尔》中，汉娜的悲剧就源于此，她不明白婚姻到底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乡村生活图景》，为什么最后一个故事突然变得带有魔幻色彩？

奥兹：最后一个故事只是记录了我的一个梦，一个噩梦，我并不确定我理解了它，我只是把它记录了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魔幻现实主义的，我应该怎么理解？

奥兹：我的意思是，魔幻现实主义不应该以狭隘的方式来理解。魔幻现实主义并不只是有人突然漂浮在半空，有人突然长出了尾巴或者突然开始吐火，这只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对我来说，每天的日常生活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你只需要用眼睛去看，再加上一点好奇心和想象力。

比如人际关系就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当一个男人成功地让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笑起来，这就是魔法。在某次交谈中，你突然发现一个人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或者人们突然向彼此敞开心扉，这也是魔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的印象里，以色列与印度

很像，整个历史都是建立在一本宗家典籍之上，真假难辨，非常魔幻现实主义。

奥兹：我觉得人类的生活本来就是由事实与幻想交织而成的。每一段人生，每一段恋爱关系，每一段旅程，都是真实与幻想的混合。几乎每一次思考人生，都会从梦开始，由梦结束。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爱以色列的这一点？

奥兹：这是我唯一知道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梦从来都是真实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相信不仅以色列如此，整个人类世界都是如此。昨天在人民大学的青年作家研讨会上，我谈到动物的性和人类的性之间的区别：人类的性总是涉及故事。有时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有时故事只发生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总会牵涉到一个故事。所以，梦和现实的界线在哪里？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魔幻现实主义，魔幻与现实之间原本就没有边界。

三联生活周刊：像书中的特里宜兰，这样的村庄在以色列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吗？我在其中好像读到了中国的故事。

奥兹：谢谢你，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赞美。我并不了解中国，但我相信一个好的故事，即便它发生在世界遥远角落里的一个小村庄，只要写得足够好，也可以具有普遍性。原因非常简单，好的故事永远在向我们讲述爱、孤独、失去；向我们讲述死亡、欲望和遗弃，这些东西都是普遍的。

我一生已经写了30多本书。我一直努力不去重复自己，但我知道我的书里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我总是在写孤独。我总是在写失去。我的祖母以前常常说，这里疼，那里疼，到处疼，疼到几乎可笑。无论《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还是《乡村生活图景》，其实都在讲：疼，疼，疼，直到它变得可笑。

三联生活周刊：有时候我们在读书时产生共鸣，有时甚至在书里发现自己内心的阴暗之处和别人如出一辙，你觉得这是一种好的共鸣吗？

奥兹：我将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名作家。当我读一本书，并在书中认出自己时，那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因为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单。当我读了一本书，书中一个角色说了一些我永远不会说的话，做了一些我永远不会去做的事——就算给我100万美元也不会去做的事，这同样是一种安慰，因为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我知道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这是文学所能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两个道理：第一，我们的秘密都是一样的；第二，

我们并不相同。感谢上帝。

我的祖父，我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写到过他的故事，曾经有人问他：“能不能说说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但差异万岁。”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解女人，老了以后反而觉得有很多不解。关于女人，到底有什么是你不了解的？

奥兹：在女人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很勤奋的学生。我所指的不仅是性别上的差异。我的感觉是，大多情况下女人的情感要比男人复杂、敏感得多，正如《圣经》所讲的那样，上帝先创造了男人，然后才创造女人。我想他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才有了更好的创造。模型2总是比模型1要好，世事大概都是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女性，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形象？

奥兹：没有。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对女性的理想，就像对于任何事物的理想一样，永远都在改变。早上一个理想，晚上另一个理想。冬天一个理想，夏天又一个理想。有时候，我同时会有两个理想。

三联生活周刊：年轻的时候呢？

奥兹：年轻的时候，任何女性都是我的理想。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写作和年龄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大部分人到了你这个年龄可能已经不再写作了。对你来说，变老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吗？

奥兹：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的，当然。我感觉每天都在失去一些东西。这无可避免。但我也会觉得每天都在得到一些东西，学到一些东西。如果有一天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学到时，我知道我又浪费了一天。

写作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职业。当一个理发师第30遍剪一个发型时，要比第一遍简单得多，到了第300遍时，又比第30遍更简单一些。司机、木匠都是如此，唯独作家不同。对一个作家来说，每一本书的写作只会变得更难，而不是更简单。因为他不愿意写两本同样的书，所以写作会变得越来越难。

我觉得写书就像开车，一脚踩在油门上，另一脚踩在刹车上。日久年深，经验渐长，但踩在油门上的那只脚会变得越来越小心，越来越犹豫，而踩在刹车上的那只脚则会变得越来越沉重，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也越发渴望做到完美。因此，时间不会使写作变得更简单，大概也只有写作这一种职业是这样的。□

李陀：文学的地平线（4）

文 / 朱伟



李陀

上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李陀很重要的作用是因 1986 年第六期起担任了《北京文学》的副主编。1986 年第五期前，《北京文学》的主编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副主编是王蒙与苏辛群，王蒙是兼任，主持工作的是辛群。1986 年林斤澜上任当主编，辛群退休了，老林拉了李陀当副主编，另一位副主编陈世崇原是编辑部主任。林斤澜与李陀、陈世崇搭档，成就了《北京文学》的黄金时代。

林斤澜当主编，是从 1987 年第一期使《北京文学》焕然一新的。从这一期开始，《北京文学》一下子开了五个专栏，挑头的是汪曾祺的“草木闲篇”。汪老头与林斤澜是一唱一和的老哥们儿，自然要助阵的。小说方面，李陀负责布阵，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放到了头条。这一期老林写的《新年告白》宣言，调子很低。他说：“融洽和谐，活泼宽松是春光，是百花齐放必需的气氛。到哪里去讨这气氛？原来这气氛是要自己创造出来的。”“《北京文学》能有多大能耐？一共才吃几碗干饭？不过是仰望春风拂面，有一些飘忽如柳丝的想法。”

现在回头看，李陀在小说推陈出新方面，比我们预想的要谨慎得多。《人民文学》1987 年一、二期出了大事，《北京文学》相对更显保守。不仅是第一期的亮相，之后若干期都没有重要作品的集束，记得我们当时很有出乎意料感，觉得李陀上台也不过如此。但李陀就是在不慌不忙中，将余华、苏童、刘恒，直至后来的曹乃谦、丁天，一个个把莫言、马原之后的一批人推了出来。

余华其实 1984 年就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发了一个头条《星星》，写得很稚嫩。星星原是孩子王，兴趣于邻居家孩子学琴。父母给他买了小提琴后，专致其中，如入了魔。大家都无法容忍他的琴声骚扰，于是父母就把琴卖了。孩子丢了琴想琴，后来他偶遇在电视上见到的拉琴的孩子，那孩子被他的故事感动，就邀他合拉一把琴。这样的小说可以为头条，可见当时《北京文学》的标准。那时余华还在他父亲的牙科诊所学牙医。

《十八岁出门远行》真属脱胎换骨之作。1986 年余华在《北京文学》发表《老师》，还是那种写师生温情，细节娓娓道来的小说，写年龄拉远的师生距离，仅结尾是他成熟后常用的句式：“老师死了，就如黄昏的风琴声一样消逝了。”而《十八岁出门远行》叙述已变得非常老到。这个短篇的开头令人感觉并不新奇：出门远行，搭车，那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已经是人人传诵了。但叙述过半，车坏了，坡上下来的骑车人开始抢苹果，卸车，最后司机抱着“我”的背包坐上拖拉机远去，出其不意，才醒悟他写的是荒谬。而结尾与父亲的对话，“你十八了，应该去认识外面的世界了”，又是阳光灿烂的感觉。仅 6000 字，结构上有这样意外的跌宕，当初确实有耀亮感。

《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下奠定了位置，李陀的鼓

荡起了极大的作用，他逢人便推荐。同样情况，还有1987年第二期推出的苏童的《桑园留念》。苏童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南京《青春》杂志上的，叫《第八个是铜像》，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片名。这篇《桑园留念》同样是他成熟的开端。与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营造一个空间不同，苏童的小说是叙述一个长度——从“我”第一次碰上肖弟毛头，到认识丹玉与辛辛；最后，丹玉与毛头抱在一起死了，名字刻在了石桥上；辛辛变成了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女人。苏童的小说里有性，有感伤，那时他还是纯情少年呢。余华却对性情、感伤都无兴趣。《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他已经热衷“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一年后他在1988年第一期《北京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现实一种》，还记得读他这个中篇时的颤栗心理：他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地写亲人间连环的杀戮——从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打耳光、卡喉咙起，到逼孩子去舔血，一脚把孩子“像布一样踢飞起来”；然后哥哥平静地看着狗舔足底，将捆绑的弟弟活活舔死；再然后哥哥被枪毙，医生们分解他的器官。结尾医生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莫言后来写《檀香刑》，应该由他启发的。

《北京文学》的1988年上半年特别引文坛注目：第一期发了《现实一种》，第三期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淋漓尽致地写年轻叔婶的偷情故事，最后结尾是主角杨天青裸体扎在水缸里自杀，大家发觉他的“本儿本儿大”。张艺谋后来将它拍成了《菊豆》。第六期又推出山西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每篇都仅千把字。第一篇写亲家租女人，黑旦把自家女人送走，回来的路上念叨：“球，去吧去吧，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个女儿白给了咱儿，横竖一年才一个月。”第二篇写温孩的女人黑夜不给他脱裤，不下地，下地回来还不给做饭。老一辈就说：“树得刮打刮打才直溜。”温孩就把女人打了，压在她身上说：“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以简练至极的“山药蛋”式叙述，写不动声色的真实残酷。之前已有陕西杨争光，但杨争光是《中国》推出的，曹乃谦是李陀在《北京文学》推的，不一样。这些小说也就是在林斤澜主编下的《北京文学》才能推出，还安然无恙，它们无疑给了刘心武压力。无此压力，是不会有关《人民文学》1989年的小说专号的。

李陀在《北京文学》当副主编期间，更重要的工作是为莫言、马原之后的第二拨（他的排序是余华、

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作家正名。他于1988年、1989年发表了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一篇叫《昔日顽童今何在》，“顽童”指1985年在文学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们。李陀感叹他们对1987年后文学的失语，他认为：“与1985年的变革相比，这次改变不仅更为激烈，而且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家与社会的关系、读者与作品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变革得更为彻底。”由此他对那些彼此熟谙的批评家的说法是刻薄的：“1985年才刚过去，他们似乎一下就从一群顽童跃进成为一群老头儿。”

另一篇文章叫《雪崩何处》，更明确认为，余华为首的这批作家意味着“作者文学的出现”。所谓“雪崩”，是指“工农文学时代的正式结束”，指“语言的解放”，“归根结底意味着世界的更新”。他说，“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创了现代汉语的新纪元，“今天会不会再一次重演这样的局面呢？我想有一定的可能”。

现在回头，他显然夸大了这批作家的作用。因为本是各式各样、此起彼伏、参差不一在构成着文坛。但他对这批作家的推动，无疑帮助了这批作家茁壮成长。记得在《雪崩何处》中，他坦诚记载了自己用1985年的阅读经验，初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的惶惑。他说，因此惶惑，对余华“写作的追踪和关切，也成了我对自己在写作阅读上所持的习惯立场和态度进行不断质疑的过程”。

李陀因此是他那代人中，罕见不断在甩开他人前行的。□（待续）



《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林斤澜与李陀、陈世崇搭档正式亮相，新开5个专栏，发表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李陀80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都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就叫《雪崩何处？》

大家都病有病

朱德庸



悲伤及其所创造的

文 / 李金羲 (昆明) 图 / 陈曦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这么快地离开，但他确实离开了。6月14日的中午，在昏迷12天后，姨父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这种平静似乎显得有些异乎寻常。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家人的离去，不止一次想象过自己应该要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场景，但所有的设计都是徒然的。就好像不小心碰掉一只玻璃杯，你的中枢神经还没有调整好情绪以适应状况，它就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

姨父是一名普通工人。他单调的生活连最平凡的语言都无法记述。在合适的年龄工作，在合适的年龄结婚，在合适的年龄有了孩子，却在毫无预料的年龄里结束了生命。命运之笔在他生活的白纸上枯燥地画了一条直线，而后，戛然而止，除了那个突兀的终点以外，那条线段上再也没有值得人注意的地方。

唯一让我印象清晰的是姨父爱酒。每顿饭他都会喝一大杯白酒。这已经脱离了喝酒本身的意义，似乎仅仅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醉过。我并不能准确地理解他那个被酒精浸泡的世界，不知道那种被液体放大的快感是不是真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他在那个世界里流连忘返的同时，现实的世界对他来说就越来越模糊了。

我年幼时曾与姨父有过一段亲近的日子。那时他住在离城很远的地方，在西山脚下，是个世外桃源。一放假我就会到他那里去躲开车马的喧嚣，寻找些山林里的乐趣。出于我对蟋蟀的喜爱，姨父总爱带我到山里去寻，顺便采些野生的蘑菇，他是这方面的行家，而这也是他被家里承认的、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

那时的他就像是个领路人，在我前面挡住了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我只要跟紧了他，就永远不会迷路。后来，由于年岁渐长，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开始在成长的道路上毫不松懈地发足狂奔，姨父便渐渐地成为记忆中一道一闪而过的风景。

父亲是个有家族情结的人，总想着通过家庭聚会的方式将整个家族维系到一起，而这种聚会也就成了我和姨父之间产生联系的仅有的纽带，每年我们会有

两三次见面的机会。在这种聚会上，姨父话不多（除了在要酒的时候），似乎知道自己枯燥的生活并不值得成为一个谈资。姨父的寡言少语和孤僻使他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更像是一个跌跌撞撞的闯入者，是个客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和我们出现在一起。我们的热情与慷慨更像是对他孤独的一种怜悯与施舍，而我们对他的帮助也多是出于道德上的责任感而非血脉间的联系。

当姨父躺在医院时我去见了他最后一面。他的双腿因炎症而变得肿胀溃烂，神志不清，几乎所有的器官都已经衰竭。那具枯槁的身体早已失去了弹性与光泽，生命的活力正透过他的每一个毛孔消逝。他知道我们的到来，尽可能地鼓足了力气和我们说话，但他却并不能清楚地表达，只是如呓语般地朝我们咿咿呀呀。我们走的时候，姨父猩红的眼睛里流出泪来。他知道自己即将失去什么，然而他却并不想屈服。我知道他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流泪，而是因为没有了抗争的力气。

与此同时，在另一家医院里，姨父的女儿正做着产前最后的检查。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生与死仅一墙之隔。我们在承受着一个生命即将逝去的巨大痛苦的同时，却在忐忑中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期待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这种血脉间的延续充满了种荒诞的偶然性。

最终，姨父没有等来外孙出生的喜讯。虽然他拖了足够长的时间，但还是在最后时刻被击垮了。死亡是迅速的，甚至没有为准备好的悲伤留出足够的时间。

在将姨父下葬后，我们情愿或是不情愿地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生活还在继续——只有在以后每年的某个特定时刻，我们才会将那种悲伤再重新复习一遍。

姨父姓“飞”，此刻，他的魂灵，正在另一个世界里自由地飞翔着……